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发展进阶研究

魏雪梅

(蚌埠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发展为研究视角,通过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文化底蕴,深入探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文化挑战,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文化发展进阶。研究认为,在新征程上应当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培根铸魂、繁荣文化事业与产业、通过交流互鉴保持文化开放性。研究旨在为明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发展进阶路、增强文化软实力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底蕴;文化挑战;发展进阶

中图分类号:A8;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4-0001-06

Cultural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I Xuemei

(School of Marxism,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0030, Anhui)

Abstract: Taking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examines of the cultural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nprecedented global transformations occurred in a century, it explored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approach in this paper on the new journe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believes that on the new journey,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 cultural work,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vitalizing cultural programs and industries, and maintain cultural openness through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It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clarifying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enhancing cultural soft power.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cultural basis; cultural challenge; development path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正确之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起着推动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塑造价值观念、提升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注入了强大

的改革动力,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

1 探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

文化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先声。人类现代化的进程,首先是从文化上出现端倪并取得突破的^{[1][11]}。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也是中华文化焕发活力、重铸辉煌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

收稿日期:2025-05-05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23AH053438)。

作者简介:魏雪梅(1976-),女,陕西周至人,副教授。E-mail:wxml23163@126.com

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2]这一重要论述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

1.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1.1.1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沃土

中国式现代化,生发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与意义担当。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显著特征,蕴含着丰厚的文化积淀与精神特质。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对儒家思想精华的传承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的事业,14亿多人口要共同迈向现代化。全体人民是实现现代化的主力军,同时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受益者,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这一立场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取向,更是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儒家思想精华的传承与创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对中华文化基因的传承。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华夏儿女的千年夙愿,体现着中华文化血脉的基因传承。春秋时期治国能臣管仲在《管子·治国》中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这是古代最早关于富民的思想。先贤孔子提倡“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大同思想,《礼记》中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美好愿望,《论语·颜渊》中主张“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富民思想,这些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都能探寻到共同富裕的文化根源。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沃土。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镌刻在中华文明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基因之中。《史记·管晏列传》中记载的“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汉书·食货志》中提到的“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这些讲的都是物质富足对实现精神富裕的重要性。在《论语》中,孔子称赞弟子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这彰显了古人重精神的优良传统。《墨子》中提到的“兼相爱,交相利”是古人对道德理想的不懈追求。这些思想昭示了古人重视人的内在修养和

外在修养的协调,强调了物质与精神的密不可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目的是实现永续发展。这正是对中国古人的生命哲学和自然生态观的传承与创新。《庄子·达生》中提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强调了大自然是人类生命的孕育者和养育者。《庄子·内篇·齐物论》中讲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天人合一”思想中最具代表性。《道德经》中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精辟地涵括了天、地、人乃至整个宇宙的深层次规律。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哲学思想源泉。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人心和善的民族。这些特质体现在儒家经典著作中。《论语·子路》中指出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左传·隐公六年》中讲道的“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孟子·梁惠王上篇》中提到“仁者无敌”的施政思想,都体现了中华民族讲信修睦、与邻为善、天下为公的交往和为政之道。中国政府一贯坚持通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实现现代化,在国与国相处中坚持和平相处、合作共赢,主张世界各国在文化交流互鉴中共同走向文化繁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3]。

1.1.2 “第二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根与魂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完整阐释“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4]其中“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5]。“第二个结合”开启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新维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第二个结合”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根基。党带领人民走过的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就是扎根中国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体现。在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的过程中,党始终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形成了以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彰显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独具中国风格。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又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根基坚实而稳固。

“第二个结合”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武夷山市朱熹园考察时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扎根中华大地,同时又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独立自主,又没有固步自封,而是海纳百川、包容开放。“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⁴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创,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拓宽了迈向现代化的多元路径,更向世界展现了一条既能够实现快速发展、又能坚定守护自身独立性的现代化新道路,为那些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参照,奉献了源自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与实践方案,展现出了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中国风范。

“第二个结合”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基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筑牢中国式现代化“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基础。

1.2 革命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中创造和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革命文化包括革命文物(物质形态的文化)和红色文化精神(精神形态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6]红色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以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集中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强大思想优势;践行“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使命的强大政治优势;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保持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强大精神优势;面对任何威逼利诱都会表现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崇高政治品质。蕴藏着“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和“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成功密码,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任何时候都会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更需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从革命文化中汲取前进的动力。

1.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7]首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方向指引。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一批又一批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高素质劳动者。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引导新时代青年,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青年的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其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制度是定国安邦之本,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广泛凝聚人民的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文化支撑。

2 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挑战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也史无前例地相互影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诸多文化挑战。

2.1 中华文化的碎片化呈现对青年文化自信自觉的挑战

学习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统方式包括读书、观看文艺节目、参观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址和文化展等,人们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信息是体系化的、完整的和准确的。在信息化时代,“浅阅读”成为普遍的阅读方式。然而这一系列的文化传播方式均带有碎片化的烙印,某些网络主播为了迎合观众的喜好,掐头去尾开展演播,可能会导致其传播内容有失真现象,也造成文

化传播的完整性缺失。另外过于娱乐化的传播方式限制了人们对中华文化的深入思考和准确理解。

新时代青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是新时代青年肩负新的文化使命的不竭动力。同时,新时代青年出生、成长和工作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碎片化的文化传播方式带来知识的非系统性,看似都知道,实则所知甚少,对新时代青年树立文化自信、开启文化自觉带来新的挑战。

2.2 “饭圈文化”对青年主流价值观的挑战

“饭圈”作为粉丝群体及其社交圈层的简称,其衍生的“饭圈文化”本质上指向由粉丝自发形成的组织化群体,通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为偶像提供支持、开展宣传等相关文化实践。“饭圈文化”是娱乐文化和网络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文化环境的开放性和青年人心理机制的变化等原因造成“饭圈文化”在青年群体中盛行^[8]。“饭圈文化”对当代青年人积极方面的影响,如偶像的奋斗历程能帮助粉丝树立拼搏奋斗、直面逆境的人生价值观,但是“饭圈文化”的消极影响不容小觑。首先,“饭圈文化”的幕后推手是资本运作,资本运作具有功利性,如以粉丝投入金钱的多少来衡量对偶像“爱”的等级,导致盲目消费、攀比心理、拜金主义在“饭圈”中盛行。其次,“饭圈文化”中的盲目崇拜现象冲击着青年人的道德观。偶像的“完美人设”蒙蔽了粉丝的双眼,使得某些有道德缺陷的人成为“道德标杆”。2021年的“吴亦凡事件”就是例证^①。最为严重的是,“粉丝团”人数的庞大及种类的混杂对主流价值观形成冲击或者使之被边缘化。粉丝为了追星,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时间、精力,无心无力投入学习、工作,导致思想空虚、专业荒废、工作无效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先进文化中倡导的价值观念似懂非懂。这对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带来新的挑战。

2.3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渗透的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进步,跨地域、跨国界的文化交流愈发频繁,不同文化在互动中交织互鉴、碰撞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头脑清醒,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渗透的危险。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提出:若是中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信传统文化,那美国就不战而胜了。这就是美国开启对我国文化入侵战略的体现。尼克松的预言已经落空,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入侵的企图没有停止。文化入侵的重要方式就是文化渗透,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西

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途径。西方文化渗透存在使我国传统文化被边缘化甚至消失的危险,也会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支持,甚至威胁到我国的文化安全。这种文化渗透的目的是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及和平演变,其西化、分化及和平演变的重点对象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3 探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进阶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为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振兴。

3.1 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9]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体现在政治、思想、组织多个层面。首先,政治领导是根本。我们党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制定并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文化建设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文化工作中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文化建设工作中时刻保持政治敏锐性,确保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都能与党的政治要求高度契合,为人民提供积极健康、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其次,思想领导是关键。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具体到文化工作中,就是要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凝聚人心、筑牢思想根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稳步前行,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例如,在文艺创作中,要求创作者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从生活中汲取灵感,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精神、展现人民精神风貌的优秀作品;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广泛宣传习近平文化思想,让其深入人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指南。再次,组织

领导是保障。党中央与各级党组织对各类文化机构、组织、载体实施全面领导,引领全体文化工作者及相关队伍,统筹指导文化事业与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一方面,对于文化事业,要加大投入,支持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艺术普及等工作,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对于文化产业,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文化创新,培育文化市场主体,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使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通过有效的组织领导,形成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确保文化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

3.2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动权

要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就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动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一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当今的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视思想的力量,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首先,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是确保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稳定的定海神针。其次,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时代发展要求,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其更好地指导我国的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再次,要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学校、文化场馆等阵地,传播主流思想文化,抵制错误思想的侵蚀;加强对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管理,规范网络文化秩序,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培养一批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敢于担当的意识形态工作者,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3.3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②要用现

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人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人隔空链接,能够为治国理政提供更多借鉴。如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航拍中国》,电视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经典咏流传》《国家宝藏》《唐宫夜宴》《洛神水赋》等都是穿越古今、深受观众喜爱的文化艺术精品,是传统文化创新性表达的范例。要充分运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深入开展文化资源普查梳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坚定文化自信,增进国家情怀,更好地发挥以史育人、以文化人作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让传统文化成为被遗忘的记忆,而要让它成为滋养心灵、启迪智慧、凝聚力量的源泉。只有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活起来、火起来,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坚守住自己的文化阵地,让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3.4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培根铸魂

要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弘扬以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讲好中国故事,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汲取人格力量、智慧力量、真理力量。要充分挖掘和利用红色资源,发挥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如《觉醒年代》等影视剧的镜头语言,做“觉醒青春”主题思政课的互动设计,通过全息投影还原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蘸墨吃粽”的场景,让“真理的味道非常甜”从文字变为可体验的精神共鸣,激励新时代青年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教育引导、舆论宣传等方式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弘扬社会主旋律,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要利用身边人身边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比如徒手接住坠楼儿童的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在重庆山火救援里集体冲锋的“摩托骑士”、校园里的“诚信考场”、社区里的“好人榜”、网络空间的“正能量话题挑战赛”等,都是让价值观可感可学的生动载体。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铸魂,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精神引领实践、实践丰富精神”的良性循环。

3.5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传播主流价值观念、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力量,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息息相关。2024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大力推进文化数字化,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经济发展增动能增效益、为旅游休闲增内涵增魅力、为城乡社会增正气增活力。”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如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非公有制资本成为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等,激发了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如沉浸式数字光影演绎《寻迹洛神赋》、数字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的电影《哪吒2》等,丰富了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要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如建设多功能文化中心、乡村文化书屋、乡村文化礼堂、村史馆等,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3.6 坚持交流互鉴,保持文化的开放性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主旨讲话强调:“在各国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的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对于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体现了交流互鉴在当代时代的重大意义,为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和文化开放包容提供了重要指引。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始终是发展的主旋律。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碰撞、相互学习,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成为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迈向新高度的关键力量。中国古代典籍《三国志》记载的“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便深刻体现了“和”文化的思想内涵。古“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重要通道,驼铃声声,满载着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精美商品,也传递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文化,开启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新纪元。时光流转至现代,“一带一路”倡议传承了丝路精神,为沿线各国搭建起合作共赢的桥梁,推动各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多领域深入交流,携手共创美好未来。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对开放包容理念的坚持,也展现了中国在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大国担当。

坚持交流互鉴,保持文化开放性,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路径。首先,应秉持开放的心态,尊重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差异,以平等心态看待不同文化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学习借鉴其中先进的理念、技术和经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新的活力。其次,要搭建多元交流平台,拓宽

文化传播渠道。如借助国际文化博览会、艺术节等实体平台,展示各国文化精品。利用数字技术构建线上交流空间,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等传播中华文化内容。再次,推动跨国文化产业合作,促进文明交融创新。如中国与中亚五国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合作,促进了文化融通与民心相通,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文明活力。

党的二十大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冲锋号。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蓝图。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动迎接文化领域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推进文化自信自立自强,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添砖加瓦。

注释:

- ① 2021年吴亦凡事件:2021年7月,吴亦凡性丑闻曝光后,在警方官方通报之前,吴亦凡上千万粉丝团,为了给吴亦凡“洗白”,矢口否认受害人摆出的事实,网暴受害人,做出了违法乱纪的行为。
- ②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中国式现代化面对面[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
- [2] 习近平.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299.
- [3] 张文显. 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概念和丰富内涵[J]. 理论导报,2022(10):34-37.
- [4]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4.
- [5]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4-11.
- [6] 习近平.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 求是,2024(8):9.
- [7] 习近平. 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5-10-15(2).
- [8] 陈青紫. “饭圈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其引导机制研究[D]. 北京:华北电力大学,2023.
- [9] 习近平. 坚定文化自信 秉承开放包容 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强大精神动力 有利文化条件[N]. 人民日报,2023-10-09(1).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

王万春*, 高 莉

(滁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滁州 239000)

摘 要: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与高校思政课联系紧密,是助力高校思政课的先进教学资源。将红色文化资源有效融入到高校思政课,在加强意识形态引领,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强化情感认同,厚植文化自信;丰富思政课教育教学资源,提升思政课实效性和感染力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意蕴。从立足思政课教学主阵地,优化课程教学资源;加强资源整合,拓展红色实践教学;创新教育载体,搭建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平台等方面探讨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有效路径,凝聚育人合力。

关键词:高校思政课;红色文化资源;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4-0007-06

The Practical Path of Integrating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Civics Clas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Wanchun*, GAO Li

(School of Marxism,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239000, Anhui)

Abstract: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re valuabl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wealt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advanced teaching resource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has important value implications in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guidance,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enhancing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deep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enriching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sources, and enhancing classroom effectiveness and appeal. The effective path of integration can be explored through three aspects: optimising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ources, based on the main posi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strengthening resource integration, expanding red practical teaching; innovating educational carriers, and building a digital platform for red cul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practical paths

2024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1]。高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与红色文化资源在思想基础、价值导向与核心内容上都具有一致性。积极探寻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政课的融

合路径,可以有效提升思政课实效性,促进大学生传承好红色基因。

1 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政课的内在耦合

高校思政课融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于一体,肩负着铸魂育人的重要职责。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对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凝炼所形成的各种物

收稿日期:2025-04-20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重点项目(2023sxzz062)。

作者简介:王万春(1996-),女,安徽宿州人,助教,硕士。E-mail:3288758092@qq.com

质及其精神载体的总和,与高校思政课在思想基础、价值导向、核心内容方面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耦合关系,是助力高校思政课的重要教学资源。

1.1 思想基础的一致性

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政课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一方面,高校思政课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宣传、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公共基础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新时代砥柱新人的主渠道。另一方面,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风雨征程中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珍贵财富,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浴血奋战、不懈奋斗铸就了红色物质文化资源、精神文化资源、制度文化资源,彰显着鲜明的政治属性和深远的教育意义。红色物质文化资源表现为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主要包括革命烈士陵园、纪念馆、革命先辈故居、革命遗址以及革命文物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红色精神文化资源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长征精神、红岩精神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的“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等。进入新时代,红色精神融入了伟大建党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红色精神是红色文化之魂,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奋往直前的精神动力。制度文化资源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中制定下来的法规制度,用来规范、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的言行举止。红色文化资源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历史见证,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品格。基于此,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政课在指导思想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1.2 价值导向的一致性

高校思政课是融合理论知识传授与人生价值引领于一体的关键课程,不仅要对学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更重要的是在理论教学过程中通过运用多种方式手段引领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信仰,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从而自觉继承优良传统,展现时代风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任挺膺担当、有为善为,进而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内在要求。红色文化资源印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承载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体现了革命先辈勇担历史使命的责任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与顽强意志,蕴含了丰富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有其特有的育人功能与价值导向,可以超越时空激

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帮助学生深刻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进而自觉以革命先烈为榜样,积极发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努力肩负起时代重任。因此从价值引领上看,二者是高度一致的。

1.3 核心内容的契合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是对大学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帮助学生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更系统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革命斗争史、艰苦创业史、改革创新史,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中所发生的历史变革与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的根本问题,进而增强历史自觉,坚定历史自信,凝聚成艰苦奋斗、锐意创新的磅礴精神力量,积极投身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红色文化资源中的革命遗址、烈士陵园、馆藏文物等承载着革命历史的记忆,其中包含的革命精神、优良传统等核心内容浓缩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情怀、砥砺前行、理想信念的生动体现,与高校思政课所要传递的教育内容高度契合。在高校思政课中有效融入红色文化资源,既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又有利于引导学生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因此,从教育内容层面而言,二者呈现一致性。

2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

高校思政课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任务,红色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是助力思政课立德树人重要教学资源,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意蕴。

2.1 加强意识形态引领,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仍面临着严峻挑战。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加剧,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树立面临着多元化社会思潮、复杂化网络环境的挑战。由于其知识水平、社会阅历以及年龄的限制,对诸多良莠不齐的政治观点不能独立进行理智的价值判断,极易被不良信息所迷惑,从而动摇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经验表明,“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把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始终坚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发展与创新。”^[2] 高校思政

课作为宣扬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必须确保思政课建设始终坚持正确思想引领和价值导向,不断提升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红色文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是“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成果,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融合。其发展既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相统一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追求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信念的实践过程,作为一种历史底蕴厚重且教育意义深远的特殊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天然载体和重要素材。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批批革命先辈前赴后继,他们始终怀着崇高理想与坚定信念,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顽强斗争,开拓奋进,留下了丰富的物质、精神和制度资源。这些红色文化资源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百年风雨征程,是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见证。以滁州地区为例,滁州作为皖东革命老区,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涵盖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小岗村改革精神发源地等 78 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 9 座革命纪念馆,承载了新四军“铁军精神”、小岗村“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创新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将地域红色文化与思政课教学有机结合,诸如讲述刘少奇、罗炳辉等革命先辈在皖东的先进事迹,介绍半塔保卫战、定远自卫反击战等历史事件,描绘小岗村的时代变迁等,一方面可帮助大学生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历史必然性,从而筑牢政治思想基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增强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另一方面,红色文化中所体现的先进精神与榜样力量也有利于激励大学生增强责任意识,树立远大志向,自觉肩负起历史使命。

2.2 强化情感认同,厚植文化自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生生不息、得以延续的精神命脉,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文化根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注入全新活力,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入了更为深厚的文化滋养。2023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是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新高度的重要体现。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产物,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成果。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既承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又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理论的影响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成为激励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以滁州地区红色文化为例,新四军在滁州开展抗日斗争时,充分发动当地群众,组织起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领导皖东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人民性,也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将红色文化有机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以生动形象的案例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可以帮助大学生有效破除对书本理论的抽象认知,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展现的伟大创造力,系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厚历史渊源和文化脉络,明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丰富内涵与实现途径,把握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优势,进而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积极传承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并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承担起历史使命,推进文化创新,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挺膺担当。

2.3 丰富思政课教育教学资源,提升思政课实效性和感染力

为了满足思政课改革创新的迫切要求,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高校思政课必须坚守政治立场、明晰阵地战位,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回应好满足好大学生在成长发展过程中的知识诉求与心理需求,做好思想统一与价值引导,因此教学过程中教学资源的筛选十分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4]思政课教学效果的优劣与教学资源的选择息息相关。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基因和厚重的中华文化底蕴,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艰难岁月与光辉历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顽强不屈的生命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产物,是丰富思政课教学、加强师生之间情感互动的绝佳资源。将晦涩难懂、较为抽象的教学理论同红色事迹、红色人物相融合,可以创设丰富多样的教学情境,让教学内容变得更直观、更鲜活、更有温度,从而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让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走进学生的头脑中,在情理结合中有效地增强思政课的实效性和感染力。同时,红色文化资源中的革命遗址、先辈故居等红色教育基地极大地拓展了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场所,将课堂从室

内延伸到了室外,使教学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课堂理论传授。以滁州地区为例,高校可组织学生实地参观半塔保卫战旧址、周家岗革命纪念馆、小岗村等红色教育基地,学生通过沉浸式观看珍贵的革命文物和历史照片,能更直观地理解“群众路线”“农村包围城市”等党的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更深刻地感受到革命先辈们的英勇壮烈和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更真切地体会到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和中国精神的伟大力量,从而激励学生不断提升精神境界,牢固树立远大理想,以实际行动践行报国之志。

3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路径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深入挖掘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及旅游价值。红色文化资源同高校思政课相融合,是传承红色血脉、发挥其育人价值的重要途径。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有效路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

3.1 立足思政课教学主阵地,优化课程教学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5]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师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持知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原则,不断优化课程教学资源。课堂教学是对学生传播思想、传授知识的主渠道,因此思政课教师要结合地域特色、教学知识点以及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系统挖掘地方性红色文化资源,把其中典型的革命事迹、英雄模范等同教学内容相统一,把抽象深奥的书本理论通过生动鲜活的红色事迹来讲述,既丰富了教学内容,烘托了课堂氛围,也增添了课堂吸引力,促进大学生真听真懂真信,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从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来看,高校各门思政课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因此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既需要把握好各门思政课特点以及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也需要结合地域优势进一步优化课程教学资源,从而实现各门思政课同向同行,凝聚育人合力。以滁州地区为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以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为主线,可以将滁州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的发展现状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史中,引导学生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积极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发展,进而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自觉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文化使命。《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主线,通过结合新四军在滁州的战斗策略以及根据地建设经验,如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首创“三三制”政权模式,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理论、群众路线智慧与统一战线实践等知识点,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可以增设“皖东革命史”专题,剖析刘少奇、徐海东等革命家在滁州的革命实践活动,如定远自卫反击战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在皖东的攻势,促成了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在华中敌后第一次树起了新民主政权的旗帜。通过生动的革命事迹帮助大学生感悟饱含血泪的艰难抗争年代,从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自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可结合半塔保卫战以及小岗村的改革变迁,系统讲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励学生勇作弘扬和践行中国精神的时代先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可用唯物史观解读小岗村“大包干”改革的实践逻辑,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的哲学原理。通过融入地方性的红色文化资源,可以进一步丰富教学内容,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使学生切身感受到中华文化的蓬勃生命力,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和中华民族认同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思政课理论教学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3.2 加强资源整合,拓展红色实践教学

高校思政课不仅包括课堂教学,同时也要大力丰富课外实践,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连接起来。一方面,在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新形势下,各高等学校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校地协同合作,结合地域特色共建共享红色实践育人基地,将红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高校“大思政课”资源优势。以滁州地区为例,高校可以革命遗址、烈士纪念馆、地方博物馆等场地为重要依托,如凤阳县小岗村、定远县藕塘烈士陵园、来安县半塔保卫战旧址等,与其共建实践基地与教研平台。通过“暑期三下乡”活动以及重要纪念日,组织学生前往基地开展具有教育意义的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如担任红色文化讲解员,向游客讲述滁州地区的革命历史和红色故事;参与革命文物保护调研等实践项目。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学生不仅对地域红色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能切身体会到革命先辈们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事业所作出的伟大奉献,在潜移默化中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坚定政治立场,从而夯实信仰之基。另一方面,学校、二级院系以及党团社团组织等可以

结合时事和专业特点,广泛开展如“红色诗歌朗诵会”“音乐思政课”“党史学习知识竞赛”等校园文化活动。通过这些主题活动,大学生不仅可以锻炼专业能力,也能够进一步感悟红色精神的伟大力量,深刻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史和新中国的来之不易,在追寻红色记忆的过程中强化政治认同,提升精神追求,展现出时代新人的责任担当,为社会主义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同时积极建设红色文化校园环境,可打造红色文化长廊、改革精神主题雕塑等标志性建筑,并利用校园文化墙、宣传栏、校广播等积极宣传地方红色历史故事、革命英雄事迹、先进人物模范等,营造浓厚的校园红色文化氛围,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潜移默化地提升政治素养,自觉以革命前辈为榜样,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把红色基因深深地融入到血脉里。

3.3 创新教育载体,搭建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6]在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不仅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渠道,而且有力地拓展了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途径。一方面,各地高校可强化数字化技术赋能,结合地域特色搭建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共享平台,通过整合利用当地先进事迹、英雄人物、红色文献、红色研学基地、文物 3D 模型等资源,建设立体化红色文化数据库。通过云计算分析处理收集到的数据,可以精准找出其中的规律,既助力思政课教师在教学质量、学术研究等方面实现智能化的突破,也拓展了大学生学习红色文化的渠道,为其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学习资源,极大地增强了高校思政课的实效性。同时思政课教师应不断提升数字化技能,充分发挥现代数字技术带来的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如将 Deepseek 接入课堂教学中,创设智能交互式情境,AI 助教可化身虚拟革命人物与学生进行“跨时空对

话”或利用 AI 重现革命场景,塑造“师-生-AI”协同的新型教育生态,使学生在丰富的教学情境中直观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艰难抗争,增强其学习红色文化的代入感和参与感,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高校思政课的感染力。另一方面,高校可借助学校官网、抖音等平台开设以知识普及、文化交流为目的的红色文化主题专栏。如滁州地区高校可以锚定新四军在皖东、小岗精神等红色文化,鼓励学生立足地域特色,把当地红色文化资源与思政课教学内容有机融合后,通过短视频、微电影等方式展现出来,并通过专栏积极传播既有深度又有温度的优质红色网络作品。这既贴合新时代大学生对数字时尚的追求,以新颖的形式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也使得红色文化教育通过数字化形态变得生动鲜活起来,有力调动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对高校思政课的理论兴趣与价值认同。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N]. 人民日报, 2024-05-12(1).
- [2] 冯留建,孙海星. 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建构的逻辑理路[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2): 7-13, 126.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4] 习近平. 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扎实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N]. 人民日报, 2014-12-16(1).
- [5]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N]. 人民日报, 2020-08-31(1).
- [6] 习近平.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16-12-09(1).

思政元素融入育人载体的创新实践探索 ——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

侯芳*, 沈琪

(蚌埠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以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探讨思政元素融入育人载体的创新实践。影片蕴含丰富哲学思想,其唯物论底色、辩证法思想、价值观引领和方法论启示,为思政教育提供了生动的育人素材。影片契合了“第二个结合”要求,契合了开展“大思政课”教学、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完善“三全育人”机制的时代主题,通过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的双重机制构建,实现思政教育的隐性渗透与深度融合。哪吒的成长历程展现了生命教育、家国情怀、奋斗精神和文化自信等思政元素,实现了艺术表达与价值传播的统一,为新时代思政教育载体创新提供了示范范本,彰显了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教育语境中的转化效能。

关键词:《哪吒2》;思政元素;育人载体;创新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4-0012-05

Innovative Practices of Integrating Civic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Nurture Careers Taking *NeZha: Mo Tong Nao Hai* as an Example

HOU Fang*, SHEN Qi

(School of Marxism,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was analyzed for integrating the elements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to the carrier of human education, taking *NeZha: Mo Tong Nao Hai* as a case study. The film is replete with philosophical ideas, and its materialistic undertones, dialectical ideas, values and methodological revelations provide vivid nurturing materials for Civic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film is noteworthy for its alignment with the “Second Integra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theme of the teaching of “big ideology and politics class”. It is argued that the film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classes in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and perfects the mechanism of “three-pronged educating people”. The dual mechanisms of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value recognition, implicitly penetrating and integrating Civic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e realised. The character of Nezha’s journey of growth is emblematic of the elements of life education, national sentiment, spirit of struggle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thereby demonstrating the unity of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value dissemination. This provides a practical model for the innovation of carriers of Civic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highlight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valu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modern context.

Key words: *NeZha: Mo Tong Nao Hai*; elements of civics; the carrier of human education; innovative practices

收稿日期:2025-03-31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质量工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项目(2023sxzz074);蚌埠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23jyxm34)。

作者简介:侯芳(1981-),女,安徽蚌埠人,讲师,硕士。E-mail:2118688101@qq.com

在《哪吒之魔童降世》创下中国动画电影史的票房纪录和高光时刻后,其续作《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延续了颠覆性的叙事风格,以“天劫重生”为核心叙事线索,讲述哪吒和敖丙在元神溃散后重塑肉身、对抗宿命枷锁的成长故事。影片展现了哪吒从“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个体抗争,到“小爷是魔,那又如何”守护苍生的责任觉醒,最终完成从“叛逆者”到“守护者”的精神蜕变。影片突破传统说教模式,通过重构神话叙事中的精神基因,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内核转化为具象化的情感符号。既以“若命运不公,便和它奋斗到底”的抗争精神传递个体价值追求,又通过“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集体协作场景,隐性渗透团结奋斗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这种将思政元素融入故事叙事的创作手法,打破了思政教育与艺术作品的边界,使影片不仅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更成为兼具审美价值与育人功能的“移动思政课堂”。这种艺术表达与价值传播层面的双重突破,为新时代思政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学素材,彰显了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语境下的转化与创新价值。

1 作品中思政元素的融入

在“大思政课”建设背景下,优秀文艺作品作为意识形态载体正显现出独特的教育价值。《哪吒2》以其叙事创新实现了哲学话语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其现象级传播效应为思政教育创新提供了具象化的研究样本。通过深入挖掘影片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探寻其与“大思政课”教学体系的融合路径,进而为新时代思政教育创新提供可借鉴的范式参照。

1.1 唯物论底色:破除宿命论的实践精神

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哪吒2》对传统神话进行了唯物论重构,将“天劫”这一抽象概念具象化为可观测、可干预的能量现象。影片通过法器改造、阵法协作等手段实现对抗,既保留了神话叙事的神秘感,又注入了理性精神。这种“物质第一性”的呈现消解了传统宿命论的神秘性,赋予观众“人定胜天”的实践力量感,强调人类在面对客观世界时的能动性与创造力。

实践对意识的改造作用。哪吒的成长轨迹深刻体现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内核,从“魔童”到“救世者”的转变,并非依赖神谕或顿悟,而是通过与百姓共同对抗危机的实践完成身份重构。这种实践论的叙事策略,使观众看到个体的价值观和意识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塑造和升华,个体应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坚定信念。

反“机械决定论”的叙事。角色命运不再受制于“灵珠或魔丸”的先天设定,如敖丙挣脱龙族复仇枷锁选择生态修复的情节,强调后天环境与主观能动性对命运的重构。这种叙事打破了传统的宿命论观念,赋予角色更多的自主性和可能性。并为当代青年突破固化的思维定式提供了哲学参照,命运并非一成不变,后天的努力、环境的影响以及个人的选择都能对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1.2 辩证法思想:矛盾驱动的动态平衡

对立统一的身份困境。影片以哪吒的身份困境为核心构建了多重矛盾体系,如灵珠与魔丸的对立、个体自由与社会规训的冲突,展现出矛盾双方相互渗透、转化的辩证关系。哪吒作为魔丸转世,既有魔丸的邪恶力量,也有人的善良本性,两者相互斗争,最终达到平衡。这体现了道家“阴阳相生”的哲学思想,认为世间万物皆由阴阳两种对立统一的力量构成,善恶、美丑、正邪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1]84}。

量变到质变的成长逻辑。哪吒在绝境中喊出“若命运不公,便和他斗到底”,呼应了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哲思^{[2]63}。影片将死亡威胁转化为自我超越的契机,哪吒通过肉身重塑实现涅槃,隐喻现代人在危机中寻找本真存在的可能。哪吒从愤怒的被动反抗到理性的主动破局,说明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会引起质的飞跃。因此在面对问题时,要注重量的积累,同时也要警惕量变引发的负面质变。

否定之否定的升华路径。李靖夫妇从“保护幼子”到“放手让哪吒承担三界责任”的转变,体现了家庭教育观从“过度干预”到“尊重规律”的螺旋上升,暗合辩证法的扬弃逻辑。哪吒的成长路径蕴含三层哲理:其一,个体身份的建构权在于自我定义,如“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台词;其二,真正的强大源于对自我与世界的坦然接纳;其三,破除偏见需建立在理性认知之上。这些哲学命题使影片超越了娱乐属性,成为兼具思想深度与教育价值的载体。

1.3 价值观引领:重构英雄主义的时代内涵

个体价值与社会责任的统一。哪吒早期执着于挣脱“魔丸”标签,这种反抗本质上是个体意识的觉醒。而当陈塘关百姓陷入危机时,哪吒选择挺身而出,这一转变实现了从个体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跨越。在面对“天元鼎”即将吞噬一切的危急时刻,哪吒与强敌展开殊死搏斗,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蜕变。这种选择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自我牺牲,通过“神格化”实现了个体价值与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

社会正义的觉醒。影片中哪吒对抗的不仅是父

权或宿命,更是整个仙界体系所代表的“规则”。这种对结构性压迫的反抗,影射了现实社会中阶层固化与资源分配不公问题。哪吒与敖丙的觉醒,批判了规则制定者的虚伪性,呼吁打破“出身决定论”与“唯权威论”,体现了对平等、公平的追求,强调了个体自主性与规则动态性的辩证关系。

身份重构与代际和解。哪吒对“魔丸”标签的接纳,以及“小爷是魔,那又如何”的呐喊,体现了对传统善恶二元论的解构。这种自我认同的深化,隐喻了当代年轻人对标签化社会评价体系的反抗,强调了个体的复杂性与主体性。影片还通过哪吒与父母的亲情线,从李靖夫妇对哪吒的接纳与牺牲,体现了家庭关系的现代重构,即从“父权压制”到“代际和解”。这一转变不仅是对传统家庭观念的挑战,更是对当代家庭中平等、尊重与理解的呼唤。

1.4 方法论启示:解决问题的东方智慧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混沌”无形无相的特性,角色放弃武力镇压,转而从山河社稷图重构其记忆本源,体现从现象到本质的辩证思维。哪吒“小爷是魔,又怎么样”和“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具象化表达。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强调个体通过自由选择定义自身^{[3]619}。哪吒从被动接受“魔丸”标签到主动拥抱自我身份,完成了从他者定义到自我赋权的主体性建构,展现了个体在命运面前的主体能动性和反抗精神。

系统思维与协同实践。最终胜利依赖哪吒、敖丙、人族与龙族的多方协作,凸显“和而不同”的传统智慧与现代协同创新观念的深度融合。面对超越个体能力的系统性危机,影片通过跨族群合作、资源互补与目标共享的叙事策略,揭示了复杂问题解决的系统性路径。这种系统思维和协同实践的方法论对于现实生活和教育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批判性继承传统文化。影片对“封神榜”体系进行重构——将封神从终点转化为责任起点,暗喻对待传统应取其精华、超越形式桎梏。玉虚宫的崩塌不仅是对神权体系的批判,更解构了传统神话中神-妖二元对立的叙事。福柯认为分类体系本质上是权力规训的工具^{[4]164},而哪吒的觉醒象征着个体对文化暴力的反抗,揭示了善恶不由身份决定,而取决于行动本身。

2 思政课元素融入影视作品的创新实践及其理论依据

2.1 贯彻“第二个结合”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定

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5]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思政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筑牢中华文化根基。《哪吒2》的成功正是践行“第二个结合”的生动范例,影片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传统奋斗精神相结合,通过哪吒的成长轨迹诠释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原理。这种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传统文化精髓相融合的叙事策略,与《“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以动漫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高度契合^[6]。此外,《哪吒2》团队自主研发的“动态水墨渲染引擎”,赋予角色和场景更生动的视觉效果。这种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传统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实践,既展示了“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的转型成果,又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的重要论述^[7]。思政课教师通过解析影片制作背后的科技突破,能够有效引导学生理解“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深刻内涵。

2.2 开展“大思政课”教学的应有之义

“大思政课”是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必然趋势,更是贯彻铸魂育人、立德树人的重要理念和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大思政课”是依据个体思想政治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规律,以学生成长为时空维度,集合课内课外、校内校外以及线上线下的多元思政教育资源,构建起贯穿大中小学各学段的纵向思政课程,并实现学校与社会之间的横向联通。这一课程是在传统思政课堂基础上的进一步守正创新,仍属于思政课,具有思政课的本质属性和功能。

由于传统的思政课堂往往以说教为主,容易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教学效果一般。因此,走出思政小课堂,进入社会思政大课堂成为思政课改革的必然选择。《哪吒2》为思政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这种以优秀文艺作品为载体的教育转化模式,能够有效突破理论灌输的局限,通过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实现思政教育的“润物无声”。

2.3 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育的有益尝试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是指将全国各个年级阶段的思想政治课程整合到同一体系。从横向角度

看,它强调连贯性、促进交流与协同合作;而从纵向的视角看,则要求掌握思想政治课程一体化的总体原则,进行全面的课程目标与内容体系的规划,并加强不同学段之间的衔接。这一教学模式旨在消除年级之间的时间壁垒,将多个年级的思想政治课程整合到一个整体性的课程框架下进行教学,以便各年级学生可以更加系统地理解和掌握教学内容,从而提升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以电影《哪吒2》为载体,挖掘其哲学意蕴与思政价值作为共同教育素材,针对不同学段学生开展不同侧重点的思政教育活动,能促进和实现教育资源共享。这种资源共享既有助于打破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之间的壁垒,促进各阶段思政教育的衔接与贯通,又能够吸引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使思政教育更加生动有趣。

2.4 完善“三全育人”机制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8]这是一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多主体、多环节、多要素、多层次的综合性育人模式。在《哪吒2》中,哪吒的父母李靖夫妇代表了家庭在育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对哪吒的教育方式体现了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即使哪吒被视为魔丸转世,他们依然坚信哪吒的善良与潜力,始终给予他支持和理解。

此外,电影中申小豹的戏份虽然不多,但也通过申公豹自身的行为为孩子树立了榜样,充分体现了榜样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这些内容体现了全员育人的理念,强调教育不仅是学校的职责,更是家庭、学校与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性过程。又如哪吒从一个被社会偏见束缚的孩子,到最终接受自己的魔丸身份。这一转变体现了接纳自我对于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暗示了教育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需要家长和孩子在相互陪伴中共同成长。这体现了全过程育人,即教育应当贯穿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而不是某一阶段的任务。再如哪吒的父母不仅在情感上给予支持,还在行动上尊重哪吒的个性,给予他自由探索的空间,支持他自由发展。同时,电影也通过哪吒的成长故事,传递了关于挫折教育和自我成长的理念,鼓励孩子在实践中学习,在失败中积累经验。这体现了全方位育人,即教育应当从多个角度出发,关注孩子的全面成长,而不是某一方面成长。

3 影视作品中融入思政课实践探索的多维审视

3.1 生命教育与感恩教育双重赋能的融入

影片中,哪吒在历经重重磨难时,对生命的执着追求展现得淋漓尽致。面对强敌与绝境,他未曾有过一丝放弃生命的念头,每一次战斗都全力以赴,这种坚韧诠释了对生命的高度珍视。以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呐喊为切入点,结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存在决定意识”原理,解析其从“被动接受魔丸标签”到“主动建构生命意义”的转变,论证“生命价值源于主体实践”的核心观点。这种生命观的具象化呈现能够有效回应现实生活中部分青少年因挫折而产生的认知困境,为思政课提供了直观的情感素材。通过引导学生反思自身对生命的态度,引导他们珍视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强化生命仅有一次的认知基础。懂得感恩亦是影片传达的重要思政价值。哪吒在成长过程中,父母的无私付出是他成长的力量源泉。殷夫人化作仙丹前的母子诀别,通过“娘从来没在乎你是仙是魔,娘只知道,你是娘的儿”这一深情告白,将母爱的无私和无条件性具象化。这种情感表达不仅深化了哪吒对父母的敬爱,也为学生提供了家庭伦理教育的生动样本。敖丙与哪吒之间的友情同样令人动容,当哪吒喊出“助我破鼎”后的生死相依,用行动诠释着对彼此的信任与感恩。对于学生而言,他们在生活中也接受着来自各方的关爱,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老师谆谆教导的付出、朋友在困难时刻的陪伴,这些点滴关爱都应成为学生感恩的对象。《哪吒2》通过将抽象的思政理念融入生动的情节与角色塑造,实现了从知识传授到情感共鸣的价值转化。当学生看到哪吒对生命的坚守,便会反思自身对生命的态度;当感受到哪吒与身边人之间的情感羁绊,也会审视自己的感恩之心。思政教育借助观看电影这一艺术形式,实现了从知识到情感、从认知到行动的转化,切实达到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的目标,助力学生成长为珍视生命、心怀感恩的社会栋梁。

3.2 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的辩证统一

哪吒最初的反抗是源于对命运不公的不甘,他渴望挣脱他人强加的“魔丸”标签,追求个人自由而反抗命运,体现个体主体性的初步觉醒,这是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当陈塘关的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哪吒毅然决然地放下个人恩怨与私欲,舍小我为大我,投身于拯救苍生的行动之中。这种从追求个人自由到担当家国责任,正是在社会实践中实现

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对比哪吒的行为转变,可以组织“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是否对立”辩论赛,引导学生运用辩证法理解“小我”与“大我”的对立统一。《哪吒 2》将家国情怀的情感表达巧妙地依托于角色间的亲情与友情架构,实现了抽象情感的具象化呈现。哪吒与父母之间尽管经历了诸多误解与冲突,但在关键时刻,父母的信任与支持成为哪吒内心最坚实的依靠。殷夫人对哪吒无私的母爱,李靖为儿子不惜牺牲一切的父爱,这种亲情的滋养使哪吒深切体悟到家的温暖与力量,进而明晰守护家庭与亲人的责任。

同样,敖丙与龙族之间复杂而厚重的亲情纽带,以及哪吒与敖丙跨越种族的友情,都为家国情怀注入了丰富的情感内涵。他们在困境中相互扶持、不离不弃,这种真挚情感让观众真切感受到家国情怀并非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而是蕴含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关爱与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将《哪吒 2》所传递的奉献与担当精神融入思政课实践,组织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路径。通过学校服务、环保行动等实践活动,学生可以从关注自身需求转向关注他人与社会。这种实践不仅让学生体会到奉献的快乐,也帮助他们理解个人行为对集体与社会的积极影响,从而在实践中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真正将影片中倡导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长为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青年,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3 追求正义勇于奋斗的精神

哪吒自出生起就被“魔丸转世”的天命束缚,陈塘关百姓因其身份对他充满误解与敌意,但是哪吒并未屈服于这不公的天命,喊出了“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若天理不容,我便逆转这乾坤”,本质上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客观世界的哲学表达。在面对各种艰难险阻时,无论是与强大的敌人战斗,还是突破自身的心魔困境,哪吒始终秉持顽强的抗争精神,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努力打破外界的偏见,用行动证明自己并非天命所定的“恶”^[9]。影片通过哪吒的蜕变过程证明思政教育中的奋斗精神培养,引导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建构,在质疑与实践中实现自我觉醒。这种精神与思政课所倡导的奋斗创造幸福生活的理念高度契合,抓住这一思政元素融入的切入点,引导学生分析哪吒在面对强大敌人与自身心魔困境时的抗争精神。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就好比哪吒面对的天命束缚,这些困难看似强大,但并非不可战胜。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哪吒的奋斗精神如何在现实中激励他们克服困

难。通过这种对比分析,让学生认识到奋斗精神的重要性。只要怀揣坚定信念,付出不懈努力,就能够冲破重重阻碍,改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

哪吒凭借奋斗与抗争精神改变命运时,这不仅是个体的宣言,更是新时代青年打破“躺平”“摆烂”等消极心态的精神指引,激励他们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奋勇前行。《哪吒 2》以其深刻的主题和生动的故事,为思政教育中奋斗精神与正义观念的培养提供了宝贵资源。思政课可借助这一资源,组织学生开展主题讨论,分享从哪吒故事获得的启示以及如何将这种精神运用到学习和生活中。通过这种方式,将影片中抽象的奋斗与抗争精神具象化为学生的日常行为,使其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精神动力,激励他们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奋勇前行,用奋斗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并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敢于奋斗的新时代青年。

3.4 对文化自信与核心价值认同的强化

影片《哪吒 2》在细节处尽显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哪吒独特的造型设计,如火尖枪、混天绫等法宝源自传统文化元素,经精心改良后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心理。影片中宏大的山河场景、精美的服饰纹理,搭配悠扬的传统音乐,将观众带入一个充满奇幻色彩又极具文化特色的世界,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神话的独特魅力。这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使青少年观众在欣赏影片的同时,自然而然地被中华文化所吸引,进而激发内心深处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与自豪,为坚定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哪吒 2》巧妙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以个性解放、平等尊重等现代理念贯穿故事始终。哪吒不再是传统礼教下的被束缚者,而是拥有独立思考能力、敢于追求自由平等的少年英雄。这种融合为思政课提供了绝佳鲜活范例,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与意义,认识到传统文化并非与现代生活脱节,而是能够为现代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与价值支撑。

在思政课堂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析影片中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理念的结合点,探讨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例如,分析哪吒的个性解放如何体现现代平等理念,以及这种融合如何促进社会进步。此外,影片中哪吒与敖丙从对立到合作的情节设置,生动展现了不同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他们代表不同的立场与背景,却在经历磨难后携手共进,体现了多元价值观的和谐共存。这一情节映射到现实生活中,有助于引导学生理解社会主义 (下转第 39 页)

概念隐喻理论视角下《诗经》中水隐喻认知分析研究

范敏*, 郭嵘

(蚌埠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基于概念隐喻理论,结合《诗经》中典型的情感隐喻,探讨水意象如何作为隐喻载体,承载“爱情是水”“悲伤是水”“思念是水”和“怨恨是水”等情感隐喻的映射。通过分析这些隐喻映射,揭示了水隐喻背后深藏的哲学和文化内涵,旨在加深对《诗经》中水隐喻的认知与理解,同时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隐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

关键词:概念隐喻理论;水隐喻;认知;《诗经》

中图分类号:H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4-0017-04

Water Metaphors in *Shij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FAN Min*, GUO R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it examined how water imagery serves as a metaphorical vehicle in *Shijing*, to express emotional metaphors in this paper such as “love is water” “sadness is water” “longing is water” and “resentment is water” in *Shij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se metaphorical mappings, it further uncovered the 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underlying water metaphors. The study aim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water metaphors in *Shijing* and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for metaphor research i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Key words: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water metaphor; cognition; *Shijing*

从先秦时期起,“水”作为一种象征意象便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诗经》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中国历史上首部诗歌总集,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象,其中水意象频繁出现,涉及了黄河、长江、淮水等二十多条大江大河,产生了众多与“水”相关的意象隐喻,成为先民在江河两岸繁衍生息、劳作耕耘的历史写照^[1]。因此,“水”意象作为诗作者表达情感和思想的重要载体,在《诗经》中的地位不容忽视。

近年来,随着隐喻研究的深入,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其中,以“水”为载体的意象隐喻研究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然而,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修辞学、语义结构分析以及跨文化比较等方面,尽管这些研究为我们

理解水隐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但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仍处于相对薄弱的阶段,亟需进一步深入和拓展。因此,结合概念隐喻理论,选取《诗经》中的典型“水是情感”概念隐喻实例进行认知分析,探索不同类型的“水”隐喻背后隐藏的认知和文化因素,为深入理解人类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模式提供新的视角,为隐喻研究本土化探索提供理论支持。

1 理论基础——概念隐喻理论

隐喻作为语言表达中的一种重要修辞手段,常被用于增加语言的表现力。然而,直到 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在其开创性著作 *Metaphors We Live By* 中提出了隐喻的认知功能^{[3]168},传统的隐喻

收稿日期:2025-03-13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范敏(1981-),女,山东新泰人,副教授,硕士。

作者简介: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点项目(2024AH052815)。E-mail:fanminbbxy@126.com

观念才得以颠覆。根据 Lakoff & Johnson 的理论,隐喻不仅是语言中的修饰性元素,而且会通过借用一个具体、易于感知的概念域(源域),来构建并传达一个抽象、复杂的概念域(目标域)。因此隐喻应该被视为一种帮助个体在日常体验中理解和表达世界的认知工具。在概念隐喻的框架中,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关系并非随意构建,而是根植于人类的感知、经验及认知规律之中。隐喻的映射遵循若干认知原则,其中最为关键的为恒定原则(invariance principle)与目标域优先原则(Target Domain Overrides)。恒定原则认为,隐喻的映射需遵循一定的认知结构和规则,确保隐喻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避免源域与目标域间出现不必要的冲突或混乱。而目标域优先原则则意味着目标域的认知框架在映射中占据主导地位,源域的选择与映射的细节均服务于目标域的认知需求和理解便利性。概念隐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化的认知网络。这种系统性特征使得隐喻的映射不仅是简单的个体认知表达,而是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整体结构,具有内在的逻辑性与规律性。同时隐喻的建构与使用深受文化背景的影响,不同文化共同体的人们往往会发展出具有显著差异的概念隐喻。

总之,概念隐喻理论突破了语言层面传统隐喻的修辞功能,深入涉及人类的思维、行为以及文化表征之中,贯穿了人类认知的多个维度,该理论揭示了隐喻在认知、思维及语言表达中的核心作用,深刻影响了人们对语言、思想与文化相互作用的理解。

2 概念隐喻理论视角下的水意象隐喻分析

2.1 《诗经》中的水隐喻

在《诗经》中,水不仅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自然元素,更是作为情感和抽象概念的象征,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情感表达之中^[4-6]。水象征着爱情、思念、悲伤和怨恨等,成为表达人类内心世界的强有力工具。“水喻爱情”“水喻思念”“水喻悲伤”和“水喻怨恨”等情感隐喻,都是以“水”这一具体的、易于感知的物质来表达人类内心难以捉摸的抽象情感的。水丰富多变的特性,使其成为这些复杂情感表达的理想载体。

根据 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指出,隐喻可分为结构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本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和方位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结合《诗经》中各种类型水隐喻的特质,诸如“思念是水”“爱情是水”“悲伤是水”和“怨恨是水”等,均属于本体隐喻的范畴。

它们不仅将具体的物质“水”映射到抽象的情感,更是通过水的流动、多变的物理属性去体味情感的波动与变化。以下将通过具体实例对不同类型的水隐喻进行详细分析,以揭示其背后的认知机制。

2.2 《诗经》中不同类型水隐喻的个案分析

2.2.1 以“水”隐喻爱情

根据概念隐喻理论,“水”属于源域,“爱情”属于目标域,“爱情”与“水”具有共通的属性,绵延不绝的爱情就如同奔流不息、永不停歇的流水一般。

《关雎》作为《诗经》中的第一首诗,开篇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将读者带入了充满水意象的情感世界,水之悠悠代表了男子追求心上人追而不得的烦恼。河边的水草,岸边成对歌唱的水鸟,为整首诗营造了爱意朦胧的氛围。通过水这一意象,诗人传达了对爱情的理想化追求,以及因情感的复杂性而产生的焦虑和无力感。

全诗以“水”起兴,将男子从“喜欢”到“追求”再到“求而不得”,因情感的复杂性而产生的焦虑和无力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后世传颂的经典爱情名篇。诸如此类的诗篇还有《陈风·泽陂》《郑风·溱洧》以及《唐风·扬之水》等。

《郑风·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扬婉兮”两句生动刻画了双眼如露水般晶莹剔透、含情脉脉的女子,“婉如清扬”从男子的视角凸显姑娘的妩媚动人,绝世之美。《诗经》中也有诗歌是从女子的角度去审视男性之美的,诸如《魏风·汾沮洳》。诗中利用“沮洳”“一方”“一曲”等词汇的变化展示了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女子总会思念自己的意中人,如此一来将女子的痴情之状描绘得栩栩如生,强调了女子的意中人不仅人长得俊美,高尚的品德更是世俗的达官贵人永远无法企及的。诗人通过对比、烘托的艺术手法,将一位品德高尚、勤劳英俊的男子形象活脱脱地展示出来。

世间的爱情并非总如《周南·关雎》这般美好、顺畅,很多时候还会受到自然环境的阻碍。被水阻隔,无法相守、相伴的惆怅与无奈在《秦风·蒹葭》《周南·汉广》《邶风·匏有苦叶》中都得到了较完美地呈现。以《邶风·匏有苦叶》为例,诗的前四句:“有弥济盈,有鹭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济水丰盈,水面波光粼粼,夏日骄阳照在水面上格外刺眼,岸边草丛里不时传来野鸡的鸣叫声,由物及人,衬托了主人公求偶心切的心情。在生产落后、水上交通极不发达的时代,就连渡水过河都危险重重,恋爱中的男女只能被水阻隔,无法相聚。与《周南·关雎》中男子思慕、追求女子相比,《诗经》

中也不乏女子主动向男子表达相思和爱慕之情的诗歌,诸如《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过河”,描写了直率泼辣的女子在聚会上直接向河对岸的小伙子发起了猛烈的爱情攻势,展示了上古时期女子敢于表达心中爱慕之情,大胆、活泼的性格。

2.2.2 以“水”隐喻思念

“思念”往往指的是恋人、家人以及朋友等分离之后产生的一种牵挂之情。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河流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带给人们阻隔,很多情况下“一水之隔”就只剩下对父母、兄弟、恋人的无尽愁绪与思念,《诗经》里的思念之情也自然而然地与“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以《国风·卫风·竹竿》为例:“籊籊竹竿,以钓于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四句诗两次提到了淇水,淇水是女子记忆中故乡生活场景的代表性元素,承载着她年少无忧的生活片段,也即“目的域”。驾车出游时看到水流场景,女子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淇水,回忆起自己往昔拿着细长的竹竿在淇水垂钓,进而思念起家乡的一切。淇水在此作为一种情感的纽带,将思念具象化,体现了女子对家乡亲人以及过去美好时光的眷恋之情,“水”喻“思念”的映射关系最终形成。

《邶风·泉水》是一首卫国女子思念故乡的诗,它以“嗟彼泉水?亦流于淇”开篇,以汨汨流淌的泉水起兴,无论是泉水,还是淇水,它们不断流动的特性与诗人那割舍不断、绵延无尽的思念之情相契合。“有怀于卫,靡日不思”表明女子远嫁他国,心中依然思念着故乡卫国,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悲伤和惆怅。“我思肥泉,兹之永叹。思须与漕,我心悠悠”,肥泉、须、漕都是卫国的地方。身处异乡,淇水所代表的家乡记忆始终萦绕在心头,思念绵延不绝,始终在心底流淌着,无法停歇,生动地体现出主人公对家乡浓烈且持久的思念之情。

2.2.3 以“水”隐喻悲伤

“水”作为人类情绪的典型载体,不仅传递着人们的幸福与快乐,也传递着人们的悲伤和痛苦,《诗经》中也不乏以“水”隐喻悲伤的经典之作。以《邶风·新台》为例,诗中前两句“新台有泚,河水弥弥”,描写了河水盛大、浩渺且绵延不绝地流淌,作为该诗中违背人伦闹剧的发生地,就在河水的旁边,两者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诗中的女主人公本该拥有一份美好的婚姻,却因卫宣公的恶行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女主人公内心的悲伤(源域)就如同那河水(目的域)一样,深沉且无法控制,时刻流淌在她的心底,每次看到河水,或许都会勾起她那刻骨铭心的

悲伤记忆,整首诗烘托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悲伤氛围。她内心的伤痛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反而如河水一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流淌着,她的悲伤也在心底持续地隐隐作痛。此处的“水”意象隐喻,将女主人公那种深沉且无尽的悲伤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读者深切感受到其所遭受的痛苦。

在《小雅·沔水》一诗中:“沔彼流水,其流汤汤。彼飞隼,载飞载扬。念彼不迹,载起载行。心之忧矣,不可弭忘。”诗句使用了比兴的手法,“流水浩荡、鸟飞不止”隐喻社会局势动荡不安,不法之徒为非作歹。面对这些,诗人忧心忡忡、坐立难安,又进一步联想到各种社会乱象,既担心丧乱殃及父母,也担心兄弟朋友遭小人陷害,心中的忧愁与悲伤如滔滔不绝的汉江水一样连绵不断。

2.2.4 以“水”隐喻怨恨

水边本是青年男女爱情的发源地,潺潺的流水也就成了情感寄托的载体。然而当美好的爱情无法实现时,怨恨的情绪也就随即而生。以《邶风·谷风》为例,“泾以渭浊”中,年老色衰的旧妻被视为“浑浊”的泾水,年轻貌美的新妇则被视为“清澈”的渭水。丈夫因新妇的到来而嫌弃旧妻,“水”的清浊变化,暗示了丈夫喜新厌旧,也隐喻了旧妻对丈夫不公正对待的“怨恨”。

“湜湜”形容水清澈见底的样子,女子尽管被丈夫厌恶嫌弃,但她依然坚守正道,保持正直的品德,就如同清澈的渭水一样,从侧面反映出女子对丈夫不辨是非、抛弃自己的行为感到怨恨和委屈。

泾水和渭水的合流,如同女子的生活因新妇的到来而被打乱,她的情感也如同水流一样不再平静。这种情感的变化,蕴含着女子对婚姻变故的不满和怨恨,而水的意象则将这种复杂的情感具象化地呈现出来。

《王风·扬之水》主要描写的是戍边将士心中积郁的思归之怨,其中有思念也有怨恨。诗中以“扬之水”起兴,河沟的水哗哗作响,如同岁月的流失,不再回来;一捆捆的柴草隐喻将士对家乡的思念,平缓流动浅浅的河水根本无法将其漂起冲走,水势衰微一定程度上隐喻了国势衰微。“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表达了将士们对孤军奋战的不满。“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强烈地表达了将士们对家乡的思念以及对长期戍守边疆、归期无望的怨恨。以水喻怨恨,怨思之情逐层推进,极具感染力。

3 《诗经》中“水”隐喻背后的哲学因素

Lakoff 的概念隐喻理论为《诗经》中“水”隐喻

的解读提供了坚实的认知理论基础,本文将从哲学维度和文化维度去阐释水隐喻。

3.1 基于哲学维度的“水”隐喻阐释

3.1.1 基于阴阳理论的“水”隐喻阐释

道家思想中的“阴”与“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基石之一,代表宇宙万物中对立而统一的力量。在阴阳理论中,“阴”与“阳”是两种互相对立却又密切相关的力量,它们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中维持着平衡与和谐。

水常与“阴”属性相关联,其阴柔、滋润、包容等特质使其成为爱情、思念、悲伤等情感的象征。在《诗经》中,爱情常被比作流动的水,正如流水般的爱情温柔、细腻且绵长。这种隐喻不仅形象地表现爱情的连续性和不息性,还突出爱情中的柔和与温润。同样,水也常被用来隐喻悲伤,成为表现无尽哀伤和内心痛苦的理想载体。它像涓涓细流一样无止无休地延续着,象征着心灵深处未曾抚平的痛楚。

3.1.2 基于天人合一理论的“水”隐喻阐释

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上古时代,人们面对变幻莫测的自然界既充满好奇,也充满无助。在《诗经》中,诗作者通过水这一自然意象来表达对生命、情感以及人生的思考。水的流动性和变化性不仅是自然的常态,也是人类情感发展的象征。因此,“水”与人类情感是相通的,人与自然在《诗经》水意象隐喻中实现了和谐共生与相互统一,这实际上顺应了儒家学派的核心思想——天人合一理论。

在《诗经》中,“水”与“爱情”是相通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催生了水边美妙的爱情,“水”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特点可以隐喻人类情感的深厚与持久,水流的变化则可以用来比喻人生的跌宕起伏。水被赋予了人类高尚、纯洁的道德品质,这些特质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2 基于文化视角的水隐喻阐释

《周南·关雎》中的“雎鸠”意象承载着深刻的原始文化密码。作为水鸟图腾,它具有明显的生殖象征意义。作为候鸟,“雎鸠”的鸣叫周期与黄河流域汛期高度吻合,拟声词“关关”不仅模拟鸟鸣,还暗含了雄鸟与雌鸟阴阳和鸣的意象。同时,水鸟交颈的求偶姿态与“君子好逑”形成自然与人文的双重互文,构成了“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的宇宙生命图式。“雎鸠”的捕鱼习性与《易经》所阐释的“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的哲学命题相契合。在中国文化中,“鱼”本就具有生育力的象征,而“水鸟衔鱼”的意象则构成了完整的生殖符号链。

此外,《鲁颂·泮水》“思乐泮水”中的水滨祭祀

成为周代礼乐文化的符号化呈现,《大雅·灵台》“麇鹿濯濯”的水边景象也象征了周朝的礼制秩序。基于文化视角的水隐喻意象阐释,揭示了古代先民对水神的图腾崇拜,这些有助于促进水隐喻的跨学科研究。

4 结论

结合《诗经》中“爱情是水”“悲伤是水”“思念是水”“怨恨是水”四种典型水隐喻实例,深入探讨了水隐喻的认知功能。研究揭示了中华文化如何基于身体体验与背景知识,从源域“水”向包含抽象情感的目标域(如“爱情”“悲伤”“思念”“怨恨”等)进行投射的机制。同时,本研究还剖析了水隐喻背后所蕴含的哲学与文化因素,为《诗经》水隐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推动了多学科研究的融合。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对象的选择具有局限性,仅选取了《诗经》中部分情感类水隐喻实例作为分析对象,而未涵盖其他类型的隐喻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全面性。其次,跨文化视角的缺失使得研究未能充分揭示不同文化体系中水意象的异同之处,这一领域在未来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拓展价值。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对象可以涵盖《诗经》中更广泛的隐喻类型,并引入跨文化比较分析,以更全面地揭示水隐喻的认知机制及其文化内涵。这将有助于深化对《诗经》隐喻体系的理解,并为认知语言学与文化研究的交叉领域研究提供更丰富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 [1] 宋平锋,张学玲. 先秦诸子典籍中的水隐喻与水文化思想探析[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7(4): 117-122.
- [2] 孙毅,林攀龙. 概念隐喻理论发凡40年述评:现状与前瞻[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5): 122-134.
- [3]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 [4] 王充闾. 诗的意境寻求与意象创造——以《诗经·蒹葭》为例[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7(1): 139-145.
- [5] 胡婷婷. 概念隐喻理论视角下《诗经》植物隐喻英译研究[D].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 2021.
- [6] 蓝纯,白亦玄. 拓展概念隐喻理论视角下《诗品》中的诗歌本体隐喻和评价隐喻[J]. 当代修辞学, 2023(3): 48-60.

论《金瓶梅词话》的近代性

赵献涛

(河北工程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出现于明朝中后期的《金瓶梅词话》,彰显了一种已经不能为古典文学所范围且领先于同时期世界文学潮流的一种特质,即近代性。这种近代性表现为由一种拒绝将现实世界理想化的人生态度引起的“非诗意书写”、让事物以自身的面目呈现在文学世界里的“回到事物本身”以及由作者创作态度上的真诚而形成的苍凉风格等三个方面。中国近代文学自明朝中后期开始,而不是从晚清才开始,有必要将《金瓶梅》列入近代文学的脉络中重新思考它的文学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金瓶梅词话》;近代性;非诗意书写;回到事物本身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4-0021-05

On the Modernity of *Jinpingmei Cihua*

Zhao Xiantao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Hebei)

Abstract: *Jinpingmei Cihua*, which appeared in the mid to late Ming Dynasty, highlights a characteristic that is no longer within the scope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ahead of the world literary trend of the same period, namely modernity. This modernity is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non poetic writing” caused by a refusal to idealize the real world, the “returning to things themselves” that allows things to be presented in the literary world in their own form, and the desolate style formed by the author’s sincere creative attitud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egan in the mid to late Ming Dynasty, no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include this work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literature and rethink its literary value a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 *Jinpingmei Cihua*; modernity; non poetic writing; returning to things themselves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里程碑、纪念碑式的作品《金瓶梅词话》,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围绕西门庆及其一妻五妾展开叙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走卒贩夫,涵盖广阔的社会画面,烛照幽微的人性善恶,模仿批评家乔治·圣斯伯瑞评论《汤姆·琼斯》的话来说^[1],《金瓶梅》是普通人的生命史诗,不是最高尚的、最慷慨激昂的,却是合乎人性的、真切实在的(为行文方便,下文将《金瓶梅词话》简称《金瓶梅》)。《金瓶梅》这种新的小说精神的出现是一种艺术上的重大突破,远远不能用古典文学的“古典性”来限定、来解释,因为它已经具有了与同时期世

界文学潮流(甚至领先于世界文学潮流)共同的特质——近代性: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特质,主要表现为“新的小说家”这一创作主体的形成而彰显的新的价值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小说艺术的革命”——叙事上的非诗意书写、语言表达上的转型以及苍凉的艺术风格。对于《金瓶梅》的近代性,目前学界中李儒国、王俊棋^[2-3]两位学者主要从《金瓶梅》的价值观念、思想内容方面做了相关研究,但《金瓶梅》艺术革新方面的探索仍有开掘空间,故申而论之。

收稿日期:2025-01-03

作者简介:赵献涛(1975-),男,河北肥乡人,讲师,博士。E-mail:zhaoxiantaoxt@163.com

1 非诗意书写

与“诗意书写”相对而言,“非诗意书写”指的是由一种拒绝将现实世界理想化的人生态度引起的直面现实、“反浪漫化”的表达方式。

非诗性的日常生活是《金瓶梅》小说艺术的一大发现、一大宏愿。“文学生存的条件,就是提出宏伟的目标,甚至是超出一切可能的不能实现的目标。只有当诗人与作家提出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任务时,文学才能继续发挥它的作用。”^[4]《金瓶梅》注目于现实生活,走出了“说话四家”的苑囿,发现了一个鲜活的现实世界——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并且以一种“形式现实主义”^{[5]30}来表现日常生活,从而将它与之前的虚构叙事区别开来。如第三十回“来保押送生辰担”,《金瓶梅》中的来保、《水浒传》中的杨志同样是押送生辰担,但彰显的小说精神却截然不同:《水浒传》以传奇性取胜,《金瓶梅》以日常性见长。由浪漫传奇走向日常生活的《金瓶梅》,是一种领先于世界小说发展趋势代表性小说家如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的“新型写作”^{[5]2},昭示着与旧体传奇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之间的决裂。虽然《金瓶梅》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合称四大奇书并被海外汉学家称为“奇书文体”来加以叙事学的分析,但《金瓶梅》彰显的现实主义精神完全不同于后三种小说的浪漫情调、“诗性理想”^{[5]3}。可以说,只有到《金瓶梅》问世,近代意义上的“小说”才真正诞生,因为之前的三部作品尽管分属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的不同虚构故事类别,但《西游记》属于弗莱《批评的剖析》所言的“浪漫传奇”,《三国演义》《水浒传》属于弗莱所言的“高模仿”模式,而《金瓶梅》则属于“低模仿”模式。“低模仿”模式的主人公是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而小说是黑格尔所说的“现代市民史诗”,因此《金瓶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其作者才是近代意义上的小说家。与《金瓶梅》相比,晚出的《红楼梦》将生活诗意化则是一种艺术的退步,因为诗意书写就是给生活披上一层温暖的面纱,让人一只脚踏入诗意的梦幻世界里,从而忘掉另一只脚还深陷在生活的泥淖里;作为一种浪漫的谎言的诗意书写就是一种媚俗,而媚俗“是最大的美学之恶”^[6]。

即使《金瓶梅》营造诗意的氛围,它的精神与中国古典文学亦不相同,根本上是“反诗意”、反浪漫的——展示情感理想化的虚幻性。第八十二回“潘金莲月夜偷期,陈经济画楼双美”,前半回写金莲、经济在春梅协同下的隔墙密约,是对《西厢记》爱情

故事的改编、戏仿,但却去除了《西厢记》爱情故事的浪漫化色彩。这一回“潘金莲月夜偷期”处处衬托以植物世界里的“花草”,且看经济、金莲暗约偷期:

“一日,四月天气,潘金莲将自己袖的一方银丝汗巾儿,裹着一个玉色纱挑线香袋儿,里面装安息香、排草、玫瑰花瓣儿,并一缕头发,又着些松柏儿,一面挑着‘松柏长青’、一面是‘人面如花’八字,封的停当,要与经济。不想经济不在厢房内,遂打窗眼内投进去。后经济开门,进入房中。看见弥封甚厚,打开却是汗巾香袋儿,纸上写一词,名《寄生草》:‘将奴这银丝帕,并香囊寄与他。当中结下青丝发。松柏儿要你常牵挂,泪珠儿滴写相思话。夜深灯照的奴影儿孤,休负了夜深潜等茶蘼架。’这经济见词上许他在茶蘼架下等候私会佳期,随即封了一柄金湘妃竹扇儿,亦写一词在上面答他,袖入花园内。”^[7]

陈经济送给潘金莲的物事是湘妃竹白纱扇儿一把,上面一种青蒲半溪流水;经济月夜赴佳期时猛然从茶蘼架下突出,双手把金莲抱住;金莲、经济偷情约定摇木瑾花树为号,经济发送潘姥姥回来时为金莲拿了两枝茉莉花儿来戴……花花草草世界伴随着金莲、经济的偷期私情,在为他们的巫山云雨弥漫上一种诗意氛围的同时,却又象征着男女双方的命运犹如花开有花落一般最终过眼烟云。花草的诗意被不道德的苟且、命运的无常这种文学效果一扫而光,《金瓶梅》就是在这样营造诗意的同时却反诗意,在讲述浪漫故事的同时却反浪漫。

《金瓶梅》的反诗意不仅表现在拒绝将爱情视为一种神圣、永恒的存在而加以歌颂上,而且表现在揭露传统浪漫化情感的虚幻性上。《金瓶梅》的故事多次发生在雪天,如第二十一回“吴月娘扫雪烹茶”,第三十八回“潘金莲雪夜弄琵琶”,第四十六回“元夜游行遇雪雨”,第六十七回“西门庆书房赏雪,李瓶儿梦诉幽情”,以及第七十七回“西门庆踏雪访爱月,贲四嫂倚牖盼佳期”。中国古典诗文中的“雪”意象多与浪漫主义相联系,如《世说新语·任诞》所载王子猷雪夜访戴^[8]。与《世说新语》等古典文学世界中“风花雪月”的浪漫气息不同,《金瓶梅》中在雪天发生的故事却无浪漫气息:或是夫妻合气,或是妻妾斗气,或是寻花问柳,或是窃玉偷花……去除了文人骚客附加在“雪”这一自然意象上的诗情画意,让雪花仅以雪花的形态出现在小说里,从而驱逐浪漫想象,展示被掩盖的生活真实、人性真实,这是

《金瓶梅》所昭示的一种新的小说精神,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回到原生态的生活,回到事物本身,剥掉附加在生活与事物身上的所谓诗性。

《金瓶梅》非诗意书写的形成源于作者新的生存哲学,即拒绝用任何虚幻的美好掩盖生活的真实。诗意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手法、文学境界,而且昭示着作者的生存态度、书写态度:“诗意”就是对生活持一种浪漫的抒情态度。充满历史悲剧感的《三国演义》满怀诗意,《水浒传》彰显英雄主义价值观念,《西游记》尽管处处溢出纸面的是滑稽、幽默以及对正统文化的调侃、嘲讽,但修心成佛的主题却是诗意的。“小说家从他抒情世界的废墟上诞生。”^[9]之后晚出的《金瓶梅》超越了这种诗意的抒情,不再完全“借用神话、历史、传奇或之前文学中的情节”^{[5]7}去塑造类型化的人物以宣扬理想化的价值观念,而是“把人物呈现为特殊个人”^{[5]13},诸如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吴月娘、孟玉楼、李娇儿、宋惠莲、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陈经济、应伯爵、韩道国、韩爱姐、来旺等“人物会被视为一个特定的人物而非类型化的人”^{[5]15};不再像以往虚构作品那样,“事件发生的系列被置于一个非常抽象的时空延续中,时间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因素并不受重视”^{[5]19},而是“更在意小说人物在时间过程中的发展”^{[5]18},近乎逐日、逐月、逐年地写出人生琐碎的日常起居以及社会的真相、人生的空无,并且不用诗性的帷幕掩盖这种空无,这种反诗意的美学风格的形成标志着真正的小说家的诞生。《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唐传奇的作者们虽然是小说家但不脱诗人的本色,《金瓶梅》的作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家。“现代意义上小说的前提是已经不具有诗性的现实。”^[10]真正的小说家面对“不具有诗性的现实”,破除对世界的诗意幻象,这就是《金瓶梅》在小说史上的一大贡献。

2 回到事物本身

《金瓶梅》反诗意的创作态度,必然带来作者要回到事物本身(即回到世界本身):悬置文学传统赋予事物的隐喻意义,搁置诗学传统赋予事物的诗性色彩,让事物以自身的面目呈现在文学世界里。这种新的认识论意义重大,昭示着一种近代小说精神,即现代时期的现实主义:拒斥普遍的、抽象的事物,关注特殊的、具体的事物。“小说兴起于现代时期,此时期的智力倾向从总体上以其对普遍性的拒斥——至少企图拒斥——而极为坚定地与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遗产分离开来。”^{[5]5}由作者的个人感官

出发,对人物所处环境加以细致描绘,将每一对象、事物放置在一种个人主义的视角下进行描写,《金瓶梅》这种新的典型的叙述风格完全不同于古典小说叙述风格(古典小说更多关注事物普遍的象征意义)。《金瓶梅》第四十二回“豪家拦门玩烟火,贵客高楼醉赏灯”说的是乔家、西门家结成亲家后,乔家送节在先,西门庆回礼在后,回礼颇为丰厚:

一面分付来兴儿拿银子,早往糖饼铺,早定下蒸酥点心,多用大方盘,要四盘蒸饼:两盘果馅团月饼,两盘玫瑰元宵饼;买四盘鲜果:一盘李干,一盘胡桃,一盘龙眼,一盘荔枝;四盘羹肴:一盘烧鹅,一盘烧鸡,一盘鸽子儿,一盘银鱼干。又是两套遍地锦罗段衣服,一件大红小袍儿,一顶金丝绉纱冠儿,两盏云南羊角珍灯,一盒衣翠,一对小金手镯,四个金宝石戒指儿。十四日早装盒担,教女婿陈经济,和贵四穿青衣服押送过去。^{[7]522-523}

小说在这里罗列事物,彰显着一种尊重个体经验的近代倾向。《金瓶梅》在罗列事物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以前诗文、小说罗列事物往往将事物或视为比兴的工具,或视为情感的寄托,或赋予象征的意义,或违背“生活真实”地将不同季节的事物罗列在一起以渲染气氛,事物是一切但唯独不是事物本身。“可以这么说,一件物品在故事中出现时,它就具备了一种特殊力量,变成了磁场中的一个极或某个看不见的关系网中的一个眼。物品的象征意义有的明显有的隐含,但总会存在。因此可以说,任何一篇故事中任何一件物品都是具有魔力的东西。”^{[4]34}《金瓶梅》罗列事物是将事物当成事物本身来写的,就是“回到事物本身”——剥去附加在事物身上的比喻意义、象征意义,让事物以自身的面目呈现在艺术的世界里,比如上文所写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食物而已。再看《金瓶梅》第五十二回“应伯爵山洞戏春娇,潘金莲花园看蘑菇”,后半回引人注目的意象是“芭蕉丛”:金莲扑蝶在芭蕉丛,官哥儿受到大黑猫惊吓也是在芭蕉丛。如蒋捷“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样在中国古典诗文中充满诗意的芭蕉意象,到了《金瓶梅》这里却失去了诗情画意,成为男女偷情的地方、孩子受到惊吓的场所,这是《金瓶梅》作者面对事物、描写事物的一个显著特点:消解诗意,让物象以其本来面目出现。再如《金瓶梅》中的蝴蝶白马、服饰酒茶、建筑家具、草木物候等这些自然物象、文化物态亦无不如此。其中原因在于蒋捷以词人的情怀观照事物,事物披上了诗性的光辉;而《金瓶梅》作者以平常人的眼光打量事物,事物就

是事物本身,世界也就是世界本身。

李干、胡桃、龙眼、荔枝、烧鹅、烧鸡、鸽子儿、银鱼干等诸多专有名称的出现表达着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关注特殊,关注个体。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是欧洲世界17、18世纪笛卡尔、洛克、休谟哲学背景下才会出现的一种新的小说观念。《金瓶梅》恢复了事物的原貌,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作者以一种现实主义的眼光像镜子一样来反映生活、描写生活,同样与艺术自身的发展存在着关系。文学艺术的早期,因为语言及艺术手段的局限,多借用具体物质来传情达意,如以饮食来比喻男女,以香草恶草比喻君子小人。当艺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作家就没有必要再继续采用这些手段,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艺术手段,所以在描写性事的时候就开始直接描写,不必假助食物的隐喻。事物从隐喻的系统里解放出来,直接进入作者的视野,原原本本地呈现自己。当然《金瓶梅》的作者因为时代的限制,没有将这一“回到事物本身”的艺术观念贯彻到底,很多时候依然采用传统的艺术手法赋予事物以隐喻的意义。

因为要回到事物本身,回到生活世界,《金瓶梅》的小说语言疏远了以往叙事虚构作品诸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的典雅、绮丽的风格传统,而是进行“让语言更具指示性”的革新:语言指向其现实生活世界的对应物。“以前虚构性写作的文体传统并不主要关注词语与事物之间的对应,而是通过使用修辞将外在的美加之于描述和行动。”^{[5]25}受到洛克哲学(语言的目的在于“传达关于事物的知识”^{[5]27})的影响,笛福、理查逊这些小说家“让词语呈现出目标物具体而独特的全部性质,并以我们熟悉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以容忍其中出现的重复、插入和冗言为代价”^{[5]26}。在这种新的语言观念影响下,小说就成为了一种关于现实生活的转写。“于是由此见出,语言在小说中的功能远比其他文学形式中更具指示性;这种类型的语言本身是详尽地进行呈现而不是专注于表现优雅。”^{[5]27}《三国演义》演义程度上优于、高于普通人的历史人物,其语言必为与这种高模仿模式主人公相适应的、更多指向历史文化传统的文言,而《西游记》要讲述一个浪漫传奇的故事,其语言更多指向一个神魔世界而非现实世界,市井小说《水浒传》尽管语言指向外部现实世界的指示性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毕竟因为所写人物到底是英雄人物。只有对现实生活转写的《金瓶梅》,其语言才更具指示性,更具巴赫金所言的“杂语性”,从而疏远了古典文学语言的传统,昭示着一种近代小说精

神的诞生。

3 苍凉的整体风格

《金瓶梅》创造了一种整体上可以谓之“苍凉”的艺术风格:苍凉之气,弥漫全书。这种苍凉的调子源于作者的人生经验、人生思考,也来自于中国古典诗文传统(如《古诗十九首》、魏晋文学就歌咏生命的无常和苍凉)。《金瓶梅》的连贯性不仅表现为统一的主题、连贯的情节,而且表现为同一的风格——苍凉。

中国古典白话长篇小说讲究开头,多引用或自撰诗词以开篇。属于个人独创的《金瓶梅》循此小说体式,第一回“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开头引用了一首词,词曰:“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7]1}情色,一本说部意旨所在。入话处,讲述项羽、刘邦“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这流传千古的故事可谓人尽皆知,但凡人能走出情色的世界,这是人的存在的悲剧性!入话奠定了小说的基调,说破了小说的主旨,为小说罩上了一种苍凉的调子。所有的男欢女爱、蝇营狗苟、熙熙攘攘、迎来送往都是在这样一个苍凉的曲调下一幕幕上演,不得不让读者生出悲悯之心,以“我佛慈悲”的大悲悯来观照人生的悲喜剧。《金瓶梅》第六十六回“翟管家寄书致赠,黄真人炼度荐亡”,下半回同样有一种悲凉之感,黄真人的念词“一朝倾逝,万事皆空”,让人悲从中来,十类孤魂《挂金索》概述非正常死亡的类型,可见人生无常犹如梦幻泡影。西门庆为死去的李瓶儿做水火炼度,到头来也是“超生空自喜,长恨不胜情”。第九十六回“春梅游玩旧家池馆,守备使张胜寻经济”,上半回是一种重游故地的叙事模式:故地重游,昔日繁华不再,今日只有萧条悲凉,今昔对比,今不如昔。与以往作品诸如《诗经·采薇》、元稹《连昌宫词》、杜甫《哀江头》的苍凉多出于心系家国盛衰这一情怀不同,《金瓶梅》的苍凉源于一种近代意义上的“个体的孤独”,即作者本人因为走出柏拉图的“洞穴”,因为对社会、人生的洞察而产生的对社会、人生之所谓意义和价值的绝望,为此小说中的人物都近似是“孤独的个体”,相互之间难以共情理解;尽管他们貌似亲密,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心理距离。

这种“个体的孤独”亦艺术地表现在西门庆没有子嗣上。第一百回“韩爱姐湖州寻父,普静师荐拔群冤”呈现出西门庆没有了子嗣,官哥儿已经夭

折,孝哥儿在这一回里出家,这是西门庆的人生悲剧——苍凉,但“这贫瘠不育并非缘自小说家刻意所为,这是小说艺术的灵(或者说,是小说艺术的潜意识)厌恶生殖”^{[6]48}。古典虚构作品多以子孙繁衍、家族昌盛来结尾,《金瓶梅》却以“厌恶生殖”来煞尾,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新的社会结构的产物,即个体社会的产物。现代社会的基础是个体,小说和现代社会一起产生,只有将个体作为中心,小说才有完成的时候。“堂吉诃德死了,小说完成了。只有在堂吉诃德没有孩子的情况下,这个完成才会确立得如此完美。”^{[6]48-49}所以西门庆没有子嗣是小说艺术的需要:小说的中心人物西门庆死了并且没有子嗣,才彻底地标志着小说完成了。小说艺术上的“厌恶生殖”呼应着新的社会结构形态,即明朝中后期中国社会结构的近代性:市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而更加世俗化。《金瓶梅》只能出现在经济个人主义思想成为社会主导思想的时代,西门庆本人体现着一种不同于以往传统思想的经济个人主义思想,商人西门庆成为小说的主人公也只有在经济个人主义思想盛行的时代才有可能。

《金瓶梅》“苍凉”艺术风格的形成源于作者创作态度上的“真诚”:真诚地面对生活的复杂、人性的复杂,毫不回避生活中所谓丑陋的事物、卑劣的人物(如韩道国、王六儿夫妇,王六儿自愿以身体来挣钱,韩道国甘做明王八)。托尔斯泰认为小说家须具备的特质之一是“诚意”,英国的劳伦斯认为小说的三个条件之一是“必须诚实”。“看得出来,这些近代大文豪常常要求诚实地看待和思考事物。”^[11]“诚实地看待和思考事物”这种近代的小说精神贯穿于《金瓶梅》的整个叙述中,实现了中国小说质的飞跃。与《金瓶梅》相比,唐传奇、宋话本、“三言二拍”拟话本、才子佳人小说、侠义公案小说都缺乏创作态度上的“真诚”,致使故事浪漫化、人物理想化、情节模式化,充斥着鲁迅所批判的“瞒和骗”。只有《金瓶梅》的作者勇敢地正视社会、人生,发现了社会的本质即虚空、人生的本质即虚无这一真谛,并本着这样真切的人生感受以他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实实在在地写出了这种虚空——毫不掩饰这种虚空,也不去为这种虚空装点、填充美丽的天鹅绒,于是就有了《金瓶梅》源于“人生的底色是虚无”这一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整体意义上的苍凉风格。

4 结论

学界关于中国文学史的阶段划分过多依据于朝代变迁、王权更替,以致于掩盖了文学自身发展的进

程与规律。以散文为重点考察对象和例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认为五四新文学的源头为明朝中后期性灵派、竟陵派的言志派文学^[12],这一观点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明朝中后期的文学已经孕育了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明朝中后期,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文化上出现了新的思想、精神,一种韦伯所言的与封建主义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精神,《金瓶梅》只能出现在这样一个现代社会元素萌生、发展的时代。出现于明朝中后期的《金瓶梅》形成了与以往叙事虚构作品不同的叙述模式,一种可以称之为“形式现实主义的文学手段”^{[5]30},这使得它区别于古典文学中的虚构作品而成为一种近代意义上的小说,具有一种不同于古典性的近代性。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近代文学不是从晚清才开始,而是自明朝中后期就已经发生:模仿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句话,我们可以说“没有晚明,何来五四”,为此我们有必要“拯救”《金瓶梅》及其所形成的“伟大的传统”,将它从古典文学的世界里加以“拯救”,将之列入中国近代文学以及世界近代文学的脉络中重新思考其文学价值、文学史地位和世界意义。

参考文献:

- [1] 毛姆. 小说鉴赏十讲[M]. 宋碧云,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23:64-65.
- [2] 李儒国. 现代性在《金瓶梅》中的凸显[J].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6):71-74.
- [3] 王俊棋. 现代性视野下的《金瓶梅》译介价值探析[J]. 华西语文学刊,2012(第六辑):94-99.
- [4] 伊塔洛·卡尔维诺. 美国讲稿[M]. 萧天佑,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07.
- [5] 伊恩·瓦特. 小说的兴起[M]. 李树春,译. 北京:三联书店,2024.
- [6] 米兰·昆德拉. 相遇[M]. 尉迟秀,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82.
- [7]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M]. 戴鸿森,校点.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246-1247.
- [8] 张之. 世说新语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66.
- [9] 米兰·昆德拉. 帷幕[M]. 董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13.
- [10] 黑格尔. 美学讲座[M]. 转引自方维规:文学社会学新编[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69.
- [11] 伊藤整. 文学的温度[M]. 张永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164.
- [12] 周作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 长沙:岳麓书社,2019:21-34.

歌人生百态而尽精微 ——论杜甫诗中之“歌”

徐 阳^{1,2}

(1.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2. 池州学院 艺术与教育学院, 安徽 池州 247000)

摘 要:杜甫创作了百余首含有“歌”字的诗作,学界对其研究解读多从文体和诗体的层面进行,较少考虑其中与音乐存在的传统关系,致使音乐维度研究显得边缘化。然而,“歌”在杜诗中的呈现并非偶然或阶段性,而是贯穿杜甫一生创作轨迹。这些“歌”的描写,形式多样且主题广泛,呈现出多维度和动态变化的特性。它们不仅直接反映了杜甫在音乐与文学交融上的独到见解,同时也间接折射出杜甫个人的音乐活动实践和音乐品鉴能力,再现了部分音乐场景的历史画面。基于对事物完整性的认识,从音乐层面理解杜诗中“歌”字属性,既有助于从美学视角考察杜甫的创作历史,也有助于追溯诗歌传统艺术本真和潜在的艺术面貌。

关键词:杜甫诗歌;“歌”;创作;音乐

中图分类号: I222; J60 - 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297X(2025)04 - 0026 - 08

Singing Life is Full of Various Forms and Subtleties ——On the “Song” in Du Fu’s Poetry

XU Yang^{1,2}

(1. School of Literatur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2. School of Arts and Education, Chizhou University, Chizhou, 247000, Anhui)

Abstract: Du Fu created over a hundred poems containing the word “song”, but academic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m mostly focus on the level of literary style and poetic form, with less consideration given to their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with music, resulting in the marginalization of music dimension research. However, the presentation of “song” in Du Fu’s poetry is not accidental or phased, but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creative trajectory of Du Fu’s life. The descriptions of these “songs” are diverse in form and have a wide range of themes, presenting multidimensional and dynamically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They not only directly reflect Du Fu’s unique insights on the integration of music and literature, but also indirectly reflect his personal music activity practice and music appreciation ability, reproducing some historical scenes of music scenes.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grity of things, understanding the “song” attribute in Du Fu’s poetry from a musical perspective not only helps to examine Du Fu’s creative history from an aesthetic perspective, but also helps to trace the true and potential artistic appearance of traditional poetry.

Key words: Du Fu poetry; Song; a literary creation; music

杜甫作为唐代乐府诗的重要作手,有28首收录于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分别录于杂曲歌辞、

横吹歌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类别。除此之外,他还有不少内容与音乐相关的描

述和题名含“歌”字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作从直观上都与音乐有着一定的联系,但能否入乐而歌,史料记载甚少,后人评注中也颇多争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杜甫之后不同历史阶段文化思潮的发展流变与需求;二是其后各历史时期文坛主流趋势与文人群体在文化心理层面的倾向。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杜诗在诗的文人化、纯粹化”^{[1]62}方面被显著强调,而音乐元素在杜诗中的体现则相对边缘化,未能形成显著的典型特征。

目前学界已有研究探讨杜诗与音乐的关联,主要集中在解读和阐释杜诗中“歌”字频繁出现的现象。然而,研究范围聚焦于特定诗体或单一作品;研究方法多围绕诗与歌之间的文体联系;研究内容虽涉及音乐元素,但音乐分析相对较少,更多倾向从文学理论角度探讨。总体来看,音乐成分并非研究主旨,而是更多地被用作对比、参照或展示诗歌艺术形式。但从音乐层面来说,此类研究提供了宝贵视角,不仅揭示了杜甫与音乐之间的联系,而且拓展了“歌”在音乐与文学之间的媒介属性、意义与定位的研究维度。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基础,本文以杜诗中的“歌”为研究对象,运用音乐理论视角,梳理并分析杜诗中与“歌”相关的文本内容,探讨杜甫及其诗歌与音乐之间的多重联系,并考察“歌”字音乐性。

1 杜诗“歌”字使用创造概况

“歌”字在杜诗中主要分布在三个方面:诗题、诗文以及二者兼之。本文以仇兆鳌注《杜诗详注》^[2]、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3]和萧涤非等校注《杜甫全集校注》^[4]三个版本作为参考,结合诗人年谱^①、诗歌创作时间和文本内容,综合梳理含有“歌”字的诗作与“歌”字在诗歌作品中的数量与分布情况。

1.1 含有“歌”字诗作创作时间

根据统计,杜甫自公元745年起,开始创作含有“歌”字的诗作,共计135首。其中,在公元745年至753年的九年里,年均创作数量维持在1首左右。公元754年出现第一次高峰,共创作8首。随后,在公元755年至758年的四年间,年均创作数量增至4首左右,公元759年出现第二次高峰,共创作13首。接下来的六年里(760-765年),年均创作数量进一步上升至6首左右,其中有两年连续年均创作10首以上。公元766年出现第三次高峰,共创20首,也是创作数量最多的一年。在公元767年至770年最后四年期间,前两年数量较多,后两年逐渐减少(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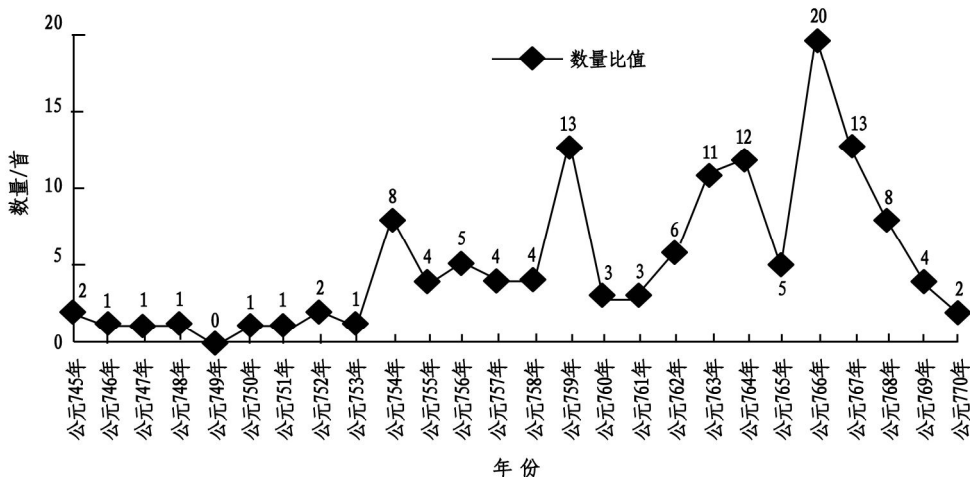


图1 含有“歌”字诗歌创作数量年份图

1.2 “歌”字在诗作中的分布与创作

学界对于杜诗分期及人生阶段划分存在诸多看法。从宏观历史角度看,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转折点,引发了社会动荡和变迁,深刻影响了杜甫等文人群体的生活、仕途和创作。对此,以安史之乱作为时间节点划分统计,安史之乱前杜甫共创作22首含“歌”字诗作。此阶段除含“歌”字诗题外,诗文中对“歌”字共有17种不同的

表达运用(见表1和表2)。

表1 “歌”字在不同时段的创作分布及诗歌数量 首

分布形式	安史之乱前	安史之乱中	安史之乱后
诗题	7	12	6
诗文	13	16	61
以上二者兼之	2	10	8

表 2 “歌”字在不同时段创作及诗歌数量 首

描写形式	安史之乱前	安史之乱中	安史之乱后
单一描写	9	22	47
综合描写	8	4	22

综上,杜诗中“歌”字的使用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如时间方面,自杜甫 34 岁起,含“歌”字诗的创作便呈现长期且持续增长趋势,这一趋势与安史之乱的时间节点紧密相连。同时,增长不仅体现在诗作的数量变化,而且表现在使用频率及其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和丰富性上;在分布方面,诗文内容含“歌”字的诗作数量较多,占据此类诗作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在描述方面,杜甫对“歌”的语言表达不是简单的重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从“歌”字运用来看,形式多样且主题广泛,包含了为何而歌、怎样用歌以及歌的感官情绪、性质类别等;其次,从“歌”字内容来看,与其他音乐形式相结合的“歌”字描写基本都是音乐属性类别,而文本单含“歌”字的诗作,约有一半表现出音乐属性,其余都与音乐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综合来看,杜甫对“歌”字的运用与描写不是单一的,不仅展现了“歌”在文学表达中的多维度特征,而且反映了杜甫个人及其诗作与音乐紧密相连的多个层面。

2 杜诗“歌”的内容:歌人生百态

“歌”字的起源与发展是一个涉及语言学、音乐学、文学以及社会文化学等多个学科复杂而多维的过程。不同学科层面的解读赋予了“歌”字丰富的概念内涵、功能形式以及用途与意义。因此,解读杜诗中的“歌”字,需以文本内容为基础,结合唐代社会历史发展、诗歌文化背景和杜甫的个人经历等多个层面进行综合比较考察,从而进一步了解“歌”在杜诗中的本意、性质与语境,以及杜甫对“歌”的理解和创作运用。根据文本内容梳理统计,杜诗中的“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1 他者之歌:观社会风貌

“他者”是与杜甫相对的其他个体或群体。他者之歌,即来自杜甫以外的其他成员之歌。此类之歌诗作约有 30 余首。如《听杨氏歌》,从诗题即可判断歌者为杨氏,诗中“佳人绝代歌,独立发皓齿”描绘了歌者的形象、性别和歌声之美。其后“满堂惨不乐……老夫悲暮年,壮士泪如水……金管迷宫徵”进一步说明歌唱地点在宴会,听众不止杜甫一人,同时宴会中除了歌声还有管乐伴奏。此诗中杜

甫对于“歌”的描述有两点现象值得关注:一是描绘歌者歌声发于齿;二是强调管乐迷宫徵。仇注:“《楚词》:朱唇皓齿。阮籍诗: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沈约诗:金管玉柱响洞房。嵇康《琴赋》:角羽俱起,宫徵相证。”^{[2]1430}“赵次公曰:其声部逮于歌,皆以形容歌声之妙也。《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三十)注:杨氏之歌妙乎宫徵也。以唐玄宗惑于声音,制为《霓裳羽衣》之曲。闻者悲怆,禄山之乱,听此之由也。”^{[4]3863}从这些注释可见,“发皓齿”被解释为引用典故。而“金管迷宫徵”的解释存在分歧:第一种观点将金管、宫徵拆开解读;第二种观点认为歌声胜于管乐;第三种观点认为诗中所描述之歌是《霓裳羽衣》,宫徵源于杨贵妃最擅长之音。这三种观点中,第一种未能诠释诗句全意;第二种似与诗文更贴切,但诠释较为抽象;第三种则带有猜测之意。因为《杜工部草堂诗笺》由南宋人蔡梦弼笺注,而南宋人王灼《碧鸡漫志》认为《霓裳羽衣》源于“夫西凉既献此曲,而三人者又谓明皇制作,予以是知为西凉创作,明皇润色者也”^{[5]125},说明《霓裳羽衣》乐曲的创作并非因为杨贵妃^②。比较两位南宋学者学术领域和专长来看,显然王灼的说法更为准确。此外,史料中也没有记载《霓裳羽衣》与宫徵有关。可见第三种观点是为了解读诗中听歌后的情绪,而非音乐本身。有学者根据“现代发音学原理,将五音(宫商角徵羽)对应口腔位置,宫音在后鄂,小舌之处,而徵音在齿部之处”^{[6]151}。若按此说法,“发皓齿”可能意味着歌者唱的是徵音,而“金管迷宫徵”则是管乐器也吹奏了该音。然而由于诗中没有明确指出何种管乐器以及何律为均的问题,只能推测“迷宫徵”可能是此曲在某律中,宫徵二音演奏具有较高难度,乐人演奏水平有限或是歌者唱徵音时,乐曲演奏此处需宫徵音交替连续进行。依据此解释,再对应诗歌前后内容看,说明杜甫可能在别处听过此歌,所以非常熟悉演唱和演奏中的音律体现。如若杜甫是首次观听此歌曲,便能准确辨别曲中宫徵二音,则说明杜甫精通音律,具有较高的鉴乐水平。由此综合全诗来看,能细致描写歌者姓氏、性别、技艺、演唱地点以及听众反映、现场器乐等众多因素,应是杜甫现场纪实所创,而诗中记写之“歌”为乐人之歌。诸如此类乐人之歌诗作还有很多,如《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法歌声变转,满座涕潺湲”、《宴戎州杨使君东楼》“座从歌妓密,乐任主人”是描绘宴会中的乐人之歌;《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白日移歌袖,清霄近笛床”描绘船上的乐人之

歌等。

除乐人之歌外,杜甫还有创作其他群体之歌的诗作。如《悲陈陶》“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夷歌饮都市”描绘胡人在城市中饮酒唱歌;《日暮》“羌妇语还哭,胡儿行且歌”描绘路边胡人小孩边走边唱歌;《写怀二首》“万古一骸骨,邻家递歌哭”描绘邻居家中有丧,哭唱丧歌;《十六夜玩月》“谷口樵归唱,孤城笛起愁”描绘山谷中伐柴而归的樵夫唱歌,等等。通过上述诗作来看,他者之歌皆为音乐之歌,包含了来自乐人的精湛歌唱,百姓朴实的生活劳作歌唱、孩童天真的歌唱以及民间风俗歌唱等。而歌者的群体来自社会各个层面,歌唱之地也是遍及宴会、路边、船上、山谷等多个地点。总体来看,这些歌唱不仅涵盖了唐代音乐在社会中的多个类型,也反映了唐代音乐在不同阶层的运用与面貌。杜甫将这些他者之歌融入诗歌创作,体现出其广阔的视野与足迹,以及观察事物和现象的宽泛与多元意识。而从音乐层面来说,这些作品是反映出杜甫个人对音乐细致而敏锐的洞察与品鉴,以及他在音乐领域的高深造诣。

2.2 自我之歌:品生活画卷

自我之歌,即杜甫之歌,歌者为诗人本身。此类诗作相对较多,近70首。整体来看可以分为三个类别。第一,与酒之歌。诗中“歌”字与酒搭配,即杜甫饮酒而歌,体现在杜甫饮酒状态与酒醉程度让歌有了不同方式的表现。如《赠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描绘了痛饮式喝酒与疯狂而歌的状态;《醉时歌》题中清晰表述醉酒而歌,诗文“痛饮真吾师……但觉高歌有鬼神”进一步描绘痛饮式喝酒与高歌的状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白日放歌须纵酒”描绘白天而歌需要有酒相配;《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罢酒酣歌拓金戟”描绘酒后而歌的状态,等等。通过此类诗作来看,酒与歌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既是互助也是因果。然而这些与酒相关的“歌”本质属性却是模糊的,学界对此有诸多解释。主要有三种观点倾向:第一种认为杜甫唱歌,具有音乐属性;第二种认为诗中“歌”字表达引用古典;第三种认为歌是诗,不具有音乐属性。对此,这里以《赠李白》试作简单分析,诗文中“痛饮狂歌空度日”,可见酒与歌的行为都已超越常态。仇注:“后诗‘李白斗酒诗百篇’,即痛饮狂歌也。”^{[2]43}这一观点源于杜甫在此诗后又作《饮中八仙歌》,其中描述李白在与人斗酒状态下可创作百首诗篇,而这惊人的创作数量与状态正是“狂歌”一词所要表达的。从这一角度看,注释的主旨更关注于“狂”的状态与效果,而非“歌”是什么。但从理解的层面看,应倾向于“歌”为诗;另

一些注释认为,“狂歌”引自古典,源于《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之门”^{[7]249}、徐干《中论》“且夫贤人之道者,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或披发而狂歌”^{[8]282}、《后汉书》“其不遇也,则裸身大笑,被发狂歌”^{[9]1753}。从这些材料看,“狂歌”意为在某种情况下,通过疯狂唱歌才能表达的一种精神状态或情绪。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情绪或精神状态的表达是通过唱歌的形式来完成的,它不同于乐人歌唱,更多是抒发内心自我的歌唱,重点在于情绪的宣泄而非美感和悦耳,但它依然是歌唱的一种行为。杜甫若是引用古典表达自己的情绪,那么“狂歌”无论从本意还是引申意,都与音乐有着一定的关联。再看杜甫写给李白的15首诗,其中4首含有“歌”字都与酒醉相关。而李白回赠《沙丘城下寄杜甫》“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10]1597}也描绘了二人饮酒后齐歌的情形。但还需注意,杜甫另一首诗作《春日忆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同样也写了酒,但酒不多,其后句承接“细论文”,而非论诗、论歌、歌文或歌诗。这里不免值得疑问,所谓“文”指代是诗还是其他文体,而“狂歌”为何没有狂文或狂诗的表述?综合以上材料推断,在酒醉下的“狂歌”如果是诗,却要用“歌”来表述,可能意味着诗需要用通过歌唱行为来表达,或者指代可以歌唱的歌辞。显而易见,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体现出“歌”字的音乐属性。由此来看,杜甫其他与酒之歌的诗作,其中“歌”字的属性可能都与音乐存在一定联系。

第二,与舞之歌。诗中“歌”字与舞搭配,体现出歌舞互动或相并,即杜甫自舞并歌。从现存史料看,“唐人好乐善舞,尤其盛唐,不仅权贵朝臣能舞,文士也能舞”^{[11]273-297}。如《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十》“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描绘灯下起舞,醉酒而歌的情形,句首“自笑”一词点明歌者和舞者的身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描绘杜甫怀念与李白共同醉酒起舞并行歌的情景;《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哀歌时自短,醉舞为谁醒”,其中“自短、为谁”的强调,表明杜甫描绘自己在哀歌、醉舞;《夜归》“白头老罢舞复歌”描绘舞动过后再次而歌的情形。这几首诗歌除《夜归》外,其余皆是醉酒之下的歌与舞,与上述“与酒之歌”相比,多了舞的行为。同样这里的舞也非如同乐人之舞讲究美感与悦目,而在于诗人本身情感和情绪的抒发。所以舞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让“歌”的表达多了一些律动。再观杜甫其他诗作,如《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九》“醒酒微风入,听诗静夜分”描绘酒醒后听诗的状态,与上述

“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中“歌”字形成比照;而《题郑十八著作丈故居》“酒酣懒舞谁相拽,诗罢能吟不复听”描绘酒醉之下懒舞,其后承接“诗、吟、听”而非“诗、歌”或“歌、吟”等表达。这些细节表示,杜甫在诗文中对于“歌”与“诗”的表述并不随意,同样与酒或舞相接,但“歌”与“诗”在诗文中表现状态、形式都存在细节区分,而与酒之歌和与舞之歌中的“歌”在诗文中的语境、形式则较为统一。由此来看,与舞之歌的相关诗作,其中“歌”字属性与“诗”是有区别的,同与酒之歌相似,都与音乐存在一定联系。

第三,与情绪之歌。诗中“歌”字与各种情绪词搭配,体现出杜甫歌时的心情、思绪与情感,即杜甫有感而歌。如《晦日寻崔戢李封》“当歌欲一放,泪下恐莫收”描绘歌后泪下的心情;《赠别贺兰钊》“悲歌鬓发白”将悲歌与白发并列,可见杜甫内心的感慨程度;《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衰老强高歌,歌罢两凄恻”描绘衰老也要歌,歌后却更惆怅的心情;《夜》“哀歌叹短衣”描绘个人的独自感慨之歌;《元日示宗武》“不见江东弟,高歌泪数行”描绘不见远方的亲人而高歌伤感;《湖中送敬十使君适广陵》“几年一会面,今日复悲歌”描绘与朋友相聚离别,重复悲伤而歌的感慨,等等。总体来看,情绪之歌的范围非常宽泛,离别、相见、想念、孤独、感慨、悲伤等都是可以歌的主题,重在以歌抒情、寄情与托情,但这些“歌”的本质属性还需具体作品具体分析。结合上述与酒之歌和与舞之歌来看,这些情绪之歌也与二者有相似之处,在表述中“歌”字是多见的情感表述用语,少见“吟”“啸”“诵”“咏”或“诗”等词来表达情感。可见“歌”对于杜甫来说有着不一样的认知与意义,有学者认为“杜甫习惯于将诗称为‘歌’,把普通所说的写诗一事称之为歌唱”^{[1]68},这也未必不是一种可能。但从另一层面来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12]270},乐与人的内心情感和意识密切相关,而情感也是连接音乐与文学的桥梁,杜甫用歌来抒情,歌的不是旋律而是自己的诗心和本心,所以“歌”可能也有“唯乐不可以伪”^{[12]284}的内涵,这或许也是杜甫“百年歌自苦,未有见知音”的一个原因。由此综合来看,与情绪之歌的相关诗作,其中“歌”的属性也与音乐存在一些联系。

2.3 歌之本身:述歌之艺术与使用

歌之本身,即指有具体名称的歌曲和一些场景对应之歌,此类诗作有 20 余首。如在歌曲方面,有《魏将军歌》“吾为子起歌都护”、《奉同郭给事汤东

灵湫作》“浩歌绿水曲”、《屏迹三首·其一》“独酌甘泉歌,歌长击樽破”、《伤春五首·其五》“得无中夜舞,谁忆大风歌”、《奉寄李十五秘书文蔚二首》“竹枝歌未好”、《八哀诗·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空闻紫芝歌”等,这些含有具体名称的歌曲有些引用古典,有些应是杜甫时代所唱之歌,由于这些歌曲名称清晰,也让诗文所对应“歌”的本质属性明确。其中比较特殊的是《屏迹三首·其一》“独酌甘泉歌,歌长击樽破”,描绘杜甫自己敲着酒樽而歌的状态,这也是为数不多的诗作中,杜甫较为详细地呈现自己如何实践而歌。诗中陈述歌长而把酒樽敲破,说明杜甫歌时,是有敲打节奏进行的,这也间接表明这首长歌的律动性。而句前也有交代歌名为《甘泉歌》,对于此歌的来源历代注释不一,主要倾向两个方向:一则认为源于古歌;二则认为是杜甫创作的歌。诗中如引用古歌,说明杜甫是了解此歌曲,在敲打节奏中也必然会歌其旋律。但若是杜甫自己所创,则说明在创作过程中,歌是依据节奏进行的,旋律不一定是杜甫所创,但应是有某个旋律的节奏适合此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或许也是杜甫创歌合乐的一个过程。在杜甫另一首诗《宴忠州使君侄宅》中也陈述“乐助长歌逸”,这是杜甫参加宴会所写,宴会中必然有乐人演唱与演奏,而杜甫观后认为长歌有乐的附和才能更好地表达,可见杜甫对于长歌合乐演艺的鉴赏是颇有见解的。同时这一观点刚好对应了杜甫敲打酒樽而长歌的行为,而杜甫在家中长歌是没有乐人演奏的,所以自己敲打节奏合长歌,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杜甫在音乐节奏与诗歌韵律结合上的能力。

场景对应之歌。此类诗作对于“歌”描述范围相对形式多样,主要取决于诗文内容的需要和作者创作意图。如《西山三首·其三》“今朝乌鹊喜,欲报凯歌归”中“凯歌”即凯旋而归的歌声,表达了诗人对战争胜利的期待;《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坐中薛华善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描写了一位叫薛华的人特别擅长创作醉歌的歌辞;《奉送王信州崑北归》“壤歌唯海甸”反映战后社会景象;《李潮八分小篆歌》“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描绘了杜甫外甥李潮向杜甫求歌;《览柏中丞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作歌挹盛事”描绘杜甫要创作歌来赞美一些盛事,等等。此类诗作主要描写了在一些场景中歌的用途、功能、意义等其它方面。在这些多样“歌”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杜甫作歌目的除了抒情,还有歌颂与赞美。同时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杜甫侄儿求歌而非求诗,杜甫宣扬盛事

也是作歌而非作诗。可见歌的用途、范围及传播更具灵活性。综合来看,杜甫对“歌”的运用不仅技巧娴熟,而且在表达意图和情感上也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创造性。

3 杜诗“歌”的体现:多元而细致

3.1 “歌”之视角多元

杜甫所写之“歌”不仅内容丰富且形式多样。有研究认为,“这是杜甫具有‘歌’的意识,以‘歌者’自居,相关诗作也是建立在这种创作的体验之上”^③。在这一观点中,具有“歌”的意识应是很好地概括了“歌”在杜诗中的体现,但“歌者自居”则相对片面。通过诗歌内容梳理来看,杜甫对于“歌”的描绘实际融合了多种视角,使得“歌”在诗文中不是单一的现象或模式,也不是单一抒情或习惯性表述,而是让“歌”与作者的思想、情感、实践以及诗作本身之间形成了多重联系与呼应。这种多视角的设立,与杜甫以何种身份去呈现这些“歌”的面貌密切相关(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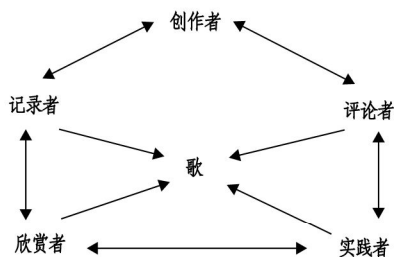


图2 身份视角关系

由图2可见,杜甫对于“歌”的呈现主要来自五种身份视角:创作者、记录者、评论者、欣赏者和实践者。这五类视角既可独立存在,也彼此互相组合、共存与融合,这主要取决于诗人本身对歌的理解和运用。所以上述观点认为杜甫具有“歌”的意识是一个宏观的理念,在这意识之下所涉及的是杜甫个人层面与文学、音乐、生活、社会之间的联系与影响,而多重视角就是这些联系与影响之下所呈现的杜甫个体自我特征。杜甫将这一特征用于诗歌创作中,既拓展了“歌”的表述空间,也极大地丰富了“歌”的文化属性与艺术表现。因此从杜诗中可以看到,如《寄高三十五书记》“主将收才子,崆峒足凯歌”是杜甫写给好友高适的诗作,恭贺好友高适随主将哥舒翰在边塞立下战功,并封为掌书记。其中“凯歌”一词源于“王大献则令凯乐,军大献则令凯歌也”^{[13]159},杜甫借此表达了对高适的欣慰与祝贺。这是杜甫以创作者的视角将“凯歌”融于诗歌创作,

让“歌”成为承载深切情感和敬意的媒介;《陪柏中丞观宴将士二首·其二》“一夫先舞剑,百戏后歌樵”,杜甫以记录者的视角记写了宴会上的表演状况。作为创作者,他用精炼的语言概括了这场表演,使“歌”不仅成为音乐发生的记录,也成为当时社会音乐文化现象的一个缩影;《听杨氏歌》中,杜甫以记录者的视角详细记写了宴会中听杨氏乐人唱歌的过程,再以欣赏者和评价者的视角称赞这为“佳人绝代歌”,同时也细致评写了现场听众的反应、配乐等情形。最后以创作者的视角将这首“绝代歌”用精炼的诗句表达,使“歌”不仅记录了当时精美音乐呈现瞬间的画面,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音乐审美和文化氛围,等等。

3.2 “歌”之描写细致

细致化描写是杜诗中“歌”呈现的一个显著特征。从宏观上看,在歌的类型方面,梁元帝《纂要》云:“齐歌曰讴,吴歌曰歊,楚歌曰艳,淫歌曰哇,又有清歌、高歌、安歌、缓歌、长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劳歌。振旅而歌曰凯歌,堂上奏乐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14]376}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歌文化的分类。到了唐代,杜甫在其诗歌中对这些歌的类型进行了广泛的描写,尤其长歌、高歌、酣歌等类型出现频率较多,体现了杜甫对不同歌唱形式的深刻理解和细腻的观察;歌的人物方面,涵盖了社会大众的多个层面,包含乐人、胡人、孩童、渔夫、樵夫、船夫、朋友以及杜甫自己。这些人物既展示了“歌”在社会中的广泛性和丰富性,也体现了杜甫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关注。歌的地点方面,多样且不拘于场地限制,遍及宴会、路边、竹林、山谷、军营、江边、小巷、船上、家中等,这些地点不仅展示了“歌”的普遍性和丰富性,也体现出杜甫对“歌”的自由和灵活理解。歌的情绪方面,涵盖了悲伤、高兴、痛苦、落寞、惆怅、疯狂等多种情绪,这些丰富的情感不仅展现了“歌”所承载复杂而细腻的情感深度,也反映了杜甫感性而细腻的内心世界。歌的内容方面,丰富多彩且宽泛,涉及多种情境表达,如饮酒时的洒脱、独自感慨时的抒发、怀念过去的美好、与友人相见时的交流、得知战事胜利时的庆祝、自娱自乐时的消遣等,体现了“歌”在表达个人情感和社会交往中的多重功能,也映射出杜甫的生活轨迹以及“歌”在其中的角色。

从微观上看,杜甫在创作或记写“歌”时,不拘于简单或循环重复,呈现出多维度和动态变化的特性。这种创作方式有效避免了“歌”片面、抽象和静态式的陈列,赋予了“歌”立体、生动的形象,同时也增强了其在诗文中的艺术性和细腻的画面感。如

《狂歌行赠四兄》描写了杜甫与多年未见的四兄相聚的过程。其中“歌”字在题目和诗文中均有出现,但表述不同。诗文“长歌短咏”用长歌来表示对四兄多年不见的欣喜,奈何长歌太长只能短咏。这里也是第一次出现长歌可以短咏的表述形式。从杜甫其它长歌的描述“乐助长歌逸”“歌长击樽破”来看,长歌的呈现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表现方式应是缓慢而抒情。但在此诗中,杜甫选择短咏以表达对相聚时光的珍惜和急切的喜悦,与题目“狂歌”形成呼应。杜甫在诗中将“歌”字呈现出狂歌、长歌直到短咏的过渡与转变,不仅体现了杜甫与四兄交流的动态,也深刻反映了其内心细腻的情感变化,同时使得“歌”字在诗中变得生动而具有艺术形象。再如《乐游园歌》中,杜甫描绘了自己远望一场歌舞表演的场景。因为距离遥远,用“缘云清切歌声上”来表达乐人歌唱的音量、音高和音色,这种表述不仅展现了杜甫对声音细微差别的敏感捕捉,也间接体现了他的听觉艺术。在这里“歌”字不仅代表了声音的律动,而且营造了一种抽象的演唱画面。由此来看,杜甫对“歌”的形式有着丰富而细致的表达,不仅为后世诗人提供了新的创作领域和素材,而且开辟了新的创作思路与角度。与李白留给读者广阔想象空间的风格不同,杜诗通过具象的描写,再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立体、生动的历史画面,展现出独特的历史真实感和艺术魅力。

4 杜诗“歌”中内涵意蕴拓展

4.1 杜甫对“歌”的实践与创作

杜甫诗文中的“歌”不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总体来看,其意蕴表达基本清晰。然而,对于部分诗中“歌”字的具体意义及属性,则相对模糊,学界存在分歧。主要涉及歌行诗体的界定、歌辞文本的解读与界定,以及诗作是否能入乐或与音乐无关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也让杜诗“歌”的意蕴有了多维的解读层面。在这些层面中,音乐的解读虽不是主流,却为诗歌文本中的音乐元素提供了研究视角。但从宏观性角度来说,杜甫对于“歌”的创作意图是否具有音乐意识,或是否以乐作诗为前提,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关于此,杜诗文本中略有提及及相关话题,对此本文稍作分析与推断,以期学术讨论提供参考和见解。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记写了外甥李潮向自己求歌;《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坐中薛华善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记写薛华特别擅长写作醉歌的歌辞;《羌村三首·其三》“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记写杜甫以歌作答并自歌,同时在场听众热泪纵横的情形。从这三首诗作来看,第一首外甥求歌而非诗,可能说明“歌”在当时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流行性和社交功能。此外,如果此诗是歌辞可以入乐,这也可能是外甥求歌的另一层目的,即通过音乐传播其内容,以获得更广泛的赞誉。第二首作于宴会上,通常是伴有乐人的场合。杜甫在诗中赞赏薛华歌辞创作出色,反映出他对歌辞文采的重视。这种关注可能也意味着在当时,歌辞入乐是基本要求,无需探讨。第三首是杜甫自歌给父老听。虽然诗中没有明确指出歌是否带有旋律,但从听众热泪纵横的反应来看,强烈的情感共鸣通常需要旋律的辅助才能实现。因此,歌很可能是有旋律的。如确有旋律,表明杜甫不仅精通歌的创作,还掌握了一定的音乐知识和旋律曲目,能够根据旋律倚声填词。综合来看,杜甫应是擅长创作歌辞,且歌辞文采及形式也是具有较高水准,符合入乐而歌的要求。此外,杜甫对其他诗人歌辞创作表现出的特别关注与兴趣,也可能反映了他对这一艺术形式的深刻理解和鉴赏力。

4.2 文化语境对“歌”创作的潜在影响

杜诗中“歌”的创作思想与意图,除个人主观意识外,社会文化语境这一宏观背景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这里需要考虑几个潜在因素:第一,唐代的乐工歌妓属于社会最低等级,多数为文盲,“大都喜唱篇幅短小的律、绝体歌词”^{[5]105-123},容易记忆;第二,“唐诗直接交由乐工歌妓,由他们选择乐调来配唱。唐代的乐工歌妓掌握着词(诗)与音乐配合的更多选择权、主动权”^{[15]51};第三,乐人要考虑自己的名气、收入等实际因素,因此他们倾向于演唱著名诗人的作品,以期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可。这种做法既有助于提升乐人自身的知名度,也促进了名家诗作的广泛传播;第四,从杜甫参加科举考试以及献赋而获得官位的经历来看,首先,杜甫所献三篇礼赋均有涉及礼乐描写;其次,从唐代科举大环境来说,尽管常举和制举下的科目对考生有不同的要求,但在主流科考知识体系选择上,与礼相关的礼乐知识应是常规学识,“现有资料显示,这两种选拔制度造就了114篇唐代散篇音乐文献。”^{[16]123}此外,制举中对文学之科的不断细节调整,如“文史兼优、博学通艺、文词雅、文藻宏丽、博学宏词等,虽未集中于某一现实主题”^{[17]65-66},但其中部分科目与音乐之间也存在一些潜在的联系。综合以上因素,唐代文人阶层特别是像杜甫这样渴望入仕的文人,普遍具备音乐的基本常识。因此,文人作诗入乐而歌在当时应

属常规,在这种普遍化的语境中,诗歌若要通过乐人传唱而广泛流传,仍然需要特定的机遇和个人名气。特别是在安史之乱这一动荡时期,杜甫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或许只有歌声才能给他稍许安慰与解愁。在这一过程中,尽管音乐的旋律可能逐渐淡化,但“歌”的行为和意识始终存在。从这个角度出发,或许能够解读杜甫“歌”的创作本质与部分意义,以及它在杜甫个人生活和情感表达中所扮演的角色。

5 结论

综上所述,“歌”在杜诗中的呈现并非偶然或阶段性,而是贯穿杜甫一生的。从记写层面看,杜甫对各种类型的歌、不同歌者以及多样的演唱地点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记录,这不仅反映了“歌”在杜甫生活中的平常性和普遍性,也显示出他将“歌”融入诗歌创作之中的习惯性。从音乐层面看,这是杜甫音乐实践活动的生动展现,不仅记录了杜甫个人的歌唱、听唱、评乐以及与乐人的交往经历,也捕捉了他人的音乐活动,全面呈现了杜甫个人音乐喜好和经验水平。同时这些记录提供了一扇窥探唐代社会音乐文化氛围的窗口。从创作层面看,首先,这是杜甫对乐承载的一种方式,也是对音乐文化诗歌模式的记录与延续。虽然这些诗作经过了艺术创作,但它们基本保留了音乐文化的事实,尤其保存了杜甫对音乐的直观感受、审美意象与音乐思想。其次,杜甫将“歌”融入诗歌创作,并将其提升为情感表达的艺术形式。“歌”超越了旋律本身,转而成为情感的载体,承载了音乐的底蕴,更成为杜甫自我抒怀、自我寄情的文学表达。这种表达方式丰富了“歌”的内涵,使其成为杜甫情感的象征,同时也体现了杜甫在音乐与文学交融上的独到见解。

注释:

- ① 杜甫年谱除参考文前所述《杜诗详注》《钱注杜诗》《杜甫全集校注》三本著作外,并参考刘文典《杜甫年谱》,2013年版云南人民出版社。另外,文中所引杜甫诗歌均出自仇兆鳌《杜诗详注》版本,由于体量较多,便不再标明页码。
- ② 对于《霓裳羽衣》的考证,学界已有诸多成果,但仍有诸多争议与难解之处。总体来看,王灼《碧鸡漫志》的结论更为合理。“盖西凉节度使杨敬述,于开元九年前进献《婆罗门曲》,至天宝十三载,随胡部新声与道调法曲合而为一,始改名为道教色彩极浓之《霓裳羽衣曲》,从此它得以成为著名之法曲,获得新的声誉。这一过程,正好与白居易所云《霓裳曲》‘起于开元、盛于天宝’相吻合。”主要论证参见:秦序.唐玄宗是《霓裳羽衣曲》的

作者吗?——《霓裳曲》新探之一》[J].中国音乐学,1987(4):99-107;涂宗涛.试析《霓裳羽衣曲》,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3(2):24-28。

- ③ 关于杜甫“歌者”的研究较少。主要有:钱志熙提出:杜甫诗歌创作中“歌”的意识,且有歌者意识;尧守兰2018年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唐代“歌”诗研究》,在其第三章第二节诗人的歌者意识中,提到杜甫的歌者意识,并列举了盛唐其他诗人也会以歌者的身份自我定位;辛晓娟2013年北京大学博士论文《杜甫七言歌行艺术研究》中,探讨了杜甫歌者意识是增加抒情强度的。其中前两位研究“歌”的理念与范围主要聚焦于诗歌文本性质与文体之间,涵盖诗文中部分“歌”字意义探讨。第三位研究者主要阐述歌是用来增加诗人情感表达的。

参考文献:

- [1] 钱志熙.“百年歌自苦”——论杜甫诗歌创作中“歌”的意识[J].中国文化研究,2004(1):61-73.
- [2]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3] 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4] 萧涤非,张忠纲,廖仲安,等.杜甫全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 [5]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 [6] 王广祈.中国音乐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151.
- [7]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49.
- [8] 徐干.中论解诂[M].孙启治,解诂.北京:中华书局,2014:282.
- [9] 范曄.后汉书[M].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73:1753.
- [10] 郁贤皓.李太白全集校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1597.
- [11] 柏红秀.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诗歌创作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273-297.
- [12] 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 [13] 刘珍.东观汉记[M].吴树平,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159.
- [14] 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376.
- [15] 秦序.唐代音乐文学创作、传播中的三个“规则”——唐代音乐与文学互动关系初探[J].音乐传播,2012(2):47-52.
- [16] 王小盾,陈瑁璐.隋唐五代音乐文献概论(正编)[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22(1):115-125.
- [17]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5-66.

新质生产力赋能徽州版画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探究

江明荟

(合肥经济学院 文法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1)

摘要:分析新质生产力赋能徽州版画的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提出可行性实践路径方案。通过构建“数字为体,工艺为魂”的共生系统、精准数字采集、健全传承人才培养机制、深化产业融合进程等途径,更好地发挥新质生产力对徽州版画的数字化赋能作用,对讲好安徽故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徽州版画;数字化转型;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J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4-0034-06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 of Huizhou Print Empowered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JIANG Minghu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 Hef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efei, 230001, Anhui)

Abstract: It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the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is paper of Huizhou prints enabled by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put forward the feasible practical path scheme. By building a symbiotic system of “digital as the body and process as the soul”, accurate digital collection, improving the talent training mechanism of inheritance, and deepening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t is of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digital empowerment of Huizhou prints.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uizhou pri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path

徽州版画始于汉唐徽州刻书,作为古徽州文化艺术门类中的重要代表,是集绘、刻、印于一体的特色艺术形式。至明朝万历崇祯时期,徽州版画代表了中国版画艺术形式的最高成就^[1],其中的套版印刷法“实已跻彩色版画的至高境界”^[2],是中国对世界印刷史的第二大贡献^[3]。2006年徽州版画入选安徽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围绕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战略任务,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4],为新质生产力赋能徽州版画非遗数字化建

设提供总遵循。为了更好地联结徽州历史与现在,多面向展现徽州版画艺术精髓,凝聚徽州人智慧与文明成果,需运用先进的科技才能更好地促进徽州版画非遗艺术价值和内涵的传承和传播,对社会公众全面认识安徽文化遗产对于丰富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通过梳理与徽州版画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学界研究,主要聚焦以下三个维度。一是徽州版画的数字化展示,在技术方法和应用场景的选择上有所创新,体现出对徽州版画的数字化发展和应用的关注与思考。二是徽派版画数字化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如对传统教学方法的改革、在民居建筑装饰、旅游管理等特定场景的应用以及对教师培训的影响等^[5]。三是提高徽州版画数字技术的传播效率和

收稿日期:2025-03-11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科研重点项目(2022AH052616)。

作者简介:江明荟(1986-),女,安徽合肥人,副教授,硕士。E-mail:jmh_530182@126.com

艺术价值方面^[6]。但鲜见新质生产力与徽州版画的数字化融合性研究。基于此,本文通过阐述新质生产力赋能徽州版画的数字化的内在逻辑,通过咨询、田野调查方法了解徽州版画的现实困境,提出数字化转型实践路径,为徽州版画非遗保护、传承传播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 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化转型的生成逻辑

1.1 内在机理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以创新驱动发展为突出特征,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技术为支撑的新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的“新”,具体指向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和新型劳动对象,为徽州版画数字化转型提供智慧源泉、技术动力和文化载体的创新支持。

首先,新型劳动者提供智慧源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7]。徽州版画自汉唐起始,在历史长河的涤荡和时代变迁中自成一派,并形成完整的版画艺术体系,是以其传承人的版画艺术创作为主要载体的“活”的艺术文化形态,着眼于徽州历史演变、徽州版画的制作技术、材料研究和特定场景的传承传播。这些能力要求劳动者不仅在徽州版画技术方法上有所创新,在应用场景的选择和传播叙事上也需投入关注与思考。除了具备徽州版画非遗知识的储备,还应具有知识快速迭代能力,掌握并熟练运用现代先进技术和装备,经由平台化、品牌化和场景化打造,实现虚拟现实的跨界融合,让徽州版画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软实力”成为经济发展的“硬支撑”,为徽州版画数字化转型提供智慧源泉。

其次,新型劳动资料提供技术动力。不同于依赖或侧重机械工具的传统劳动资料,新型劳动资料以数字化、信息技术为代表,强调信息和技术创新为主导的生产模式。数字化档案记录与管理、3D 扫描、精准建模和打印技术、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体验和展示技术等新型生产资料的不断更新迭代,也为徽州版画的深入研究学习提供技术支持,为其现代绘画和文创设计等提供样本参考,有助于提升徽州版画的社会能见度和认知度,增强观众的体验感和保护传播意识,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徽州版画的保护、传承传播和创新发展。

再次,新型劳动对象提供文化载体支持。新型劳动对象是随着数字化等新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劳动概念,包括实体性和非实体性

劳动对象。具体映射在徽州版画中,体现在为版画创作技艺、母版实体和创作内容中统筹安徽山脉、水脉、文脉,为徽文化地域优秀文化等要素转化为虚拟应用场景中的数据提供支撑。数字化身份转换能全要素保存复制徽州版画的信息,实现非遗信息数字身份转化。徽州区是古徽州域名唯一传承地,徽州版画作为徽州文化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智化技术能够深入挖掘文化承载的徽州版画遗产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以更加宏大的视野,延展的文脉生动、直观、有趣的方式展现、理解和欣赏徽州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多样性,从而促进徽州版画非遗的活态传承,催生出新类型劳动对象以提供文化载体支持,进一步推动徽州版画艺术产业的转型升级。

1.2 目标指向

新质生产力是在数智化推动下形成的更高级生产力表现形式。其赋予徽州版画数字化转型具有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的特征,并向着高科技复原再造、高效能平台传播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

首先,高科技复原再造是基础和先决条件。2011 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保存工作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徽州版画中由于制作母版、画作和画作古籍善本等在历史的长河中受到本体损耗、环境侵蚀、保存条件和技术不完善等因素影响,随时面临着被损毁的风险^[8]。利用高科技数字化复原再造能够为徽州版画非遗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和先决条件。数字化复原再造是指利用现代数字技术,进行高精度测量、图像采集和三维建模,在计算机中重建文化遗产的形态、结构和属性数据。具体到徽州版画,可借助 MeasureAnything、AR 技术实现版画画作的数字化高精度和高效率测量,高精度摄像头、扫描仪以及图像处理软件实现版画图像素点的量化采集、数字化处理与数据表示等技术。数字化复原再造不仅能为文化遗产提供精确的数字化记录,有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工作,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移动设备进行广泛传播,使更多人能够了解和欣赏文化遗产。同时它还可以作为教育资源,为学习者提供直观、生动的学习材料。此外,通过数字版画建模重构拓展虚拟现实体验场景,为徽州文化旅游提供新的亮点和体验。

其次,高效能数字传承是核心需求。徽州版画作为中华传统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能以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广维度

进行高效能传播。高效能首先体现在数智内容建设方面。将徽州版画图文样版转化为计算机语言,建立徽州版画全门类收集、智能分类和高效检索的数字化体系,并通过即时更新和深度互动等数字化平台和技术手段实现更大范围更快速传播,将徽州版画的内涵和艺术魅力有效传播至国内外。高效能还体现在普及率上。网络与新媒体设备跨平台运作提供徽州版画艺术信息的便捷获取、个性化推荐和在线教育等功能。用户通过移动设备或电脑轻松获取徽州版画的相关知识、作品欣赏和艺术家介绍,能显著提高优秀传统非遗文化艺术普及率及传播效果。

再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是终极指引。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体现在打造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上,重点体现在质量导向和可持续发展上。徽州版画数字化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保护和传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通过推进数字化技术创新,打造徽州版画高质量的沉浸式艺术体验。例如,开发以徽州版画为主题的旅游纪念品、数字教育和娱乐产品等,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和参与到徽州版画艺术的传承与可持续发展中来。

2 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困境

2.1 传统工艺与数字化技术耦合性不足

一是传统工艺与数字技术逻辑的错位。笔者于 2024 年 6 月 25 至 7 月 10 日分别考察了古徽州(黄山市)博物馆、歙县版画博物馆(徽城镇七里头徽州艺术品市场)等地,带领学生到皖南宣纸博物馆参观考察、学习及咨询。徽州版画传承至今已历 19 代,30 年前安徽芜湖应天齐教授创作的版画《西递村系列》《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及水印版画《渔汛》等多次荣获大奖;《西递村系列》全套作品被英国木版基金会、大英博物馆收藏。在中国现代版画展,日本神奈川美术馆收藏其多幅版画作品,充分体现了徽州版画的艺术价值、学术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及传承价值。这些获奖作品是在徽州版画母体文化、地理环境的基础上产生的,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数字化技术具有标准化与可复制性、虚拟化与材料脱域、算法逻辑与经验知识的冲突等逻辑特征,在与传统工艺融合的过程中易出现错位问题。以明末胡正言编印的《十竹斋笺谱》徽州版画为例,数字扫描技术虽能记录作品中翎毛表面形态,但难以精准捕捉手工雕刻的“细若蚕丝”线

条,无法还原制作过程中的动态调整。数字技术的标准化消解手工雕刻的随机性与个性化痕迹,造成因工艺细节的丢失而引发的审美价值的稀释等问题。

二是数字化技术工具的应用困囿。数字化技术工具的局限体现在版画细节的缺失。数字扫描技术虽能够多维度记录版画参数,但对于诸如“飞白刀法”等虚实刻痕的捕捉较难实现。以明代徽州版画《黄山松云图》为例,该作品以枫木为基材,融合浅浮雕(最浅 0.08 mm 刀痕)、透雕窗棂纹(孔隙宽度 1.2 mm),手持式激光扫描仪(标称精度 0.1 mm)难以捕捉到全部细节。色彩模型压缩技术易产生色彩偏差。徽州版画由传统矿物颜料叠加、多层套印形成丰富的色彩层次感。RGB 色彩压缩技术通过色彩的模型转换(DCT)、将版画图像从空间域转换为频率域,实现图像色彩高效压缩的同时,其固有的有损压缩原理致使矿物颜料颗粒质感及漆面反光效果丢失,模型呈现均质化色彩,不同程度地制约了色彩的还原度。

2.2 数字采集与保护的困局

一是数字采集难度大。从类型上看,徽州版画从早期的“图经”类著作,到辑刻本至民间图像读物,创作题材囊括谱录、戏曲、宗教、地理山川、军事、科技等万象;从地域上看,除古徽州一府六县外,明嘉靖后随着徽商的崛起,徽州版画传播并影响了国内外,徽州版画散落在各地的博物馆、图书馆、私人藏家手中,且不同收藏机构和个人的保护条件参差不齐。从数据显示,目前仅 58% 文博机构迈出数字化采集第一步,数字资产形式以二维图像和文本资料为主^[9],采集工作任重而道远。

二是数字信息保护不易。首先,数字化技术设备要求高且成本高,为了采集、记录和保存徽州版画的高精度信息,包括线刻、刀版味、分版套印的技法和文人画的艺术风格,需要使用先进的扫描仪、相机、图像处理软件等高精度技术设备。这些设备往往价格昂贵,且操作复杂,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操作和维护。对于一些小型收藏机构或个人来说,购置和使用这些设备存在较大困难,从而影响了信息保护的进度和效果。其次,徽州版画的信息分散在不同的收藏机构、研究机构和个人手中,缺乏统一的整合和共享平台,导致信息孤岛现象严重,不利于信息的全面保护和有效利用。再次,虽然数字化技术为徽州版画的保护和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但数字化标准不统一、数据质量参差不齐、版权保护不完善等因素,影响了数字化信息的共享和传播效果。

2.3 传承人才紧缺与断层的困境

一是传承人才紧缺。复合型传承人才的紧缺给徽州版画数字化转型带来难度和挑战。笔者考察参观黄山市博物馆、歙县徽派版画博物馆期间,通过对呈坎、许村和雄村居民咨询,了解到歙县虬村黄氏版刻至今已历19代,徽州盛产纸墨,在过去民间中手工业、版画家、刻印师人才辈出。在旧时当地乡村有很多务农的百姓都能挥墨弄笔,作画、写字,刻字、雕刻,用刀刻镂空磨具制作点心。但现在当地鲜见会刀刻,制作版画的工匠。由于徽州版画的创作难度大、经济收益有限、社会认知不足等原因,愿意从事徽州版画创作的人越来越少。现有遗产保护机构人员存在年龄偏大、数字化技能不高、数字化人才缺乏的现实困难。《2024 数字白皮书》显示,74%的企业表示存在数字人才缺口,数字化专业人才占比87%^[10],有待助力克服传统传承方式的局限。

二是传承断层现象凸显。传承人才断层严重削弱徽州版画非遗的数字化转型效果。首先表现在创作队伍水平不齐。据统计,在1530项非遗项目中,仅有约12.75%项目有稳定的传承人,36.27%的非遗人才培养存在半途而废的情况^[11],导致传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受到影响。其次,版画艺术教育培养体系不完善。对徽州版画等传统技艺的教育和培养相对薄弱,缺乏系统的课程设置和专业的师资力量。学校教育中对徽州版画的传承意识培养不足,导致学生对这一传统艺术的了解和兴趣有限,难以为徽州版画的传承提供足够的后备人才。

2.4 产业融合与市场推广不畅

一是产业融合深入度不足。具体表现在与现代产业、文化旅游等文化业态融合度不足。首先,徽州版画作为传统手工艺,由于其生产方式多为手工制作,难以实现大规模标准化生产,难以满足现代制造业对效率和产量的要求。在与科技产业融合方面,虽然有尝试将徽州版画与数字技术结合,但整体应用还不够广泛和深入,未能充分发挥科技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其次,在旅游产品开发中,徽州版画相关产品的种类和形式较为单一,缺乏创新和吸引力,未能充分挖掘徽州版画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与旅游市场的多元化需求不匹配,与旅游产业的融合还不够紧密。此外,旅游景点中对徽州版画的展示和宣传也不够充分,游客对徽州版画的认知度和参与度较低,没有形成有效的产业联动效应。再次,徽州版画在影视、动漫、游戏等其他文化业态融合上也相对滞后。很少有以徽州版画为主题或元素的影视作品、动漫形象等出现,导致徽州版画在年轻一代

中的认知度和影响力不足。

二是市场推广不畅。首先,徽州版画产业的品牌建设相对薄弱,缺乏具有广泛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品牌。许多徽州版画企业和工作室规模较小,品牌意识不强,没有注重品牌策划、推广和维护,导致产品在市场上缺乏辨识度和竞争力,消费者在购买时难以形成品牌认知和忠诚度。其次,传统的营销渠道如线下画廊、展会等仍然是徽州版画的主要销售渠道,覆盖面有限,传播速度慢,难以满足现代市场的需求。虽然部分企业和个人开始尝试线上销售,但对电商平台的运营和推广不够专业,缺乏有效的网络营销策略和手段,线上销售效果不佳。

3 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

当下,徽州版画面对现代印刷技术、现代工艺的冲击,同时艺术评论多集中于油画、国画、雕刻艺术方面,对版画及其艺术的宣传、评论尚不力,认为高难度的版画技艺、繁杂的器皿设备、繁重的技巧性生产劳动,不适应现代艺术工艺流程设备线式生产,为传统版画艺术带来诸多挑战。鉴于艺术发展既要考虑艺术欣赏和审美的纯粹艺术性,又要考虑其商业性,试图构建技术-艺术-商业一体性发展的理路,进一步推动徽州版画艺术的发展。

3.1 构建“数字为体,工艺为魂”的共生系统

首先,新质生产力在设计学语境下的具体内涵,包括价值定位、数字技术和工艺融合等维度。在设计创新理论的框架下,体现为数字化工具、智能制造和技艺美学的深度融合,为徽州版画传统工艺的转型提供了全新的赋能机制。第一,从价值定位层面,打造徽州版画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建构工艺数据库,嵌入刀法意蕴数字转译模块,对切刀、冲刀等版画刀法进行算法建模,建立材料感知智能再现系统,对木制纤维的物理空间进行模拟,突破传统工艺物理限制的同时,实现美学和易用合一的双提升。第二,在数字技术和工艺融合的关键技术上,建立人机分工的混合智能创作系统,集结版画艺术家的构思、工匠的雕刻、人工智能(AI)的纹样生成和人机协同的辅助精修,还原刻刀入木的真实触感。通过建立数据流、技艺流、价值流的有机循环,可实现徽州版画传统工艺的范式跃迁和当代转译。

其次,解决数字技术对版画细节内容和色彩的损耗问题,需突破单纯数据采集的局限,构建包含材料科学、计算机视觉等跨学科技术体系。通过将老艺人的经验知识转化为可量化的技术参数,在数字世界重建传统工艺的“模糊精确性”。第一,升级多

模态数据采集技术,利用白光干涉仪捕捉刀痕的深度和梯度,将版画中“入木三分”的表达引入量化研究中去。第二,建立色彩还原失真补偿方案,通过构建徽州版画专用色彩模型,采用视觉适应模型改进色适应变换,开发多光源色度测量装置进行色彩纠偏。在数字媒介中创造符合版画美学本质的新表达维度,最终形成“数字存真、人工传神”的协同范式。

3.2 精准数字采集,强化信息保护机制

首先,建立徽州版画非遗数字资源库。一是提高高精度扫描技术应用能力。采用高精度的扫描设备,对徽州版画进行全方位、高分辨率的扫描。确保采集到的图像能够清晰地还原版画的细节,包括线条、色彩、纹理等。三维扫描技术可以精确捕捉版画的立体形态和深度信息,为后续的数字化处理提供更丰富的数据。二是多源数据融合。除了图像数据,还可以采集与徽州版画相关的文字描述、历史背景、制作工艺等信息,形成多源数据融合的数据库。通过数据清洗、格式转换和编码,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再次,动态数据更新。建立动态数据更新机制,定期对徽州版画的数字资源进行补充和更新,以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和保护状况。利用物联网技术,对版画的保存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及时记录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数据,为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其次,强化数字信息保护机制。一是加强版权权属和授权管理。与徽州版画的创作者、收藏者或相关机构达成协议,明确版权范围和权属情况,包括作品类型、地域范围、使用方式等。二是强化隐私保障力度。通过分布式数字身份技术、差分隐私技术、去中心化身份标识技术(DID)等技术手段,不断强化版权保护和检测手段,实现徽州版画的精准数字采集和强化信息保护机制,确保徽州版画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在数字化时代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3.3 健全传承人才培养机制,打造数字化专业团队

首先,健全徽州版画非遗传承人才培养机制。一是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徽州版画非遗课程体系。二是强化政策支持与保障,建立徽州版画传承人认定制度、制定保护政策措施,支持文化衍生品开发,鼓励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运用创意设计和技艺革新,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与现代生产生活相融通,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整合徽文化教育等多方资源,编写徽州版画传承普及辅导读本,开设徽州版画乡土课程,开展徽州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

其次,打造专业人才团队。一是建设多学科交叉团队。建设一支涵盖考古学、设计艺术学、新闻传播学、民俗学等多学科领域专家、学者和实践者共同参与的队伍,在徽州版画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凝聚人才。二是搭建数字产学研平台。将数字化教学作为徽州版画复合型传承人才的实践项目。在当地传承人的“传、帮、带”下,让学生在实践项目中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数字化应用开发。

3.4 深化产业融合进程,推进数字化生态构建

首先,积极探索“徽州版画+数字+产业”模式,探索构建系统性的数字化生态路径。数字化开发催生徽州版画新业态、新载体和新项目。一是建立文旅融合新业态。创新“非遗+旅游+数字”的创新举措,在保护徽州版画特色资源的基础上,在景区吃、住、娱、购、行等环节开展非遗数字文创、体验和互动。二是电商融合新载体。非遗成为电商销量增长的新引擎。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商消费报告(2023)》显示,2023 年非遗电商产品成交额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37.7%,呈现快速增长态势^[12]。

其次,推进数字化生态构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使徽州版画从传统的展销模式转向以线上平台为依托的数字化生态推进。一是开发数字文创。在数字化展示与互动体验上,通过数字化技术将徽州版画的图像元素转化为三维模型,并利用云览互动平台、AR 增强现实等技术,为观众提供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观众可以通过互动屏或手机设备,360 度欣赏版画作品,并深入了解其历史背景和艺术风格。通过建立徽州版画非遗文创体验中心,游客亲手体验徽派版画的制作过程。在数字化传播与教育上,通过开发徽州版画相关主题 APP,整合资讯推送、在线展览、虚拟旅游等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该平台学习和体验徽州版画等传统文化。在文旅融合与数字化升级上,通过 3D 打印技术将徽州版画的图案应用于文创产品设计中,既保留了传统美学,又提升了生产效率。开发云旅游、直播旅游等新型旅游业态,将徽州版画等文化内容融入虚拟旅游体验中,吸引更多游客。二是推进数字化生态系统性融合。积极构建徽州版画数字化生态的理论支撑和实际运用体系,建立“三维扫描-数据建模-虚拟修复”的系统数字技术链,开发虚拟展览和互动体验项目,将徽州版画融入旅游线路,整合并凸显版画数字化转型的系统性特征,融合线上+线下模式相结合的文化体验游项目,如版画制作体验、文化讲座等,吸引游客参与的同时,让用户通过沉浸式体验感受徽州版画

的艺术魅力,不断提升数字化传播效力和吸引力。

4 结论

新质生产力赋能徽州版画非遗数字化转型为徽州版画与现代科技的融合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是“第二个结合”的创新实践。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工具和新型劳动对象为徽州版画数字化转型提供智慧源泉、技术动力和文化载体支持,为徽州版画非遗实现高科技复原再造、高效能数字传承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指明方向。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广泛应用,徽州版画非遗数字化转型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 [1]汪良发.徽州文化十二讲[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305.
- [2]郑振铎.西谛书话[M].上海:三联书店,1983:499.
- [3]徽州的文学艺术造诣有多高?中国文化研究院-灿烂的中国文明[EB/OL].(2020-12-22)[2020-01-23].http://edu.ifeng.com/kaoyan/news/detail_2011_12/30/11676523_0.shtml.<https://chiculture.org.hk/sc/china-five-thousand-years>.
- [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

(上接第16页)核心价值观中和谐与包容的重要性,学会尊重不同观点,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他人,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环境。影片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不仅是中国文化创新活力、魅力与实力的生动展示,也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成功范例。这种文化价值传播的创新实践,为新时代思政课提供了重要启示:其一,传统价值的现代转化需遵循创造性转化原则,在保留文化基因的同时注入时代精神;其二,跨文化对话能力的培养,需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叙事框架。

参考文献:

- [1]老子.道德经[M].北京:金盾出版,2009:84.
-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63.
- [3]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619.

报,2024-02-02(1).

- [5]周雅琼,李辉周.徽州版画视觉语言在数字插画设计中的应用[J].池州学院学报,2011,25(1):129-131.
- [6]董锦绣.从传承视角看徽州版画艺术形式的变迁[J].池州学院学报,2024,38(4):106-108.
- [7]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EB/OL].(2024-7-21)[2024-08-12].<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4lhSggVkMuj>.
- [8]姚征帆.传统徽派版画图像再造与美术馆数字化传播[J].池州学院学报,2024,38(2):91-95.
- [9]《中国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报告》重磅发布!“探元计划”2022收官[EB/OL].(2023-02-22)[2023-02-22]<https://news.qq.com/rain/a/20230222A076AP00#:~:text=58%25>.
- [10]《数字人才白皮书》深度剖析:破解数字人才困境的策略[EB/OL].(2024-09-29)[2025-9-29].https://economy.gmw.cn/2024-09/29/content_37590705.htm2024.
- [11]民生智库.重磅发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现状调研报告[R/OL].(2020-06-15)[2020-06-15].http://www.minshengzk.com.cn/page24?article_id=58.
- [12]《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商消费报告(2023)》正式发布(附全文)[R/OL].(2024-06-17)[2024-06-17].<https://news.qq.com/rain/a/20240617A06H8M00>.
- [4]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164.
- [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N].人民日报,2022-10-17(02).
- [6]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EB/OL].(2021-06-07)[2022-11-02].http://zwgk.mct.gov.cn/zfxgkml/zcfg/zcjd/202106/t20210607_925031.html.
- [7]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2.
- [8]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5).
- [9]张新新,黄笑语,孙俨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蕴涵、当代表达与策略机枢——《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文化现象分析[J/OL].中国编辑:1-12[2025-03-20].

阿梅代奥·莫迪里阿尼作品的原始主义特征

汪臻*, 张璐瑶

(安徽大学 艺术系,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阿梅代奥·莫迪里阿尼是20世纪绘画艺术的代表人物,其作品突破了传统艺术形式的桎梏,以原始主义的独特视角深刻诠释了人性与生命的本质。从绘画形式分析的角度,探究莫迪里阿尼作品的构图布局、色彩表现及造型特色等问题,能全面揭示其作品与不同形式原始艺术的内在关联,同时凸显其在现代艺术中的美学意义,引发对艺术本质与价值取向的深刻思考,并为当代绘画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阿梅代奥·莫迪里阿尼;原始主义;现代艺术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4-0040-04

The Primitivist Characteristics of Amedeo Modigliani's Artworks

WANG Zhen*, ZHANG Luyao

(School of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nhui)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20th-century painting art, Amedeo Modigliani's works broke through the shackles of traditional art forms and profoundly interpreted the essence of humanity and life from a unique perspective of primitivism. It analyzed the composition layout, color expression and modeling characteristics of Modigliani's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inting form in this paper, which can comprehensively reveal the Modernist art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his works and different forms of primitive art, while highlighting their aesthetic significance in modern art, provoking profound thoughts on the essence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art, and providing beneficial references for contemporary painting creation.

Key words: Amedeo Modigliani; primitivist; Modernist art

原始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思潮,对现代艺术先锋艺术家阿梅代奥·莫迪里阿尼的创作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旨在探讨莫迪里阿尼艺术作品中的原始主义特征,分析其作品对原始文化元素的借鉴和融合,及对人类情感与生命本质的纯粹表达,并探讨原始主义在现代艺术中的意义与价值。

1 现代艺术中的原始主义概念

原始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思潮,主要表现为对非洲、太平洋岛屿等非西方原始艺术的推崇与借鉴^[1]。这一概念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特定历

史语境中具有多重意涵:既包含着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种族偏见与文明退化论等负面认知,也体现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与反叛^{[2]19}。在当代艺术史研究中,原始主义更多被界定为原始艺术对现代艺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成为理解现代艺术发展脉络的重要维度。

然而原始主义并非一个界限分明的艺术流派或理论体系,而是一种跨文化的美学实践方式。其独特性在于:首先,它突破了传统艺术运动的单一性,呈现多元融合的特征;其次,它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其边界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再次,这种模糊性

收稿日期:2025-02-20

* 通讯联系人

作者简介:汪臻(1971-),女,安徽绩溪人,副教授;张璐瑶(2000-),女,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E-mail:93061@ahu.edu.cn

虽拓展了其应用范围,但也带来了概念界定上的困难^{[2]19}。因此在研究原始主义时,应审慎区分其复杂多变的内涵与外延,以避免概念误用与理论混淆,从而准确地把握原始主义在艺术史发展中的独特地位与价值。

1938年,艺术史学家罗伯特·戈德沃特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原始主义研究著作《现代艺术中的原始主义》,其开创性的美学分析至今仍对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然而戈德沃特的研究存在明显局限:他过分强调形式主义分析方法,而忽视了“原始”概念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与社会语境。在其理论框架中,原始主义被归结为对情感表现力的极致追求,这种追求采用两种途径实现:其一是对自然技法的模仿与重构,其二是对“存在的基本激情”(fundamental passions of existence)^{[2]19}这一戏剧性主题的提炼与呈现。具体而言,艺术家将主题简化为本质要素,在由人物象征性特质构成的简约空间中,建立起与观众的即时情感交流^{[2]19}。

此外,戈德沃特还指出,原始主义艺术风格的形成,与一种来源于“黑人艺术”的简化图像的新型艺术手法紧密相关,该方法在1903年至1906年间于艺术界逐渐兴起,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原始主义艺术的广泛传播而进入公众视野。他将“黑人艺术”定位为美学领域的新思潮,这一认知深受卡尔·爱因斯坦1915年著作《非洲雕塑》(Negerplastik)的启发。作为首部系统研究非洲艺术的欧洲学术著作,爱因斯坦提出了突破性的空间理论:传统艺术构建虚幻的三维空间,遮蔽了真实的情感表达,而非洲雕塑则摒弃了这种可塑性幻觉,展现出纯粹的形式美感,开创了独特的精神空间^{[3]347}。在这种空间观念下,立体主义绘画不再为观者预设单一视角,而是通过多重视角的并置,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空间结构,爱因斯坦称之为“可塑性的逻辑结果”(Logical consequence of plasticity)^{[3]353}。这些理论洞见革新了非洲艺术的研究范式,也为原始主义艺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在现代艺术的发展历程中,艺术家们为突破西方古典艺术传统的桎梏,将视野拓展至非洲、东南亚、大洋洲、美洲及欧洲古代艺术,从中寻求创作灵感与革新动力。这一艺术转向催生了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莫迪里阿尼的女像柱系列、毕加索的变形人物肖像以及布朗·库西的大理石雕塑。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形式语言的突破与美学观念的革新,而且折射出艺术家在与原始主义艺术对话过程中,实现的身份解放与艺术自觉^{[2]20}。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艺术家共享着相似的非西方艺术资源,然而他们在借鉴与转化过程中,都发展出极具个人特质的艺术语言。这种个性化特征的形成,既源于艺术家独特的文化认知与审美取向,也得益于个人经历与创作语境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化的艺术实践,使得原始主义在现代艺术中,呈现多元交织的发展态势。

从深层的文化维度而言,艺术家在其作品中实现了双重转化:一方面将原始主义的艺术元素转化为现代艺术语言;另一方面又将个人文化身份与艺术智慧注入创作之中。这种转化不仅丰富了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而且构建了一个多元共生的艺术生态系统,为现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与可能性。

2 莫迪里阿尼作品的原始主义特征

莫迪里阿尼的艺术生涯始终保持着持续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学习态度。1906年移居巴黎后,他通过伯恩海姆画廊的卡萨姆作品展,以及秋季沙龙中的更高雕刻展,开启了艺术视野的拓展之旅。这一时期,他对非洲、大洋洲和古希腊的不同原始艺术形式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与原始主义艺术的具体对话中,莫迪里阿尼将其转化为个人创作的灵感源泉,作品逐渐形成平面化、内敛化与抽象化的形式特征。

2.1 平面化与非对称的空间布局

在原始绘画形态中,岩画这类艺术表现形式受制于原始材料与技术条件,画面不受三维空间的束缚,呈现平面化与非对称的构图特质。平面化的空间布局舍弃了透视效果与深度空间的表达,形成一种独特的视觉语言。原始壁画中的场景布局多采用平面化的横带状分段构图,主体和场景通过色块与轮廓线表现^[4],有序呈现不同情节或场景。

在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岩画《受伤的野牛》中,野牛的躯体蜷缩,前肢扭曲折叠,后肢蹬地发力,头部深埋于肩部,背部肌肉因疼痛而隆起。这种姿态打破了静态对称的平衡感,使画面产生强烈的方向性动势,观众视线被引导至野牛的挣扎状态,而非均匀分布的构图元素。洞窟岩壁的天然裂缝、凸起与凹陷迫使创作者放弃对称布局,转而采用随形策略。例如,在很多岩画的洞顶边缘处,常见动物的头部或肢体因岩石结构限制而被截断,形成不完整的形态,这种未完成感增强了画面的真实感与即兴性。

莫迪里阿尼的绘画作品以平面化为主要布局特征。他采用点、线、面等几何元素的叠加,削减物象的细腻质感,在简化空间纵深的同时,构建个人的视

觉语言。画面中人物与背景的扁平化处理,既压缩了空间距离,又通过视觉留白,为观者预留了延展的想象空间。这种布局策略打破了西方传统绘画的三维透视法则,更将原始艺术的稚拙形态与欧洲古典美学,熔铸为独特的现代性表达。

以作品《侧坐的珍妮·海布特》(Jeanne Hébuterne)为例,背景墙面仅以简单几何线条划分,左侧的灰色房门和右侧的棕黄色墙面无明显透视变化,在大面积的单色背景中,仅以矩形轮廓暗示椅子结构,以及几何形态的家具摆件。画面人物与背景间距离感被压缩,无层次分明的空间纵深,所有元素似处于同一平面。人物的肢体呈扁平化,颈部等部位被拉长变形,打破真实的人体比例。人物服饰摒弃细腻的阴影塑造,以平涂色块,表现无光影过渡的立体渲染,并用简洁线条勾勒轮廓,消解三维立体效果,凸显平面化的艺术表达。不同于西方传统绘画中对光影与体积的细节刻画,莫迪里阿尼简化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空间环境,其平面化的构图形式与原始主义艺术风格高度契合(见图 1)。



图 1 侧坐的珍妮·海布特

在画面设计与布局层面中,莫迪里阿尼擅长通过非对称的构图与动态元素的融合,摒弃传统绘画追求稳定的构图方式,不刻意营造视觉上的平衡感,突破了西方古典肖像绘画的对称性范式。其 1917-1919 年间的肖像画创作呈现的形式特征,即人物面部特征与身体姿态,常遵循一种明显的非对称方式布局^[5]。人物在画面中的位置常偏向一侧,背景元素分布也无固定规律,利用元素的疏密和大小对比,营造非对称空间的节奏感,使画面从形式上打破常规的布局方式。

在《侧卧的裸女》(Reclining Nude)中,人物仰卧在软垫之上,其身体自然地向画面左侧延伸,将深色背景与红色软垫区域划分,这种以主体人物分割不同空间的构图方式,使画面的视觉焦点凸显,增强

了视觉冲击力。人物身体的扭转、肢体的摆放与右侧大面积留白,形成视觉重力偏移,引导观众视线在画面中不规则移动,强化非对称感。人物头部几乎触及边框,而延伸至画面之外的躯干线条则赋予了构图在空间中的延伸感。画面人体虽呈现不完全的形态,但富有韵律感的线条暗示了人体的完整形态。人物肢体的二维延展,将三维空间压缩为平面,与阿尔塔米拉洞窟岩画的随形特征形成跨时空的呼应。

2.2 内敛与象征性的色彩表现

受制于自然材料的匮乏,原始绘画色彩种类有限,以天然矿物颜料为主,在目前已知的史前洞穴壁画和岩画中,尚未发现绿色和蓝色等复杂加工的色彩。法国多尔多涅省韦泽尔河谷中的拉斯科洞窟壁画,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的杰作,其岩画色彩主要依赖矿物和有机材料,通过研磨、混合后涂抹在洞窟岩壁上。岩画的色调主要由赭红、棕黄、黑白等色构成,先人们用温暖的赭红或棕黄色调,勾勒动物的轮廓或填充局部,用黑色描绘动物的毛发或身体细节,而白色多用于画面局部的点缀。因保护技术与意识的缺乏,以及矿物颜料的不稳定性以及岁月的侵蚀,岩画出现不同程度的褪色或变色,从而形成质朴内敛的色彩基调。

此外,岩画的色彩与原始信仰紧密关联。先人们将复杂的狩猎场景或宗教仪式浓缩为视觉代码,隐含着人类对自然、死亡与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如因与血液的关联,红色成为生命力的象征,在原始艺术中具有重要地位^[6]。旧石器时代人类涂抹赭红颜料模拟动物血液,以祈求狩猎成功或安抚被猎杀动物的灵魂;黑色常用于勾勒动物或人物的轮廓,象征死亡与危险,并与红色对比,暗示生命与死亡的循环;而棕黄色等取自粘土与植物,象征着原始人类对土地丰饶与自然馈赠的希求。

莫迪里阿尼的作品摒弃了对光影再现与色彩渐变的追求,其画面的色彩常以柔和的暖棕、灰褐、赭石等中性色为主,呈现一种“褪色”的质感,与同时代野兽派的鲜艳狂放形成鲜明对比。他常使用低明度的灰色调平涂背景,剥离多余的环境细节,使观者注意力聚焦于人物的表情与姿态。内敛的色彩赋予画面一种超现实的孤独感,暗示人物与现实的疏离。如作品《安妮·比雅恩肖像》(Annie Bjarne),莫迪里阿尼运用的色彩种类相对较少,画面以赭石、土黄、熟褐等颜色平涂背景,人物身着灰褐色服装,与象牙色肌肤形成微妙的平衡,面部、四肢与服饰色彩过渡细腻自然,没有明显界限。画面通过有限的色彩建构,增强了整体感与秩序感,低饱和度的灰色贴

合其内敛的情感表达,人物仿佛置身于时间停滞的私密空间中(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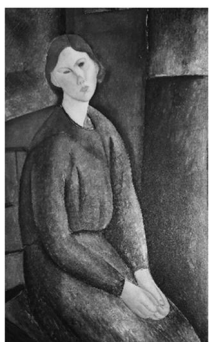


图2 安妮·比雅恩肖像

作为意大利犹太裔艺术家,莫迪里阿尼将流亡经历与身份焦虑,以及长期的生活窘迫与病痛困扰融汇,这对其色彩选择具有一定影响^[7]。如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暗色背景与人物苍白的肤色,或可视为对边缘化生存状态的隐喻,画面中阴郁的色调与其对生命短暂的感知紧密相连。莫迪里阿尼的作品色彩不再是对客观世界的模仿,而是情感转化的符号。低饱和度的灰色运用,弱化了色彩的视觉冲击,是其内敛的情感表达,以及象征意义的传递,引发观者对画中人物内心世界的探寻,这种色彩运用理念与原始艺术绘画中的色彩表现特质一脉相承。

2.3 简化与抽象的造型设置

非洲原始艺术摒弃繁琐细节,捕捉对象的本质特征,追求造型的简约与抽象,将人体形态凝练为线条,形式优雅高贵,既体现了权力与宏伟,又蕴含了生殖崇拜的深层意义,具有直观性强、整体和谐的特点。这种艺术形式为现代艺术家们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使他们得以摆脱自文艺复兴以来对理想化形态与精湛技艺的执着追求。

基克拉底文明分布在爱琴海中部的基克拉泽斯群岛及周边地区,雕塑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以公元前2700-2300年大理石雕塑作品《基克拉底人头像》(Head of a Cycladic figure)为例,作品摒弃了复杂的细节描绘,采用几何形状构建人物面部形态,强调对面部基本形态的提炼和概括,造型简约抽象,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想象空间。这种高度简化的手法启发了莫迪里阿尼的人物造型^{[2]100}。

在莫迪里阿尼的作品《梳发髻的女头像》(Head of a Woman with Chignon)中,该雕塑突出的鼻楔特征,与《基克拉底人头像》鼻部的造型高度相似,展现了简化与抽象的特征和审美意蕴(见图3)。此外,莫迪里阿尼对头像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都予以简

化,他运用细长而略带弧度的线条勾勒眼睛和嘴唇,鼻梁长而挺括,充满力量,颈部被明显拉长,硬朗的线条突出雕塑作品的面部特征,这些特质在非洲、大洋洲以及美洲原住民的传统艺术中也有迹可循。罗伯特·戈德沃特曾评价莫迪里阿尼:“他在原始中发现简化之美,和颇具古风的新古典主义画家们,从古希腊罗马传统中提炼出的线条美最为接近。”^[8]



图3 梳发髻的女头像

当人体作为创作的核心主题时,画家对人体造型的具体处理手法,往往传达出丰富的信息。莫迪里阿尼对于区分人体的不同固有形态抱有浓厚兴趣^[9],在其《女像柱》创作手稿中,人体躯干被分解为若干独立的部分,同时以强有力的轮廓线分隔:画面中人体的躯干呈梯形,乳房则为球形;大腿与躯干为垂直状态;前臂作为支撑结构,与上臂的横向部分垂直;头部呈椭圆形,由圆柱形的颈部支撑,并向相反的方向倾斜。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物面部中,五官也被不同的几何元素精确区分,如狭窄且具有体积感的三角形鼻子,以及位于拱形眉毛下方的杏仁形眼睛。莫迪里阿尼发展出独特的视觉符号系统:他在外眼角的褶皱、眉弓的弧度以及眼睑线的处理中融入了古埃及荷鲁斯之眼的象征元素^[10]。几何形式的运用是其作品抽象与简化造型的核心要素,使人体造型流畅且充满形式美感。对比藏于中非皇家博物馆的刚果女像柱凳(Caryatid stool),莫迪里阿尼的造型理念体现在对不同形态的明确区分上,他致力于赋予单独的部分以高度的形式自主性。这种对人体结构的细致分解,看似拆分了人体形态,但未破坏其整体和谐与统一。通过对节奏、色彩以及自然比例的精准把握,莫迪里阿尼成功维系了人体造型的完整性,其作品激发出一种对“充满和谐与美感的造型”的抒情和怀旧式探索^[11],真正地达到了精简与抽象的艺术效果,获得属于个人的绘画语言。

(下转第73页)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特征、内在缺陷及改革路径

陆彦, 张子涵*, 张翔硕

(1. 安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6; 2. 安徽农业大学 农科教结合研究中心, 安徽 合肥 230036)

摘要: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存在因其共有产权特性导致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失控、剩余索取权配置失衡的缺陷。这一缺陷使得在经营者层面难以实现激励相容、产权激励功能弱化从而导致经营者选拔任用制度失灵,致使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效率偏低。深化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应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两个层面最大程度地实现激励相容、重塑集体产权的排他性和开放性为目标,通过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农村集体产权组织形式和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等路径,有效发挥产权制度的“激励-约束”双重功能,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特征;内在缺陷;改革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4-0044-08

Characteristics, Inherent Defects and Reform Paths under th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China

LU Yan, ZHANG Zihan*, ZHANG Xiangshuo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nhui; 2.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of Agriculture,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nhui)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property right system of China'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has inherent defects, such as the uncontrolled opportunistic behaviour of operators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the imbalance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idual claim rights, which make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at the operator level, and the malfunctioning of the system for selecting and appointing operators due to the weakening of property right incentives, resulting in low efficiency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property right system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should be aimed at achieving the maximum degree of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at the levels of owners and operators, reshaping the exclusivity and openness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and effectively bringing into play the "Incentive-Restraint" function of the property right system through the Demutualisa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assets, reforming the forms of organiza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way of realization of collective property, perfecting the management structure of legal entities and the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residual property rights, etc. Fulfilling the dual function of "Incentive-Restraint" and promoting the rapi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Key word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property rights system; characteristics; inherent defects; reform paths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农村集体产权改革

收稿日期:2025-02-24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2022jyxm465);安徽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S202410364170)。

作者简介:陆彦(1981-),男,安徽亳州人,副教授,博士;张子涵(2004-),女,安徽芜湖人,研究中心助理。E-mail: luyan@ahau.edu.cn

的基本原则和改革方向。2021 年和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是“农村改革重点任务”之一,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立“产权关系明晰”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指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农村重点工作之一,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事实证明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确实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1]。尽管如此,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至今仍未达到令多方利益相关者相对满意的状态,其经济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既有政治逻辑又有经济逻辑,而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对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的要求又不是完全统一、协调的^[2],因此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只能在一定的政治逻辑前提下,尽可能地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在本质上,经济学是对稀缺资源产权的研究,“一个社会中的稀缺资源的配置就是对使用资源权利的安排。”^[3]在特定的正交易费用的现实社会中,产权制度至关重要,一套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基础和前提^[4]。本文的目的在于应用产权经济学理论,深入分析当前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的特征和缺陷,探讨其改革目标和路径,以便有效激活农村集体经济,提高农村集体资源利用效率。

1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特征

1.1 研究对象的界定

在现有文献中,农村集体经济是一个外延比较宽泛的概念,对于农村集体经济这一概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上,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到,农村集体经济包含了生产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土地、资本和生产工具等)归集体所有的各种公有制经济组织形式。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农村集体经济主要表现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领域通过家庭承包制改革,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5]。经过农业家庭承包制改革,农村集体经济形成了“农户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两个相互联系但又相互独立的经济单元。其中,“统”的部分实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6]。广义的农村

集体经济既包括乡、村、村民小组三级所有,以及在“统”的层次上的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又包括“分”的层次上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户经济,其财产含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他所有权主体代表管辖的所有集体财产;既包括资产完全为集体所有的“一元化”集体经济组织,又包括各种形式的农村合作经济,还包括由集体参股的农民合作社,同样还包括集体参股的股份合作社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狭义的农村集体经济是指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依法登记成立的,以企业形态存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了更加准确地把问题分析清楚,先要对本文的研究对象界定清楚。本文的研究对象不是广义上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而是狭义上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即在“统”的层次上以企业形态存在的、其自有资产归集体所有、“一元化”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由于中国目前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代表的“多元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和本文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是两个相互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前者是指财产所有权主体代表属于农民集体的那些财产的产权制度,如法律规定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宅基地、建设用地和农地的产权制度,都隶属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范畴。后者是指财产所有权主体代表属于狭义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那部分财产的产权制度。两者的联系是:前者包涵后者,后者是前者的组成内容。两者的区别在于:一是财产外延不同,二是所有权主体代表不同,三是制度安排不同。

1.2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特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然也是一种科层制经济组织,但与私人所有制企业不同的是,其财产不是由所有者个人定量差别所有,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属于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民共同所有、共同受益,或者说,其产权是一种“共有产权”。所谓的共同所有、共同受益,也就是平均所有、平均受益。作为共有产权的一种经济形式,农村集体的经济产权制度具有以下特征,如表 1 所示。

具有严格身份限制的共有产权。农村集体经济的财产由集体成员共同所有,但是某个集体成员因为一些原因脱离村集体或者死亡,也就是说他一旦丧失村集体成员的“资格”,那么他享有的村集体的各项权利也会自动丧失。村集体内部每位成员都有使用集体资源的权利,但每个人都无权宣称这种资源或者资源的一部分属于他自己所有,而且当一个成员退出集体时,他不能带走名义上归其所有的那份权利(包括财产及收益),同样他也不能继续享有

原有的各项权益,即这种财产属于所有集体成员共同所有,虽然产权在个人之间是无差异的,却不可以也没有定量地对象化在各个成员身上。集体成员对集体产权是一种无差别的平均占有,并且这种无差

别平均占有的权利只有在其所有者还是集体的成员时才会得到承认,否则成员“资格”一旦丧失,包括脱离集体或病故身亡等状况,其享有的集体产权便自动丧失。

表 1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特点

序号	特点
1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是一种具有严格身份限制的共有产权。
2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的主体边界模糊,不利于产权的清晰界定。
3	农村集体经济活动实行民主决策,经营者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其劳动报酬受到政策的严格限制。
4	农村集体经济盈余不得在个人之间进行量化分配。
5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所有者与劳动者重合。
6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开放且权能受到严格限制。

产权主体边界模糊,不利于产权的清晰界定。如上所述,一个人只要具备集体成员“资格”,他就能均等享有集体产权。也就是说,一个人通过合法婚姻、生育等途径成为集体成员,他便可自动获得对“集体产权”的平均占有权而不必支付任何代价。因此,对每一个集体成员来说,其在理论上平均占有的“集体产权”会因为成员人数的变动而变得不确定。

实行民主决策,经营者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其劳动报酬受到政策的严格限制。农村集体经济重大决策由村民(代表)大会按民主程序做出,经上级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者一般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民主程序选拔产生,经营者劳动报酬由聘用合同约定,一般由基本薪酬加奖金构成,但奖金比例和数额受国家和政府政策严格限制。如某省关于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政策文件规定,奖金最高不得超过年收益资产额的 20%,奖金超过 50 万元(含 50 万元)须经县(市、区)委常委会研究确定。

盈余不得在个人之间进行量化分配。农村集体经济的盈余不得在其成员之间进行直接分配,其盈余的一部分是以“集体积累”的形式(公积金)壮大这个集体产权的盘子,一部分以“集体福利”的形式(公益金、福利费)统一安排用于成员福利^[7]。

所有者与劳动者重合。一般来说,农村集体经济的所有者和劳动者是重合的,非集体成员的受雇者不得享有除劳动报酬外的其他权利。集体土地产权不开放且权能受到严格限制。由于长期计划经济和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作为农村集体经济核心要素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封闭的(即不能在土地产权市场自由流转或出让),其权能的行使受到严格限

制,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变更只有国家土地征用一种方式,集体经济组织也没有土地的处置权。

2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的内在缺陷及影响

如上所述,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具有自身的特点,农村集体成员能够均等化享有集体经济带来的各种收益(当然也包括损失),充分保障了集体成员利益的公平性。尽管如此,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的内在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的内在缺陷表现及其产生的主要影响如表 2 所示。

2.1 共有产权特性难以在所有者层面实现激励相容,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失控

作为共有产权形态,按照共同拥有、共同受益的原则,农村集体经济的剩余只能由集体成员平均受益,作为所有者的集体经济成员监督努力的成本和收益不能内在化,致使集体成员对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失去有效性。从理论上讲,农村集体经济成员负有监督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的权利和职责,但由于共有产权的高度重合性和队生产函数的特性,无法找到计量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关切度与成员报酬之间的制度设计,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与个人的直接利益关系不大(假如一个农村集体经济中有 N 个成员,无论个人付出多少监督努力,其在农村集体经济边际收益中始终仅占 1/N 的份额),导致农村集体经济成员监督经营者在集体资产的使用、保护、配置中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积极性不高。也就是说,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种具有公有制属性的队生产组织,每个集体成员为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所付出的监督劳动及贡献并不能从农村集体经济总产出

中得到独立分解和准确计量,成员个人也无法因此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从而导致集体成员对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关切度普遍不高,难以在所有者层面实现激励相容。“村里死了一头牛,大家高兴地等着分牛肉。家里死了一只猪,主人抱着猪哭。”民间这则传言正是对农村集体经济成员对集体资产保值

增值关切度不高真实而生动的写照。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共有产权特性,导致集体成员缺乏参与集体经济管理、监督经营者行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为经营者滥用职权或者消极怠工等机会主义行为留下了制度空间。

表 2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的内在缺陷表现及影响

内在缺陷表现	影响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在集体成员内的共有性	农村集体经济的剩余由集体成员平均受益,集体经济成员监督努力的成本和收益不能内在化,致使集体成员对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失去有效性。
农村集体经济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监督者)的权利非一致性	农村集体经济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监督者)的权利非一致性,导致经营者(监督者)的剩余索取权不能得到有效保障,致使剩余索取权配置失衡,从而在经营者(监督者)层面难以实现激励相容。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的激励功能相对较弱	经营者无法得到有效激励,很难选出优秀的经营者。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主体的“多元性”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主体的“多元性”有悖产权的排他性要求,导致产权难以清晰界定,既不利于经营者形成合理预期,也不利于节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交易成本。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的封闭性与权能残缺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的封闭性及权能残缺降低了产权的配置效率和激励功能,不利于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2.2 剩余索取权配置失衡致使在经营者层面难以实现激励相容

队生产理论认为,若要有效解决队生产组织中的机会主义和搭便车问题,必须在职能专业化的基础上赋予监督者以剩余索取权,以便在经营者层面实现激励相容^[8]。与私人所有制的队生产组织不同,农村集体经济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监督者)的权利并非是重合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通过民主程序聘用经营者行使队生产中的“监督者”职能,而实现有效监督的前提是存在某种剩余索取权安排,以促进和实现“激励相容”。然而,由于队生产函数的特点,即总产出并非是每个独立投入的分产出之和,计量作为监督者的经营者的监督努力程度对产出的贡献是一种及其困难的事情,或者说根本无法将经营者的劳动贡献从总产出中分离出来,致使现行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中缺失使“监督者的监督劳动与报酬紧密联系”的安排,无法实现“激励相容”,因而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成为一种普遍存在和无法避免的问题,或者说如何解决农村集体经济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和降低代理成本是一个未决问题^[9]。不仅如此,作为共有产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实现有效管理和保障监督的有效性,必须将剩

余索取权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经验已经充分证明,这种做法是减少经营者偷懒、提高监督有效性的有效途径,而现行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并没有赋予经营者这些权利。其中,开除作为农村集体经济成员的劳动者或者解除其劳动合同这样的权利一般只能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或其代表机构拥有,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经营者偷懒的动机,降低了经营者监督劳动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从而不利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这是因为失业风险的大小将影响个人对报酬的主观评价或效用,这等价于失业风险与偷懒的私人边际成本成正比,也就是说零失业风险意味着强化了偷懒和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激励。加之,农村集体经济的产出除了劳动者和作为监督者的经营者的劳动努力外,还受诸如经济政策、市场环境、自然风险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要在农村集体经济中找出实现“激励相容”的产权安排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2.3 产权激励功能弱化导致经营者选拔制度失灵

早在 20 世纪初叶,经济学家熊彼特就指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经营者才是企业成败和经济兴衰的关键^[10]。因此,建立一套好的经营者选拔任用制度

是经济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而有效的经营者选拔任用制度与企业产权制度密切关联,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经营者选拔任用制度的有效性决定于企业产权制度的特性及其有效与否^[11]。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的共有产权特性决定了集体成员对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关切度不高,而对集体经济资产保值增值的关切度集中体现在经营者的选拔任用问题上。由于集体成员在经营者选拔任用工作的偷懒或者失察所引起的成本和收益无法内在化,选拔任用什么样的人,采用什么方式选人用人,对集体成员个人而言,也就显得无关紧要^[12],而私人所有制的业主制企业所有者在选人用人问题上决不会得过且过、马虎行事,这是经济组织产权特性使然。尽管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经营者选拔任用的民主化、规范化程度有了很大提升,但依然未能形成一套科学的经营者选拔任用制度体系,现实中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经营者选拔任用制度要么成为摆设,要么难以有效实施,要么成为权势集团利用的工具,导致在经营者选拔任用中诸如以权谋私、暗箱操作、流于形式“走过场”等现象和问题并非少见^[13]。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共有产权特性。如何通过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经营者选拔任用制度的科学性、有效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是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2.4 产权主体的“多元性”,既不利于经营者的合理预期,也不利于节约交易成本

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产权的明确界定和产权的排他性(即产权能够得到有效保护)是产权有效配置和使用的前提,因为只有排他的、清晰界定的产权才有助于利益主体形成合理预期^[14],节约产权交易成本,促进经济运行所必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形成,而所有权是产权束中最重要的财产权利^[15]。如前所述,土地尤其是建设用地是农村集体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财产,依据现有法律,包括土地在内的中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主体代表是“多元”的而非主体一元化的排他性产权,其拥有的财产所有权不具有完整的排它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等法律和政策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归村民集体所有,其所有权主体代表和管理主体可以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合作经济组织,也可以是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资产交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管理或者交由村委会或者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负责管理都

有法律和政策依据。那么,当以上“多元”的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主体代表在农村集体财产管理权限划分和实际财产管理工作中发生矛盾和纠纷时,究竟应当维护谁的“地位和权利”呢?制度尤其是作为制度硬化形态的法律,是调解社会生产关系和规范利益主体行为的工具,需要清晰地界定利益主体的行为界区,明确指出利益最大化主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及做与不做应当承担的后果。只有这样,才能使各个利益主体各行其道、各司其职、有所为有所不为,以此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用产权经济学的观点看,一项财产权利同时由两个利益主体所有,则破坏了产权的“排他性原则”,不利于产权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16]。以上法律和政策文件中关于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主体代表和管理权限上的这种不确定的法律规定和政策表达不仅在实践中容易导致集体土地管理中的摩擦和矛盾,增加了集体土地产权的交易成本,而且不利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者及相关利益主体形成稳定预期和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2.5 产权封闭性与权能残缺抑制制度效能,阻碍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土地作为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财产,历来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基础。根据现有法律法规,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分为三类:农用地、宅基地和建设用地。改革开放前,农用地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实行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宅基地实行集体所有、农户长期使用。改革开放后,农用地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户拥有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依然为集体所有,使用权实行有限条件下的市场流转。最新的《土地管理法》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含所有权)进入市场进行交易,虽然这一规定破除了农村集体土地产权长期封闭的樊篱,在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但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交易管制依然没有放松,不允许集体土地买卖即所有权交易。在现行制度下,要变更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只有国家征用这唯一的途径。

如前所述,由于目前国家法律有关规定的不确定性导致农村集体土地存在多元的产权主体代表,各地对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和农地所有权主体代表的规定和具体做法也存在不一致并且十分复杂的情况,有的地方规定由村委会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有的规定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并且同一地方对不同类型的集体土地,

以及对所有权主体代表的规定也有所不同^[17]。如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代表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那么,集体土地产权的封闭性及权能残缺必然会降低产权的配置效率和激励功能,不利于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众所周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只能在“三条底线”(即农村土地改革必须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的框架内进行^[18]。从理论上讲,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并不一定要采取禁止集体土地所有权市场交易的办法,或者说集体土地所有权市场交易并非必然导致土地公有制性质的改变。相反,禁止集体土地所有权市场交易破坏了产权的可让渡性,导致集体土地产权残缺,不利于集体土地产权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也不利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财产性收益的合理增长。

第一,用发展的眼光看,任何微观经济组织都不可能一成不变,组织的消亡、拆并、发展客观上都要求土地产权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交易和所有权转移,以促进土地产权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禁止集体所有权市场交易,无异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有悖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第二,集体所有权转移和主体变更只用国家土地征用一种方式,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交易方式多样化要求,结果必然导致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产权权益流失及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占用和配置。由于地方政府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议价权乃至知情权,尽管国家法律规定了土地征用补偿安置标准,但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权益被侵害的事件屡屡发生,并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分享土地用途变更的巨额增值收益,集体土地所有权价值得不到真正实现。

第三,集体土地产权受到限制,尤其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所有权市场交易受限,不利于优化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和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限制集体土地所有权市场交易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防止土地市场化交易动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不稳定和大起大落。事实上,这一出发点虽好,但结果未必如意。目前,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拥有的资产并非只有土地,还有其他多种资产形式,资产的作用是用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如果一种资产不能实现价值增值、不能为经济组织带来更多的价值,这种资产也就失去了资产的本来意义。如果

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雄厚,即使没有土地所有权,也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薄弱乃至仅有土地所有权,那么限制土地所有权交易无异于作茧自缚,无法激活土地要素活力,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的优化配置和财富增值。

第四,允许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市场交易与坚持土地公有制并非必然发生矛盾。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市场交易在逻辑上必然会导致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变更,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市场交易主体的性质作出明确规定,即除国家土地征用和公有制性质的市场主体外,禁止一切自然人和私人企业买卖土地,这样以来不仅不会动摇农村土地公有制性质,而且有助于实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动态优化,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村土地公有制。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禁止集体土地买卖和自主交易,并非是理性的制度安排。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和趋势应该是也必然是市场化,以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产权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农村集体土地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加快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合理增长。

3 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和路径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阶段,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挑战。由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的内在缺陷,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经营能力差,资源利用效率低,集体经济活力不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集体经济的转型发展需要更灵活、更有效的产权制度保障,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现代化。中央在推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明确提出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重点是明确集体经济的产权结构,强化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流转和集体资产的增值,最终提高农民的集体经济收益。

3.1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历史和体制等原因,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和不甚合理的安排。深化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在保障利益相关者合法权利的前提下,激活农村集体经济,必须首先明确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以便有的放矢。

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是:针对现行产权制度不能有效解决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失控、剩余索取权分配失衡、经营者选拔任用制度失灵、集体财产所有权主体代表“多元性”和集体产权的封闭性以及权能残缺等问题,明确集体经济产权结构,强化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以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两个层面最大程度地实现激励相容、重塑集体产权的排他性和开放性为目标,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充分发挥产权制度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激励约束功能,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3.2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

首先,积极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改造农村集体经济的共有产权特性,以提高农村集体经济成员对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关切度和经营者行为监督的有效性。理论和经验证明,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可以有效提高投资者对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关切度和对经营者行为监督的有效性。深化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可以借鉴股份制的先进基因,将集体资产折算成可以度量的货币形式,再均等量化到每个集体成员,通过财产股份化改革,结合分配制度改革,赋权于民,使每个成员年终可以实实在在地定量分享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红利”,以有效解决共有产权的“模糊性”和剩余分享的非切身性,增强农村集体经济成员的获得感,促使农村集体经济成员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上关注、关心、关切集体经济发展,激发村集体中的每一位成员参与集体经济管理、监督经营者行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其次,改革农村集体经济产权组织形式和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以有效实现层级节制、权利制衡。在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中,没有谁能够独立成为救世主。科层制企业治理的真谛在于层级节制、权利制衡,而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实现层级节制、权利制衡的有效途径。因此,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客观上要求在集体财产股份化的基础上,积极推行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改造农村集体产权组织形式,优化农村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与此同时,要通过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法人内部治理机制等途径,优化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内部决策权、监督权、经营权配置格局,促进股份合作制企业有效治理。

第三,合理配置农村集体经济剩余索取权,更多地赋予经营者参与剩余索取权分配的权利。允许经营者参与剩余索取权分配,是提高经营者监督管理的有效性、在经营者层面实现激励相容的有效途径。

为此,要通过改革农村集体经济分配机制,改变经营者才能和贡献与其所得报酬不相适应乃至严重脱节的问题,在合理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基础上,从农村集体经济消费基金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对经营者业绩贡献的奖励。与此同时,要赋予经营者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包括人事权,尤其是要赋予经营者自主聘用员工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实现经营者层面的激励相容,充分激发经营者管理才能和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忠诚度。

第四,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经营者选拔任用制度和监督机制,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经营者选拔任用工作的领导和监督,确保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权牢牢掌握在“一懂两爱”(即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善经营、会管理的经营者手中。从根本上讲,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关键在于能否造就一支“一懂两爱”、善经营、会管理的经营者队伍,而经营者选拔任用制度是确保经营者队伍素质和质量的根本保障。为此,要改变过去化地为牢、少数人说了算的不良习气,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经济经营者选拔任用制度改革,解除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者必须是集体成员的身份限制,在全社会范围内“不拘一格降人才”,切实把“一懂两爱”、善经营、会管理的有用人才选拔任用 to 农村集体经济经营者岗位上来。制度是重要的,但不是万能的。由于信息不对称,再好的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也可能变形走样,甚至成为摆设和权势集团利用的工具。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是农民的需要和期盼,也是党和政府的职责所在。因此,基层党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经营者的选拔、监督和考核,不断提高经营者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化、法制化和规范化程度,确保农村集体经济经营者选拔任用制度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落实。

最后,修改完善现有法律法规,着力打破农村集体经济财产所有权的封闭性和“多元性”,为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权能的有效行使和确立农村集体经济财产所有权的排他性奠定法律依据和创造法治环境。只有产权主体具体明确,允许产权在市场上自由转让,并且产权交易所得收益能得到有效保护,产权所有者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 在产权约束的范围内配置资源以获取最大收益^[19]。农村集体经济财产所有权主体代表的“多元性”背离了财产权利的排他性要求,而农村集体经济财产所有权主体代表的“多元性”本身就是法律的不完善造成的。禁止农村集体经济财产所有权市场交易不仅导致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权能残缺和权益流失,而且有悖新发展理念和

改革开放原则,已经成为农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制度桎梏。诚然,由于中国国情和农业的特殊地位,现阶段禁止宅基地、非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农地集体所有权市场交易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的经营性建设用地有必要允许其所有权开展市场交易。因此,必须尽快修改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依法明确农村集体经济所有权主体代表资格,还农村集体经济财产所有权主体代表的“一元性”本真,重塑农村集体经济财产所有权的排他性,解除农村集体经济产权的法律禁锢,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当然,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入市涉及到众多利益相关者和其他方方面面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做好顶层设计,尤其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市场交易主体进行严格限制,以防止和避免土地私有化和改革的“方向差”。

4 结论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然选择,也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由于历史和体制等原因,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和不甚合理的安排,未能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两个层面实现激励相容。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坚持问题导向,通过积极推行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农村集体产权组织形式和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合理配置农村集体经济剩余索取权、完善集体经济经营者选拔任用制度和监督机制、修改完善现有法律法规等路径,有效解决集体成员对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关切度不高、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失控、产权激励功能弱化、资产配置和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以便最大程度地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两个层面实现激励相容,不断提高集体产权的配置效率,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参考文献:

- [1] 胡凌啸,舒文,周应恒. 产权改革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效能及深化方向[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2): 87-97.
- [2] 魏广成,孔祥智.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框架、难点阻点与制度构建[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6): 14-24.
- [3] 高静,朱金涛,杨云皓,等.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乡村共同富裕的效应及其实证[J]. 农业技术经济, 2025(3): 1-15.
- [4] 孔祥智. 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产权清晰+制度激励”理论框架的研究[J]. 经济纵横, 2020(7): 32-41.
- [5] 罗必良. 中国农业经营制度:立场、线索与取向[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0(3): 261-270.
- [6] 罗必良,洪炜杰. 记忆、信念与制度选择——以家庭承包制为例[J]. 社会科学战线, 2021(01): 78-90, 281.
- [7] 刘雨欣,王子怡,刘二阳. 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黑龙江省13个地级市403家合作社的调研数据[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5, 46(1): 250-260.
- [8] ALCHIAN A, DEMSETZ H.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 IEE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Review, 1975(2): 21-41.
- [9] 黄婉,罗宏. 限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能够提升股价信息含量吗?——来自“减持新规”的经验证据[J]. 管理评论, 2025, 37(2): 3-18.
- [10] 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孔伟艳,朱攀峰,姜季芳,编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8: 72-104.
- [11] HAROLD D.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2): 347-359.
- [12] HAROLD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II: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private and collective ownership[J].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002, 31(S2): 653-672.
- [13] 伍旭中. 重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53(2): 7-14.
- [14] ARMEN A, ALCHIAN. 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J]. Il Politico, 1965, 30(4): 816-829.
- [15] ARMEN A, ALCHIAN, HAROLD D. The property right paradigm[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3, 33(1): 16-27.
- [16] 罗必良,张露. 中国农地确权:一个可能被过高预期的政策[J]. 中国经济问题, 2020(5): 17-31.
- [17] 米运生,罗必良,徐俊丽. 集体所有权的变革逻辑——演变、现状与展望[J]. 经济学家 2020(1): 98-109.
- [18] 申始占,夏杰长,王鹏飞. “多源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考察[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5(1): 168-182.
- [19] 杨洁莹,张京祥,张逸群. 乡村集体土地产权转换与乡村治理格局演变机制研究[J]. 规划师, 2022, 38(10): 61-66.

基于三阶段 DEA-Malmquist 和 RSR 法的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探析

郭凌霄*, 魏 骅, 陶群山

(安徽中医药大学 医药经济管理学院, 数据科学与中医药创新发展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 安徽 合肥 230012)

摘 要:基于2014–2023年我国31个省市各类养老服务资源的数据,为减少环境因素和干扰因素的影响,利用三阶段 DEA 模型对2023年我国各类养老机构的服务效率进行静态分析,采用秩和比法进行排序和分档,以 Malmquist 指数对2014–2023年的数据进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整体不高,并且存在地域性差异,区域呈“东北部–东部–西部–中部”的递减格局;规模不经济和缺乏技术进步是限制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根据研究结果对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提出构建科学合理的养老服务资源配置规划,强化区域协同发展,整合社会资源,缩小地域差异等建议,通过优化资源整合与布局,持续提升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的效率。

关键词:养老机构;服务效率;三阶段 DEA–Malmquist;秩和比法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4–0052–07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China Elderly Service Resources by the three-stage DEA-Malmquist and RSR Method

GUO Lingxiao, WEI Hua, TAO Qunshan

(Anhui Key Laborato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for Data Scie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12, Anhui)

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various elderly care service resources in 3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of our country from 2014 to 2023,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and interfering factors, a three-stage DEA model was utilized to conduct a static analysis of the service efficiency of various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in China for 2023. The rank-sum method was employed for ranking and classification, and the Malmquist index was used for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data from 2014 to 2023.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allocation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resources in China is rather low, and there are regional disparities, following a decreasing pattern from “Northeast-East-West-Central”. Furthermore, economies of scale and lack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re the main factors limi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the allocation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resourc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it was recommended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ally sound allocation plan for elderly care service resources, strengthen regional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integrate social resources, and reduce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the allocation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resources through optimized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layout.

收稿日期:2025–03–23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GXXT–2022–095);安徽省高校优秀科研创新团队(2022AH010039)。

作者简介:郭凌霄(2002–),女,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魏骅(1966–),男,安徽无为,人,教授。E-mail:1284658563@qq.com

Key words: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service efficiency; three-stage DEA-Malmquist; RSR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当前我国处于中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态势严峻,程度持续加深,养老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更是关键所在。2025年1月7日,民政部等24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的若干措施》,要求持续优化养老机构床位结构,完善公建民营等运营机制,统筹利用社区公共资源。我国老年人口呈现出数量庞大且持续增长的特点,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多层次,有限的养老服务资源能否得到高效地配置,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养老服务体系的持续健康发展。然而,当前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存在地域性不均、城乡差异大、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现有文献中,对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主要集中在 DEA 模型或 DEA 模型与其他方法的综合评价,如王禹杰、甘晓成、郭珊珊等分别采用 DEA 模型、三阶段 DEA-SBM 模型、三阶段 DEA 模型和 GIS 空间分析对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评价^[1-3]。本研究运用三阶段 DEA-malmquist 指数法与 RSR 法,对 2014-2023 年我国 31 个省市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展开综合评价。通过三阶段 DEA 模型排除干扰,实现静态分析,用 malmquist 指数法进行动态分析,再借 RSR 法排序分档^[4],精准定位并解决养老服务资源配置低效率的问题,对于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推动我国养老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文研究资料来源于 2015-2024 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包括 2014-2023 年 31 个省、市养老服务资源的相关指标。根据前期的文献梳理,充分考虑数据的代表性、科学性和可取得性,选取养老机构的床位数、年末职工人数和机构数作为投入指标;选取养老机构的年末在院总天数和年末在院总人数作为产出指标;选取政府养老支出、老年人口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人口比重作为环境变量^[6]。

1.2 研究方法

1.2.1 三阶段 DEA 模型

三阶段 DEA 数据包络方法是一种用于评估决

策单元效率的分析方法。第一阶段传统 DEA 分析是基于决策单元的投入与产出的数据,通过数学规划与模型计算得出初步效率值,能直观反映出各单元的相对效率,但容易受到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项的影响;第二阶段运用 SFA 模型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项的影响,对原始投入进行调整,使各决策单元处于相对公平的比较环境;第三阶段对调整后的投入变量再次进行 DEA 分析,得到更加精确客观的效率评价结果。一般而言,效率值越接近 1,表明决策单元资源利用越充分,效率越高;反之则说明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存在资源浪费或配置不合理等问题。

1.2.2 Malmquist 指数法

Malmquist 指数法是一种在经济学领域广泛应用,深入分析多期生产率动态变化的重要方法。本研究通过 Malmquist 指数从当期到下期的生产率变动对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动态评估。若 Malmquist 指数大于 1,表明生产率有所提升;等于 1 生产率保持不变;小于 1 则说明生产率下降。

1.2.3 秩和比法

秩和比法即 RSR 法,是一种综合评价方法,它将多项指标的秩次进行综合,以反映事物的综合水平。秩和比法测算出的指标值介于 0-1 之间,其值越大越好。其基本计算公式为: $RSR = \sum R/mn$, R 为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指标的秩次, m 为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指标的个数(本文中 $m=5$), n 为我国养老服务资源的省份数(本文中 $n=31$)。通过对 RSR 值的计算,可以对评价对象进行分档和排序,从而实现综合评价的目的。

2 结果

2.1 第一阶段:传统 DEA 模型结果

如表 1 所示,第一阶段运用传统 DEA 模型得出的结果表明,2023 年我国 31 个省、市在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方面的综合效率平均值为 0.592,纯技术效率平均值为 0.740,规模效率平均值为 0.826。具体而言,吉林和西藏这两个省份的综合效率值为 1,表明它们处于技术有效状态;北京、黑龙江、吉林、辽宁等 11 个省、市的纯技术效率为 1,说明这些地区在现有技术和管理水平下,资源利用能力较强;青海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其余 28 个省、市则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减^[7]。整体来看,东部地区凭借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在养老服务资源利用效率上处于优势地位;中部地区在技术和规模利用上都有提

升空间;西部地区整体发展不均衡,部分省市还具有较大的挖掘潜能,需要加大资源投入并进行管理优化;东北部地区资源配置状况全面领先,但仍然需要以先进的技术为依托,发挥规模效益,实现规模经济,以进一步提高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综上,我国在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整体上并不理想,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8]。

表 1 2023 年我国 31 个省、市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

省份	传统 DEA 模型结果				调整后的 DEA 模型结果				RSR	Probit	排名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收益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收益			
北京	0.817	1.000	0.817	drs	1.000	1.000	1.000	—	0.659	6.1310	5
天津	0.642	0.814	0.789	drs	0.545	1.000	0.545	irs	0.635	5.7527	8
河北	0.526	0.859	0.613	drs	0.827	0.956	0.865	drs	0.508	3.8690	28
山西	0.392	0.414	0.947	drs	0.509	0.825	0.616	irs	0.597	4.8784	18
内蒙古	0.702	0.774	0.908	drs	0.670	0.966	0.694	irs	0.627	5.6493	9
辽宁	0.781	1.000	0.781	drs	1.000	1.000	1.000	—	0.650	5.8649	7
吉林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0.713	7.4060	1
黑龙江	0.877	1.000	0.877	drs	1.000	1.000	1.000	—	0.665	6.3002	4
上海	0.872	1.000	0.872	drs	0.978	0.990	0.988	drs	0.615	5.2869	13
江苏	0.406	1.000	0.406	drs	0.855	1.000	0.855	drs	0.475	3.1514	31
浙江	0.637	1.000	0.637	drs	0.829	1.000	0.829	drs	0.488	3.4821	30
安徽	0.678	1.000	0.678	drs	0.949	1.000	0.949	drs	0.668	6.5179	3
福建	0.262	0.286	0.916	drs	0.442	0.628	0.704	irs	0.515	4.1351	26
江西	0.584	0.655	0.892	drs	0.831	0.873	0.953	irs	0.544	4.4476	23
山东	0.641	1.000	0.641	drs	0.985	1.000	0.985	drs	0.515	4.0108	27
河南	0.589	1.000	0.589	drs	0.931	1.000	0.931	drs	0.622	5.4605	11
湖北	0.397	0.520	0.764	drs	0.712	0.724	0.984	drs	0.537	4.3507	24
湖南	0.435	0.519	0.838	drs	0.741	0.756	0.980	irs	0.494	3.6998	29
广东	0.441	0.551	0.800	drs	0.709	0.730	0.972	drs	0.527	4.2473	25
广西	0.821	0.911	0.901	drs	0.620	0.990	0.627	irs	0.5764	4.7131	20
海南	0.584	0.586	0.997	drs	0.107	1.000	0.107	irs	0.615	5.3723	12
重庆	0.666	0.682	0.975	drs	0.871	0.934	0.933	irs	0.679	6.8486	2
四川	0.684	1.000	0.684	drs	0.967	1.000	0.967	drs	0.652	5.9892	6
贵州	0.365	0.396	0.921	drs	0.425	0.842	0.504	irs	0.570	4.6277	21
云南	0.428	0.448	0.955	drs	0.453	0.870	0.521	irs	0.609	5.0404	16
西藏	1.000	1.000	1.000	—	0.104	1.000	0.104	irs	0.614	5.2035	14
陕西	0.435	0.484	0.898	drs	0.633	0.827	0.766	irs	0.590	4.7965	19
甘肃	0.145	0.155	0.936	drs	0.201	0.695	0.290	irs	0.552	4.5395	22
青海	0.451	0.478	0.943	irs	0.093	0.980	0.095	irs	0.602	4.9596	17
宁夏	0.421	0.446	0.944	drs	0.182	0.978	0.186	irs	0.614	5.1216	15
新疆	0.670	0.968	0.691	drs	0.537	0.962	0.558	irs	0.623	5.5524	10
均值	0.592	0.740	0.826		0.668	0.920	0.726				

注:“—”为规模报酬不变;“irs”为规模报酬递增;“drs”为规模报酬递减。

2.2 第二阶段:SFA 回归模型结果

第二阶段把各地区投入指标的松弛变量,即床位数松弛、年末职工人数松弛和养老机构数松弛作为被解释变量;政府养老支出、老年人口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人口比重这些环境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 SFA 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2,如果回归系数为正值,则增加该环境变量会产生消极影响,反之则会产生积极影响。广义似然比 LR 单边值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 SFA 模型构建合理,有必要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因素。政府养老支出、老年人口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人口比重在 1% 水平上对我国养老服务资源的投入松弛变量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政府养老支出对于各类投入松弛变量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于各类投入松弛变量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职工人数的松弛变量具有

积极作用,对床位数的松弛变量和机构数的松弛变量具有消极作用;城镇人口比重对床位数的松弛变量具有积极作用,但对于职工人数的松弛变量和机构数的松弛变量具有消极作用。

上述分析结果揭示了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受人口与经济因素影响的复杂性。从人口因素看,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各类投入松弛变量均具有抑制作用,城镇人口比重对不同资源投入松弛变量影响不同,因此具体如何影响资源投入仍需综合考量。在经济因素方面,政府养老支出对各类投入松弛变量均具有积极作用,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不同资源松弛变量影响各异。这表明人口结构变化 and 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在增加养老服务资源投入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配置的新挑战,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全面评估精准优化养老服务资源配置。

表 2 SFA 回归结果

变量	床位数	职工人数	机构数
常数项	-1.70E+04	-1.01E+04	-4.29E+03
政府养老支出	-1.07E-01	-1.05E-02	-3.11E-03
老年人口抚养比	3.06E+03	3.62E+02	1.59E+02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3.24E-01	-4.03E-03	7.11E-03
城镇人口比重	-6.69E+02	8.48E+01	7.83E+00
σ^2	2.21E+10	7.15E+08	1.81E+08
γ	7.53E-01	8.18E-01	8.78E-01
LR	1.72E+02	2.48E+02	3.37E+02

2.3 调整后的 DEA 模型分析结果

对第二阶段调整后的数据再次进行 DEA 分析,结果见表 1。调整后我国各地区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均值分别为 0.668、0.920 和 0.726,相较于调整前综合效率上升了 7.6%,纯技术效率上升了 18%,规模效率下降了 10%,说明传统 DEA 方法的计算低估了我国养老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9]。地域上看,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项后,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这 4 个省、市的综合效率为 1,处于技术有效状态;天津、内蒙古、广西、海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 8 个省份的综合效率下降,这说明外部环境因素对这些省份综合效率的提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中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养老服务行业的资金投入不足;内蒙古则是由于地域辽阔,老龄化程度和分布不均,养老服务资源难以全面覆盖。河北、山西等

22 个省、市的地区综合效率有所上升但仍然没有达到 1,这意味着外部环境对这些省份的综合效率有一定的影响,需要对养老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和升级,提升养老产业服务能力,以进一步提高综合效率。

2.4 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 Malmquist 指数结果分析

运用 Malmquist 指数对 2014-2023 年我国养老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行动态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2014-2023 年技术效率指数的均值为 1.053,年平均改动幅度为 4.90%,2014-2019 年整体呈上升趋势,2019-2020 年大幅度下降,随后又有所回升。技术进步指数的均值为 2.196,年平均改动幅度 26.40%,波动剧烈。2014-2015 年达到极大值 12.114,随后大幅下降。纯技术效率指数的均值为 0.994,年平均改动幅度仅 0.06%,相对稳定。规模效率指数均值为 1.059,年平均改动幅度 5.6%,多

数年份大于 1,表明我国养老服务行业整体呈现有效扩张趋势,通过实现规模经济提升规模效率。2014 - 2023 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为 0.724 - 12.619,均值 2.302,年平均改动幅度为 32.60%,总体呈下降趋势,其变化趋势与技术进步指数有一定关联性,在 2014 - 2015 年较高,2019 - 2020 年较低,反映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受技术进步影响较大^[10]。此外,2014 年 6 月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国

家智能养老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的通知》,该工程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养老服务领域,推动了养老服务在安全监测等方面的技术升级,这可能是促进当年技术进步指数大幅上升的重要原因。综上,技术进步指数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变化趋势相吻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仍有提升空间,较为稳定的纯技术效率,为生产提供了基本保障^[11]。

表 3 2014 - 2023 年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 Malmquist 指数及其分解

年份	技术效率指数	技术进步指数	纯技术效率指数	规模效率指数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2014 - 2015	1.042	12.114	0.985	1.057	12.619
2015 - 2016	0.987	0.903	1.001	0.986	0.891
2016 - 2017	1.097	0.915	0.985	1.113	1.003
2017 - 2018	1.072	1.078	1.015	1.056	1.156
2018 - 2019	1.267	0.995	0.999	1.267	1.260
2019 - 2020	0.885	0.818	0.924	0.957	0.724
2020 - 2021	1.052	1.006	1.018	1.033	1.058
2021 - 2022	1.037	0.929	1.001	1.037	0.963
2022 - 2023	1.040	1.003	1.017	1.022	1.043
平均值	1.053	2.196	0.994	1.059	2.302
年平均改动幅度	4.90%	26.40%	0.06%	5.60%	32.60%

2.5 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的 RSR 分析

以调整后的投入产出数据为基础,计算我国 31 个省、市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的 RSR 和 probit 值,根据 RSR 值进行排序,结果见表 4。以 RSR 值为自变量,probit 值为因变量,利用 SPSS 软件进行线性回归拟合,从而计算得到回归方程 $RSR = 0.281 + 0.061 * Probit$,根据计算结果将我国 31 个省、市的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分为四档,结果如表 4 所示。在利用 RSR 法对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评价时,地区所处的档次越高,说明该地区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后,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更为出色,资源利用效率较高,配置结构较为合理,能更好地满足当地对养老服务资源的需求。1 档(低)涵盖的省份为江苏和浙江,位于东部地区;2 档(中下)包括的省份有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山东、贵州、江西、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河北,主要以西部地区为主,东部和中部地区均匀分布;3 档(中上)包含的省、市有北京、宁夏、西藏、云南、四川、海南、天津、河南、黑龙江、上海、内蒙古、辽宁、新

疆,以西部地区为主,东部地区次之;4 档(高)覆盖的省份有安徽、吉林、重庆,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均匀分布^[12]。

RSR 法的分档结果对于了解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从各个区域来看,东北部地区因吉林处于 4 档,黑龙江和辽宁处于 3 档而整体效率最高,其在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助力其他地区优化资源配置;东部地区的江苏、浙江在 1 档,北京、天津等在 3 档,说明东部地区养老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这可能是由于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和复杂的人口结构所导致,后续需要努力实现资源与需求的精准对接;西部地区多集中于 2 档和 3 档,整体上都有提升空间,可以借助政策扶持和特色资源,吸引更多养老服务资源投入;中部地区整体靠后,说明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不足,需要加强区域合作。综上所述,分档结果可以帮助各个地区找准定位,便于政府针对性施策,引导资源合理流动,提升全国养老服务资源的整体效能,从而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要。

表 4 我国 31 个省、市养老服务资源分档结果

档次	等级	Probit	涵盖省份	地区特点
1	低	<3.5	江苏、浙江	东部
2	中下	3.5 ~	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山东、贵州、江西、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河北	以西部地区为主,东部和中部地区均匀分布
3	中上	5 ~	北京、宁夏、西藏、云南、四川、海南、天津、河南、黑龙江、上海、内蒙古、辽宁、新疆	以西部地区为主,东部地区次之
4	高	6.5 ~	安徽、吉林、重庆	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均匀分布

3 结论与建议

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存在整体效率欠佳、区域分配失衡以及发展受限等问题^[13]。通过传统 DEA 模型分析可知,我国 31 个省市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普遍较低,经 SFA 模型调整后的 DEA 模型评估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除技术层面外,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且存在资源相对过剩、未达到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情况。利用 RSR 法进行分档,进一步凸显出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所在。从地域差异来看,我国各省市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因资源配置不均衡、基础设施不足和人力资源差异而有明显不同。东北部地区资源配置效率最高,东部和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相对较低。通过 Malmquist 指数动态分析可知,2014 - 2023 年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然而平均纯技术效率指数小于 1,平均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都只是略大于 1,表明我国养老服务资源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基本维持原状,并无突破性改善,规模不经济和缺乏技术进步成为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直接影响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的可持续性^[14]。

上述结论包含的政策性启示如下:

首先,制定科学合理的养老服务资源配置规划,实现一体化管理^[15]。精准评估老年人的需求,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与实地调研方法,对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数量分布、健康状况、经济水平以及养老服务需求偏好进行深入研究,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的重点与方向。必须打破城乡及区域间的障碍,推动养老服务资源的均衡分配。应加大对农村及偏远地区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注入,引导城市优质的养老服务资源向这些地区转移。构建养老服务资源共享平台,整合医疗、养老、文化

等多元化资源,以实现资源的协同效应,避免资源的重复建设与浪费。

其次,多管齐下,全面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政府与社会资本应共同发力,政府要增加养老行业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设立专项基金,促进科研协同;同时在推动养老服务行业实现规模经济、优化产业布局上加大财政支持,如助力构建养老产业综合园区,整合产业链。社会资本则可参与养老机构建设与运营,鼓励大型养老机构通过并购、连锁经营等整合小型机构,形成标准化运营模式,降本增效。提升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能力,关键在于资源整合与产业布局优化,加强养老服务行业资源整合,实现多机构、多地区协同发展。高等院校要完善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学科体系,创新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针对养老护理人员开展技术培训,让其掌握先进技能,为老年人提供更专业的服务。通过多方面举措,全面提升我国养老服务水平^[16]。

再次,融合文化特色,优化服务模式^[17]。受传统养儿防老观念影响,许多老人倾向于居家养老,应加大对居家养老服务的资源投入,比如提供上门护理、助餐助洁等服务,设立社区养老服务站,让老人在熟悉的环境中享受养老服务,减少对机构养老资源的过度依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同地区的社会习俗和文化也各具特色,可据此开发特色养老项目。在有传统文化活动的地区,设立老年文化活动中心,组织戏曲欣赏、传统手工艺制作等活动,吸引老人参与,丰富其精神生活。借助传统习俗中的邻里互助、家族关怀等理念,鼓励社区或乡村开展互助养老模式,如一些地方在农闲时邻里间相互帮忙照顾老人,可通过社区的组织和引导,将这种行为规范化、常态化,设立互助养老志愿者队伍,定期探访老人,提供生活帮助和情感陪伴,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降低专业养老服务资源的压力,提高整体配置效率。

最后,优化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缩小区域间差异。组织专业团队运用大数据分析、问卷调查等手段,全面了解各地养老服务需求和资源现状。针对不同省份和城市,精准识别在养老设施数量与类型、服务人员数量与专业技能水平、专业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具体缺口。依据评估结果,制定针对性资源优化策略。对于养老服务资源短缺的中西部地区,加大财政投入,提升养老设施建设水平。同时,增加具有专业技能养老服务人员配置,通过提高薪酬待遇、提供职业发展空间等扶持政策,吸引并激励杰出养老服务人才前往中西部。推动东部地区先进养老服务模式和专业技术向中西部扩散,搭建远程养老服务平台,组织东部养老专家定期开展线上培训、会诊等活动;推广智能化养老设备,在中西部地区建设试点项目,示范引领智能化养老发展,增进区域间交流与资源共享。通过这些举措的实施,实现我国养老服务资源的合理分配与高效运用,让每一位老人都能享受到优质养老服务,提升全国养老服务整体水平和普及度。

参考文献:

- [1] 王禹杰,陈红. 基于 DEA 模型的养老机构服务效率评价分析[J]. 内蒙古统计,2024(2):25-28.
- [2] 甘晓成,艾力飞热·阿不都古力,蔡瑶瑶. 人口老龄化下我国城乡养老机构运行效率研究——基于三阶段 SBM-DEA 模型的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22(8):132-136.
- [3] 郭珊珊,杜进林,柯小瑜,等. 东莞市养老机构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效率评价——基于 GIS 和三阶段 DEA 模型[J]. 现代预防医学,2024,51(5):871-876.
- [4] 杜逸芳,刘蒙,朱艳霞,等. 基于三阶段 DEA-Malmquist 和 RSR 法的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效率综合分析[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5,42(1):59-62,106.
- [5] 张琳. 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研究[J]. 中国总会计师,2023(12):112-115.
- [6] 姜春玲. 新医改背景下我国医院卫生资源配置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沈阳:中国医科大学,2021.
- [7] 凡滇琳. 广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试点地区卫生资源配置效率评价研究[D]. 南宁:广西医科大学,2021.
- [8] 付凯云,尹文强,宋雅蕾,等. 2021 年我国养老机构资源配置效率及空间自相关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2024,51(7):1249-1254.
- [9] 鲍伟鑫. 基于公平与效率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卫生资源配置评价及预测研究[D]. 重庆:重庆医科大学,2024.
- [10] 唐倩倩,张目,赖辉. 基于 DEA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效率评价——以生物产业为例[J].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15,33(2):119-125.
- [11] 梁圣蓉,罗良文.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基于人力资本视角[J]. 技术经济,2019,38(4):23-32.
- [12] 刘加敏,袁竞峰,卢文飞,等. 城市化进程中区域 PPP 模式公共治理绩效研究——以我国 31 个省市为例[J]. 工程管理学报,2021,35(6):73-78.
- [13] 马广博,丁小云. 我国养老机构服务效率测度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三阶段 DEA 和 Malmquist 指数的实证分析[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24,43(7):59-65+78.
- [14] 郭珊珊,杜进林,柯小瑜,等. 东莞市养老机构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效率评价——基于 GIS 和三阶段 DEA 模型[J]. 现代预防医学,2024,51(5):871-876.
- [15] 于本海,高英俏,张东风. 基于三阶段 DEA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效率评价[J]. 中国医院,2024,28(1):37-42.
- [16] 贾舒,关洛桐. 人口老龄化视阈下养老资源错配与优化路径研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J]. 理论与改革,2024(6):161-172.
- [17] 陈武元,陈伟,蔡庆丰. 社会少子化、刘易斯拐点与家庭教育投资——基于资源再配置的研究视角[J]. 教育研究,2024,45(10):121-136.

中国蒙学典籍英译中的文化自信 ——以《三字经》及其英译为例

杜若凡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之下,蒙学典籍英译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文化自信意义重大。以蒙学经典作品《三字经》英译为例,基于自建的汉英平行语料库,运用功能对等理论,从词汇(形符与类符、文化负载词)、句子(诗行、诗句)、语篇(文化内涵、韵律)等方面,对比分析了赵彦春和翟理斯的两个英译本。研究发现,翟译本以解释说明为主,在内容形式上与原作相差较远;赵译本在语言和文化层面均与原作取得了较一致的效果,基本保留了原作的神韵和风貌。赵译本将中国蒙学经典原汁原味地传递了出来,彰显了中国典籍文学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中国蒙学典籍;英译;文化自信;功能对等理论;《三字经》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4-0059-08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Primer Classics:by the *Sanzijing*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s

DU Ruofan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Media,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Going Global” of Chinese cultur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primer classics is a major measure to promot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window to demonstrate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Tak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primer work The *Sanzijing* as an example, basing on the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corpus of The Three Word Primer, combining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t compared and analyzed two English versions, one is translated by Zhao Yanchun, and the other one is translated by Giles in this paper from three aspects: vocabulary (type and token, culture-loaded words), sentences (length of lines and sentences), and discourse (cultural connotation, rhythm). The result showed that Giles’ translation is mainly explanatory and differs greatly from the original text in terms of content and form; Zhao’s translation has achieved a relatively consistent effect with the original text in term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basically retaining the charm and style of the original text. The style of Zhao’s translation faithfully conveys the authentic Chinese ancient primer work into English, highlighting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Chinese classics.

Key words: Chinese ancient primer classics;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cultural confidence;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Sanzijing*

《易经》有言:“蒙以养正,圣功也。”中国古代蒙学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蕴含着中国传统

教育的独特魅力与智慧。蒙学典籍是蒙学教育的重要教材,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

收稿日期:2025-03-19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23AH050232)。

作者简介:杜若凡(1987-),女,安徽蚌埠人,讲师,博士。E-mail:915106032@qq.com

旨在塑造中华民族正确的价值观和优良的道德修养,对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蒙学典籍的英译有其历史必然性,这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彰显我国文化自信至关重要。

研究将以蒙学经典作品《三字经》的英译为研究对象,结合功能对等理论,从词汇、句子、语篇等维度对比分析赵彦春和翟理斯的两个英译本,探究其与原作的对等程度,进而梳理中国蒙学典籍在英译中实现文化自信的策略与途径。

1 功能对等视角下的蒙学典籍英译与文化自信

1.1 功能对等的翻译观

功能对等理论(functional equivalence)的前身为动态对等理论(dynamic equivalence),于1964年在《翻译科学探索》一书中提出,是奈达翻译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奈达认为:“翻译在于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既要再现原文的意义,又要再现原文的风格。”^[1]功能对等理论以等效原则为基础,即译语接受者和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和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2]159}。这就要求译者能够清晰地反映原文的意义和意图^[3],同时关注语言交际的功能性,在译语中找到功能对等的形式来再现原文^[4]。此外,奈达强调了文本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性,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调整文本的表达形式。在功能对等的翻译中,译者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但功能对等翻译不等同于“自由翻译”或“活译”,因为功能对等翻译有严格要求,它要求译文在不同的语言结构里尽可能完满地再现原文意旨^[5]。

奈达翻译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我国,在翻译界引起的广泛兴趣和热烈反应至今未衰。我国译界不少学者将文本翻译研究同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相结合,进行了多方位、不间断的摸索与探究。张丽娜^[6]、曹思佳^[7]、翁义明和王金平^[8]等学者针对科技、医学、文学等方面的文本展开了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这些研究对译语文本在语言结构、语用交际、文化传播等方面与源语文本的对等现象进行了深入探索。这为本文基于功能对等理论展开的中国蒙学典籍英译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2 蒙学典籍英译与文化自信

中国蒙学典籍是典籍化的文学财富,也是世界

认知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构建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蒙学典籍的英译不仅助力于完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还能将典籍中蕴含的文化自信推向世界,从而获得国际的广泛认识与认可^[9-10]。早在清末时期,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中国丛报》曾较为系统地译介了包括《三字经》《百家姓考略》《千字文》《孝经》《小学》等在内的蒙学典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起了重要作用^[11-12]。

其中,蒙学典籍《三字经》自问世以来,历经四百多年翻译出版历程。该书由南宋名儒王应麟编撰,后经清人贺兴思、国学大师章炳麟删改续写,素有“千古一奇书”之称^[13],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三字经》的英译肇始于清朝中晚期,先后有马礼逊、裨治文、欧德理、翟理斯等西方译者完成英文版翻译。其中,翟理斯于1900年出版的《三字经》英文重译本 San Tzu Ching: Elementary Chinese 被公认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14]。到了20世纪末,中国本土译者逐渐担纲《三字经》的英译工作,先后有潘世兹、王宝童和李黎、赵彦春等学者的英译本涌现出来。其中,赵彦春于2014年出版的《英韵三字经》一经问世,便为社会各界所称赞,被誉为“有史以来最美汉英翻译”。《三字经》在不断的译介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其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得以被持续地传承与传播。

要使中国蒙学典籍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英译中发扬光大,译者必须充分理解和把握好蒙学典籍的核心内容,同时还要兼顾其诗学意义和美学价值。这就要求在内容上,译文能够如实地传达出原作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等;在形式上,译文应当符合原文的文体、句式和韵律等。鉴于此,以功能对等理论为框架,从内容对等和形式对等两个层面出发,对比分析蒙学典籍《三字经》的赵彦春译本和翟理斯译本与原作的对等程度,探索蒙学典籍在英译中如何实现文化自信。

2 语料库的创建与研究方法

2.1 《三字经》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创建

自建《三字经》汉英平行语料库,该语料库建设步骤如下:文本采集:其中,赵彦春译本^[15]来自光明日报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纸质书,翟理斯译本^[16]来自中州古籍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的纸质书;文本扫描与识别:利用识别软件 ABBYY FineReader 将扫描得来的图形文件进行识别,并另存为文本文档;文本整理:对识别好的文本进行校对、去

噪,以确保文本内容准确、格式规范;文本对齐:由于《三字经》原文版本不一,赵译本基于清朝贺兴思的版本,翟译本基于南宋王应麟的版本。因而本文以原文每六字一句为单位,对中英文四个文本进行了对齐。至此,语料库建设完毕。

2.2 研究方法

奈达提倡在功能对等的翻译中应遵循可懂性、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并重的原则。结合功能对等理论,围绕上述原则,借助语料库软件 WordSmith Tools 6.0,对自建的《三字经》汉英平行语料库进行统计和分析,分别从词汇、句子和语篇三个方面出发,主要针对形符与类符、文化负载词、诗行、诗句、文化内涵、韵律等方面,对比分析赵译本和翟译本同原作的对等程度;同时将综合考虑不同译者的身份背景、所处的时代环境、译本受众群等因素,对两译本采用的翻译策略、体现出的文化自觉、再创造中达到的艺术特征等做出合理解释;最后结合实际来探求中国蒙学典籍在英译中如何才能实现文化自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3 功能对等理论在《三字经》两英译本中的体现

《三字经》作为蒙学之冠,内容广泛,涵盖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如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可谓包罗万象;其形式以三字为一行,短小精悍、整体划一、朗朗上口。在翻译中,译文应尽可能实现与之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双重对等。本文从功能对等的角度对比探究《三字经》两英译本与原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对等情况。

3.1 词汇层面

3.1.1 形符与类符

考察文本的词汇总体情况首先从文本的形符、类符数入手。其中,形符(token)是指文本中出现的所有的词,类符(type)是指文本中出现的任何一个独特的词形。在对《三字经》语料库中的四个文本进行形符、类符数(包括后文提到的句子信息)统计时,两原文本以每个汉字为单位,两英译本以每个英语单词为单位。本文借助 WordSmith Tools 6.0 统

计出了语料库中四个文本的形符数、类符数及 STTR(见表 1)。

翟译本相比王应麟版本原文,在形符数上前者接近后者的两倍,而在标准化类符/形符比(STTR)上前者却低于后者。STTR 是以每千字或词为单位得出的类符/形符比,常被用来做不同文本用词变化程度的对比分析。这说明翟译本整体文本篇幅较长,为原文长度的两倍左右;然而其用词的变化程度却低于原文。赵译本相比贺兴思版本原文,二者在形符数上十分接近,在 STTR 上前者高于后者。这表明赵译本整体文本篇幅接近原文,同时其用词变化程度高于原文。

表 1 《三字经》原文本和英译本形符类符统计

形符类符	王应麟版本	翟译本	贺兴思版本	赵译本
形符数/个	1068	2112	1368	1414
类符数/个	513	748	621	804
STTR	48.70	41.25	48.20	62.30

为了能够更加直观地对比两英译本的整体情况,本文保留两原文本中内容相同的部分,其余部分悉数删除;并基于此分别对两英译本中的内容进行筛选。最后统计出筛选后的原文本、翟译本和赵译本的形符数、类符数及 STTR(见表 2)。

表 2 筛选后的《三字经》原文本和英译本形符类符统计

形符类符	筛后_原文本	筛后_翟译本	筛后_赵译本
形符数/个	1062	2102	1096
类符数/个	513	743	649
STTR	48.80	41.40	60.80

从数值上来看,筛选之后,原文本的形符数略低于王应麟版本,远低于贺兴思版本,这说明贺兴思版本基本覆盖了王应麟版本的内容,只有个别处有所删减;两英译本相比,翟译本的形符数接近赵译本的两倍,而 STTR 远低于赵译本,这说明在文本篇幅上,翟译本明显长于赵译本,而在用词变化程度上明显低于赵译本。下面举例说明(见表 3)。

表 3 筛选后的《三字经》原文本和英译本中实例演示

序号	筛后_原文本	筛后_翟译本 ^{[16]2}	筛后_赵译本 ^{[15]1}
例 1	人之初,	Men at their birth	Man on earth,
	性本善。	Are naturally good.	Good at birth.
	性相近,	Their natures are much the same;	The same nature,
	习相远。	Their habits become widely different.	Varies on nurture.

这是《三字经》开篇第一节。相比原文,翟译文篇幅较长,赵译文基本与原文篇幅一致。在用词方面,赵译文中无一词重复,其用词变化程度最高;原文中有一处“相”字重复;翟译文中“their”出现三次,“are”出现两次,其用词变化程度最低。

3.1.2 文化负载词

表4 筛选后的《三字经》原文本和英译本中儒家核心词统计

序号	筛后_原文本	筛后_翟译本	筛后_赵译本
例2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If jade is not polished, it cannot become a thing of use. If a man does not learn, he cannot know his duty towards his neighbour. ^{[16]9}	No jade crude, shows craft good. Unless you learn, brute you'll turn. ^{[15]7}
例3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He who is the son of a man, When he is young Should attach himself to his teachers. And friends, And practise ceremonial usages. ^{[16]13}	Son of man, Mature you can. Teacher or peer, Hold them dear. ^{[15]8}
例4	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We speak of charity of heart and of duty, towards one's neighbour, of propriety, of wisdom, and of truth. These five virtues, admit of no compromise. ^{[16]23}	Grace, justice, courtesy, wisdom, and fidelity. Good order derive, from Constants Five. ^{[15]26}
例5	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	The works of Mencius, are comprised in seven sections. These explain the way and the exemplification thereof, and expound charity and duty Towards one's neighbour. ^{[16]37}	Mencius, the sutras, has seven chapters. These are counsels, of virtues' n morals. ^{[15]50}

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在中国文化特征的形塑、民族精神与品格的培育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17]。由于中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差异,对于这五个核心词的英译,要做到概念对等绝非易事,但译者当尽其所能地使译文达到相同语境下的对等效果。

这里以“义”的英译为例,“义”是我国古代一个内涵丰富的道德范畴,展现了孔孟倡导的义利观和君子的言行准则,是儒家道义思想的关键点^[18]。“义”字出现在例2、例4和例5中,翟译本均采用了短语“(his) duty towards his/one's neighbor”,即对他人的一种责任,来传达“义”之观念,侧重体现了君子处事应具有的责任感。赵译本则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翻译这三处“义”:例2结合语境做了意译处理,将“不知义”作为整体译为“Brute you'll turn”。“Brute”表示不理性的,粗野的,蕴含“义”的反面意思;例4选用名词“justice”,即公平正义,来对应“义”;例5也做了变通处理,将“仁义”整体译为“virtues”,有美德、优点之意。此三处译文互为补充,对“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所谓“义”,当讲求内在的个人修养、维护外在的公平正义,并进而规

范自身道德准则。相较而言,翟译文对“义”的阐释较为片面单一,未能站在文化视角给予恰当的诠释;而赵译文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了儒家思想,一方面尽可能地做到了词类对等,另一方面也实现了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的基本对等。

3.2 句子层面

奈达指出:“只重内容而不考虑形式,往往会导致平庸之作的诞生,令原作的魅力和光彩丧失殆尽”^{[2]164}。《三字经》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便是每三字为一行,每两行为一句。要实现译文与之的最大对等,译文当理应体现出这一特征。鉴于此,本文将围绕诗行及诗句长度对翟、赵两英译本展开句子层面的对比探索。

3.2.1 诗行

借助 WordSmith Tools 6.0 统计出了《三字经》原文本、翟译本和赵译本中的诗行总数、平均诗行长度及诗行长度标准差(见表5)。其中,平均诗行长度是指文本中诗行的平均长度,由所包含的单词数量表示。

两译本同原文本相比,赵译本与原文本的诗行总数完全一致,翟译本偏多。原文本的平均诗行长

度为 3 个汉字,翟、赵两译本分别为 5.36 和 3.10 个单词。此外,由诗行长度标准差可知,两译本中各诗行长度均接近平均值,尤其是赵译本。进一步观察语料库可知,赵译本基本上做到了每行三个英文单

词对译三个汉字,如例 1、例 2 和例 4;而翟译本往往是三行译文对译两行原文,如例 3、例 4 和例 5,并且每行包含的单词数在 5 个上下浮动,因此在形式上较原文本略显臃肿且参差不齐。

表 5 筛选后的《三字经》原文本和英译本诗行信息统计

诗行	筛后_原文本	筛后_翟译本	筛后_赵译本
诗行总数/行	354	392	354
平均诗行长度/字节	3.00	5.36	3.10
诗行长度标准差/字节	0.00	1.70	0.34

3.2.2 诗句

再次借助 WordSmith Tools 6.0 对原文本、翟译本和赵译本中的总句数、平均句长及句长标准差进

行了统计(见表 6)。其中,平均句长是指文本中诗句的平均长度,由所包含的单词数量表示。

表 6 筛选后的《三字经》原文本和英译本诗句信息统计

诗行	筛后_原文本	筛后_翟译本	筛后_赵译本
总句数/句	177	148	165
平均句长/字节	6.00	14.20	6.64
句长标准差/字节	0.00	6.80	2.43

《三字经》原文平均句长为 6 个汉字;翟译本和赵译本分别为 14.20 和 6.64 个单词。从句长标准差来看,赵译本中各句句长相差不大,都比较接近其平均值;而翟译本中各句句长与其平均句长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大。以上数据表明赵译本在句长方面相比翟译本更加接近原文本。

此外,原文本共计 177 个诗句,翟、赵两译本分

别为 148 和 165。可见,两译本的总句数均少于原文本,这说明两译本采纳了合译的翻译策略。观察语料库得知,两译本还使用了拆译的策略。经统计得知,翟译本中有 1 处拆译和 30 处合译,赵译本中有 7 处拆译和 19 处合译。本文从两译本中各选一例拆译与合译制成表 7。

表 7 筛选后的《三字经》原文本和英译本中儒家核心词统计

序号	筛后_原文本	筛后_翟译本	筛后_赵译本
例 6	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	拆译:Then we have one who put fireflies in a bag, and again another who used the white glare from snow. Although their families were poor, these men studied unceasingly. [16]81	拆译: With fireworms bright! With snow white! Poor, having none, they studied on. [15]99
例 7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合译:Units and tens, tens and hundreds, hundreds and thousands, thousands and tens of thousands. [16]17	合译:One to ten, a hundred then, one thousand more, ten thousand afore. [15]12

例 6 中,原文第一句话在两译本中均被拆译成两句话。例 7 中,原文共两句话均被两译本合译成一句话。根据前文统计的数据可知,翟译本中合译较拆译现象更为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诗句的平均句长,因此也加大了同原文本的差距;相对来说,赵译本合译现象稍多于拆译,因而平均句长偏原

文本略长,并无明显差异。

3.3 语篇层面

《三字经》英译,为译事之至难。《三字经》不仅浓缩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之精华,还极具韵律之优美。为了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的魅力,译者除了掌握翻译学的本体知识之外,还须具备贯通中西古

今的文史知识,尤其需要哲学、逻辑、语言学和诗学等方面的素养。本文将主要围绕文化内涵和韵律两方面对翟、赵两英译本进行语篇层面的对比分析。

3.3.1 文化内涵

《三字经》被誉为国学中的“袖里通鉴纲目”。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及的是教育的意义,如能教育及时且方法得当,方可培育出可造之才。作者在这部分借用了“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的典故,《三字经》中的相关原文、翟译文及赵译文见下表中的例8。

表8 筛选后的《三字经》原文本和英译本中各示例

序号	筛后_原文本	筛后_翟译本	筛后_赵译本
例8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Of old, the mother of Mencius, chose a neighbourhood; And when her child would not learn, she broke the shuttle from the loom. ^{[16]5}	Then Mencius' mother, chose her neighbor. At Mencius' sloth, she cut the cloth. ^{[15]3}
例9	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	Then Guang Wu arose, and founded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It lasted four hundred years, and ended with the Emperor Xian. ^{[16]63}	With Guang Wu began the Eastern Han. The four hundredth year, Hanh-sian died drear. ^{[15]76}

例8中,“断机杼”是这一节的翻译要点。翟译文“*She broke the shuttle from the loom*”,意为孟母将机杼砸碎;赵译文“*She cut th' cloth*”,意为孟母剪破织好的布。而“断机教子”的典故见于《列女传》,根据《列女传》中“孟母以刀断其织……孟母曰:‘子之废学,若我断斯织也。’”,可知孟母的行为是“断斯织”,因此赵译文更符合史实。

《三字经》在第五部分讲述了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其中,作者对于汉朝历史的介绍见上表例9。该节是说汉光武帝刘秀起兵消灭了王莽,恢复汉室,史称东汉;西汉、东汉共四百余年,到汉献帝灭亡。

翟译文中,第三行开头的“*It*”前指第二行的“*the Eastern Han dynasty*”,因而第三行整句意思就是东汉延续了四百年,而实际上东汉从公元25年到220年总共196年。根据史料记载,“四百年”是指整个汉朝延续四百年而非东汉,翟译文在此处属误译。赵译文对此处的处理较为恰当。

3.3.2 韵律

韵体是《三字经》的又一大突出特征。《三字经》的韵式属于中国诗歌中的传统韵式,包括隔行韵、交叉韵、随韵、抱韵等,具体韵式如表9所示。

表9 筛选后的《三字经》原文本中韵式统计

韵式	总频次/次	频次分解/次	占比/%
隔行韵(abcb, abac, abca)	48	43, 4, 1	53.93
交叉韵(abab)	8	8	8.99
随韵(abbb, abcc, aabc)	8	4, 2, 2	8.99
随韵、交叉韵组合(aaba)	3	3	3.37
抱韵(abbc)	2	2	2.25
无韵(abcd)	20	20	22.47
总计	89	89	100

《三字经》中最常出现的是隔行韵,尤以abcb韵式最多,如例1和例2。在很多情况下,《三字经》每小节中四行各不押韵,如例4和例6。但由于《三字经》是三字式格局,一字一音,即便不押韵,诵读起来也是琅琅上口。

因此,在《三字经》的英译中,要实现与原作的功能对等,须做到音韵和谐、节奏鲜明。翟译本属于

阐释性的散体译本,赵译本属于三词格偶韵体译本^{[19]XIII}。翟译本缺少了本应保留的节奏韵律,但为了能够让译文读者欣赏到原文本的音韵之美,它对每一个汉字的发音都做了一个语音补偿。例如,《三字经》开篇首节,翟译文是这么处理的(见表10)。

翟译本中标注了每个汉字的拼音,包括声调。

其中,拼音形式采用了威妥玛式拼音,声调是用阿拉伯数字标在了每个拼音的右上角,分别代表汉语的四个声调。翟译本采纳的语音补偿措施在一定程度

上彰显了原文的韵律,然而译文本身在韵律上的缺失却终究难以弥补。

表 10 翟译本语音补偿示例

原文本	人	之	初	性	本	善
汉字发音	Jen2	chih1	ch' u1	Hsing4	pên3	shan4
汉字释义	Man	arrive	beginning	Nature	root	good
整行译文	Men at their birth			Are naturally good.		
原文本	性	相	近	习	相	远
汉字发音	Hsing4	hsiang1	Chin4	Hsi2	hsiang1	yüan3
汉字释义	Nature	mutual	near	Practice	mutual	far
整行译文	Their natures are much the same;			Their habits become widely different.		

赵译本采用的是偶韵体,即 aabb 韵式。虽然在韵式上无法同原文本做到严格的对等,但是以韵译韵的做法实属难得。吕叔湘^[20]曾指出:“以诗体译诗之弊,约有三端。一曰趁韵……”这里所谓的“韵”之“弊”是指因韵害义,即为了押韵而错乱织综或扭曲语义或丧失要旨,则“译犹不译”^{[19]XI}。而赵译本做到了每两行押一韵且不伤其义,比如“性相近,习相远”被译为“The same nature, Varies on nurture”。原文以“性”对“习”,赵译文用“nature”对“nurture”。“nature”是人与身俱来的“性”,“nurture”是经后天养成的“习”。这两个单词不仅达意且押韵合辙,同时也巧妙地表现出了“性”与“习”的对立与关联,将译文推到了文化深层上同原文的对等。

4 分析与讨论

从功能对等的角度来看,翟译本在形符类符数、文化负载词的诠释、诗行与诗句长度、文化内涵的表达以及韵律等方面与原文还存有一定的差距;而赵译本在这些方面几乎完美地再现了原文。赵译本做到了映照原文、文辞洗练、节奏分明、意境悠远。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翟理斯的《三字经》在 20 世纪初期不管在内容上,还是在文化上,均远超前人,是对前人的吸取、纠正、添加、改进的集大成者,对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可谓厥功甚伟。“翟理斯那样对《三字经》的解释性的翻译在当时是必要的是适当的”,但是在 100 年后的今天,“像赵彦春这样逐字逐句对应着‘硬译’、‘直译’、真正的豪杰译在当下也是必要和适合的!”^[21]

赵彦春与翟理斯的译本同原文本在对等程度上

的差异正是来自于两位译者不同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指在一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自身文化的溯源、演进和发展的自我认知^[22]。文化自觉恰是走向文化自信的基础。然而,西方译者源于对本民族的文化认知,与中国本土译者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自觉。翟理斯生活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正值英国对外扩张的鼎盛时期。而扩张的先行者即宗教,为了更好地传教,须首先了解异域文化和意识形态。翟理斯英译《三字经》同样是为这一目的服务,进行的是以西方为立足点的翻译活动。因而,翟译本通篇以解释说明为主,其重点只为达意,并非再现原作的文学价值。此外,翟理斯身处的维多利亚时代偏爱铺陈、冗长的文风,这对翟理斯的翻译风格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由于中西方文史哲等方面存有差异,难免在翻译时会望文生义造成舛误。

现如今,中国本土译者当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带着强烈的文化自觉,重铸中华国学之经典,坚决树立文化自信。赵彦春版《三字经》实乃当代国学翻译之典范,译者赵彦春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知之明和自信力对其翻译活动产生了直接影响。首先,从选择的典籍版本来看。自南宋到民国期间,《三字经》版本众多且时间跨度大。赵彦春曾在采访中表示,王应麟版本对中华文化体系的叙述较为粗疏;贺兴思版本较为丰满、全面;民国版本离当前太近,且作为经典还未得到历史的验证^[14]。赵译本正是基于贺兴思版本,从而得以将更为完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向全世界展示出来。其次,从典籍译者的素养来看。要做好典籍翻译,译者除了具备双语功底以外,还须打好国学基础,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汉语言文字、文化习俗、哲学、典故以及宗教

等的涉猎与解读能力。多年来,赵彦春致力于《诗经》《道德经》以及唐宋诗词等经史子集的研究和英译,并基于对《三字经》文体特征和文化内涵的体悟,最终打磨出一部形神兼顾的《英韵三字经》。最后,从遵循的翻译原则来看。赵彦春在《三字经》的英译中,始终坚持以原作为基础,尽量使译文贴近原文。比如,《三字经》有三大突出特征:三字、押韵以及经典。为了真实再现原文本,赵译本采用了三词格偶韵体,同时整体语言简洁、美感不失,具有箴言、警语之效果。总而言之,赵译本很好地再现了原文本的神韵、气质和风貌,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5 结论

功能对等的翻译要求译文在词汇、句子以及语篇等层面上都能做到同原文内容以及形式的对等。蒙学典籍英译要做到文化自信,就要求译者必须拥有文化自信。翟理斯出于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自觉以及社会所需,他的《三字经》英译本以解释说明为主,在内容形式上与原作相差较远。赵彦春有着强烈的中华文化自知自信和自觉,这从他选择的典籍版本、具有的译者素养以及遵循的翻译原则可清楚得知。赵彦春的《英韵三字经》在语言和文化层面均与原作取得了较一致的效果,基本保留了原作的风姿和神采。赵彦春的译法将中国蒙学典籍原汁原味地传递了出来,彰显了中华典籍的文化自信。在当下,中国本土译者也应当在具备深厚的双语文学文化的同时,拥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与责任担当。只有这样,中华典籍文化才能更好地在世界文明中展示优良的文化品位,真正树立起中华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 [1] NIDA E A, TABER C 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Leiden: Brill, 1982: 12.
- [2] NIDA 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3] WAARD J D, NIDA E A.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ible Translating[M].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Inc., 1986: 14.
- [4] 杨司柱. 语用翻译观: 奈达翻译思想再研究[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55.
- [5] 谭载喜. 新编奈达论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34-44.
- [6] 张丽娜. 基于奈达对等理论分析化工英语翻译策略[J]. 日用化学工业, 2021, 51(7): 699-700.
- [7] 曹思佳.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心系疾病相关名词术语英译研究[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23, 25(7): 2274-2280.
- [8] 翁义明, 王金平. 基于功能对等的“很+形”谓语句英译对比研究——兼论葛浩文的译文风格[J]. 山东外语教学, 2024, 45(3): 120-128.
- [9] 周新凯, 许钧. 中国文化价值观与中华文化典籍外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5(5): 70-74.
- [10] 邵飞. 新时代典籍翻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兼论费孝通先生的翻译思想[J]. 上海翻译, 2020(3): 85-89.
- [11] 宁博, 李海军. 《中国丛报》对中国蒙学典籍的译介[J]. 武陵学刊, 2016, 41(6): 109-111+135.
- [12] 任晓霏, 张杰, 陈丹蕾, 等. 中国古代蒙学典籍海外传播和影响研究[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1): 64-71.
- [13] 郑中求. 《三字经》英译二百年: 1812-2015[J]. 中华文化论坛, 2016(10): 126-133.
- [14] 李晶. 翻译·国学·中国话语体系——《三字经》英译者赵彦春教授访谈录[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 22(1): 41-45.
- [15] 赵彦春. 英韵三字经[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
- [16] 王应麟. 三字经[M]. 翟理斯, 译.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9.
- [17] 侯建华. “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评估与现代转换[J]. 人民论坛, 2017(14): 138-139.
- [18] 韩悦. 《论语》英俄译本中核心概念文化负载词“义”的翻译对比研究[J]. 中国俄语教学, 2019, 38(3): 77-87.
- [19] 赵彦春. 三字经英译集解[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
- [20] 吕叔湘. 中诗英译比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9.
- [21] 朱振武. 翻译活动就是要文化自信: 从赵彦春译《三字经》谈起[J]. 外语教学, 2016(5): 83-85.
- [22] 费孝通. 论文化与文化自信[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7.

《内经·素问》首部英译本副文本功能钩沉拾遗

郑鸿桥

(莆田学院 外国语学院, 福建 莆田 351100)

摘要:借助翻译副文本理论分析发现,美国医史学家伊尔扎·威斯《内经·素问》译本引言不仅呈现了中医文化概貌,而且深度地参与了对典籍内容的阐释,译者以大篇幅、多类别、双模态的模式构建的引言,为文本内容的阐释强显式地预构了中医哲学概念网和中医文化术语群,有效避免了译本正文当中注释的重复与泛滥,使译作在忠实性和可读性两者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成为当下海外影响最大的译本之一。

关键词:《内经·素问》;副文本;功能;阐释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4-0067-07

Supplement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Paratext in the First English Version of *Neijing Suwen*

ZHENG Hongqi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utian University, Putian, 351100, Fujian)

Abstract: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paratext theory,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introduction i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Huangdi Neijing Suwen*, translated by the American medical historian Ilza Veith, not only delineates the schem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ulture but also provides a significant assistanc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The large-scaled, multi-category and bi-modal introduction that Veith constructed prominently pre-loads the basic philosophical concepts of TCM doctrine and the glossary charts of TCM culture. It helps to eschew the excessive use of notes in the target text, enable the translation to achieve a favorable balance between fidelity and readability and rank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medical canon in the overseas market.

Key words: *Huangdi Neijing Suwen*; paratext; function; interpretation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由《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组成,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号称“医家之宗”,2011年5月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内经·素问》是迄今为止在海外得到译介最多、传播最广的中医典籍,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医文化的必读著作。众多的英译本包括了倪毛信译本和吴连胜、吴奇父子译本。这些译者是长期在美国行医的中医医师,此类译本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化繁为简,进行释译,目标读者是西方大众群体,旨在传播中医保健养生的理念并指导中医实践。此外,还包括了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文树德教授(Paul Un-

schuld)的译本以及我国中医翻译领域的杰出人物李照国教授的译本,此类译本所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是内容完备、考据翔实、阐释严谨、注释丰厚,堪称“文献式”翻译,旨在全景再现《内经》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与上述两类译本相比,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伊尔扎·威斯(Ilza Veith)^①的译本既未隐去或淡化异质元素以迎合西方大众读者,也未责备求全地对《内经》进行整体翻译,而是另辟蹊径,首先利用副文本重构中医文化概貌,继而将她认为能够体现中医文化要义的《内经·素问》前三十四章译成英文。

收稿日期:2025-03-03

作者简介:郑鸿桥(1982-),男,福建仙游人,讲师,硕士。E-mail:fjptzhq@sina.com

对《内经·素问》各英译本在国外接受情况的调查研究表明,从全球图书馆馆藏数量、权威期刊上的专家书评、亚马逊网站读者评论和亚马逊畅销书排名等四个指标考量,威斯译本、文树德译本和倪毛信译本是当下国外影响最大的三个《内经·素问》译本^[1-3]。其中,威斯译本作为《内经·素问》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英译本,在中国医药典籍英译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1949年首次出版至今,已由多家权威出版社多次再版,其中仅2015年版本的馆藏量就高达1326本^[3]。

如果说倪毛信译本靠通俗易懂获得普通读者的青睐,文树德译本靠严谨完备而获得专业读者的赞誉,那么威斯译本又是凭借什么特性而获得认可与好评的呢?本文不揣冒昧,试图从翻译副文本角度探究这一问题。

1 副文本与翻译副文本

“副文本”(paratext)概念源自法国文学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1987年,在法文著作《门槛》(*Seuils*)^[4]一书当中,热奈特专门论述了副文本的定义、类型、功能和研究方法等问题。次年,在《普劳斯特副文本》一文当中,热奈特进一步阐述道:“所谓‘副文本’,我指的是所有围绕在文本周围的边缘性或补充性材料。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称之为各类门槛:与作者和编辑有关的(比如标题、插图、献辞、题记、前言和注释);与媒体有关的(比如作者访谈、官方概要);与私人有关的(比如通信、有意或无意透露的秘闻轶事)以及与生产和接受的物质手段有关的(比如组合与拆分)等。与其说它是一个所指明晰的范畴,不如说是一个具有弹性的空间。它既没有分明的外部边界,也没有精确稳定的内核。副文本——正如它含义模糊的前缀所暗示——是由那些我们不能确定是属于作品但却能帮助呈现作品或‘饰文成书’的材料构成。它不仅在文本与非文本之间划出了一片‘过渡性’地带,也划出了一片‘交易区’——这片交易区从本质上来讲具有功能性和策略性。”^[5]

1996年,芬兰学者 Urpo Kovala^[6]将“副文本”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次年,热奈特法文著作《门槛》由美国学者 Jane E. Lewin 译成英文,命名为《副文本:阐释的门槛》^[7],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为该英译本所作的序言当中,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文学教授 Richard Macksey 将副文本元素称为“阈限装置”(liminal devices),能够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之间起到协商的作用。之后,副文本在翻

译研究领域取得了日益增长的重视^[8-14]。2018年,劳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了英国翻译学者凯瑟琳·巴特勒(Kathryn Batchelor)所著《翻译与副文本》(*Translation and Paratext*)^[15]一书,该书首次系统性地建构了翻译研究的副文本路径。此后,国内多名学者对该书进行引介^[16-18]。近年来,国内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各类典籍翻译当中的副文本元素。黄培希^[19]考察了《内经·素问》威斯英译本的副文本元素,认为这些副文本元素通过阐释概念、补偿缺省、变通意象构建了海外中医文化。阙红玲、刘娅^[20]以罗希文《本草纲目》全英译本和“大中华文库”《本草纲目选》编译本为研究对象,整理归纳了两个版本在装帧设计、序言、文内注释和书末附录等方面的副文本资源,认为这些资源起到了评注钩玄、充实语境和诠释文化的作用,提高了译本的可接受度。许明武、冯慧怡^[21]以陶瓷制作工艺及发展史专著《陶说》卜士礼英译本为例,阐述了图例、注释等引导读者理解、接受文本中的古代科技与文化信息,装帧设计等定位读者、促进推介、探索中国科技典籍外译的副文本路径。王明树、王格^[22]通过对中医典籍《难经》英译本在海外传播与接受情况的研究指出,除了术语转写、译介主体和传播渠道,中医典籍的译介还应借助副文本元素,比如为较难理解的医学概念绘制图表、为读者提供相关的医学术语表等。

2 伊尔扎·威斯《内经·素问》英译概述

伊尔扎·威斯,德裔美籍医史学家。20世纪40年代,威斯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史研究所师从时任所长的亨利·西格里斯特(Henry E. Sigrist)。出于偶然的机,西格里斯特得到了美国有机化学家林达沃(J. W. Lindau)生前留下的大量《内经》英译的手稿,本打算整理出版,但发现由于原作篇幅宏大、内容艰深(so long and difficult a work)且林达沃生前对汉语并不精通,一边自学汉语一边进行翻译,所以手稿当中不一致之处颇多。在西格里斯特的建议下,威斯接过了先驱留下的手稿,以博士论文的形式承担了《内经》的英译事业。为了让威斯专心于这一事业,西格里斯特为她争取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赞助支持。

在译本前言(Preface)当中,威斯回忆了翻译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原作篇幅宏大、内容艰深,平均一个汉字得译成近三个英文单词;术语表缺失,也没有专门解释中医技术、医学和哲学术语的字典可供使用,所以不得不自制术语表和字典;原作经过多手传抄,文字乃至语句错误、缺失比比皆是;不仅如此,由

于古汉语没有标点符号体系,表层语法缺失,导致语义常被遮蔽,句子停顿只能依靠韵律来判断,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威斯强调了自己翻译《内经》是遵循医学史的方法,而非语文学的方法,重在向西方医史研究人员介绍该书的内容。此外,威斯认为由于原著经过多手注释、编排和补充,许多内容乃至部分章节有重复之嫌,所以她只翻译了她认为能够体现《内经》要义(basic ideas)的前三十四章。

3 《内经·素问》威斯译本引言副文本概

1949 年,《内经·素问》译本由威廉姆斯和威尔金斯出版社(Baltimore:Williams & Wilkins)出版,成为第一部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内经》英译本。笔者收集到的是 1966 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修订再版、1973 年第二次印刷的版本。整部译作除了正文和常规副文本(如封面、封底、译者名称、出版信息、前言、再版序言、初版序言、致谢、附录、参考书目、索引等)之外,最为引人瞩目的是长达 76 页、占整部译作近三分之一篇幅的引言(Introduction)部分。

3.1 构造成分

整个引言包含 8 个小节,大致可以归为 4 个大类:《内经》的简介、成书年代和作者辨疑;《内经》理论的哲学基础,包括道和阴阳以及各自在《内经》中的运用、五行及数字体系、天干等;中医的生理和解剖概念;疾病诊断、疾病名称和治疗方法(着重介绍了针灸和艾灸)。值得注意的是,第 3 大类含有诸多无框简表,勾勒了四季、五行、方位、情感、气味、声乐、组织、器官等各自的阴阳属性和通应、生克、制化、乘侮等关系;第 4 大类引用了 24 幅来自收藏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史馆的亚洲书籍的插图,其中 14 幅(肾、三焦、肝、胆、大肠、小肠、心包、心脏、膀胱、脏腑位置、胃、脾的图形以及人体穴位图 2 幅)引自《灵枢素问节要》,3 幅(脏腑脉络图 1 幅和四肢经络图 2 幅)引自《金鉴》,1 幅(人体器官分布图)引自《医宗必读》,2 幅脉诊图则分别引自《图注脉诀辨真》和《小儿推拿广意》。这 20 幅引自古代中国医学典籍的插图笔法较为粗糙,重在写意,周围都附有文字,应当是以图辅文,体现了中医不重解剖和手术,而强调整体施治的观念。另外 4 幅则是关于人体针灸、艾灸穴位图和针具图,引自清朝末年曾任驻武汉领事的法国人戴伯理(P. Dabry)所著《中国史》和德国医生恩格尔伯特·肯普费(Engelbert Kaempfer)所著《日本史》。不同于前 20 幅图,这 4 副图笔法细腻,类似工笔画,直观地体现了西方医学

理论重解剖的特性。

3.2 形态特征

从构造成分,可以看出威斯构建的引言副文本有三个显著特征:

篇幅宏大:页数众多(76 页),内容丰富,占整部译作篇幅(260 页)近三分之一。

类别多样:涉及哲学概念、解剖生理、疾病名称、诊则治法等诸多类别。

采用图表、文字双模态:通过对《内经》各英译本副文本元素的考察可以发现,只有威斯译本的副文本图表、文字并茂,其他译本都只采用单一的文字副文本。

该引言采用了大篇幅、多类别、双模态的构建模式,属于强显式副文本。“强显”二字可解释为“强力凸显”,甚至也可指带有后殖民主义译论色彩的“强势凸显”之意。赵毅衡在《符号学》一书当中提到了“瑞恰慈实验”^[2],该实验旨在探究副文本信息的隐没对正文阅读和赏析产生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副文本的隐没可能将正文的阅读和赏析导向相反的方向。据此,赵毅衡提出了反向操作的必要性,即:刻意凸显副文本,“让读者哪怕有意忽视都做不到”^[23]。威斯利用大篇幅、多类别、三模态的方式构建副文本,可视为“反瑞恰慈实验”的一种具体实践。这种强显方式强化了 Rockenberger^[24]所谓的副文本本身所具有的自我指涉功能,似乎在告诉读者:“不经过门槛,径直走进室内是不可能的;不经过副文本,直接进入文本正文研究是莽撞的。”^[25]

4 《内经·素问》威斯译本引言副文本功能钩沉拾遗

热奈特从位置、时间、物质形态、交际情景对副文本进行类型划分。但对于“功能”这一副文本最重要的特性,热奈特却认为难以从理论上清晰地廓定,需要基于实际资料进行分析、归纳(worked out inductively from empirical data)。后来的学者对热奈特的保守态度提出批评。McRae^[10]用“前言”(Preface)来涵盖序跋、注释和其他评论,并指出了其三大功能:凸显文化和语言差异、介绍源语文化、使译者显身。Birke 和 Birte^[26]认为副文本的整体功能可分解为 3 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的类别:商业推广(commercial)、协同阐释(interpretive)和提供导引(navigational)。Rockenberger^[24]列出了 14 类的副文本功能,包括了商业性(commercial)、阐释性(hermeneutical)和增闻性(informative)等。在《副文本与翻译文化建构——以艾尔萨·威斯〈黄帝内经·

素问>英译为例》一文当中,黄培希认为《内经·素问》威斯译本的副文本元素通过阐释概念、补偿缺省、变通意象构建了海外中医文化。这项研究突出了 McRae 所强调的副文本的文化功能,这是威斯构建副文本的初衷之一,而另一个初衷则是为了弥补术语表和字典的缺失,以发挥 Birke 和 Birte 以及 Rockenberger 所指出的副文本对于正文本所起到的协同阐释(interpretive / hermeneutical)的功能。

翻译副文本的文化功能与阐释功能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区别。其一,译者利用翻译副文本在目的语中构建源语文化是为了更好地阐释文本,而文本阐释的效度又反过来影响源语文化在目的语文化中的传播效果,这是两者统一之处;其二,翻译副文本的文化功能重在解释源语文化概念、描述源语文化特征、呈现源语文化图景、介绍源语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塑造的功能更多地体现了译文对源语文化的忠实性,而翻译副文本的阐释功能更加关注译文的阐释效度和在目的语读者群中的可接受性,更多地基于读者关怀的考量,这是两者区别之处。学界对两者区别的探讨目前依然阙如,导致对翻译副文本文化功能探讨较多,而对其协同阐释功能的研究较少。《内经·素问》威斯译本引言副文本协同阐释的功能也一直被忽略而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笔者试从两个方面对这一功能进行钩沉拾遗。

4.1 为中医理论的铺陈预构哲学概念网

和基于病理学和解剖学发展起来的西方医学不同,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渊源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医以“气”概念为基础,融合阴阳和五行学说,构成了理论基础。“气”概念研究宇宙万物的构成本原及发展变化;阴阳学说是自然界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研究;五行学说则是研究金、木、水、火、土的概念、特性、生克制化乘侮规律,并用以阐释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变化及相互关系,体现了中国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三者都属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著名中医师任旭认为“(中国)古代医学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方法上,都紧紧依赖哲学,甚至用哲学的语言和规律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27]威斯自己也发现并指出:“中医思想和哲学概念密切交融(Chinese medical thought...was so inextricably entwined with philosophical concepts)。”^[28]^[12]所以,在“序言”(Preface)当中,介绍完《内经·素问》的医学价值、成书年代和作者辨疑之后,就从“道”“阴阳”“五行”“数字体系”和“天干”共5个方面介绍中医基础性哲学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介绍完“道”和“阴阳”的概念体系之后,威斯各另辟一小节,阐述

这些哲学概念是怎样参与中医理论建构和学说生成,凸显这些概念的基础性地位(参看图1)。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9
Tao.....	10
The Theory of Tao Applied to the <i>Nei Ching</i>	12
Yin and Yang.....	13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Applied to the <i>Nei Ching</i>	15
The Five Elements and the System of Numbers.....	18
The Celestial Stems.....	24

图1 《内经·素问》威斯译本中的哲学概念目录^[28]^{xix}

正因为处于基础性地位,上述概念弥漫于文本之中。威斯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序言中她指出:这些概念“在这部医学经典当中高频率出现(recurring with great frequency in the medical canon)”“多次涉及(the references...numerous)”。所以,她“所提供的分析旨在帮助读者理解翻译中不可避免地会碰到的一些抽象内容”。^[28]针对这类概念,多数译者会在概念第1次出现的时候以脚注(footnote)或尾注(endnote)等方式予以阐释,当这一概念再次出现的时候,就会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已经被读者所掌握了。这就给译者预设了一种义务,即:当译者为某一基础性概念提供了诠释之后,读者就有义务记住这一诠释,或者当再次看到这一概念的时候能够主动进行回溯关联。对于这一义务,热奈特是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他指出“公众和读者并没有义务一定要去阅读序言(the public and the reader are not unvaryingly and uniformly obligated; no one is required to read a preface...)”^[4]⁴。既然不存在“阅读”的义务,那么何谈“记住”或“主动回溯关联”的可能?注释(包含脚注、尾注等)和序言同属副文本元素,自然也没有为读者预设这一项义务的特权。另一方法则是采取重复注解,而该方法则又会造成信息冗余,且影响译文可读性。

为了化解这个难题,王彬认为“译者可……将与反复出现且文化内涵厚重的中医术语相关的副文本一次性地置于附录部分(当然,也可以是同属于副文本元素的引言——笔者注)……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注解。”^[29]也即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所称的“预构于文本之前的概念网络(conceptual grids that pre-exist the text)”^[30]。威斯所采用的,正是这一种方法。

4.2 为中医高文化密度语句的阐释预构出文化术语群

《内经·素问》吸收和融汇了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运用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论述了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对病因病机、诊则治法

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其间涉及各个领域的知识,包括历史哲学、社会政治、天文历法、物候气象等等;更兼“其文简,其义博,其理奥,其趣深”(唐·王冰语),所以书中包含着大量高文化密度语句,给跨时空、跨语域的阐释和翻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需要大量的副文本资源参与协同阐释,常见的包括脚注和尾注。但是,“过多的注释会分散读者的阅读注意力”^[31]。翻译副文本研究学者、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资深教授 Valerie Pellatt 认为“脚注和尾注属于敏感资料:许多读者对它们的擅入和干扰式特性表示反感(Footnotes and endnotes are a sensitive area; many readers...do not like their intrusive and distracting nature)”^{[13]169}。不仅如此,涉及文化概念脚注或尾注普遍沿袭传统单一形式的长篇文本流,这种强硬的“擅入和干扰”挑战着读者已经“敏感”的耐性神经。正如热奈特在《普劳斯特副文本》一文当中所指出的:“不间断、无标记的长篇文本流(long textual streams without breaks or markings)……(这种)频繁的增补,使文本呈现出崩塌的迹象(show signs of collapse under the weight of constant amplification)。”^{[5]73-74}

例:

肝主春,足厥阴少阳主治,其日甲乙。
(《内经·素问》第二十二章)

这句话的意思是:春天是最适合肝脏治疗和养护的季节,春季对应五行当中的“木”,“木”对应天干当中的“甲”和“乙”,“甲”属阳,“乙”属阴,所以在经络上分别对应“足少阳胆经”和“足厥阴肝经”。整个句子仅 14 个字,却涉及“四季”“脏器”“五行”“天干”“阴阳”和“经络”等六个概念体系,包含着很高的文化密度。我们试着比较李照国译文和威斯译文:

李照国译文(以下简称“李译”):The liver pertains to spring[in the four seasons during which]Foot-Jueyin and Foot-Shaoyang^[1][Channels]are in predominance. The days[in which the liver and the gallbladder are in predominance]are Jia (the first of the ten Heavenly stem) and Yi (the second of the ten Heavenly stem)^[2].

章末尾注:

[1] Foot-Jueyin (足厥阴) refers to the Liver Channel and Foot-Shaoyang (足少阳) refers to the Gallbladder Channel.

[2] Jia (甲) and Yi (乙) are the first two in the ten Heavenly Stems which were used to name days,

months and years. Both Jia (甲) and Yi (乙) pertain to Wood in Wuxing (五行 Five Elements). But Jia (甲) is Yang-Wood (阳木) and Yi (乙) is Yin-Wood (阴木), corresponding to the liver and gallbladder. To be specific, the liver corresponds to Yimu (乙木) and the gallbladder corresponds to Jiamu (甲木). Therefore, the liver predominates in the day of Yi (乙) and the gallbladder predominates in the day of Jia (甲).

李译的副文本建构主要体现在体量巨大的夹注和尾注。夹注分为两类,一类用大括号([...])标示,帮助廓清语义并使语句连贯,另一类用小括号((...))标示,用以解释部分中医文化术语;尾注分布于各个章节之后,对需要较长解释或存在疑义的概念、观点进行注解。李照国教授指出这种译法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持原作的写作风格、思维方式和主旨”,但同时也觉察出:“以此法翻译之译文,读起来……不十分流畅……”^[32]忠实性和可读性的天平偏向了前者。但是,中国外文局高级译审大卫·弗格森在一次访谈中指出:“(译文)如果拘泥于‘忠实性’,很难将真正的信息传递给外国读者……我认为翻译时更要注重可读性。”^[33]

威斯译文:The liver rules over Spring. The [region of the] ‘absolute Yin’ and the lesser Yang within the foot control the treatment and cure. 1 The days of Spring are those of the celestial stems chia i.

页底脚注:

Wang Ping explains: “The region of the ‘absolute Yin’ includes the pulse of the liver; the region of the lesser Yang includes the pulse of the gall bladder. The liver and the gallbladder are closely connected; hence they must be treated together.”

与李译(三类注解总词数达 122 个单词)相比,威译仅用了一处夹注和一条页底脚注(两类注解总词数仅 45 个单词),译文较为简洁而明晰,再现了汉语原文的简明句式。页底脚注引用王冰的话以阐明“肝胆一体”,“甲乙”使用音译法,并用斜体提醒读者其专名特性,回指引言当中预先构建的四季、天干、五行的对应关系(见表 1)。

表1 四季、天干、五行的对应关系表^{[28][25]}

Season	Celestial Stem	Element
fall	(庚 辛)	metal
winter	(壬 癸)	wood
spring	(甲 乙)	water
summer	(丙 丁)	fire
long summer	(戊 巳)	earth
later summer		

(注:表中“wood”和“water”错位,当是译者疏忽所致——笔者注)

可见,威译在高文化密度语句阐释上的游刃有余正是得益于译者在引言副文本当中预先建构的中医文化术语群。

5 结论

翻译即阐释。评价翻译质量的一个主要指标便是阐释的效度。《内经》的翻译与其说是语言的翻译,不如说是文化的阐释^{[19][77]}。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指出:“所有阐释的目的都是为了与文化距离和历史陌生感作抗争。”(转引自 Hermans^[34])。中医典籍的历史渊源、理论深度、文化内涵和语言特质决定了中医典籍的翻译更要注意拉近文化距离、降低历史陌生感。翻译副文本理论学者、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资深教授 Valerie Pellatt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英译颇有研究,曾与人合著《翻译中国文化》(Translating Chinese Culture)一书。有感于中英两种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Pellatt 对翻译副文本在沟通语言和文化差异方面的功能与作用推崇备至,她指出:“副文本的功能具有严肃性的一面:章节中的引言和脚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学术性背景知识。”^{[12][2]}在另一处,Pellatt 进一步指出:“借助副文本,(译者)可以创建图景(schema)或框架(construct)来引导、丰富、控制乃至钳限阐释。”^{[13][165]}

本文聚焦于伊尔扎·威斯《内经·素问》英译本的引言副文本,旨在勾描构造成分,分析形态特征和功能作用。研究表明:威斯以大篇幅、多类别、双模态的模式构建的引言,不仅呈现了中医文化概貌,而且为正文本内容的阐释强显式地预构了中医哲学概念网和中医文化术语群,有效地避免了正文本当中注释的重复与泛滥,这种“分洪引流”式的做法使译本在归化和异化两端之间站到了一个较好的平衡点,也使忠实性和可读性这2个翻译评价指标得到了较好的兼顾,使其成为当下海外影响最大

的《内经·素问》英译本之一,对中医典籍的对外译介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注释:

- ① 有学者将 Ilse Veith 音译为“艾尔萨·威斯”,但考虑到其德裔背景,笔者将其译为“伊尔扎·威斯”。
- ② “瑞恰慈实验”是20世纪20年代瑞恰慈(I. A. Richards)于剑桥大学文学系所做的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他把一些诗作隐去作者姓名让学生评判,结果是三流诗人的劣作备受赞誉而大诗人的作品却被贬低诛伐。实验结果表明副文本对正文本阅读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 殷丽. 中医药典籍国内英译本海外接受状况调查及启示——以大中华文库《黄帝内经》英译本为例[J]. 外国语, 2017(5): 33-43.
- [2] 殷丽. 《黄帝内经》海外译介模式研究与中医药文化“走出去”[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6): 53-61.
- [3] 张晨晨, 谭业升. “中医西传”视域下《伤寒论》英译本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4): 150-158.
- [4] GENETTE G. Seuils[M].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7.
- [5] GENETTE G. The proustian paratext [J]. SubStance, 1988 (2): 63-77.
- [6] KOVALA U. Translations, paratextual mediation, and ideological closure[J]. Target, 1996 (1): 119-147.
- [7] GENETTE G.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8] WATTS, R. Translating culture: Reading the paratexts of aime cesaire's 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 [J]. TTR: Traduction, Terminologie, Redaction, 2000 (2): 29-46.
- [9] TAHIR Gürcaglar, Sehnaz. What Texts Don't Tell: The Uses of Paratext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M]//HERMANS T.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I: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2: 44-60.
- [10] ARMSTRONG G. Paratexts and their functio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decamerons” [J].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2007 (1): 40-57.
- [11] MCRAE E. The Role of Translators' Prefaces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ranslations into English: an empirical study [M]//ANNA Gil-Bardají. Translation Peripheries: Paratextual Elements in Translation [C]. Berlin: Peter Lang, 2012: 63-82.
- [12] PELLATT V. Text, Extratext, Metatext and Paratext in Translation [C].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 [13] PELLATT V.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aratext and Paratext

- of Chinese Translation[M]//CHRIS Shei, GAO Zhaoming.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8: 164 – 180.
- [14] BATCHELOR K. Translation as Commentary: Paratext, hypertext and metatext[M]//Baker, Mona. Unsettling Translation: Studies in Honour of Theo Herman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22: 48 – 61.
- [15] BATCHELOR K. Translation and Paratexts[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 [16] 余小梅. 副文本与翻译研究的前沿——《翻译与副文本》述评[J]. 外语研究, 2019(3): 109 – 111.
- [17] 于洋欢, 朱源, 董雁. 副文本: 翻译研究的另一扇窗口——凯瑟琳·巴特勒新著《翻译与副文本》评介[J]. 中国翻译, 2019(6): 96 – 102.
- [18] 谭华. 翻译研究的副文本分析图景新蓝图——《翻译与副文本研究》评介[J]. 外国语言文学, 2021(2): 215 – 220.
- [19] 黄培希. 副文本与翻译文化建构——以艾尔萨·威斯《黄帝内经·素问》英译为例[J]. 上海翻译, 2018(3): 73 – 79.
- [20] 阙红玲, 刘娅. 副文本视域下中医典籍的翻译与传播[J]. 上海翻译, 2023(1): 84 – 88.
- [21] 许明武, 冯慧怡. 中国科技典籍外译的副文本路径——以《陶说》为例[J]. 上海翻译, 2023(2): 14 – 19.
- [22] 王明树, 王格. 中医典籍《难经》英译本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J]. 外国语文, 2023(4): 43 – 51.
- [23] 赵毅衡. 符号学[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45 – 156.
- [24] ROCKENBERGER A. Video Game Framings[M]//NADINE Desrochers. DNIEL Apollon. Examining Paratextual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Digital Culture. Pennsylvania: IGI Global, 2014: 252 – 286.
- [25] 朱桃香. 副文本对阐释复杂文本的叙事诗学价值[J]. 江西社会科学, 2009(4): 39 – 46.
- [26] BIRKE D, CHRIST B. Paratext and digitized narrative: Mapping the field[J]. Narrative, 2013, 21(1): 65 – 87.
- [27] 任旭. 试论中医外科治疗特点形成的历史原因[J]. 医学与哲学, 1987(7): 49 – 51.
- [28] VEITH I.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 [29] 王彬. 中医术语翻译之副文本之道[J]. 中国翻译, 2022(2): 141 – 147.
- [30] BASSNET S, LEFEVERE A.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8.
- [31] 马凯, 赵润生, 师旭亮. “厚译法”在文树德《内经》译本中的应用研究[J]. 中医药导报, 2020(9): 211 – 213.
- [32] 刘希茹, 今译. 黄帝内经·素问[M]. 李照国,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5.
- [33] 姚斌, 郭楚桦, 匡博怡. “翻译与国际传播”工作中的挑战与对策——弗格森先生和施晓菁女士访谈录[J]. 翻译界, 2022(1): 157 – 164.
- [34] HERMANS T. The Conference of the Tongues[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7: 153.

(上接第 43 页)

3 结论

莫迪里阿尼的艺术作品展现的原始主义特征, 体现了他对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深刻融合与理解, 传达出对世界的独特感知, 以及对艺术本质的探索。在构图布局时, 他突破了传统三维空间的束缚, 追求平面化与非对称性, 以摒弃透视法则来展现艺术张力。在色彩运用上, 他采用内敛且具有象征性的色彩语言, 实现了对比与协调的平衡, 赋予画面以生命力与表现力。在造型设置中, 他采用简化与抽象的手法, 将复杂的形态概括为简洁的几何形状, 强化了作品的形式感与符号性, 展现了原始质朴的美感, 揭示了人物的精神状态。莫迪里阿尼的作品为现代艺术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在 20 世纪现代艺术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参考文献:

- [1] CLARKE Michael.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Art Term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2.

- [2] Modigliani. The Primitivist Revolution[M]. Munich: Hirmer, 2022.
- [3] CARL Einstein. Negerplastik[M]. Wolfsburg: Kurt Wolff Verlag, 1915.
- [4] 邢晓舟. 伊特鲁里亚艺术[J]. 美术观察, 2003(9): 107 – 108.
- [5] 道格拉斯·霍尔. 莫迪里阿尼[M]. 贺澧沙, 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8: 92.
- [6] 关维祥, 刘晓毅. 自然的恩赐与先民的寻觅——史前绘画色彩的探索之旅[J]. 美术大观, 2009(2): 19.
- [7] 刘冬梅. 带不走的荣耀——谈《莫迪里阿尼》中人性本真的折射[J]. 电影文学, 2012(14): 93 – 94.
- [8] 乔弗里·梅耶斯. 莫迪里阿尼传[M]. 吴晓雷,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74.
- [9] SCHMALENBACH Werner. Modigliani[M]. New York, London: Prestel Publishing, 2016: 12.
- [10] 颜海英, 王怀轩. “荷鲁斯之眼”的起源、崇拜与象征意涵[J]. 丝路文化研究, 2024(00): 219 – 235.
- [11] 多丽丝·克里什托夫. 莫迪里阿尼[M]. 赵东蕾, 译. 北京: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7: 35.

论《围城》隐喻英译的体认概称性

张雪莉*, 张 凌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 要:以语言体认概称论为基础,以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和茅国权(Nathan K. Mao)合译的《围城》(汉英对照)为语料来源,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源文的隐喻表达。研究发现,隐喻的概称性尤为突出;译者基于自身的体察认识,对源文中的隐喻概称表达进行缩小、简化;针对中西文化意象差异进行解构与重构,以此来适应目标语文化和认知习惯。

关键词:《围城》;隐喻;翻译;体认;概称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4-0074-05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ortress Besieged* from the Embodied – Cognitive Genericity

ZHANG Xueli*, ZHANG Ling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Shaanxi)

Abstract: Based on the embodied-cognitive generic language theory, it adopted the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of *Fortress Besieged* in this paper, translated by Jeanne Kelly and Nathan K. Mao as its research corpus, aiming to investigate how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in the original text were handled during translation. It has been found that metaphors with generic expressions in *Fortress Besieged* have been narrowed down and simplified guided by the translators' experience and cognition. Additionally, culture-specific imag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deconstructed and then reconstructed to better adapt to the target language.

Key words: *Fortress Besieged*; metaphor; translation; embodiment-cognition; genericity

《围城》作为钱钟书的杰作,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蕴含丰富的隐喻。例如,《围城》这一书名本身就是隐喻,象征主人公的婚姻困境,也隐喻其职业选择、社会地位、以及面临的文化冲突等多重人生经验。此外,文中类似的隐喻共计115例^[1],它们的运用更是丰富了文本的内涵,增加阅读趣味性。Lakoff和Johnson曾指出:“Metaphor is pervasive in everyday life, not just in language but in thought and action”。^[2]作为一种认知工具,隐喻绝非局限于日常交际,更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它通过将抽象概念与具体体验相联系,使人们借助已知的感知经验来理解未知或难以把握的

概念^[3]。

学界对《围城》中的隐喻研究已有多角度探索。譬如,李泽民与蔡新乐论述“围城”这一主题隐喻可以贯通一切,认为“围城”之役甚至是对整个人类的愚弄^[4];王磊强调“文化负荷”的隐喻需灵活处理^[5];王德福从“四个世界”理论角度探讨隐喻话语^[6];李气纠和张建佳对《围城》中隐喻的构建及审美进行解读^[7];郭振伟简论隐喻具有主观性,是对作者立场、观点和情感认识的有效传达^[8];王银平则关注《围城》隐喻的表征特点^[9];胡学坤从关联理论角度探析隐喻翻译应对策略^[10]。然而,《围城》中隐喻英译的体认概称性尚未受到学界关注。

收稿日期:2025-03-19 * 通讯联系人

作者简介:张雪莉(1998-),女,安徽淮北人,硕士研究生;张凌(1975-),男,贵州织金人,教授,博士(后)。E-mail: 1582117458@qq.com

隐喻作为一种语言表现形式,其概称性尤为突出,隐喻的概称性体现在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概称性的确认需要读者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体察认识,即语言具有体认概称性。本研究从语言体认概称论出发,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围城(汉英对照)》^[11]作为语料来源,以具体的案例分析译者在翻译时如何调整源文隐喻的概称性以适应目标语读者的认知习惯。以期为文学作品隐喻翻译提供新视角,促进跨文化理解与交流。

1 语言体认概称论

1.1 语言体认概称论的详细阐释

语言体认概称论是一种新的语言观,强调世界、体认与语言之间的动态互动^[12]。该理论主张,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人类在与世界的互动中,通过体验和认知过程形成的描述现实的手段。语言的体认性反映人们对世界的直接感知和经验,但因个体差异而具有概率性,对于同一种事物的体认所得出的概念也并非唯一。例如,银杏树可根据其果实颜色被命名为“白果树”,又可依据其生长缓慢、寿命极长的特点被称为“公孙树”。这不仅揭示语言在描述复杂多变现象时的片面和不确定性,同时充分验证语言与世界之间存在概称关系,且语言体认性与概称性相互依存、互为表里^[12]。由于现实世界持续演变,个体在认知过程中的主观意图、情绪状态和观察角度的多样性,使得语言表达天生具有多样性和歧义性。因此,概称符号的具体所指会随着时空语境和使用者的变化而发生改变^[13]。语言体认概称论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借助这一视角,人们可以更深刻地洞察语言的本质和它在形成意义、构建隐喻时的作用。

1.2 语言体认概称论在隐喻翻译中的作用

传统上只将隐喻视为一种修辞手法,用来美化语言,却忽略了它在人类认知中的核心作用。现在,隐喻已经超越修辞学的范畴,被视为一种基础的概念思维模式^[14],是人类看待和认识事物的一个视角,不可否认是一种认知现象^[15]。《围城》中,作者别具匠心地运用大量隐喻性修辞,将诸多不同意象有机地融合起来,使得小说的语言风格既幽默风趣又具尖锐讽刺。在这种尖锐的讽刺背后,实际上是对社会、文化等提出深刻的洞见和批判。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围城》的隐喻翻译变得非常困难^[16]。简单直译难以传达其文化内涵和深层意义,因此,译者的体认在翻译过程中至关重要。王寅认为,翻译是一种涉及认知活动的复杂过程^[17],并指出“翻译

是一种特殊的、多重互动的体认活动,译者在透彻理解源文语篇所表达的有关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中各类意义的基础上,运用多种体认方式将其映射进译入语,再用创造性模仿机制将其建构和转述出来”。^[18]¹¹⁵在此基础上,语言体认概称论强调翻译是译者带着一定的目的对原文进行体察、认识的结果。鉴于原文的概称性质,译者在翻译时会根据翻译目的,在原文提供的概称空间内进行选择,并有意识地将概称性具体化。因此,尽管翻译结果仍然具有概称性,但可能与原文并不完全一致。这一过程表明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的技术活动,更是译者对原文进行重新体认和创造性表达的过程。

语言体认概称论在隐喻翻译中的应用体现在,它强调译者需深入理解原文中隐喻的概念思维和认知活动,进而在目标语言中创造性地再现原文的深层含义。在《围城》的文学转译中,译者在翻译隐喻时,需识别并传达这些隐喻背后的认知和文化含义,同时也应考虑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概念差异。通过体认概称论的视角,译者可以在翻译过程中更好地把握原文的概称性,选择适当的策略来缩小和具体化这一概称性,以期达到既忠实于原文,又能让目标语言读者理解和感受原文的隐喻意图和深层意义。

2 《围城》中隐喻英译的体认概称性分析

由于译者与作者存在主体间性,两个主体对同一客观世界的体验可能存在差异,认知加工也不尽相同,即面对同一场景或事件,人们可以从不同视角、选择不同辖域、突显不同焦点、运用不同方法来观察^[18]¹⁴²。故而,译者对于原文作者所构建并概称出来的世界,会有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在面对灵活多变的隐喻表达时,常常会在翻译过程中融入自身独特的体认。在《围城》里,面对众多隐喻表达,尽管译者大多采取照搬译出语隐喻的翻译方式,为了使目标语读者切身体会作者的写作意图,部分隐喻在翻译的进程中需要译者进一步深入剖析,经过体认之后,带着特定的翻译目的,展开二次创作。

2.1 缩小隐喻概称表达

作品原文实际上仅仅是作者个人对世界进行体认后所产生的结果,所呈现出的语言表达往往具有显著的概称性。作者基于自身独特的经历、认知和感悟,通过隐喻的方式对特定的事物进行描述,将其与人们熟悉的形象相联系,旨在达到预期的写作目的,其语言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色彩和宽泛性。译者在进行翻译工作时,首先会凭借自己的体察和认识对源语中可能使用较为广泛的隐喻表达进行初步

理解。通过结合作者的意图以及自身的翻译目的,仔细斟酌源文中的隐喻表达,方能确定其概称范围,进而准确发挥英语语言的概称性,将这一隐喻表达的深层含义巧妙地传达。当原文中的概称表达过于宽泛时,译者需站在目标语读者的视角进行考量,在译入语中合理地缩小隐喻概称范围,从而减少可能产生的歧义,使译文更加清晰、准确,让目标语读者更容易理解原文所传达的信息。

例如,“偷着不如偷不着”^{[11]354}这句话被译为“Having it isn't as good as not having it”^{[11]355}。在源文中,作者将烤山薯比喻为男女私情,旨在说明烤山薯的香味往往比其滋味更加诱人,就如同男女私情中那种若有若无的吸引力往往比真正拥有时更令人心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巧妙地将“偷”译为“have”,与直译的“steal”相比,“have”这个词能恰到好处地表达“吃烤山薯”这一内涵,同时在男女私情的语境中,它也能巧妙地转述那种微妙的情感状态,充分彰显译者对目标域和源域这两件事物的准确体认。在翻译时通过对“偷”这个词的精心处理,即缩小、聚焦源文的概称范围,译者不仅成功地在译文中保留了源文的比喻意义,又使译文更加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感受源文所传达的深刻内涵。

再如“订婚一个月,鸿渐仿佛有了个女主人”^{[11]548}。在此例中,“女主人”这一概称被翻译为“boss”^{[11]549}。当“女主人”与“婚姻”联系起来,其可能蕴含多种涵义。而“boss”一词更着重突出作者所刻画的鸿渐被未婚妻“驯服”的这一实际情况,使目的语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想要传达的意义。译者也是基于对原文的深刻理解,将“女主人”指称的范围缩小,侧重强调两人之间的关系。

译者将“我在你家孤掌难鸣”^{[11]650}译为“I'm alone and helpless in your family”^{[11]651}。孤掌难鸣除了字面意思之外,还可引申为“力量单薄”和“处境孤立”,译者作何处理是有一定概率的。译文选用“alone”和“helpless”这两个词,准确生动地描绘出儿媳在婆家所面临的困境。翻译将原文中的隐喻转化为目标语言读者能够感同身受的表达。这种翻译不仅传递了儿媳在婆家孤立无援的情感状态,还使得英语读者能够迅速在心理上与原文的情感产生共鸣,体会到儿媳在婆家所感受到的孤独和无助。这种跨文化的传达方式,充分体现译者对语言和文化差异的深刻理解和准确认识,以及在翻译实践中对语言体认概称论的有效运用。

2.2 简化隐喻概称表达

由于各民族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各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必定会对各自的语言产生深刻的影响^[19]。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高度重视汉英表达上的显著差异。尤其在处理隐喻表达时,译者会根据译出语和译入语的表达规范,经由自身体认之后,在翻译时对概称表达做出适当的调整。以便目标语读者在充分理解作者写作意图的基础上,也能够感受到本族语的地道表达。综合考虑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和读者的认知方式以及概称表达所蕴含的情感色彩等多重因素,在翻译时进行一定加工,这样的译文更易于被目标语读者理解和接受。

例如:“所说的话仿佛有手从他嘴边夺去向半空中扔了”^{[11]300}译为“His words seemed to have been snatched from his lips and flung into the air”^{[11]301}。“话语”这一抽象概念被概称为一个可以扔出去的实物,是一种生动的隐喻表达。原文中,李梅亭坐在拥挤的车上伸出头朝着车下三人叮嘱,汽车先是轰隆掀动,而后突然鼓气开动,嘈杂之时,他说的话车下三人完全没听到。源文中,极为形象地描述了这样一种情景:随着汽车猛地发动,他的话在那一瞬间仿佛被人骤然抛向空中,而后远远地扔了出去。译文中虽省略“手”这一动作的发出者,但并不影响画面在读者脑海中的呈现。译者充分考虑汉英表达差异,以目标语读者为中心,采用被动句式来呈现,这种做法非常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因为在英语中被动句表达更客观,更能唤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表达观点更能被语言受众接受^[20]。再如:“她手上生的五根香肠”^{[11]310-312}被译为“The five sausage-like fingers”^{[11]313}。通过将概称“五根香肠”具体化为“five sausage-like fingers”,译者巧妙地将原文中的比喻转化为一种直观的形象,这样的处理不仅保留了原文的生动形象,还使得读者能够迅速抓住这一描述的精髓。这种翻译手法体现译者对原文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目标语言表达习惯的精准把握。

2.3 隐喻的解构与重构

隐喻翻译的难点还在于各民族独特的文化意象,由于一个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轨迹,某一特定事物早已被深深烙上文化的印记^[21]。文化意象指的是蕴藏着人类智慧和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结晶的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语言符号。对文化意象的解读差异可以反映出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碰撞^[22]。这意味着操不同语言的人,由于其体认方式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同一个隐喻在汉语中可能司空见惯,但直译成英语可能会变得难以理解。比如,汉语中说“他是个老黄

牛”,听话人结合语境能捕捉到他是个工作勤恳、踏实的人,但如果直译为英语“He is an old yellow ox”,在特定的语境下,这句话会让人感到困惑。当事人只有依据体认结果对原句进行解构,充分理解之后,再发挥英语的概称性,重构为“He is a hardworking and dedicated person”,这时才能准确传达隐喻内涵。因此,在一种语言中,某种事物可能具有独特的概念及涵义,这是该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文化遗产中对其进行体认的结果。然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不存在与之完全对应的涵义。这就需要译者深入分析源文概称的内涵、背景及象征意义,并在理解基础上结合新的语境与需求,以创新的方式重新塑造和表达这一意象。

在翻译过程中,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存在,译者常常需要面对各种挑战。例如:“人家就疑心是马戏班的演员,再不然就是开窑子的乌龟”^{[11]84}译为“Would be suspected of being a circus performer, or else a pimp who ran a brothel”^{[11]85}。在原文中,将穿着皮外套但未拥有私人汽车的男性形象比喻为“开窑子的乌龟”,通过解构原句可知这里的“乌龟”在汉语中具有特定的含义,指的是妓院的男主人或男仆,这一形象在中国文化中带有贬义色彩。然而,由于“turtle”在英文中没有此种文化背景与相应含义,直接翻译极有可能让目标语言的读者产生困惑。译者在处理这一翻译时,采取一种更为巧妙的方法,将原文中的比喻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本土化,选择“pimp”这个词来代替。“Pimp”在英文中指的是妓院的男主人或男仆,与原文中的“乌龟”在文化含义上更为接近。译者充分解构作者在原文中构建的源语世界,明白原文的意义、内涵即作者的意图,采取舍象保义的方法,成功传达出原文想要表达的贬义和讽刺意味^[23]。

再如:“若有水田三百亩,来年不作猢猻王”^{[11]254},这里的“猢猻王”译为“monkey king[i. e., teacher]”^{[11]255},此处将“猢猻王”这个词汇翻译为“teacher”是一种巧妙的增译手法。译者在对原文“猢猻王”这一概称解构之后,没有舍弃这一意象,反而把其内涵补充出来。不仅保留原文的隐喻意味,还通过具体化的表达方式,使得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monkey king”在汉语文化背景下的独特含义,起到一定的文化传递作用。同样的表达还有“辛楣一肚子酒,几乎全成了酸醋”^{[11]192}。在这里,“酸醋”被翻译为“Sour vinegar in his jealousy”^{[11]193}。在中国文化中,“醋”有着独特的寓意,常常用来指代人的一种嫉妒心理。当人们说“吃醋”

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内心产生了嫉妒之情^[9]。这种文化寓意在中国的文学作品、日常用语中屡见不鲜。然而,在异国文化中,不存在这种潜在的比喻意义。如果直译,外国读者可能很难直接理解“醋”所蕴含的嫉妒之意。因此,译者经由自己的准确体认,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文化差异。为了让目标语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原文的含义,译者将原文“醋”这一概称进行具体化处理。通过增译“jealousy”这个词,目标语读者能够迅速领悟句子的涵义。他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人物内心的嫉妒情绪,从而进一步明白“醋”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文化意象。

文中“加油加酱,如火如荼”^{[11]340}译为“embellishing it with details and painting such a vivid picture of the action...”^{[11]341},“加油加酱”这一表述意味着在转述消息时进行夸大且增添特定内容。译者基于对原文的精准理解,并未直译,而是将源文中的概称范围进行缩小处理,重构这一隐喻所蕴含的意义,使得目的语读者能够与原文读者达成相同的理解。这种翻译策略能有效地弥合语言文化的沟壑。“加油加酱”这一极具中国文化色彩的说法,经译者精心运作,以契合英文表达规范且精准表意的形式展现出来。

最后,“物价又像得道成仙”^{[11]626}被译为“As though they had achieved Nirvana and immortality”^{[11]627}。“仙”这一概称在汉语语境中形象地描绘出一种达到极高境界的状态,源语读者能够由此深切体会到物价上升之迅速以及价格高得离谱的状况。译者在对源文进行解构时发现,在中国的传说体系里,修仙是一个广泛常见的概念,然而在英语的语言认知范畴中,并没有与之直接对应的精准表达。鉴于此,译者独具匠心地选取“Nirvana”这个带有宗教性质的词汇。这一选择充分考虑到英语使用者的认知模式,因为“Nirvana”在英语文化中具有一定的认知基础,能够让目标语读者在其自身的认知框架内相对容易地理解和接受。同时,“Nirvana and immortality”还巧妙地诠释出“成仙”的另一重内涵,即具有可与世长存的意味,从而准确地将原文中物价难以下降这一含义传递给目标语读者。原文的讽刺在译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翻译方式遵循“世界-体认-语言”的关系,即充分考虑语言使用者的认知体验和文化背景,通过巧妙地词汇选择和语义传达进行重构,实现跨语言文化交流中的有效信息传递,使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读者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原文所蕴含的深层意义和情感色彩。

3 结论

在语言体认概称论“现实－体认－语言”的指引下,本文对小说《围城》翻译中的隐喻英译展开探讨。研究发现,译者充分运用了语言的体认概称性。隐喻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表现形式和认知工具,毫无疑问具有概称性。面对隐喻翻译时,译者先以读者的身份对源文的隐喻进行体察认识,其次为了使译文能更好地契合目标语的文化底蕴和认知模式,译者带着特定的翻译目的,全力运用英语表达的概称性对源文隐喻进行创造性加工。主要采取以下策略:对于宽泛的隐喻概称,合理缩小概称范围,确保译文清晰准确、避免歧义;重视汉英表达差异,遵循语言规范,适当简化概称表达;对于具有特定文化意象的隐喻表达,经过体认进行解构,而后在译入语中准确重构。由此可见,语言体认概称论为《围城》中隐喻的英译提供了深刻的阐释框架。本研究揭示译者在翻译隐喻时,如何在忠实原文精神的同时,做到适应目标语言的文化和认知习惯,从而提高翻译质量并促进跨文化交流。这不仅为《围城》中隐喻翻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对文学中的隐喻翻译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 [1] 束定芳. 论隐喻与明喻的结构及认知特点[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2): 102-107.
- [2]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3.
- [3] 尉迟若辰.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汉英谚语的隐喻翻译及策略[J]. 汉字文化, 2024(18): 160-162.
- [4] 李泽民, 蔡新乐. 论《围城》的主题隐喻[J].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2(5): 21-25.
- [5] 王磊. 隐喻与翻译: 一项关于《围城》英译本的个案调查[J]. 中国翻译, 2007(3): 75-79.
- [6] 王德福. 小说文本隐喻话语的四个世界[J]. 小说评论, 2009(2): 152-155.
- [7] 李气纠, 张建佳. 施喻者构建隐喻的自我驱动性与隐喻的审美表达——以《围城》隐喻构建的解读为[J]. 外国语文, 2012(4): 91-94.
- [8] 郭振伟. 论《围城》隐喻的主观性[J]. 齐鲁学刊, 2014(1): 151-154.
- [9] 王银平. 《围城》中隐喻的表征与英译[J]. 语文建设, 2016(3): 51-52.
- [10] 胡学坤. 隐喻翻译的应用对策——以《围城》为例[J]. 语文建设, 2017(17): 69-70.
- [11] 钱钟书. 围城(汉英对照)[M]. 珍妮·凯利, 茅国权,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 [12] 张凌. 语言体认概称论[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2): 37-47.
- [13] 张凌. 概称语“达人”词源考及英译研究[J]. 语言与教育研究, 2024(1): 24-29.
- [14] 陈雪, 李想.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英汉谚语的隐喻翻译及策略[J].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3): 234-237.
- [15]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17.
- [16] 程凯. 概念隐喻视角下《围城》中的隐喻翻译研究[J]. 普洱学院学报, 2024(1): 113-115.
- [17] 王寅.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过程新观[J]. 中国翻译, 2017(6): 5-10.
- [18] 王寅. 体认翻译学(上)[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19] 曹勇. 汉英民族思维模式对其语言表达的影响[J].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3): 116-119.
- [20] 谭益兰. 浅谈英汉被动语态的差异对比与翻译策略[J]. 西藏科技, 2019(8): 40-43.
- [21] 李琳. 互文视域下文化意象符号的解构与重构——以《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例[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12): 128-132.
- [22] 王静. 文化意象的解读——谈《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翻译策略[J]. 语文建设, 2016(33): 79-80.
- [23] 黄忠廉, 孙福庆. 翻译体认系统论[J]. 中国翻译, 2024(4): 15-22.

后方法视域下大学英语复杂语法教学研究 ——以关系从句为例

胡 靓

(安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000)

摘 要:“后方法”理念倡导“调查式教师研究”范式,强调教师应通过类似于“观察-反思-行动”的循环路径,构建起本土化教学知识体系,对语法教学产生深远影响。在此理论框架下,以关系从句为研究对象,采用“观察-反思”的实证研究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与教学反思,进而提出针对性的复杂语法教学策略,以期优化教学实践提供理论参照与方法指导。

关键词:后方法;复杂语法教学;大学英语;调查式教师研究;关系从句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4-0079-07

Complex Grammar Teaching in College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ethod Taking Relative Clauses as an Example

Hu L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00, Anhui)

Abstract: The “post-method” thoughts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grammar teaching, and more importantly have provided teachers with a new paradigm of inquiry-oriented “teacher research”, where teachers should construct a localized teaching knowledge system through the cyclical process of “observation-reflection-action”. Guided by this research paradigm, it took relative clauses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in this paper and adopted an empirical research approach of “observation-reflection”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and pedagogical reflection. Subsequently, targeted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complex grammar were proposed,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optimizing teaching practices.

Key words: post-method; complex grammar teaching; college English; inquiry-oriented teacher research; relative clause

当前,大学英语教学遵循整体语言理念,以意义建构为核心,在培养学生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的同时,兼顾课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特质。因此,大学阶段的复杂语法教学,不能只停留在规则讲解,否则会与学生的高阶需求脱节。本文将根据后方法(post-method)理念提供的研究范式对英语关系从句开展

实证探索,采用“观察-反思”的实证研究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与教学反思,在解决学生实际学习问题的过程中通过反思不断优化教学方法,最终构建出针对复杂语法结构的教学策略,以期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更具适应性和实效性的支持。

收稿日期:2025-03-04

基金项目: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SK2020A0304); 高校优秀青年骨干人才国内访学研究项目(gxgnfx2021006); 安徽省质量工程一般项目(2023jyxm0495)。

作者简介:胡靓(1980-),女,安徽池州人,副教授,硕士。E-mail:957485265@qq.com

1 后方法视域下的语法教学

后方法理念倡导的语法观和调查式教师研究范式(inquiry-oriented teacher research),立足于具体教学情境,主张通过“观察-反思-行动”的路径生成本土化复杂语法教学知识。

1.1 后方法语法观

从“方法”到“后方法”是外语教学思想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在方法时代,外语教学领域过度追求所谓的“最新最佳方法”,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前沿教学理论的验证与应用,导致教师个体的教学智慧和课堂观察能力被严重低估,教师在教学研究中的主体意识和创新能动性明显不足。这一现象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1994年美国学者库玛(Kumara-vadivelu)教授首次提出了“后方法”概念^[1],它是对传统“方法时代”的批判与超越,主张跳出固定教学法的局限,强调教师的自主性、教学的动态性和情境的特定性。其核心思想可概括为整体语言、意义优先的语言观;回归生活、体验实践的教学观;互动协商、合作探究的学习观^[2]。这些对语法观和语法教学实践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方法语法观认为:所有语法结构都可视为整体,是意义和形式的映射,且在形式与意义的映射过程中,意义具有优先地位。为了实现这一映射,语法教学中应创造大量输入和使用机会——“频率”、“基于使用”、“涌现论”等概念都体现了后方法语法教学理念。而语法教学的本质是教师引导学习者自主归纳语法规则。

由此可见,从“方法”到“后方法”的转型时期,传统的语法观和语法教学产生了解构式的变化^[3]。后方法语法观为语法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后方法对于教学经验和教师能力的欣赏和推崇更为复杂语法教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打开了新的局面。

1.2 后方法语法研究范式

后方法教学理论以教师自主性为核心原则,由此发展出一种创新性研究范式——“调查式教师研究”^[4]。其核心在于教师以“研究者”身份,通过观察、记录、分析和干预等科学方法,对自身教学实践开展批判性反思与持续性改进。它打破了传统“理论-实践”的单向模式,主张教师通过“观察-反思-行动”的路径生成本土化教学知识。该研究范式鼓励教师回归课堂,开展课堂观察和研究;注重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哪怕解决再小的问题都会对教学方法的提升有所裨益,都是有意义的教学研究。后方法还鼓励教师从固定教学法的条条框框中解脱

出来,博采众长,立足自己的教学实践和已有理论知识,探寻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教学方法或思想,实现个人教学理论和实践的突破。作为本科院校教师,我们清楚地了解目前所面临的学情:一方面,无论从教学目标还是从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自身需求而言,都亟需掌握系统的语法知识,尤其是复杂语法知识;另外,在分层教学背景下,大学英语课堂后期的学生平均英语水平不高,对语法学习仍有较强需求。因此,基于后方法对外语教学实践的指导和实际需要,我们提出了后方法指导下的调查式教师研究范式:在外语教学中开展“观察-反思-行动”的循环模式,通过各种调查手段观察具体的学情,善于批判性思考和总结,提出相应的语法教学策略,并根据实践不断调整策略。

2 关系从句实证研究和教学反思

基于研究范式中的“观察-反思”环节,以关系从句为研究对象开展实证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开展批判性分析与教学反思,实现对学生现有问题的诊断,为下一步复杂语法教学策略的提出提供依据。

2.1 关系从句研究设计及结果

本研究以关系从句这一典型复杂句法结构为研究对象,选取某高校理科专业大二年级一个自然班(N=41)作为受试群体。基于该校大学英语课程的分层教学制度(通过CET-4考试者可免修后续课程),该班学生整体英语水平处于较低阶段。研究聚焦书面语产出中的限制性关系从句,采用AntConc语料分析软件辅以人工检索的方法,从每位受试者半年内完成的六篇作文中最终提取有效关系从句150例。

本研究在标注限制性关系从句时,同时考察先行词在从句和主句中的句法功能。从句层面,根据先行词在关系从句中的句法功能,将其划分为主语关系从句(S)、直接宾语关系从句(DO)、间接宾语关系从句(IO)、介词宾语关系从句(OPREP)、比较宾语关系从句(OCOMP)和属格关系从句(GEN)六种类型。主句层面,则依据先行词在主句中的语法角色,标注为系词补语(PN)、主句主语(SUBJ)、主句宾语(OBJ)和介词宾语(OBL)四种类型。

研究结果显示,受试产出的关系从句类型在结构分布上呈现显著特征(见表1)。主语关系从句占比高达86%(129/150),其中系词补语主语关系从句(PN-S)最为突出,占全部主语关系从句的44.2%(57/129)。直接宾语关系从句占10.7%(16/150),而介词宾语关系从句仅占3.3%(5/150)。值得注

意的是,语料中未出现间接宾语、属格和比较宾语关系从句。

表 1 各类关系从句分布结构表 例

	S	O(DO)	OPREP	总计
PN	57	2	2	61
SUBJ	36	/	1	37
OBJ	19	14	1	34
OBL	17	/	1	18
总计	129	16	5	150
比例	86%	10.7%	3.3%	100%

将先行词在主句中的句法功能纳入分析框架后,受试产出的三类关系从句可细分为 10 种类型:

表 2 关系从句错误分布表 例

	S(127)					O(DO)(18)		
	PN	SUBJ	OBJ	OBL	PN	SUBJ	OBJ	OBL
关系代词错误省略	20	3	2					
关系代词误用		1		1				
关系代词冗余			1				4	
从句与先行词错误分离		1						
先行词重复或缺失		1						
主句不完整(主句仅含名词短语)		8						

2.2 关系从句类型分析及教学反思

在句法结构类型方面,学习者呈现出明显的句式简化倾向。标记性较强的间接宾语(IO)、属格(GEN)和宾语补足语(OCOMP)关系从句在语料中完全缺失;相比之下,主语关系从句和直接宾语关系从句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介词宾语关系从句。这一分布特征与 Schachter 提出的二语习得“结构回避”策略高度吻合^[5],表明学习者倾向于规避标记性强、加工复杂度高的句法结构。Gass 的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认知层面的解释,证实英语中主语关系从句和直接宾语关系从句在认知加工效率上确实存在优势^[6]。

在综合考虑主句功能后,所建立的句法层级序列(PN-S > SS > OS > OBL-S > OO)能够更清晰地揭示学生关系从句的产出特征。在占主导地位的主语关系从句中,PN-S 关系从句最多,占 44.2%,其典型构式为"There are some people/persons/those who say/hold the view/think/argue that..."等程式化表达。Diessel 和 Tomasello 将这类结构界定为“呈现

PN-S、SUBJ-S(SS)、OBJ-S(OS)、OBL-S、PN-O、OBJ-O(OO)、PN-OPREP、SUBJ-OPREP、OBJ-OPREP、OBL-OPREP。在剔除数量较少的五种关系从句后(见表 1),研究结果显示各类型关系从句的产出频次呈现以下排列顺序:PN-S > SS > OS > OBL-S > OO。

研究还考察了受试者在关系从句中的错误使用情况。总体错误率达到 28%(42/150)。其中,关系代词省略最为常见,共 25 例,占全部错误的 59.5%(25/42),且主要集中在 PN-S 结构中;主句不完整的错误有 8 例(占 19%),多出现在 SS 结构中;关系代词冗余错误 5 例(占 11.9%),主要出现在直接宾语关系从句中。其他类型错误相对较少(详见表 2)。

型关系从句”(presentational relative construction),指出这是母语习得初期用于引入新信息的特殊构式,虽然形式上包含主从句结构,实则表达单一命题^[7]。受试者大量使用这类单命题表达方式,而较少产出需要处理主从句双重命题关系的非呈现型关系从句,这一现象折射出其句法能力发展的局限性。

此外,同为主语关系从句,SS 结构使用频率达到 OS 结构近两倍。若将加工中断(processing discontinuity)^[8]视为习得难度的关键因素,那么 SS 关系从句由于存在一次加工中断,其加工难度理应高于没有中断的 OS 关系从句。然而,实际数据却呈现相反的趋势,这一现象值得深入探讨。在四六级英语写作中,SS 关系从句常采用 people + who support... + say...结构点明观点。这种“已知立场 + 新观点”的句式结构中,关系从句承担背景信息功能,主句传递核心新信息,成为考生备考时重点掌握的模板句式。据统计,在受试 36 个常见 SS 关系从句中,此类观点表达句式占比达 55.6%(20/36),体现出其在议论文写作中的高频应用特征。根据基于使

用的语法观,频率对成人习得和加工关系从句起核心作用。基于使用,一部分修饰主句主语的关系从句也像 PN-S 关系从句一样具有语块特征^[9];这种构式属性显著减少了 SS 关系从句原有的加工难度,所以产出率较高。对于关系从句的习得,Fitz 基于使用观进行了研究,旨在说明不同类型关系从句习得和加工难度并非取决于结构本身,而是语言经验;反对以单一标准解释不同类型关系从句的加工难度^[10]。由此可见,因语言经验可以改变加工中断所造成的加工不对称性,关系从句习得不必遵循从简到难的基于结构本身的习得顺序。

基于上述分析,提高句式复杂度已成为当前教学工作的主要任务。不过,我们仍欣喜地看到,频率和构式结构对受试关系从句习得产生了促进作用。具体而言,某些理论上加工难度较高的结构,由于大量接触形式-意义配对的构式结构,在实际语言产出中反而表现出较高的产出率。这一现象印证了基于使用的语法理论在二语教学中的指导价值,同时也凸显了教学中,将意义放在第一位的重要性。从二语习得机制来看,句法结构的掌握不仅受制于认知加工难度,更与学习者的语言经验和使用频率密切相关。因此,在未来的教学中,复杂句法教学不能仅依赖理论上的结构层级,而应将语法结构看成整体,且将意义放在第一位,同时动态关注学生的语言使用习惯与认知特点,通过频率驱动和构式结构习得,逐步提升其句法复杂度和实际运用能力。

2.3 关系从句错误分析及教学反思

基于使用的语法构式和频率效应对大学英语关系从句习得和产出意义重大,但依据后方法思想,这并不代表一种语法教学法可以穷尽所有学生的语法问题。不同水平的学生面临不一样的困境,语法教学应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之上,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本研究通过分析关系从句错误,也发现了我们的学生所面临的一些特有问題。首先,PN-S 在所有关系从句类型中产出量最高,但是 57 个 PN-S 关系从句中有 20 个是关系代词的错误省略。PN-S 关系从句表达单个命题,加工难度偏易,为何我们的学生在大学阶段还会集中出现此类问题呢?房印杰的研究也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 PN-S 关系从句中系词补语对显性关系代词预测概率最低^[11]。其次,受试的错误还有主句不完整,如“Someone who has good ability and will get success finally”,此句只要去掉“and”就是 SS 关系从句,即先行词“someone”作主句的主语。很多关系从句研究均指出:这种主语带后置定语的关系从句句式如同上面提到的呈现型

关系从句一样,属于过渡阶段出现的构式,这说明学习者需要积累很多的其它构式用例后才能逐渐掌握抽象的复杂构式^{[12][13]}。这个问题应引起教师重视,要积极思考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和策略。

本研究揭示的学生关系从句错误,特别是 PN-S 结构中关系代词的高频省略和 SS 结构中主句不完整现象,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传统基于规则的教学法和单纯强调输入频率的基于使用法,在面对已经形成固化错误的成人学习者时,都显示出明显的局限性。这些学生从初中就开始系统学习关系从句,却在大学阶段仍然出现基础性错误。这一现象的核心在于,当前教学未能有效解决“知”与“用”之间的断裂。学生虽然通过显性学习掌握了关系从句的构成规则,但在实际产出时却仍然依赖简化策略。这种矛盾表明,单纯的规则讲解无法转化为语言能力,而单纯增加输入频率又难以改变已经固化的错误模式。更关键的是,我们的教学环境缺乏母语习得中的两个关键要素:真实交际需求和充分的容错空间。面对这一困境,我们需要构建一个“诊断-解构-重构”的三维教学框架。首先,通过系统错误分析诊断学生的具体困难点;其次,针对性地解构固化错误背后的认知机制;最后,设计阶梯式重构任务帮助学生重建正确的形式-意义联结。例如,对于关系代词省略问题,可以设计“最小对比对”练习,让学生比较省略与保留关系代词时句意和语用的差异;对于主句不完整问题,可采用“句子完形+元认知反思”的方式,强化学生对句子结构的敏感性。

这一反思启示我们,在现阶段语法教学中,不仅需要超越形式与意义的二元对立,创设能够激发认知冲突的学习情境,还应为学生突破中介语发展的瓶颈献计献策。这要求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和教学的设计者,更要成为学习过程的诊断者和干预者,针对学生的实际困难设计精准的教学干预。

3 复杂句法教学策略和方法

复杂语法教学应秉持“意义优先”原则,同时辅以形式聚焦教学,特别强调将“注意”原则有机融入教学流程设计。

3.1 意义优先

关系从句类型分析指出了“使用”“输入”“语言经验”在复杂句法教学中的核心作用。这与后方法语法观一致,说明语法结构应看成意义与形式的映射,且意义优先,形式第二。这种观念在教学中的实施更可满足大学生对句子复杂度的需求。因此,在

复杂语法教学中应秉持意义优先原则。首先,我们要解放思想,大胆对学生进行复杂句法的教学,不必拘泥于结构复杂程度和学生英语水平。其次,意义优先,强化高频构式的输入与输出。针对学生需要的复杂句型,可设计情境化练习,基于使用巩固其语块化处理能力,同时引导拓展至其他语境,避免表达僵化。最后平衡输入多样性,通过对比分析主从句双重题关系(如非呈现型关系从句)与单命题构式的差异,帮助学生突破对“简单模板”的依赖,逐步提升复杂句法结构的产出意识并提高句式的复杂度。

为实现意义优先策略,建议在具体语法教学中,重视利用意义协商(negotiating for meaning)帮助学生理解其功能而非形式。意义协商指师生或生生之间对所学语法知识在意义层面的交流过程。这种意义层面的交流,意义的表达是最终目的。但是在出现形式错误时,交流过程会因为纠正反馈而被打断。此时所要表达的意义对于学习者是已知的,是清楚明晰的,而纠正后的句法形式则是新的,至此学习者完成旧的意义和新的形式的联系,完成意义与形式的映射。正如绍斌指出构式化的过程是一个由旧到新的过程。旧的形式表达新的意义或旧的意义用新的形式表达^[14]。例如,在任务中,教师首先示范描述目标句型,但不直接解释语法结构,而是通过提问引导学生关注意义,如“这句话的主干信息是什么?如果去掉从句,意思会缺失什么?”随后,让学生尝试模仿造句。这一过程可能会出现形式错误,但此时教师不要直接纠正语法,而是通过协商性提问使学生意识到错误,同时保持其对核心意义的关注。在意义协商过程中,学生为表达更精确的含义,会主动调整句式结构。教师可适时提供“脚手架”。经过几次意义协商循环,学生将最终产出正确结构。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在真实交流中自然习得复杂句法,而非机械记忆规则。只不过此类活动亦有缺点,往往交流越真实,语法点的凸显度越不够,如此便很难建立意义与形式的联系,而且对于关系从句这样句法难度较高的语法结构,学生在理解和产出时会遇到困难,因此除了使用为先、意义为重外,复杂句法教学还应辅以形式方面的指导。

3.2 形式聚焦教学

形式聚焦教学(Form-focused Instruction, FFI)不是以形式为中心,它仍是在以意义为中心的语言教学框架中,强调当学生在理解和产出方面遇到困难时,教师应将学生的注意力从语言意义转向语言形式的教学行为,可以有意为之也可偶然发生^[15]。现

如今,虽二语教学课堂鼓励开展以意义和使用为中心的交互活动,FFI 却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课堂互动活动中融入 FFI 能提升学习者的准确度,从而有效促进二语学习^[16]。目前,FFI 相关研究已不满足对形式教学类型的探讨,更多从外部因素探究 FFI 的开展。这些研究中,我们认为徐锦芬在 2020 年的研究对我们的教学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因为该研究直接指出适合复杂句法的 FFI 形式,即语言结构难度和教学时机对形式指导有影响:对复杂句法结构而言,任务前的 FFI 比另两个时段的教学在改错练习中表现好;对于简单语法结构,任务后的 FFI 在改错练习和限时语法判断题两个测试中表现均好于另外两个^[17]。

同时,根据 Hutton 和 Kidd 结构启动研究,多用低频率不规则性的结构,反而会有比高频率规则性结构更强的启动效应,这种启动效应可以减弱甚至消除目标句原本的加工不对称性,将较难结构的学习变得简单化^[18]。虽然这个研究主要是用来证明频率和语言经验对关系从句习得的作用,但是它也同时说明以意义为中心的句法教学中,在活动之初形式聚焦教学对学生最终建立形式与意义的映射是非常重要的,且重要性随着语言形式难度的增加要递增。这个研究的实际应用将对学生,尤其是水平不高的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Ranta(2002)就曾提出假设,语言水平较低的学习者可能更需要凸显形式来帮助他们认识到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联^[19]。所以,以上两个研究都说明了教师在设计有关复杂语法互动任务时,在任务前就对结构进行形式方面的解释是非常必要的。此外,Miles 对分散指导和集中指导在二语语法习得中的作用进行比较,发现分散指导优于集中指导^[20]。所以复杂语法教学中也应注意多采取分散指导。

结合以上研究成果和分析可知,对于我们的学生,复杂句法教学活动前的 FFI 好于活动中和活动后的教学;同时难度层级越大的句法结构,因其不规则性和低频率反而更容易引起学习者的注意,从而减少甚至抵消结构本身带来的加工难度。同时建议分散指导,从而巩固所学知识,帮助学生不断验证自行归纳的语法结构,从而形成稳固的意义与形式的映射。不过,无论是意义协商还是形式聚焦教学都只是教师努力从学生角度去探究他们的真实学情,学生是否准备好学习这一结构,是否在学习中注意这个结构,也很重要。没有学生自己的主观意愿,没有“注意”(awareness)参与,哪怕输入频率极高的简单句法(如定冠词和不定冠词),也不是轻而易举就

能实现意义与形式的映射的^{[21]197}。

3.3 全程“注意”

对关系从句的错误分析发现了英语水平较低学生在中介语发展中的瓶颈问题:无论是规则讲解还是基于使用,都无法改变部分学生在具有加工优势的主语关系从句中仍产生大量错误。“如果只从语言的形式与意义角度进行研究,语言结构的习得和偏误因素便无法得到充分解释与描述”,单纯的形意配对知识和图式模式还不能确保语言使用者产出合格的构式,还需要融合构式使用的内部环境和外部因素^[22]。其中外部因素就包括学习者因素。语言习得中的一些偏误因素,“只有从认知根源上挖掘学习者产生偏误的原因”^[23],才能得到解决。其实,从二语学习者角度来看,如果学习者现有中介语体系中没有该特征的表征,亦或是学习者母语中没有对等的特征,这一特征即使高频,也依然存在不被注意到的可能性^{[21]197}。由此可知,问题关键就是学生的“注意”。这里“注意”指学习者自身对所学内容的关注,它一方面来自于学习者个人的元认知知识,另一方面则是教师真正落实“以学习者为中心”,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应牢记学习者的“注意”因素。所以教师需重视学生句法元认知知识的培养,同时在教学设计中,时刻谨记提升学生的注意水平。元认知知识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的“注意”:首先是学生对所学语法在形式上的注意。在设计与语法相关的活动时,教师一般认为学习者会注意输入例子的具体语法特征,但是从外语学习者角度来看,中介语或母语体系中没有该特征的对等特征,不易被注意到。这就明确要求“形式聚焦教学”的出现,将学习者的注意引导到该语法特征上来。其次,是理解层面的注意,即学习者应具备形式和意义之间映射关系的元认知知识。在构式语法教学中,“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有关构块的知识,让学生了解构块的概念、分类以及其对促进语言习得的重要性……增强学生的构块意识”^[24]。这个层次的注意往往被忽视,学习者尤其是成年学习者发展出有意识的形意映射表征对语法学习更为有利^{[21]198}。所以,教师可以设计语言意识培养型任务,结合教材和构式使用情景,引导学生意识到学习这些构式的重要性,主观上树立积极的交际意图。第三层面是控制层面的注意,鼓励学生用刚学的知识去监管自己的句子产出,提高学生过程的参与性。例如,设计一些判断正误或填空任务,或让学生重新写一遍自己的交流任务,在老师和同伴帮助下合力完成转录任务。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学生建立起自身的句法构式知

识库。

可以说,全程“注意”是解决我们学生现实问题的突破口。无论是在活动设计之初、活动进行当中还是活动总结时,教师都应时时不忘学习者语法元认知知识的培养和“注意”的调动,只有这样,才能将固化的错误真正改正过来,且大幅提高复杂语法教学的有效性。

4 结论

本研究基于后方法理论提出的“调查式教师研究”范式,遵循“观察-反思-行动”的路径,致力于构建本土化教学知识体系。通过展开实证研究(观察)和教学反思,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后方法语法观指导下,本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包含意义优先、形式为辅和全程“注意”三个维度的复杂语法教学策略。该策略充分考虑了大学英语分层教学中中低水平学习者的认知特点,体现了因材施教、实事求是的教学原则,切实贯彻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后续研究将重点聚焦于教学实践的行动研究阶段,研究者将以双重身份(教师/研究者)深度介入教学实践,运用课堂观察、教学日志、行动研究等科学方法,对该复杂语法教学策略开展系统性反思与持续性优化,以期构建更具适应性的复杂语法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 [1] KUMARAVADIVELU B. The post-method condition: Emerging strategies for second/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J]. TESOL Quarterly, 1994(1): 27-48.
- [2] 武和平, 张维民. 后方法时代外语教学方法的重建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1, 31(6): 61-67.
- [3] 王晶, 武和平. 方法——后方法转型时期的对外汉语语法教学 [J]. 甘肃高师学报, 2021, 26(6): 50-54.
- [4] KUMARAVADIVELU B. Understanding Language Teaching: From Method to Postmethod [M].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6: 173.
- [5] SCHACHTER J. An error in error analysis [J]. Language Learning, 1974(24): 205-214.
- [6] GASS S. An investigation of syntactic transfer in adult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M] // SCARCELLA R, KRASHEN S, eds. 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Los Angele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Forum.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1980: 132-141.
- [7] DIESSEL H, TOMASELLO M.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ve clauses in spontaneous child speech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0(11): 131-151.

- [8] HAMILTON R. Is implicational generalization unidirectional and maximal? Evidence from relativization instruction in a second language[J]. *Language Learning*, 1994(44):123 – 157.
- [9] 贾光茂. 涌现论视角下英语关系从句的习得[J]. *现代外语*, 2014(1):85 – 95.
- [10] FITZ H, CHANG F, CHRISTIANSEN M. A Connectionist Account of the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of Relative Clauses[M]//KIDD E, eds. *The Acquisition of Relative Clauses: Processing, typology and Fun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1:39 – 60.
- [11] 房印杰. 关系代词取舍的多因素分析——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的对比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9(4):68 – 77, 148.
- [12] MELLOW J D. The emergence of second language syntax: A case study of the acquisition of relative clauses[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6(27):645 – 670.
- [13] 胡靓. 语言使用观与大学英语学习者关系从句习得[J]. *海外英语*, 2023(18):50 – 52.
- [14] 邵斌. 构式视角下英汉浮现词缀的形成与变异探究[J]. *外语教学*, 2021, 42(4):8 – 13.
- [15] SPADA N. Form-focused instruc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review of classroom and laboratory research[J]. *Language Teaching*, 1997, 30(2):73 – 87.
- [16] Lyster R.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rompts and recasts in form – focused instruction[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4(26):399 – 432.
- [17] XU Jing – fen, LI Chang-ying. The effects of the timing of form – focused instruction on EFL learners’ learning of difficult and easy grammatical features: A comparative study[J]. *System*, 2021, 101:1 – 12.
- [18] HUTTON J, KIDD E. Structural priming in comprehension of relative clause sentences[M]//KIDD E, ed. *The Acquisition of Relative Clauses: Processing, Typology and fun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1:227 – 242.
- [19] 徐锦芬, 李昶颖. 形式聚焦教学时机对不同英语水平学习者语法习得的效果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0(2):50 – 56.
- [20] MILES S W. Spaced vs. massed distribution instruction for L2 grammar learning[J]. *System*, 2014, 42:412 – 428.
- [21] BATSTONE R, ELLIS R. Principled grammar teaching[J]. *System: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2009, 37(2):194 – 204.
- [22] 牛保义, 牛儒雅. 构式语法的国际前沿与发展趋势[J]. *现代外语*. 2025, 48(2):273 – 283.
- [23] 张会平. “基于用法的”二语习得研究回眸与前瞻[J]. *外语学刊*, 2023(2):80 – 87.
- [24] 李霓, 罗生全. 构式语法应用于外语教学的理念、原则和方法[J]. *外国语文*, 2024, 40(6):155 – 164.

新闻快报:

内容更加贴近产业需求,同时对参赛学生的综合技术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撰稿:罗少轩、刘斯文;编辑:毛星懿;审核:王艳春、黄灿)

新工科背景下交通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以安徽建筑大学为例

黄坤*, 张宁, 石贤增, 黄凯

(安徽建筑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传统实践教学存在资源配置失衡、产教融合欠深、学科壁垒显著等问题,难以满足交通行业对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以安徽建筑大学为例,研究交通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在新工科背景下的改革需求,提出重构“创新链-产业链”耦合实践教学体系,将企业真实案例与前沿技术通过三级进阶培养体系进行整合,构建虚实联动的新兴技术实验平台教学模式,建立课程动态调整机制,促进学科融合,实施人才培养的多维评价。研究将为土建类高校交通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新工科;交通工程;实践教学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4-0086-06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raffic Engineering Specialty under the New Engineering: Taking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HUANG Kun*, ZHANG Ning, SHI Xianzeng, HUANG Kai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nhui)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practical teaching faces several challenges, including unbalanced resource allocation,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significant disciplinary barrier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for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Taking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it studied the reform needs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traffic engineering special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ngineering. In this paper, it proposed to reconstruct the coupling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innovation chain-industry chain” integrate the real cases of enterprises and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through the three-level advanced training system, construct the teaching mode of emerging technology experimental platform with virtual and real linkage, establish the dynamic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curriculum,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and implement the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It will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al teaching reform of traffic engineering specialty in civil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Key words: New Engineering; traffic engineering;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新工科理念源于对传统工科教育模式的反思与应对,目的在于培养适应新时代科技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复合型、创新型工程人才^[1],以适应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双重挑战。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网等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工程学科的知识体系和技术手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传统的工科教育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基础理论和实践能力,难以满足现代产业对工程技术人才的要求^[2]。

收稿日期:2025-03-11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项目(2023jyxm1281, 2023jyxm1280);安徽建筑大学校级质量工程项目(2022kcsz06)。

作者简介:黄坤(1994-),男,安徽宿州人,讲师,博士。E-mail:kunhuangah@126.com

在交通工程领域,智能交通系统、车联网及自动驾驶等技术的深度应用,推动学科边界不断向信息科学、能源工程等领域拓展。当前交通系统已演变为物理设施、数字空间与能源网络的三元耦合体,这对专业教育提出更高要求。交通工程专业传统教学注重基础理论和单一技术应用的传授,忽视了对学生创新思维、跨学科协作能力的培养,不符合新时代的教育理念^[3]。实践教学环节仍局限于交通调查、信号配时等传统内容,缺乏对大数据、人工智能、车路协同等前沿技术的实验实训支撑,导致学生跨学科知识迁移能力难以培养。

在此背景下,交通工程专业教育急需构建“技术-系统-生态”三位一体的新型培养体系。通过重构实践教学体系,将传统交通工程与大数据分析、智能化控制、系统集成等新兴技术有机融合,破解学科交叉融合壁垒,有效提升学生在复杂工程场景中的系统决策能力。这一转变对于实现人才培养与智慧城市、低碳交通等国家战略需求的无缝对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交通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痛点分析

在新工科理念指导下,单纯的实验、实训和实习无法满足行业对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需求^[4]。基于安徽省内8所高校的调研及32家企业的反馈,传统实践教学存在以下核心问题:

教学资源分配存在结构失衡:高质量的实践教学需要大量的设备、场地和资金支持,但许多高校硬件设施与场地建设投入不足,且受区域经济差异制约,实践基地覆盖率与质量参差不齐,导致学生难以接触行业前沿技术装备。根据实验室年度报告,实验室设备更新率不足30%,智能交通设备覆盖率仅为40%。调研安徽省内高校发现,普遍存在优质教学资源匮乏现象。

教学体系与产业需求存在代际断层:传统实践体系仍沿用以土木工程为核心的单学科架构,依托课程设计、实验实训等环节培养基础技能,缺乏智能交通、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模块的有机融入。课程体系中智能交通技术模块占比不足25%。

产学研协同存在机制障碍:多数高校产学研处于起步阶段,校企合作多停留于认识实习、知识讲座等浅层互动,缺乏技术共研、人才共育的深度协同机制。调研数据显示,仅有20%左右的企业实质性参

与高校课程开发,合作项目周期普遍不足6个月,难以形成持续的技术反哺效应。

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存在学科壁垒:智能交通系统对学生的“交通+信息+能源”跨学科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但现有课程体系仍以道路设计、交通规划等传统内容为主,智能算法开发、多源数据融合等跨学科实践环节占比不足30%。校企合作项目平均周期4.2个月,技术反哺率低于15%,企业参与课程开发的比例不足20%。

2 实践教学改革的“范式重构”

2.1 “范式重构”的内涵

“范式重构”指在新工科理念指导下,对传统实践教学体系进行系统性、根本性变革,变革涵盖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法、评价机制等维度。本研究构建的“范式重构”体系包含四个核心维度(见图1),各维度之间形成“目标引领-内容支撑-方法创新-评价反馈”的闭环机制。

目标重构:确立“三维能力矩阵”培养目标;

内容重构:建立“技术-系统-生态”三级知识体系;

方法重构:创新“虚实联动”教学范式;

评价重构:实施OBE导向的动态多维评估。



图1 实践教学范式重构维度模型

2.2 培养目标体系

基于新工科人才培养要求,构建“三维能力矩阵”培养目标体系(见表1),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实现知识传授重构,通过虚实联动教学实现能力转化,最终达成战略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

表 1 “三维能力矩阵”培养目标体系

顶层目标	国家战略适配能力	服务智慧城市、碳中和等国家战略需求	动态调整机制、产业链协同
中层目标	跨学科复合能力	掌握“交通 + 信息 + 能源”三元知识体系	课程模块重组、虚拟仿真训练
底层目标	工程实践创新能力	具备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	三级进阶培养、真实项目实战

根据安徽建筑大学专业特色提出以下目标：

数字素养: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培养体系,开发《交通信息管理与控制》等 5 门融入新兴技术的金课。与安徽省交控集团合作,引入合肥城市交通数据集,要求学生掌握从数据清洗到分布式计算的全流程技能。搭建 AI 辅助学习系统,引入数据大模型,部署智能教学助手,实时解答交通仿真参数设置、强化学习算法选择等问题,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得以解决的时间大大缩短。

系统思维:实施复杂工程场景模拟,开发智慧城市交通模拟系统,集成交通流、能源消耗等多维度仿真模块。利用虚拟仿真平台,开展交通流分析、道路设计、交通管理等方面的模拟实践,帮助学生在没有实际操作的情况下,能够进行情境化的学习和实践,培养多目标优化能力。

创新能力:设计新技术开发训练体系,构建“感知-决策-控制”完整技术链,在虚拟仿真平台中,学生需完成 100 小时以上的算法调试。实施故障注入教学法,在交通控制实验中,人为设置通信延迟、传感器失效等多类型故障场景,培养学生异常工况处置能力。

跨学科协作:开展跨学科课程设计,设置跨学科选修课程,如开设交通数据分析、智能交通系统、人工智能在交通中的应用等课程,帮助学生掌握交通工程领域外的学科基础理论与方法^[5]。开展跨学科项目制学习模式,成立“交通+计算机+能源”校企合作导师组,实施双导师制,如结合交通工程、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领域知识,开展数据驱动的交通

通流预测、交通信号控制优化等项目。鼓励学生与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等专业的学生开展跨学科项目合作,开阔学生视野,培养其跨领域协作和创新能力。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在实践教学中融入创新创业元素,依托大创项目与创新创业学科竞赛,鼓励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进行科技创新,并拓展到实际的交通项目或交通企业的创办中。

2.3 内容重构:构建“三维耦合”知识体系

内容重构聚焦教育供给侧改革,通过“学科交叉融合、课程模块重组、技术迭代更新”三维耦合实现课程知识体系重构(见表 2)。具体措施包括:

学科交叉融合:增设《交通大数据分析》《车路协同技术》等跨学科课程;

课程模块重组:构建“基础模块+智能模块+创新模块”三级课程体系(见图 2);

技术迭代更新:引入数字孪生、车路协同等前沿技术实验模块。



图 2 跨学科能力培养模型

表 2 内容重构实施框架

维度	实施路径	技术支持
学科交叉融合	开发跨学科课程群	云计算平台、数字孪生技术
课程模块重组	构建三级课程体系	教学管理系统、学习分析技术
技术迭代更新	更新实验实训模块	虚拟仿真平台、AI 辅助系统

通过动态调整机制,近三年安徽建筑大学新增智能交通类课程 8 门,淘汰落后课程 5 门。例如,《交通信息管理与控制》课程引入安徽省交控集团实时交通数据集,学生需完成从数据清洗到分布式

计算的完整流程训练。

2.4 方法重构:创新“虚实联动”教学范式

依托“三实三虚”教学平台(见表 3),构建“基础仿真训练-系统集成实践-真实项目攻坚”三层

递进式实践体系:

实体平台网络化:建成 2000 平方米的校内综合实验中心;

虚拟平台深度化:开发交通流仿真、VR 事故再现等 12 个虚拟仿真实验;

移动实验平台化:引入无人车、移动基站等移动实验装置。

2.5 评价重构:OBD 导向的动态多维评估

建立“二维评价体系”(见表 4),实现学习成果评价“与“人才培养效能评估”的双轨制:

学习成果评价:采用“三维能力矩阵”进一步量化指标;

效能评估:构建“过程-社会-发展”三级监测体系。

表 3 “三实三虚”教学平台建设

平台类型	建设内容	功能定位
实体平台	综合实验中心	系统集成实践
虚拟平台	VISSIM 仿真系统	基础技能训练
移动平台	无人驾驶实训车	真实场景应用

表 4 OBE 评价体系框架

评价维度	评价内容	评价方式
学习成果	数字素养/系统思维等四种维度	课程报告+企业认证
培养效能	过程监测/社会反馈等三层面	大数据分析+第三方评估

2.5.1 学习成果评价

采用“三维能力矩阵”评价模型(见表 5),量化

评估学生在数字素养、系统思维、创新能力、跨学科协作四个维度的学习效果的达成度。

表 5 学习成果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项	达成标准	评价方式
数字素养	数据全流程处理能力	掌握 Python 等工具,完成分布式计算项目	课程实验报告+企业认证
系统思维	多目标优化建模能力	构建交通流-能源消耗-环境影响仿真模型	课程设计答辩+仿真报告
创新能力	技术攻关能力	完成自动驾驶感知算法调试或车路协同通信优化	专利授权+论文发表
跨学科协作	团队协作能力	跨专业组队完成创新创业项目	团队互评+企业反馈

2.5.2 人才培养效能评估

从培养过程、社会反馈、持续改进三个层面评估人才培养体系效能。过程性监测:跟踪课程目标达成度、实验实训参与率、校企合作项目完成度等过程指标;社会性监测:统计就业率、考研率、企业满意度、竞赛获奖率等终端产出指标;发展性监测:开展

校友职业发展追踪,建立行业需求与培养方案的动态适配机制;适应性监测: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岗位能力需求变化趋势,预测未来 5 年人才能力缺口。

2.5.3 持续改进机制

建立“评价-反馈-改进”机制,如表 6 所示。

表 6 学习成果评价指标体系

阶段	输入	输出	周期
数据采集	企业调研、校友反馈、第三方评估	能力需求矩阵	每学年
诊断分析	课程目标达成度、毕业要求达成度	改进优先级清单	每学期
方案制定	教学大纲修订、实验平台升级计划	实施路线图	每季度
效果验证	新生入学水平测试、中期教学检查	改进成效报告	每年度

开展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教学达成情况评价分析,建立毕业生能力跟踪调查评价机制,引入第三方开展常态化校友发展调查,通过大数据分析岗位能力需求变化,据此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毕业要求,调整课程设置,优化实践教学环节,更新

实验实训教学模块。建立学生反馈机制,收集学生在实践教学中的问题和意见,及时调整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建立行业评估机制,邀请交通行业专家参与教学评估,确保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前沿性和实用性,确保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达成。建立科学有

效的评估与反馈机制是确保教学改革得到落实的重要手段,由此对实践教学进行定期评估,及时发现并解决教学过程中的问题,不断优化实践教学方案^[6]。

3 实践教学改革路径设计

基于“三维能力矩阵”培养目标和“虚实联动”教学范式,构建“目标-内容-方法-评价”四维协同的改革路径,实现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施的闭环管理。

3.1 技术路线

基于系统理论、协同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课程思政、新工科以及行业发展的要求,建设专业教师队伍,打造工程训练教育平台,促进课堂教学模式改革,优化创新能力培养模式,建立跨学科建设体系,采用综合评价方式,助力交通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构建“目标-内容-方法-评价”四维协同的实施路径(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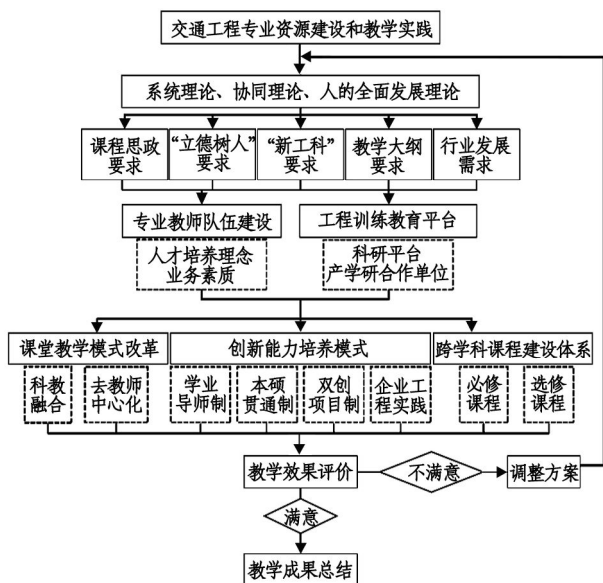


图3 技术路线

实现范式重构的闭环管理:

目标驱动:以“三维能力矩阵”明确培养方向;

内容支撑:依托“技术-系统-生态”知识体系实施教学;

方法创新:运用“虚实联动”模式提升能力;

评价反馈:借助 OBE 模型持续改进培养方案。

3.2 具体实施路径

3.2.1 优化实践教学体系

为满足新工科发展对交通行业创新型人才需求,优化人才培养目标,构建由通识教育、大类学科专业基础、专业与专业方向、实践教学、素质拓展与

创新课程平台组成的课程体系,各课程平台占总学分比例如表7所示。

表7 各课程平台占总学分比例统计

课程平台	课程性质	学分/分	占比/%
通识教育	必修	24.5	14.00
	选修	8.0	4.57
大类学科专业基础	必修	24.5	14.00
	选修	20.5	11.71
专业与专业方向	必修	40.75	23.29
	选修	20.5	11.71
实践教学	必修	45.0	25.71
素质拓展与创新	必修	9.75	6.72
	选修	2.0	

针对学科特性,形成以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为主体的教学体系基本架构,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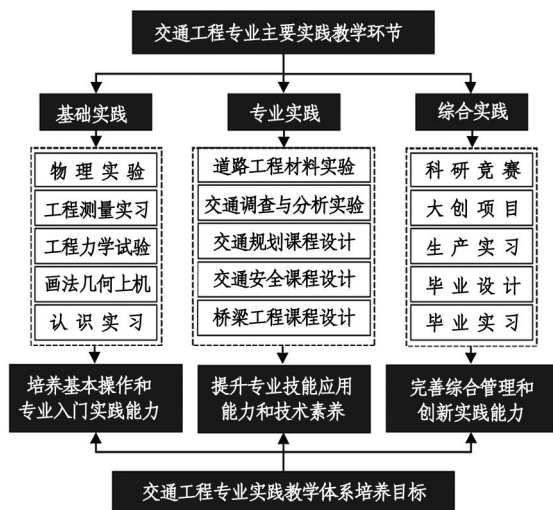


图4 交通专业主要实践教学环节与培养目标

强化基础课程的实践性,在其中融入更多的案例分析、数据分析、实地调研等实践性环节。设计模块化实践项目,将实践内容分解成若干个模块,包括从简单的交通流量观测到复杂的交通组织设计与优化等,循序渐进,逐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7]。

3.2.2 实体平台网络化布局

打造区域协同实践基地群,与安徽交控、海康威视等企业共建多个区域性实践基地,形成“省会核心节点+地市卫星节点”的网格化布局。通过远程共享设备系统,开展共享实验教学。共建高水平实验室,依托学院9个省部级科研平台,建设校内综合实验中心。与智能交通安徽省重点实验室、交通安全与智能交通技术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合肥创新院

智能交通联合实验室等开展合作,高年级学生参与实际项目。与智能电动车企洽谈,推进移动实验平台建设。未来可开展智慧交通实验实训,解决实践教学“最后一公里”问题。

3.2.3 虚拟平台深度应用

引入交通仿真软件,将 VISSIM、TransCAD、Aim-sun 等先进的交通仿真工具融入到课程和实验教学中,通过仿真平台,学生模拟和优化交通流、设计交通组织方案,进行虚拟测试^[8]。引入智能交通系统仿真,利用智能交通技术对交通状况进行实时监控、预测及调度。学生在仿真环境中进行操作,提升对现代交通管理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深化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结合,使用 VR 技术让学生参与到虚拟的交通工程建设现场,模拟交通管理与控制的操作,练习各种场景下的判断与决策。

3.2.4 国际平台能力拓展

与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美国伊利诺依理工学院等开展合作,拓展国际化实践平台,鼓励学生参与国际交流项目,通过与国外高校和企业的合作,了解全球交通工程的发展趋势,培养全球视野,实现“项目驱动+双导师制”培养模式。通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习和调研,学生得以加深对不同交通系统和管理模式差异的理解。

4 改革成效与数据分析

安徽建筑大学立足安徽省交通运输发展全局,服务新时代交通强国发展战略,对接新工科背景下交通行业人才发展需求,开展实践教学改革,重构实践教学范式,破解传统实践教学面临的困境,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工程创新能力。

4.1 产学研协同增效

通过三级进阶培养体系(见图5),实现教学与产业深度协同。依托虚拟仿真平台,完成交通流分析等基础训练;引入企业真实案例,学生参与算法优化与实车测试;校企联合孵化项目,成果直接接入产业平台。构建“创新链-产业链”耦合实践教学体系,形成“企业命题-师生解题-成果转化”的教学流程。例如,与蔚来汽车合作开展自动驾驶感知模块调试项目,提升了学生的技术方案产业适配度,促进了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此外,与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共同开发了交通枢纽仿真系统,已完成多个重大交通枢纽的客流仿真优化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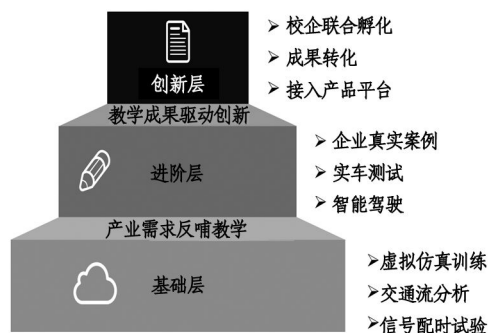


图5 “创新链-产业链”三级进阶培养体系

4.2 学生能力提升

实践教学改革实施以来,交通工程专业学生在国内外各类学科竞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例如,在“一带一路”国际大学生数字建筑设计竞赛中获得数字化结构设计组一等奖,学生应邀在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青年学者论坛做专题汇报;学生作品《一种“以柔化刚”装配式桥墩防撞装置及其设计方法》成功入选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年会。此外,学院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智能交通创新与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交通运输科技大赛等知名赛事,并在多个项目中获奖。实践教学改革的深入实施,增强了交通工程专业学生的就业和升学竞争力。通过与企业合作开展的实践项目和实习实训,提升毕业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平均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近五年来,专业考研录取率接近40%,录取高校包括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知名院校。

5 结论

在新工科理念引领下,安徽建筑大学交通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取得较好成效,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与课题,如,在新工科背景下如何应对快速变化的技术需求,持续更新实践教学内容与方法;如何进一步拓宽拓深校企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如何优化实践教学评价体系,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如何扩大国际交流合作,增强交通行业人才国际竞争力等。这些问题需要高校、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与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许荣盛,杨硕,韦璐,等. 新工科背景下交通工程专业“多维协同”育人模式研究[J]. 科技风, 2024(22): 147-149.

辅导员工作视角下的高校美育与思政融合创新

许卓佳^{1*}, 翟天然²

(1. 蚌埠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2. 蚌埠学院 团委,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立足高校辅导员工作实践,结合当代学生成长需求与教育政策导向,从育人导向、文化浸润、课程机制、媒介创新等角度探讨融合育人的现实逻辑与实践方式。在分析美育与思政教育内在关联的基础上,提出价值整合、柔性渐进、载体延展、媒介创新的管理路径,强调“以美为媒”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共鸣与价值内化,实现以文育人、以美启智、以思塑魂。研究认为,美育与思政的协同育人模式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与道德认知,更能够在“润物无声”中推进学生的自我认同与人格塑造,促进管理模式由规范治理向文化引领的深刻转型。

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审美教育;辅导员;育人机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4-0092-05

Innov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nselors

XU Zhuojia^{1*}, ZHAI Tianran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2. Committee of Communist Youth League,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Grounded in the practical work of university counselors and aligned with contemporary students' developmental needs and current educational policy orientations, it explored the practical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ducational orientation, cultural immersion, curricular mechanisms, and media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put forward the management path of value integration, flexible gradual progress, carrier extension and media innovation, and emphasized that “taking beauty as the medium” can realize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value internaliz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realize educating people with literature, enlightening wisdom with beauty and shaping the soul with thinking. The study argued that the synergistic model of aesthetic and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not only enhances students' aesthetic literacy and moral cognition, but also promotes their self-identity and character development in a subtle and nurturing manner. Ultimately, it will contribute to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student management practices from regulation-based governance to culture-oriented leadership.

Key words: university student manage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counselor; educational mechanism

收稿日期:2025-05-02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蚌埠学院2023年质量工程项目“应用型高校非艺术专业大学生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的培育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023jyxm33);安徽省2024年质量工程项目“应用型高校非艺术专业学生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创新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2024jyxm0475)

作者简介:许卓佳(1996-),女,安徽蚌埠人,助教,硕士。E-mail:893426591@qq.com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的推进,高等教育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学生管理作为高校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从传统“事务管理型”向“价值引导型”“文化育人型”转型。特别是在新一轮教育改革背景下,党的教育方针强调“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明确提出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学生成长全过程,而美育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支撑性维度^[1]。辅导员作为联系学生最紧密、掌握学生思想动态最及时的角色,是推进思政教育与美育融合的中坚力量。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育人模式割裂、教育资源分散、内容形式单一等问题。因此,系统探究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管理中的融合路径,既是教育理论的深化探索,也是教育实践的创新尝试,对于推动高校“三全育人”机制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新时代的高校育人体系以“五育并举”为基础,强调德、智、体、美、劳五大素养的协调发展,旨在塑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2]。坚持“五育并举”,将美育与德育同等对待,以保障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与价值观塑造。“三全育人”理念进一步强调“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系统性与协同性,要求在高校治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中,形成覆盖全员教职工、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育人各环节的工作格局,这被视为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路径之一。

本研究试图在理论层面丰富全程化管理与协同育人理论的交叉应用,提出辅导员主导的美育思政融合路径,为“五育并举”与“三全育人”的政策落实提供新的实践样本;在实践层面,为应用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提供更丰富的思考。

1 美育与思政融合育人的理论进展

从理论基础来看,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具有深厚的哲学依据和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重要理论框架。马克思强调人的类特性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而美育通过培养学生对“真、善、美”的感受能力,可以激发其内在的思想觉悟,推动个性自由发展^[3]。美育的感性特征在情感体验和审美教育中发挥作用,这种情感感染力正好弥补了思想政治教育中常见的说教性和单向性。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美育纳入文化自信与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美育对塑造学生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并明确提出美育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时代特点发挥以美育人、以文化

人的教育功能。这一政策导向使得美育从传统的艺术教育拓展到文化教育、德育等更广阔的领域,为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辅导员全程化管理”是指辅导员在学生从入学到离校的全过程中,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与教育活动,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学习成长、心理健康、生活指导等方面进行系统化干预和服务^[4]。实践中只有将管理与教育无缝衔接,辅导员才能真正实现对学生成长的全程跟踪与精准扶持。在全程化管理框架中,辅导员被赋予“组织者、引导者、促进者、服务者”四重身份,既要承担占领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的职责,又要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知心朋友^[5]。这四重角色相辅相成,要求辅导员具备跨领域协调与多元情境应对的能力。

自20世纪80年代高校辅导员制度确立以来,其管理模式经历了“恢复-完善-创新”三个阶段。2006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首次提出辅导员应贯彻“全程育人”要求,为后续全程化管理提供了制度依据^[6]。高校陆续出台细化措施,如制定学生手册、辅导员工作手册等,使辅导员全程化管理更加具体可操作。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强调,实践中的“手册化”管理需要与高校实际需求相结合,以避免流于形式。近年来,伴随“三全育人”“五育并举”战略的推进,高校进一步强化辅导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职责,提出要将美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融入全程化管理全过程中^[7]。此举为辅导员管理模式的跨界融合提供了新契机,也提出了更高的实践要求。从协同育人视角看,美育与思政教育在目标和方法上具备内在契合:美育通过审美体验陶冶情操,思政教育通过价值引领塑造品格,两者共同促进学生人格完善和价值认同^[8]。本研究认为,必须在理念上彻底打破“二元分割”,才能真正实现二者的深度协同。“三全育人”即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系统性工程。全员育人要求各学科教师、辅导员及后勤服务人员共同参与学生培养;全程育人则指覆盖从新生入学到毕业离校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强调课堂内外、校内外的多元育人载体协同作用。“五育并举”强调德智体美劳协调发展,将美育摆在与德育同等重要的位置,倡导在学校教育中构建“学科美育”“社会美育”“网络美育”三张网,共同织就育人体系^[9]。

2 高校美育与思政融合的现状及其不足

当代大学生思想上普遍具有“价值多元、信息碎片、表达悦己”的显著特征,这种变化对传统单向

灌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构成挑战。此时,美育所倡导的形象化表达、情感性传达与审美性共鸣便成为打破壁垒的关键契合点。

2.1 融合现状:价值整合驱动与长效机制缺失

尽管当下相关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亟待深入探索。一方面,当前关于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仍显薄弱,尤其是对二者在教育理念、实践路径和文化内涵上的深层次机制分析不足。现有研究更多停留在宏观探讨层面,缺乏具体的理论模型和实践评估体系,这使得研究成果难以有效指导实际工作。另一方面,在实践路径方面,高校普遍缺乏系统性和长效机制。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实践往往依赖于单一活动或短期项目,而缺乏长期可持续的课程设计和制度保障。此外,部分高校在推进融合过程中过于侧重理论知识传授,而忽视了培养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导致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如何在教育内容和形式上更好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和多样化兴趣,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2.2 枢纽挑战:辅导员在融合中的困境

辅导员作为承接学校宏观政策与学生个体成长的“枢纽”,凭借“管思想、管学习、管生活”三位一体的职责定位,理论上应具备开展全程化、精细化育人的资源与优势。在实践中,辅导员往往面临如下困境:一是“介入深度不足”,在学生各阶段的美育资源调配依然停留在零散活动阶段,缺乏与思政教育同频并行的课程体系和阶段性指标,难以形成持续闭环和长效跟踪,学生对美育体验的认知整体性与持续性欠缺;二是“融合路径单一”,美育多被视为艺术类专业的“选修”或课余拓展内容,非艺术专业学生审美素养培养被边缘化,课堂教学与思政课程难以形成互补,在教育过程中有机地将审美体验与价值引领相结合落地难;三是“引导效果有限”,辅导员在日常管理中缺少围绕“审美经验-情感共鸣-价值认同”完整心理路径的系统设计、师生互动与后续反馈机制也尚未成熟;此外,辅导员自身对美育理念与方法掌握不足,加之对美育与思政融合成效缺乏量化指标和动态评估,进一步削弱了其在资源整合、方案创新与持续推进上的执行力和信心。

3 实践路径:基于辅导员工作的协同创新

辅导员在此体系中应发挥桥梁作用,链接各美育渠道,实现资源统筹,将“三全育人”与“五育并举”有机结合,需在顶层设计上形成协同性、在人才培养方案中体现多元化,在实践中注重跨部门合作

与评价体系创新。据此提出,辅导员可依托“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建立“多元主体-全程覆盖-多维评估”的协同育人机制,以推动美育思政融合的常态化与制度化。

3.1 育人导向:价值整合显方向

在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引领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正经历从“事务驱动”向“价值引领”的深刻转型。其中,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不仅是育人理念的内在整合,更是构建多元统一教育生态的重要路径^[10]。教育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增强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凸显了美育在育人体系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这不仅关注了学生的审美修养与艺术感知能力,更在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人格标准和行为规范,真正实现了文化滋养下的精神培育。而思政教育作为价值观塑造的主阵地,近年来也日益呈现出“人文化”与“审美化”趋势。二者在目标指向、育人逻辑与实现路径上高度契合,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辅导员作为落实育人任务的“第一线执行者”,不仅承担着学生思想引领和行为规范的重要职责,也在“日常琐事”中完成“价值灌注”。因此,辅导员应主动提升自身“文化判断力”与“审美领导力”,强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审美观念及学生审美心理的理解与把握。尤其要认识到:审美不仅是一种艺术能力,更是一种精神能量和思想资源,具有深刻的价值引导功能。在育人过程中,审美可成为柔性而有力的教育话语,转化为打动学生、感染学生、引导学生的独特路径,实现思政教育从“传递”到“唤醒”的跃迁。在具体管理实践中,融合的有效性还依赖于对学生认知心理与情感结构的深刻洞察。

3.2 文化浸润:柔性渐进育心灵

辅导员在学生日常管理实践中,应突破传统的“事务式管理”范式,积极营造具有育人功能的班级文化空间,使学生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不断接受文化滋养,从而实现文化对心理情绪的调节和对价值观念的塑造。在实践层面,将传统节庆、非遗体验、古典艺术鉴赏等元素融入学生工作,这些工作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它们既满足了学生日益增强的文化自觉与审美期待,又构建起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桥梁。通过文化引导,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不仅理解历史与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也在精神层面形成积极的人际观、历史观与文化归属感。更为重要的是,美育活动的教育成效并不止步于“形式

参与”,并且通过“文化反馈机制”予以深化。辅导员应在活动结束后设计“审美日记”“观后感写作”或“主题演讲”等延续性任务,引导学生对活动体验进行再加工、再表达,使审美体验由感性走向理性,由外显参与转为内化认同。同时,班级内的视觉装置创作,也是辅导员激发学生主动构建美好空间意识、提升自我管理能力的抓手,学生在共同创作与审美评比中,领会自我表达与自我规范,增强集体归属与文化认同,实现从“文化参与者”向“文化建构者”的身份转化。

不可忽视的是,美育还可以成为学生心理调适与情绪疏导的有效补充路径^[11]。在当前大学生群体中,心理压力来源呈现多元化趋势,如学业压力、人际困扰、就业焦虑等问题普遍存在,而传统的心理干预手段往往因其“工具化”“标签化”特征而难以为学生普遍接受。在此背景下,将美育引入心理干预体系,作为一种“非标签式”的柔性手段,能够实现情感释放、压力纾解与心理健康建构的有机统一。辅导员可通过“色彩心理工作坊”“音乐放松体验课”“戏剧性角色扮演”等美育实践,通过色彩绘画表达内心冲突、通过音乐感知调节情绪、通过角色转换模拟压力情境,帮助学生在艺术氛围中实现“无声化心理疗愈”。这种“文化先行-情绪表达-心理疗愈-行为规范”^[12]的管理逻辑,不仅契合学生的心理接受特点,也体现了尊重个体差异与发展规律的教育伦理。进一步讲,辅导员应将这些美育手段制度化纳入到学生成长支持体系中,跟踪记录学生在美育活动中的参与情况、情绪波动与心理表现,为后续的管理与心理干预提供数据支撑。探索将美育参与情况与学生素质测评、班级综合评估进行有机结合,引导学生在主动参与中理解“美”与“德”的关系,将审美行为上升为自律实践,将艺术体验转化为人格养成。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实现美育的深层功能,使其从装饰性的文化活动走向战略性的育人机制,成为学生全面发展、心理健康与道德建构的重要支撑力量。

3.3 课程共融:载体延展强机制

高校课程是传递知识的主阵地,更是培育信仰与审美的主渠道。思政教育课程若要真正“走心”,必须“走美”;美育课程要“有魂”,就必须“思政”。在高校课程体系中,应进一步推动“课程思政”的全覆盖,使所有课程都成为传递正面价值、唤醒高尚情感、提升审美趣味的通道。此外,辅导员应积极参与推动“课堂+实践”一体化教学机制的建设。在艺术类社团活动中,引导学生在高校美术展、摄影

展、舞台剧中融入对民族命运、时代精神、个人成长的表达,形成“以课程为基,以活动为径,以管理为桥”的多维度课程生态。机制层面,则应强化组织设计与制度保障。当前已有高校将“思政+美育”设立专项激励项目,并将学生参与度、影响力、创造性等指标纳入德育综合测评体系。辅导员在参与中应注重项目管理意识,熟悉申报流程与评估标准,从“活动执行者”向“机制建设者”转变。同时,充分与教务处、团委等育人关键部门沟通协同,使美育与思政不再各自为战,而是在其指导下形成“任务协同、资源共建、责任共担”的协作机制,为学生提供更具统筹性与连贯性的教育资源平台。

3.4 技艺联动:媒介创新型品行

在新媒体高度嵌入学生日常生活的时代背景下,美育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已不再局限于传统课堂与线下活动,而应主动融入数字媒介空间,拓展学生价值认同与审美表达的新场域。互联网不仅重构了信息传播方式,也改变了大学生接受思政内容的路径与期待方式,使得教育者必须在“场景-媒介-价值”的链条中重新审视育人策略。辅导员作为一线学生工作的操盘者,理应具备“数字治理+文化领导”的复合能力,既能敏锐捕捉学生的表达语境,也能借助媒介手段开展精准化育人。具体而言,辅导员可主动策划线上主题活动,将价值引导与艺术表现相融合,鼓励学生围绕国家发展、民族精神弘扬、校园生活开展等主题进行内容创作,并结合配乐、美术、剪辑等视觉艺术形式,增强传播力和感染力。也可借助新媒体平台设立“美育·思政”联合账号,发布以“微演讲+视觉叙事”为核心的视频内容,实现“圈层传播-情感共鸣-价值唤醒”的逐步推进,以新型传播方式打破信息接受的单向性,构建起一种“共创式”的育人互动格局,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贴近性与共情性。在平台构建方面,辅导员也应积极寻求所属单位的支持,打造“思政云馆”“美育云展”等数字化平台,通过VR校园红色教育路线、AI人物对话系统、线上主题展览等沉浸式体验,让学生在参与式观展中理解国家叙事,在互动中生成审美感受,使学生在审美接受中完成“艺术-历史-价值”的有效连接。

当然,媒介的技术中性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是网络空间中存在价值失焦、审美娱乐化、信息泡沫等现象,容易冲淡思政教育的核心目标;二是辅导员在工作中难免存在“工具焦虑”与“内容贫乏”的困境,难以在媒体平台上真正实现教育性输出。因此,必须坚持“价值引领优先、技术服务育人”的根本原

则。主动提升数字素养与内容策划能力,加强媒介表达中的思政元素融入,确保输出内容具有正确导向与审美品位,进而打造“思想有温度、艺术有高度、传播有热度”的数字内容生态。在评估体系方面,也应建立与之配套的反馈机制。可以借助数据分析工具,评估参与意愿和评论倾向,形成数据化的价值接受评估报告,为下一步媒介育人策略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空间,是学生思想成长、审美训练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场所。高校辅导员应主动引导学生在媒介平台上“做出价值、传递美感、表达观点”,真正使媒介技术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和审美教育的强大助推力。在“信息超载”的数字时代,以“内容定向、形式创新、机制保障”为原则推进技艺联动的融合育人,正是高校美育与思政教育融合发展的突破口。

4 结论

学生管理不是孤立的“行政”行为,而是一项融思想塑造、文化涵养与审美熏陶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将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于高校学生管理,不仅能够提升教育的温度与厚度,也能够强化学生的文化认同与价值信仰。而在学生管理中实现美育与思政的深度融合,不仅是教育理念的转型与教育路径的优化,更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选择。在这一过程中,辅导员要发挥多重角色优势,在管理机制中主动植入美育元素,在教育内容中注重价值升华,在组织形式中鼓励学生自我表达与主体建构,实现“管中有育,育中见美,美中含理”的深层协同。未来的学生管理,应向着“人文引领、文化润心、思想筑基”的方向持续推进,真正将育人的理想落脚于学生品格的养成与精神的成长之中,为高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时代新人注入持久动力。

辅导员应充分发挥自身在管理一线的优势,将美育之美与思政之理有机贯通、相互滋养,通过文化建设、课程设计、机制改革与媒介创新,打造一套富有人文温度与精神高度的育人系统。在这一过程

中,应坚持以学生为本、以文化为引、以创新为驱,不断探索融合育人的新形式与新路径,实现“润物无声”的思想教育与“静水流深”的人格塑造,为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审美素养与时代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屈泽宇. 习近平关于美育的重要论述研究[D]. 长春: 长春理工大学, 2024.
- [2] 蒋金蒙.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大思政课”协同育人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J].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5(4): 29-32.
- [3] 蔺云帆.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向度的科学特质[J]. 理论研究, 2024(6): 20-29, 70.
- [4] 潘建红, 张晓萌. 高校辅导员队伍制度化建设探析[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8(4): 389-395.
- [5] 马江生. 地方本科院校提升办学水平的实践与研究[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9: 449.
- [6] 李程锦. 立德树人新形势下高校辅导员工作的现代转型——基于对《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的分析与思考[J]. 江苏高教, 2019(7): 120-124.
- [7] 谈传生, 胡景谱, 刘文成. 高校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基于中部某省 51 所高校 3176 名辅导员的实证调查[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1): 148-153.
- [8] 赵五一. 高校美育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发展——评《新时代大学生美育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J]. 中国教育学刊, 2024(7): 145.
- [9] 陈亚. 高中思政课美育价值及实现路径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24.
- [10] 高天乐. 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研究[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24.
- [11] 徐华. 新时代高校心理育人机制优化研究[D]. 西安: 西安理工大学, 2024.
- [12] 韩布新, 孔庆焱. 艺术文化的心理疗愈功能——重评失调的认知[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1): 58-67.

PPP物有所值立法问题研究

戴传利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 决策咨询部,安徽 合肥 230022)

摘要:随着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在我国公共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 VFM)评价逐渐成为PPP项目决策与治理的核心机制。梳理了我国PPP物有所值评价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历程,指出其在政策推动、制度创新及国际经验吸收方面的突出成就,尤其是“双评价”机制(物有所值与财政承受能力)的确立为我国PPP项目合法性提供了初步保障。通过比较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及欧盟等主要国家和地区在PPP物有所值立法方面的具体实践,归纳出VFM制度在法律地位、评估方法、合同标准化及监督反馈等方面的共同特征与差异。最后,结合我国实践中的不足,提出完善我国PPP物有所值立法的建议,涵盖强化法律制度建设、细化评价操作规范、优化监管审计体系以及加强与财政承受能力的协同等四个方面,旨在推动PPP项目的规范实施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PPP模式;物有所值;绩效评价;国际比较;立法研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4-0097-08

Research on the Legislation of PPP Value for Money

DAI Chuanli

(Department of Decision Making Consultation, Party School of Anhu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 p. c
(Anhui Academy of Governance), Hefei, 230022, Anhui)

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PPP model in China's public service field, value for money (VFM) evalu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core mechanism for PPP project decision-making and governance. It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PPP value for money evaluation system in this paper, and pointed out it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policy promo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bsorption, especiall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ual evaluation" mechanism (value for money and fiscal capacity), which provides preliminary guarantees for the legitimacy of PPP projects in China. By comparing the specific practices of PPP value for money legislation in major countries and regions such as the UK, Australia, Canada, and the EU, it summarized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VFM system in terms of legal status, evaluation methods, contract standardization, and supervisory feedback. Finally, based on the shortcomings in China's practice, it propose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legislation of PPP value for money in China, covering four aspect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refining evaluation operation norms, optimizing regulatory audit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coordination with fiscal capacity,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implement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PP projects.

Key word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model; value for mone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legislative studies

收稿日期:2025-06-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FX049)。

作者简介:戴传利(1971-),男,安徽定远人,教授,博士。E-mail:lichuandai@163.com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模式自 20 世纪下半叶在全球兴起以来,被广泛视为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实现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1]。在 PPP 项目决策中,“物有所值”(VFM)原则是确保公共资金使用效率和项目绩效的核心理念。所谓物有所值,源自英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以“3E”原则——节约(economy)、效率(efficiency)和效果(effectiveness)为核心,强调以尽可能少的支出获得尽可能好的公共服务效果^[2]。在 PPP 语境下,物有所值评价指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比较 PPP 模式相对于传统政府采购模式在全生命周期内的成本效益,以判断采用 PPP 能否实现更优的性价比和公共利益。物有所值评价不仅是项目准备阶段的重要决策依据,也是 PPP 项目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近年来,如何通过立法手段保障 PPP 项目物有所值,已成为我国 PPP 法治建设中的关键课题之一^[3]。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 PPP 模式的探索几经波折。早期主要以特许经营(BOT)方式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但缺乏系统的立法保障。2014 年前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PPP 在稳增长、促投资中的作用,提出“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运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此后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密集出台 PPP 政策文件,推动 PPP 规范发展。同年底,财政部发布首批 30 个 PPP 示范项目,并颁布《PPP 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等文件,各地纷纷启动 PPP 试点。在此背景下,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被财政部明确为筛选 PPP 项目的“两大前置条件”,要求拟采用 PPP 模式的项目须证明相对于传统采购具有物有所值且不出财政可承受范围^[4]。这一机制的引入在我国 PPP 实践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标志着我国开始将物有所值理念贯彻于 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之中,也为国际 PPP 立法提供了宝贵经验借鉴。

1 我国 PPP 物有所值评价的探索历程、政策导向与实践成效

1.1 物有所值评价机制在我国的建立与演进

我国对 PPP 项目物有所值的关注和实践起步较晚。2014 年以前,PPP 项目决策更多依赖财政承受能力和政府决策意志,缺乏对比传统模式的系统性价值评估。2014 年底,财政部和发改委发布的 PPP 操作指南中已强调“在项目识别论证阶段,应当开展物有所值评价,论证采用 PPP 方式的必要性和

优势”。此后,财政部于 2015 年 12 月专门颁布了《PPP 物有所值评价指引(试行)》,提出了开展 PPP 物有所值定性和定量评价的基本方法和流程的认定。该指引要求项目实施机构在项目准备阶段,通过设置公共部门比较值(PSC)等方法,对拟议项目采用 PPP 模式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和效益进行测算,与政府直接实施的方案进行比较,以确定是否具有物有所值^[5]。

传统 PPP 项目的 VFM 评价包括定性和定量评价两个阶段^[6],定性评价通过一系列指标(如可行性、有效性、风险分配合理性等)进行评分判定;定量评价则主要采用 PSC 比较法,计算 PPP 方案相对于公共部门自行实施的节约或溢价。物有所值评价指引的出台,填补了我国 PPP 项目决策中的一项制度空白,为各级政府规范开展 PPP 物有所值论证提供了指导框架。这一政策导向体现出我国 PPP 监管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的思路:即在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同时,更加注重“优中选优”,只有当 PPP 模式相较传统采购在经济和公共利益上更具优势时,方可采用 PPP 模式。

据财政部 PPP 中心数据,自 2015 年实施物有所值和财政承受能力“双评价”机制以来,全国 PPP 项目库入库项目数一度增长迅速,但增速在 2017 年后趋于理性,各地更加重视项目论证质量,一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被清退出库。例如,截至 2018 年 4 月,各地累计清理 PPP 退库项目 1695 个,涉及投资额 1.8 万亿元。其中有 217 个项目被认定为“未按规定开展‘两个论证’”而退出项目库。这一系列举措表明,物有所值评价机制在我国已经从政策倡导走向刚性约束,逐步发挥出遴选项目、防控风险的作用(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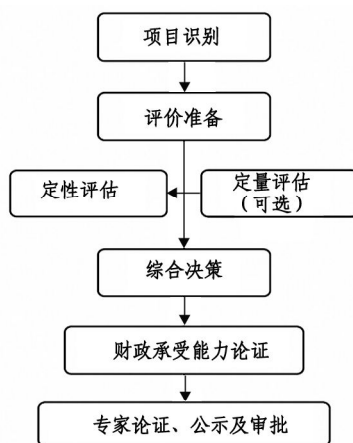


图 1 我国 PPP 项目物有所值评价示意图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目前物有所值评价主要依据部门规范性文件,我国尚未有上位法对其加以明确,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和挑战。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对物有所值评价的理解和执行标准不一,有的项目要求可能流于形式,评价报告质量良莠不齐。另一方面,现行《PPP 物有所值评价指引》本身尚不够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有待进一步优化。有学者指出该指引对定性评价的主观性控制不足、定量评价中风险量化方法不够细化等问题^[7]。又由于缺乏法律强制力,一些地方在决策过程中可能绕过物有所值论证的要求,直接上马 PPP 项目,增加了未来项目风险。再者,物有所值评价结果目前主要用于项目审批决策,缺乏后续跟踪和反馈机制,无法动态评估 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物有所值的实现情况。这些问题为我国进一步完善 PPP 物有所值立法提出了现实要求。

1.2 我国在 PPP 物有所值实践方面的创新与国际贡献

尽管起步较晚,我国在 PPP 物有所值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经验,并在国际 PPP 治理舞台上作出了独特贡献。首先,我国将物有所值评价与财政可承受能力论证并列为 PPP 项目立项审批的必备前置条件,从国家治理高度强调 PPP 项目的绩效合理性和财政可持续性。这种“双评价”制度在国际上具有开创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 2019 年通过了新的《公私伙伴关系示范法》和《立法指南》,首次将“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影响评估”确立为 PPP 立法应涵盖的核心制度,并将“在 PPP 法中明确要求对项目进行物有所值评估,作为项目审批的强制步骤”作为国际最佳实践。有评论指出,联合国这一立法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国近年 PPP 改革的经验,将物有所值从政策层面上升为法律要求,标志着 PPP 法律发展进入“择优”的新阶段。在联合国 PPP 立法修订过程中,中国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我国学者曹富国为代表的专家团队在 UNCITRAL 专家组中多次倡议加强 PPP 项目前期论证,特别是物有所值评估的法律地位^[8]。最终,通过我国代表团的努力,联合国示范法成功将物有所值评价制度纳入其中,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这一贡献实现了我国从跟随国际规范到参与引领规则制定的角色转变,彰显了中国 PPP 实践经验对国际标准形成的积极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联合国 PPP 立法的许多重要成果,就是对中国 PPP 改革经验的总结。”除了在国际规则层面影响立法方向外,我国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平

台,积极推广物有所值导向的 PPP 良性实践。例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PPP 合作项目中倡导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风险合理分配和透明决策,展示了物有所值理念在提升公共项目效益上的作用。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 PPP 物有所值实践方面的创新精神和对全球 PPP 发展的责任担当。总体而言,我国 PPP 物有所值评价的探索历程表明:只有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评价机制,才能确保 PPP 模式真正实现“物有所值”,避免变异为变相融资或加剧财政风险的工具。中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物有所值和财政承受能力双评价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为国际 PPP 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然而,要巩固和提升这一成果,还需进一步将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法律制度,使物有所值理念真正落地生根。这正是下文将通过国际比较加以探讨的问题。

2 国际主要国家和地区 PPP 物有所值立法的比较分析

世界各国在推进 PPP 项目时普遍重视“物有所值”原则,但其立法形式、评估方法和保障机制各有特色。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以及欧盟作为 PPP 实践的先行者,在物有所值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通过比较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可为我国完善相关立法提供有益借鉴。

2.1 英国:指导性政策下的严格评估与审计

英国是最早引入“物有所值”理念和方法的国家。根据英国财政部的定义,这一概念是指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前提下,实现商品或服务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成本与成效的最优平衡^[9]。自 1992 年推出私营融资计划(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以来,英国已实施数百个 PFI/PPP 项目。英国审计署还认为,政府在购买过程中除了达到 3E 原则外,还应尽可能地实现公平性原则,使财政资金的支出是一笔公平的支出^[10]。英国并没有专门的 PPP 基本法,而是采用财政部发布的指导性文件和既有的公共采购法律框架来规范 PPP 项目,将物有所值原则贯穿于项目决策和执行全过程。在项目决策阶段,英国财政部要求实施部门进行公共部门比较(Public Sector Comparator, PSC)分析和物有所值测试,只有在证明 PPP 方案相对于传统政府采购在全生命周期成本效益上更具优势时,方可获批采用 PPP 模式。

英国早在 2006 年就发布了《物有所值评估指南》,提出了分阶段、多维度的 VFM 评价方法,将项目评估划分为项目群、项目、采购三个层次,在可行性、可实现性和有益性三方面分别进行评估。评价

既包括定量的PSC比较分析,也包括对竞争程度、风险分担合理性、服务质量等因素的定性判断,从而确保评价结果全面客观。英国还建立了完善的审批监督机制,财政部设立了基础设施与项目管理局(原政府商务办公室等机构演变而来)负责对重大PPP项目进行把关,确保物有所值评估的严格执行;对地方层面的PPP项目,则通过对“地方合作伙伴关系”(Local Partnerships)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和独立评审,提高决策质量。在项目执行阶段,英国注重通过合同管理和审计来持续监测物有所值的实现情况。合同通常设置绩效指标和按效付费机制,以确保私营部门履约达到约定的服务水平,从而兑现项目预期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的国家审计署(NAO)对PPP/PFI项目开展定期的物有所值审计,并向议会提交报告。过去十余年间,NAO发布了数十份关于PFI/PPP项目是否实现物有所值的独立审计报告,对项目成本超支、风险转移效果、服务绩效等方面进行评估。例如,NAO曾审查某些PFI项目是否出于“将债务转出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动机而牺牲了物有所值,并督促政府改进评估方法以避免此类现象。通过强有力的审计监督和信息公开,英国建立了闭环的反馈机制,促使政府部门在新项目上汲取经验教训,不断完善物有所值评估体系。这种指导性政策+独立审计的模式,被认为是保障英国PPP项目整体上实现物有所值的重要制度支撑。

2.2 澳大利亚:政策框架下的强制比较与标准合同

澳大利亚的PPP制度以其成熟的政策框架和严格的比较论证机制而著称。澳大利亚联邦没有统一的PPP法,各州最初各自探索PPP实践,例如维多利亚州在2000年成立了地方PPP指导机构并推出“合作伙伴关系维州”等举措。为了在全国层面统一PPP政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2008年通过《澳大利亚基础设施法案》设立了基础设施澳大利亚(Infrastructure Australia)机构,并借助全国PPP工作组,于2008-2011年间发布了一系列国家PPP政策和指南。根据澳大利亚发布的《国家PPP政策框架》(2008年)及配套指南,各级政府在考虑重大项目时,必须将PPP作为备选方案加以评估。当项目总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如5000万澳元)时,实施机构有义务进行严格的公共部门比较和物有所值分析,判断是否采用PPP模式。这一强制性要求相当于把物有所值论证写入了政策法规,促使政府部门在决策初始即认真比较PPP与传统模式的优劣。

此外,澳大利亚出台了标准化的PPP项目合同

范本(分别针对经济类基础设施和社会类基础设施项目),统一了风险分配、绩效要求、价格调整等关键条款。这些合同范本同样以物有所值最大化为导向,例如规定政府仅在私人部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分享收益,从机制上防止社会资本获取不当高额回报,从而保障公共利益。在执行和监管层面,澳大利亚建立了较为集中的协调机制。基础设施澳大利亚作为联邦层面的智囊机构,协助制定政策、评估大型项目并向政府提供建议。

各州则设有自己的PPP审批机构和审计机关,对项目的物有所值持续进行监督。澳大利亚审计署以及各州审计长办公室定期审查PPP项目的实施绩效,对项目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政府是否获得物有所值进行评估,并公布审计结果以接受公众监督。这套制度使澳大利亚的PPP项目在选择论证阶段就过滤掉不适合PPP模式的项目,确保入选项目具备物有所值潜力;在实施阶段又通过合同和审计保障物有所值目标的实现。因此,亚洲开发银行曾评价澳大利亚的PPP制度环境成熟度为全球领先。澳大利亚经验表明,在缺乏统一立法的情况下,通过完善政策框架和标准合同,并辅以严格的评估和监督,同样能够有效落实物有所值原则。

2.3 加拿大:立法支持下的价值评估与反馈机制

加拿大的PPP实践具有政府支持力度大、制度体系完善的特点。加拿大联邦层面虽无专门的PPP基本法,但通过成立国家级PPP机构和专项基金等方式,从政策和法律上强力推进PPP,并将物有所值机制作为核心考量标准之一。2008年,加拿大联邦财政部设立了政府性质的公司——加拿大PPP中心(PPP Canada),并由独立董事会管理运营。该中心负责筛选和支持全国范围内的PPP项目,尤其关注项目的价值评估。加拿大政府还设立了多个大型基金(如总额12.6亿加元的PPP基金、80亿加元的建设基金等),明确规定只有通过PPP模式实施且经评估确有物有所值的项目才能申请这些资金支持。这相当于用财政激励手段推动地方和各行业严格开展物有所值论证,项目若要获得联邦拨款,必须证明采用PPP比传统方式更优。为此,加拿大普遍采用类似英国的PSC模型进行定量比较,同时结合定性因素对项目收益、风险分配、服务质量进行综合评判。在实践中,加拿大许多PPP项目(尤其是通过基础设施安大略等省级机构实施的项目)在决策后都会公开发布其物有所值评估结果摘要,披露PPP方案相比公共部门直接实施所节省的百分比,一般约为10%-20%不等,以增强公众对PPP项目

绩效的信心。

加拿大在 PPP 项目全过程中注重审计和反馈。联邦和各省的审计机关都会对重大 PPP 项目进行绩效审计,评估项目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物有所值。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审计长曾多次审核安大略的基础设施 PPP 项目成本效益,提出改进建议,促使评估方法和合同管理不断完善。另外,加拿大的 PPP 项目往往在运营一定年份后进行中期评估,由独立顾问或审计部门重新评估项目的实际效果与先前预测的差异,作为反馈改进的依据。这种制度保证了物有所值不仅在立项时被考虑,而且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持续受到关注和验证。可以说,加拿大通过政策支持和审计反馈相结合,形成了物有所值管理的闭环。加拿大虽然没有统一的 PPP 法典,但相关措施已散见于预算管理、审计等法律法规之中,为 PPP 物有所值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2.4 欧盟及其他:法律框架与指导原则并重

在欧盟层面,PPP 项目通常受到欧盟公共采购和特许经营法律框架的规范。欧盟虽然没有直接针对 PPP 的统一立法,但通过发布指令和指导文件,将物有所值等原则融入成员国法律体系。例如,欧盟《2014/23/EU 号特许经营指令》要求成员国在授予特许经营(常被视作 PPP 的一种)时,坚持竞争、透明和非歧视原则,以确保公共合同达到最佳价值。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投资银行也联合成立了欧洲 PPP 专家中心(EPEC),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和工具,帮助

成员国评估 PPP 项目的物有所值^[11]。EPEC 于 2015 年发布的《物有所值评估:方法回顾及关键概念》报告对法国、德国、荷兰、英国等国的 PPP 物有所值评估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各国在评估范围(侧重财政支出还是社会经济效益)、折现率选取、风险量化等方面有所差异,但都强调在项目决策前进行充分的价值测试,以确保选择最优方案。

在具体国家层面,欧洲主要经济体各有侧重。英国前文已述,以指导性政策和审计保障见长;德国虽然推广 PPP 相对谨慎,但联邦财政部制定了《关于投资项目经济性评估的指导原则》,要求政府部门对重大投资项目负有进行“经济性论证”(类似物有所值分析)的法律义务,并将部分 PPP 项目纳入联邦审计署监督;法国于 2004 年通过《合同法典》修正案引入 PPP 合同形式(称为“partenariat 合同”),并在法规中规定签约前必须由财政和审计部门出具报告,证明项目在技术上可行、在经济上物有所值;荷兰则强调广义的社会成本收益分析,将 PPP 方案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作为决策依据之一。总体而言,欧盟国家倾向于将物有所值理念内嵌于公共投资决策和公共采购法规中,通过行政规章和技术指南加以细化,并借助独立审计和议会监督形成约束力。这种模式确保了即使没有独立的 PPP 法,物有所值原则依然能够在法律上“落地”,成为公共部门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准则(见表 1)。

表 1 PPP 物有所值(VFM)国际立法要素比较

比较维度	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欧盟	法国	德国
VFM 定义与原则	强调生命周期最优组合;风险合理分担	强调风险转移,全生命成本评估	比较 P3 与传统交付的风险调整后净现值	EPEC 倡导平衡质量与成本	要求与传统方案进行成本和绩效比较	使用 PSC 量化对比成本,结合定性
评估方法与流程	早期使用 PSC 模型,后转向定性评估	使用 PSC + 风险调整(含蒙特卡罗模拟)	使用 PSC + NPV,结合定性	建议使用 PSC 对比并结合定性社会效益	法规要求预评估,对比传统和特许经营模式	可行性分析结合 PSC 与定性判断
政策/法律依据	无专门 PPP 法,财政部指南为主	联邦采购规则 CPRs + 各州 PPP 政策	各省独立政策(如安大略 IO 指南)	公共采购与特许经营指令适用	法定要求 PPP 项目事前评估	联邦/州指南和公共预算法律规定流程
审批机制	“五案法”审批;IPA 与财政部复核	基建澳洲或州 PPP 办公室审批	省级 P3 机构负责评估与建议,需政府批准	各国自定流程;欧委会/EIB 监督资助项目	财政部或地方政府审批后进入招标	各部/州财政部门审批,基于 VFM 可行性研究

续表
表 1 PPP 物有所值 (VFM) 国际立法要素比较

比较维度	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欧盟	法国	德国
信息披露	披露中标结果和 NAO 报告, 合同摘要公开	州政府项目摘要公开, 审计结果披露	项目概要及部分 VFM 报告摘要公开	TED 平台公开招标信息, EIB 项目有摘要	PPP 合同和评估摘要需公布,《政府公报》发布要点	可通过信息法申请获取, 审计报告有摘要
绩效监测与评估	运营期设绩效 KPI, NAO 审计 VFM 兑现情况	服务协议明确标准, 定期审计绩效	省级机构监督, 联邦/省审计署定期后评估	无统一机制, EIB 或欧审院对资助项目评估	审计法院对国家 和 地方 PPP 定期 评估绩效	审计署与州审计院执行期评估, 评估 VFM 兑现情况
独立监管机构	NAO (国家审计署)、IPA 支持	各州审计署与基础设施澳洲	省/联邦审计署、P3 评估机构如 IO	EIB/EPEC、欧审院; 成员国自审	Cour des Comptes 与地方法院	审计署、PPP 顾问机构 (如 PD GmbH)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无论是普通法系国家通过政策指导和实践监督保障 VFM,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和制度程序落实 VFM,其目的皆在于确保 PPP 项目实现“好钢用在刀刃上”,让公众资金获得最大效益。国际上主要国家和地区虽然立法形式不同,但都围绕“物有所值”目标构建了政策主导、标准规范、审计反馈、制度闭环的成熟体系,这些经验对于中国完善 PPP 相关立法和操作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我国可以根据自身国情,从中汲取有益元素,在法律制度层面构建适合中国环境的物有所值保障机制。

3 完善我国 PPP 物有所值立法的建议

我国 PPP 模式在物有所值评价方面取得了可圈可点的良好经验并对世界做出了贡献。但为了更好地发挥 PPP 模式的作用,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我国有必要借鉴成熟经验,通过立法完善物有所值保障体系,确保 PPP 模式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3.1 加强物有所值的法律制度建设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中国式绩效治理经历了多阶段发展:从初期重视“办事绩效”与“人事绩效”,逐步过渡到将“花钱”与“问效”相结合的“预算绩效”阶段,再演进至当前强调“以较少支出实现更好效果”的“成本预算绩效”阶段^[12]。

首先,为了更好发挥 PPP 模式的绩效治理作用,我国应尽快推动将物有所值评价制度上升为法律规范。在国家层面,应加快出台统一的 PPP 条例或法律,明确规定所有拟采用 PPP 模式的项目必须

进行物有所值评估,并将通过物有所值评估作为项目审批的前置条件和必要依据。这一要求应当具有法律强制力,而非仅停留于部门规章。联合国《公私伙伴关系立法指南》(2019)已强调:“法律应要求对 PPP 项目进行充分的物有所值评估,作为任何拟议项目审批过程的强制步骤。”我国立法应顺应这一国际趋势,将物有所值原则写入 PPP 基本法的总则或立项审批章节,确保各级政府依法依规行事。

其次,在法律中明确物有所值评价的基本内涵和方法框架。鉴于各项目情况千差万别,法律无需细化具体计算模型,但应规定评价应当包括定量和定性两个维度,涉及全生命周期成本收益比较、风险分担效果、绩效目标实现等要素。同时授权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统一的物有所值评价标准和指南,确保全国范围评价工作的规范性和可比性。可由财政部门会同发展改革、审计等部门依据法律共同发布新的评价指引或技术标准,将近年实践中成熟有效的做法固定下来,对评价流程、指标体系、报告格式等作出细化规定,使之具有法律效力。这样既保持一定灵活性,又防止各地各行其是,保证了物有所值评估的有章可循。

此外,应统筹物有所值评价制度与相关法律制度的衔接配套。特别是《预算法》《政府投资条例》《政府采购法》等法律,也应体现物有所值理念。例如,可在预算法实施条例中规定,财政支出责任较大的 PPP 项目须提供物有所值评估报告方可纳入中长期财政规划;在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论证要求中增加“PPP 备选方案比较”内容;在政府采购评审中将生命周期成本和绩效作为重要评审因素等。通过在相关法律中“嵌入”物有所值要求,形成多层次、

全方位的法律保障体系。

3.2 细化物有所值评价的操作规范

构建符合行业特殊性的绩效指标体系至关重要^[13]。法律层面的原则规定需要通过具体操作规范来落实。为提高物有所值评价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应着重细化以下操作层面的制度:

其一,完善评价指标和方法。借鉴国际经验和我国学术研究成果,对现行物有所值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优化。在定量评价方面,引入更加成熟的风险量化模型和敏感性分析方法,提高公共部门比较值(PSC)估算的准确性;在定性评价方面,建立专家评议机制和评分标准,减少主观随意性。可以考虑将实物期权理论引入 PPP 项目物有所值定量评价中更好地还原了项目真实价值,这将有利于提高社会投资者的积极性^[14]。同时,根据不同行业项目的特性制定差异化的评价指引,如交通、市政、环保等领域可分别细化权重指标,使评价结果更具针对性。对于超大型或创新性 PPP 项目,允许采用第三方独立评估等增强型手段,确保论证充分。法律应授权国务院有关部门定期更新评价指南,吸收最新实践经验和学术研究进展,不断提升评价方法的有效性。

其二,强化物有所值评估报告的质量审核和信息公开。法律可明确规定物有所值评估报告须由项目审批部门或财政部门进行严格审核,重点审查评估假设、数据来源、比较方案设置等是否合理。如发现评估结论不成立或报告敷衍,应责令重新论证或不予批准项目进入实施阶段。为了形成社会监督压力,应建立评估结果公开制度:除涉及国家机密的项目外,物有所值评价报告或其摘要应向社会公示,接受利益相关方和专家质疑。这样可促使实施机构更加严谨地对待评估过程,也有利于积累案例数据、促进学术界和实践界对评估方法的讨论与改进。

其三,严格控制 PPP 适用范围,防范不当使用。通过立法明确 PPP 模式的边界条件,例如规定一般公共工程项目不应仅为融资目的而采用 PPP,尤其是对于没有运营服务内容或收益无法覆盖成本的纯公益性项目,应慎用 PPP 模式。如果法律层面难以具体界定,可辅之以负面清单制度,由主管部门列明不宜采用 PPP 的情形(如纯政府付费且缺乏绩效指标的项目等),从源头上杜绝“假 PPP”或变相举债项目的出现。只有将物有所值作为选择 PPP 的必要条件,才能确保 PPP 真正用于那些通过创新合作能够提质增效的领域。

3.3 优化监管体系与审计反馈机制

物有所值评价并非一劳永逸,其贯穿于 PPP 项

目全生命周期,需要配套监管和反馈机制加以保障。

首先,建立专业高效的监管机构。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可考虑在财政部门牵头下设立 PPP 统一监管机构或赋予现有机构更大职权,统筹管理物有所值评估和绩效监管。该机构应负责制定评价标准、审核重大项目评估报告、指导地方开展工作,并对实施阶段的物有所值实现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目前财政部 PPP 中心已承担部分此类职能,但从法律层面予以明确和强化有助于提高权威性和协调性。此外,监管机构应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定期与发展改革、审计、监察等部门沟通信息,形成监管合力。

其次,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建议在《审计法》等法律中增加对 PPP 项目绩效审计的规定,赋予国家审计署和地方审计机关定期审核 PPP 项目物有所值实现情况的职责。审计应覆盖项目采购、建设和运营各阶段,重点检查实际成本和收益与最初评估预测是否一致、风险分担条款是否有效执行、服务质量是否达标等。如果审计发现项目未达预期,应分析原因(例如前期评估偏差、合同设计缺陷或履约不力),并向有关部门和公众报告。对严重偏离物有所值目标的项目,应建议采取补救措施甚至提前终止合同(如英国规定只有在终止合同“更物有所值”时方可批准提前终止)。通过常态化的审计监督,可将物有所值理念贯穿到 PPP 项目的长期管理中,形成闭环反馈。

再次,建立绩效评价和反馈改进制度。建议在法律中要求对 PPP 项目定期开展后评估,例如在项目运营若干年后由独立第三方或审计部门对项目绩效进行评价,衡量其实际效果与物有所值目标的符合程度。评估结果应作为日后类似项目决策的重要参考,并反馈给项目实施机构和合作企业,督促其改进。对于表现不佳的项目,可依据合同约定调整合作模式或整改,提高后续运营绩效。在立法时还应考虑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汇集历年各行业 PPP 项目物有所值评估和实施效果数据,供政府决策和公众监督使用。长期来看,这将有助于形成持续学习改进的机制,不断提高 PPP 项目的物有所值水平。

3.4 完善财政承受能力管理,协同保障物有所值

物有所值评价与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密切相关,都是 PPP 项目决策的关键控制点。在立法实践中,两者应协同发力,避免各自为政。建议在 PPP 法律中同时对财政支出责任管理作出规定,例如沿袭既有政策要求:地方政府 PPP 项目年度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不得超过 10%,并将这一上限作为硬性约束纳入法律。同时,法律应要求建立规范

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包括政府资产负债表和中长期财务规划,以便准确评估政府举债能力和未来支出义务。只有财政可持续性有保障,物有所值评估结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此外,可考虑将PPP项目支出责任纳入政府债务管理体系,在法律上明确PPP长期支出属于“或影响政府、或有债务”的一部分,需接受与政府债务类似的监管和限额控制。通过完善这些配套制度,可以防止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物有所值而忽视债务累积风险,实现物有所值与财政可承受“双轮驱动”下的稳健发展。

4 结论

“物有所值”作为PPP模式的灵魂,在保障公共利益和财政效率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我国经过近年的探索,初步建立了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相结合的PPP项目论证机制,在实践中发挥了一定成效,并对国际PPP立法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要进一步发挥PPP模式的优势,避免其异化为单纯融资工具,我国亟需通过立法巩固和完善物有所值制度设计。国际经验昭示我们,无论采取专门立法还是政策规制,物有所值原则都应当被明确确立,并辅之以科学的评估方法和强有力的监督保障。基于中国国情,通过完善法律制度、规范操作流程、强化监管审计和风险控制,我国完全有条件将物有所值理念全面融入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为PPP项目的成功实施保驾护航。

展望未来,随着我国加快推进PPP立法进程,物有所值评价有望在法律上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更严密的约束力。这将有助于筛选出真正适合PPP模式的优质项目,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促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规范健康发展。唯有让每一个PPP项目都经得起“物有所值”的检验,才能不辜负社会资本和公众对PPP模式的期望,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多方共赢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法律的引领和保障作用至关重要。我们应当充分汲取国内外经验教训,勇于在立法上创新实践,构建起中国特色的PPP物有所值法律体系,为推动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张莉. 发达国家PPP运作经验及其启示[J]. 群众, 2015(1): 82-83.
- [2] 梁玲霞, 韩芳, 周芳欣, 等. PPP项目物有所值评价的国内外比较[J]. 土木工程与管理学报, 2018, 35(4): 182-188.
- [3] 曾金华. PPP征程长 法律来护航[N]. 经济日报, 2016-06-29.
- [4] 郁琼源, 胡璐. 各地累计清理PPP退库项目1695个涉及投资额1.8万亿元[EB/OL]. [2018-05-09]. <https://www.gov.cn/xinwen/2018-05/09/content>.
- [5] ALMARRI Khalid, BOUSSABAIN Halim. The influence of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on value for money viability analysis in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rojects[J].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48(4): 93-106.
- [6] 张英婕, 林巧燕, 刘佳琪. 基于物有所值评价改进的PPP模式社会效益量化研究[J]. 项目管理技术, 2024, 22(7): 44-50.
- [7] 吴洪樾, 袁竞峰, 杜静. 国际PPP项目物有所值定性评价及对我国的启示[J]. 建筑经济, 2017, 38(3): 38-42.
- [8] 曹富国. 积极运用联合国PPP立法成果, 加快推动我国PPP立法进程[EB/OL]. [2021-05-26]. <https://ppp.cufe.edu.cn/info/1021/1235.htm>.
- [9] 陈婉玲. PPP物有所值架构与制度审视[D]. 上海: 华东政法大学, 2023.
- [10] 李镕辰. 英国预算绩效管理中的“物有所值”理念及其启示[J]. 中国政府采购, 2019(10): 76-79.
- [11] 冯媛媛. PPP项目物有所值评价体系改进研究[D]. 石家庄: 石家庄铁道大学, 2019.
- [12] 曹堂哲, 程子轩. 成本预算绩效管理的实践、理论与未来[J]. 经济研究参考, 2024(12): 49-62.
- [13] 余满, 张榆昕. 按效付费下的PPP项目物有所值目标研究——以A县乡镇污水治理PPP项目为例[J]. 财政监督, 2023(24): 71-75.
- [14] 李良君, 刘冲, 郑舒情. 基于实物期权的PPP物有所值定量评价研究[J]. 建筑经济, 2023, 44(6): 91-96.

美国社区书店经营策略创新与实践

齐振伦¹, 刘 苏^{2*}

(1. 安徽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2.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网络冲击下,美国社区书店坚守人文精神,关注书店的活动策展与文化保护能力,通过“书店+”模式融合多元业态,打造文化引力场,借力数字技术手段,构建全场景消费生态,同时更以空间媒介为载体践行公益使命,激活书店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的公共属性价值。美国社区书店的运营经验可为我国实体书店转型为“有温度”的城市文化共同体,提供参考思路与启示。

关键词:社区书店;书店经营;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4-0105-06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Business Strategies for Community Booksto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QI Zhenlun¹, LIU Su^{2*}

(1. School of Art,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Anhui;

2. School of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igital era, community booksto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dopted a human-centric business philosophy, emphasizing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By implementing the “bookstore +” model, they integrate diverse commercial formats to create a cultural hub, utilize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build an omnichannel consumption ecosystem, and leverage spatial media to fulfill their public welfare mission, thereby activating the societal value of bookstores as public infrastructure. The operational practices of U. S. community bookstore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and inspiration for transforming China’s brick-and-mortar bookstores into “warm” urban cultural spaces.

Key words: community bookstore; bookstore opera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作为社会文化汇聚的空间,书店是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石。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体书店“关门大吉”已经成为一种常景,即使是书店大国之美国也未能幸免,独立书店尤为悲壮。美国独立书店1994年为7000家,2023年则降为2185家,年均闭店166家。学界与业界普遍认为实体书店已经深陷寒冬,似乎再也难以出现逆转。事实真的如此吗?现实说明,以萨迪书店(Sadie’s Books&Beverages)、桦树皮书店(Birchbark Books)、斯特兰德书店(Strand Book Store)、蓝柳树书店

(Blue Willow Bookshop)、第三场所书店(Third Place Books)、房屋工作书店(Housing Works Bookstore)、牛蒡草书店(Burdock Book Collective)等为代表的独立书店形式中的一种的社区书店(见表1)凭借其紧密联系社区的优势,已经探索到立而不倒的生存之道,这些不无研究与借鉴价值。

1 人文中心:确立经营的核心准则

尽管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与亨利·让·马丁(Henri Martin)认为:“书籍就是一种商品,

收稿日期:2025-03-21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项目基金: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2022zybj003);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2022jyxm003)。

作者简介:齐振伦(1976-),男,副教授,博士;刘苏(2002-),女,安徽蚌埠人,硕士研究生。E-mail:1362496884@qq.com

人们制造它们的首要目的就是谋生。”^[1]然而,客观上,对于以书为核心产品的实体书店而言,“书,作为商品只是个契机而已,背后最重要的是店和人的关系”^[2]。鉴于此,“立地”社区的美国社区书店以

书为契机建构“联结”行而不辍,为社区真正成为“社区”贡献不凡。社区成为“一个‘有机生命体’”^{[3]141},“是一个充满意义的地方”^{[3]144}。

表 1 美国特色社区书店一览表

书店名称	创始年份	特色	业务范围
闲适书店 (Idlewild Bookstore)	—	旅行主题书店	非裔作家书籍、电子书、社交角
阿高斯书店 (Argosy Bookstore)	1925	美国文化古籍书店	古籍、地图、签名本、版画、藏书定制、修复与鉴定工作
斯特兰德书店 (Strand Book Store)	1927	二手书店	新旧书籍、书籍盲盒、礼品服饰、藏书定制、活动场地
住房工作书店 (Housing Works Bookstore)	1993	艾滋公益书店	医疗知识宣传、医疗保障、法律服务、二手书
爱狗人士书店 (Dog Lovers Bookshop)	1995	宠物主题书店	宠物相关新旧书、犬科动物相关书籍
蓝柳书店 (Blue Willow Bookshop)	1996	TikTok 中爆火的书店	书展、青少年阅读节、图书节、作家活动
第三场所书店 (Third Place Books)	1998	休闲舒适主题书店	免费社区活动、交友、餐饮、特殊订书服务
上城姐妹书店 (Sisters Uptown Bookstore)	2000	黑人主题书店	非裔作家书籍、电子书、社交角
桦树皮书店 (Birchbark Books)	2001	美洲原住民书店	美洲原住民书籍、艺术品、儿童书籍、活动
开放书店 (Open Books)	2002	非营利性书店	儿童书籍、书籍捐赠、图书资助
最后一家书店 (The Last Bookstore)	2005	加州最大的二手书店	二手书、初版珍本、收藏品、精选唱片
牛蒡草书店 (Burdock Book Collective)	2018	女权主义书店	女性主义书籍、作家讲座、社区讨论、监狱送书、政治教育
萨迪书店 (Sadie’s Books & Beverages)	2022	黑人主题书店	黑人书籍、免费作家讲座、自闭症儿童活动

1.1 从卖书到联结:做社区聚合中心

人际交往是社会形成的基础,也是个人实现幸福的关键^[4],“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但在网络社会中,连锁书店用标准化与高效率取代了蕴含人际交往魅力的传统售书模式,切断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渠道。但美国社区

书店在快节奏时代的迅猛浪潮中,仍然“初心”不改,为人际交往和社区联结服务,将书店作为是人与书、人与人相遇的途径,而非按商人思维将书店当作提高经济效益的工具。以萨迪书店为代表的社区书店,正是抓住了人与人之间联结的优势,书店不仅作为销售图书的展台,还被建设成读者阅读、交流和表达自我的平台,让其成为当地作家和艺术家的分享

空间及社区活动的聚会中心。

2022 年 7 月,萨迪书店在米德尔顿市中心开业,这是米德尔顿市奥兰治县第一家黑人开办的书店。书店门外立牌上“不仅是一家书店”(More Than a Bookstore)的标语正与创始人凯瑟琳·惠利·威廉姆斯(Catherine Whaley-Williams)将复兴(Rejuvenate)、培育(Cultivate)和教育(Educate)社区作为萨迪书店的使命相呼应。复兴是书店的重点,在开放麦克风之夜活动中,书店邀请青年黑人作家范塔·巴洛(Fanta Ballo)以口语诗歌的方式讲述她的身份故事,也邀请当地独立艺术家展开各类声乐表演,在这里每个人都有创造性地表达自身经历的舞台^[6]。萨迪书店对社区的联结,不仅促使个体间人际关系的强化,也加强书店自身与其他非营利组织的合作。书店与自闭症援助组织“傲才计划”(Ausome Genius)联合举办“感官星期六”活动(Sensory Saturdays),每周为感官敏感和自闭症儿童开办一次关于数学、音乐、绘画的互动教学,提供更为安静舒适的环境以减少感官刺激,让书店成为儿童接触外部世界的“专属媒介”。

1.2 从商业到文化保护:书店价值转向与使命践行

瑞安·拉斐利(Ryan Raffaelli)认为 3C 是书店实现复兴的关键路径,3C 即社区(Community)、策展(Curation)以及召集(Convening)^[7]。与之相应,社区书店不以经济利益获取为目标反以文化为中心,进行策展与召集,深入社区,与读者共创价值。桦树皮书店正是践行 3C 理论实现复兴的社区书店之一。书店将保护与复兴美洲原住民文化为使命,通过空间聚合构建社区认同,致力于成为地方文化、居民和艺术家之间互动的桥梁,做屹立不倒的文化灯塔,彰显文化韧性。

“实体书店的独特魅力在于故事、情怀和场景。”^[8]桦树皮书店所处的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市是美国原住民居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店主路易丝·厄德里奇(Louise Erdrich)是美洲原住民,一直热衷于保护与振兴原住民文化、支持原住民艺术家以及推广原住民工艺品。该书店空间布局处处体现着对土著文化的传承:入口天花板上悬挂着手工制作的大独木舟,象征着原住民与水共生的迁徙历史;角落里低矮的阁楼树屋,隐喻了始终贴近土地的土著部落。这里出售各种印第安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历史、教育和语言类书籍,并专注于收藏鲜为人知的原住民作家作品,提供当地艺术家手工制作的珠宝、银器、艺术版画、贺卡,有独一无二的金属工艺手镯、项链、幸运羽毛银耳环等等有趣新奇的物品。书店

也邀请原住民艺术家现场传授珠饰编织、雕刻等手工技艺,活动中制成的工艺品可直接在店内售卖。由此,桦树皮书店将美洲原住民的文化保护工作从博物馆式的陈列拓展至体验式的传承共生模式^[9]。同时,书店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文化从保护走向跨界推广,在 2024 年设立的子公司 Old Cedar Native Arts 网络平台上,书店通过数字化手段扩大文化影响力,将售卖艺术品的市场从实体店拓展至网络空间,在云端续写美洲原住民的文化新篇章。

2 “书+N”:以书为圆心多维度发展

书店是文化的灯塔,是心灵的栖息地。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传统实体书店只依靠书籍谋生,显然无法适应市场变化和消费者日益丰富的购买消费需求。2007 年亚马逊公司推出电子阅读器 Kindle,面对数字化阅读的浪潮和网络发行阵营的冲击,实体书店尤其是大型连锁书店日渐式微,号称“超级书店”的巴诺书店也开始“瘦身”,自 2007 年起平均每年关闭 15 家分店^[10],美国出版业进入经营寒冬。而新零售商业模式的出现,为书店转型发展驱散了阴霾。从传统售书模式到复合式文化生态的运营,再到线上平台与线下书店的融合发展,以斯特兰德书店(Strand Bookstore)、蓝柳树书店(Blue Willow Bookshop)为代表的实体书店积极转型,打造以售书为圆心,融合休闲咖啡、文创、服装展示售卖等为主体的二维经营业态,同时向互联网延伸,实现线上平台带动线下消费的三维销售模式。

2.1 书+产品:复合业态驱动场景化消费升级

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是影响实体书店转型的决定性因素。从最初的提供书籍和阅读环境,满足读者“有书读”的需求,到选择性地将饮品、音乐、展览、百货等一系列多元业态融入书店经营之中,打造舒适精致的美学空间,满足读者对高品质阅读场景的体验性需求。“书+N”将相关业态进行整合打包,以售书为核心,但不局限于单一的图书售卖模式,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书店盈利和抗风险能力。

“18 英里的书”是斯特兰德书店的口号,据说其拥有的书籍总长度有 18 英里,虽然无从考究,但已成为都市传奇。除了书籍,这里的文创产品也广受关注和好评,写着“Blind Date With A Book”(与一本书约会)的展台是斯特兰德书店的新销售模式——书籍盲盒。这里每本书籍都有独特的手绘包装,上面简要描述了本书的题材、亮点和价格,例如《身处罗马》(When in Rome)被描述成“新出炉的慢节奏浪漫喜剧片”(Fresh Baked Slow Burn Rom -

com)^[11]。这种在不告知书名的前提下模糊地暗示书籍内容的售书形式,既能带给顾客拆盲盒般的期待与欢愉,又为书籍限定了购买人群,确保“合适的书”会被“合适的人”买到。书店借助“盲盒”这一火热的售卖模式,完成了由传统单一销售的创造性转化。书店的“猫系列”帆布包文创也备受国内外受众欢迎。例如,在日本杂货人行道(Side Walkers)售卖平台上,斯特兰德书店的猫咪书签(Cozy Cat)售卖价格为2200日元,猫咪帆布包(Stay Curious)为3850日元,且不少帆布包已售罄。“书+产品”的发展模式,将书与生活方式、艺术以及家庭进行融合,将书店打造成涵盖文化艺术的综合体。然而,吸纳文创、咖啡以及网红装潢作为增收手段无可厚非,但若一味追逐潮流,而非向内挖掘自身特色,终将会在跟风浪潮中被抹去光彩而后随之没落。一家书店最核心的着力点应当是书籍,只有具备数量充足、特色鲜明的书籍储备,才能真正彰显书店的气质与魅力^[12]。扎稳立足“好书”这一圆心,才是书店实现差异化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2.2 书+网络:数字化赋能下全渠道运营融合

媒介化社会,“媒介中介一切”,媒介定义/再定义了社会的一切,书店也在其中。美国最早的网上书店设立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自实体店书店愈发“举步维艰”后,越来越多的书店开设了线上平台拓宽购书渠道,以此满足消费者购书看书的便捷性需求。其中,被评价为西休斯顿最受欢迎的蓝柳书店,在其线上网站中增设了书店故事、活动日历、书籍介绍、线上购书四大模块。在书店故事中,店主瓦莱丽·克勒(Valerie Koehler)从自己对书籍的热爱谈起,分享接手书店的初衷和书店的工作团队信息。在活动日历中,介绍书店曾举办过的丰富社区活动,并提供预约交流会和其他俱乐部活动信息的渠道。2024年11月,在此为期一个月的时间段内,蓝柳书店举办了13场丰富的交流活动,至少平均两天就有一场活动在这里展开,包括读书俱乐部、签名售书、故事会、默读派对等。在书籍介绍中,书店员工对每本书籍都进行了事无巨细的分享,包括书籍作者、主要内容,甚至有员工的“读后感”,这可能是亲临线下书店都不可能存在的模式。顾客在网站中选定书籍后,可于购物车内自由选择图书格式(如精装本、CD音频、数字音频或电子书)^[13]。可以说,蓝柳书店在“书+线上平台”营运模式中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书店并不是简单地将售书的空间从线下转移至线上,向顾客宣称拓宽销售渠道就一了百了,而是做到了与网络平台的深度融合,为售

书提供一切便利的可能性。

借力短视频平台的东风,售卖高热度、高流量书籍的策略也让蓝柳书店的客流量持续增加。2020年4月,TikTok中的图书话题标签#BookTok正式设立,并在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吸引了大量用户参与互动,发展壮大成为热门阅读社区。创作者以短视频形式讨论并调侃各类书籍,书籍类型主要偏向科幻小说与浪漫小说类等青少年文学作品。截至2024年12月,#BookTok话题下的短视频作品数量已经超过40900000,同时衍生出“让我凌晨3点哭泣的书”“我愿意出卖灵魂再读的书”等特色书单。蓝柳书店见证了这一波从TikTok而来的新客户,据瓦莱丽·克勒预计,现在商店大约10%的客流量来自#BookTok的用户,主要购买较旧的奇幻、浪漫与科幻类小说,而不是新书。同时,浪漫小说在#BookTok上的高热度直接推动蓝柳书店开设第一个以浪漫小说为主的读书俱乐部——浪漫书友会(Romance Book Club),目前浪漫书友会仍在举办,每季度在书店聚会一次^[14]。

3 社会效益:以空间为媒介的公益书写

网络社会,万物皆媒、互联全球,社会空间着实成为一种传播媒介。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空间不仅仅只是物质生产的容器与媒介,空间本身就是生产,即“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化为“空间本身的生产”的过程^[15]。雷·奥尔登堡(Ray Oldenburg)则认为“第三空间”是一种位于家(第一空间)和工作场所(第二空间)之外,可以满足社会公众聚集、松绑、社交需要的一种关键空间^[16]。以第三场所书店、住房工作书店、牛蒡草书店为代表的美国社区书店,以空间为契机、以书为核心,进行公益书写与实践,不再是以空间为工具的“利”基场,而是以空间为孵化器的“益”基场,“实现了‘物’之‘客体’以精神之‘主体’为‘原点/圆点’的意义指认与赋值”^[17]。

于社会空间而言,书店作为一个更具温度的“第三空间”,提供社交与切身感受的功能性体验在当下社会的重要性愈发突显,第三场所书店就是典型案例之一。从地理位置而言,书店处在居民区聚集的街角,有大型停车场和公园,具有很高的可进入性和容纳性。从提供设施而言,书店有大型公共场所、三家餐厅、社区活动室、舞台,为行动者提供了建立联结、培育情谊以及形成归属感的空间,致力于满足居民学习、聚会、举办社区会议等对第三空间的需要。书店的特色之一是拥有50多种现酿啤酒,不少

顾客不远千里为品酒而来,常常会出现啤酒档口排起长队的状况。店内提供专门的儿童区,设有丰富的儿童书籍,还定期举办“儿童故事时间”等家庭活动,“去书店”成为一种主动的家庭集体行为。书店经常围绕“书”和“阅读”举办各类互动体验,如写作班、文化课程和手工艺坊,据书店统计,这里每年举办一千多场免费公共活动^[18]。书店作为“第三空间”不仅是衡量城市文化发展的“标尺”,更是城市精神生活的外在表征和寄托人文情怀的“文化窗口”^[19]。作为第三空间的书店具有休闲娱乐的氛围,人们可以在此开展交谈并获得一种“在家”的感觉(at homeness)。在书店空间的体验中也并非局限于顾客被动的感受,或是感官对外物的接收,还包括在顾客主动体验的过程中。身体与空间发生互动,空间的意义就此融入了场所。这种互动体验有助于信息流动并形成社会强联接,顾客也通过自由的交谈与互动获得群体和地方归属感^[20]。

为改变“如果你得了艾滋病,无家可归,那就无法得到所需的救命治疗”之类现象,查尔斯·金(Charles King)等人于1990年创立了住房工作组织(House Working),并在六年后开办了住房工作书店。店内员工都是无偿志愿者,他们每周轮流收银、制作咖啡饮品、整理货架。书店几乎所有库存,包括书籍、唱片、食品都来自社区捐赠,员工和艺术家们志愿者将回收利用的旧物,加工成琳琅满目的工艺品、服装、配饰、家具、家居用品等^[21],而其利润则会100%用于住房工作组织的HIV救助,没有二选。截至目前,该组织已经为30 000多名受艾滋病毒感染或影响的纽约居民提供了全面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住房、医疗保健、膳食和营养咨询、心理健康、药物治疗、职业培训以及法律援助等,它已成为美国最大的社区艾滋病服务组织。住房工作书店不以追逐经济效益为要义,而是将发展的天平向社会效益倾斜,依托书店空间,为艾滋病歧视问题提供文化机构的解决之策及探索。

马克思指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22]“性别鸿沟”是美国填而未平的现实。破解之道何在?“媒介即隐喻”,女性主义书店借助“隐喻”的力量,正在重塑女性应有的社会地位:女性绝对不是一种附庸,而是一种独立存在^[23]。牛蒡草书店是一家建于2018年的女性主义书店,牛蒡草之“能指”是一种需要铲除的杂草,而其“所指”则是对社会弱势、边缘群体的一种帮扶^[24]。牛蒡草书店以此为起点开展空间生产实践,尝试通过精选书籍构建性别平等的知识体系,如书籍《他们眼望

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展现了黑人女性挑战种族与性别之双重压迫的抗争故事。通过举办读书会与讲座、开展性别平等宣传、邀约女性创作家与会等方式,试图开展社区对话并搭建女性宣传平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牛蒡草书店以女性主义为视点,却又不唯性别议题,而是将文化流动的场域从书店书架延伸至阿拉巴马州监狱的铁窗之内。书店定期向狱中捐赠书籍,并借助书信、网络,鼓励囚犯与书店读者建立笔友关系,帮助并力图打破社会中对“牛蒡草”群体的偏见。向狱中送书可以提供知识资源并打破信息隔离,书信、网络可以促进囚犯与社会重建联结,更是赋予被视为“社会病灶”之群体积极的能动性和重新定义自我的权力。“做笔友”成为狱中囚犯了解并融入社会的“第一公里”。这种跨越社会阶层与物理空间的文化交流实践,恰似牛蒡草顽强的生命力,不试图隔离社会边缘群体,而是尝试创造出让每个根系都能蓬勃生长的生态。

社区书店以空间为媒介的公益思考与实践,恰如空间生产理论所言,“空间是一种政治工具,它战略性地被人建立并规划起来用于特定目的^[25]”。当书籍不再只是静态陈列的商品,书架、配饰、灯光、色调、布局都成为空间生产的一环,书店从“书籍交易场所”进化为“文化意义发生器”,其社会效益已突破传统营销模式,进而朝着人文关怀与反哺社会努力。书店作为媒介空间,其生产实践不在于治愈个别,而在于通过空间意义的持续输出,完成对消费主义的柔性抵抗,让社会每处地带都能成为文化与自我再生的“苗床”。

4 结论

美国社区书店的旺盛生命力,源于其在社区的深度嵌入与对社会互动关系的多维重构。多维度发展的混合经营模式兼容了书店的公益使命与商业逻辑,书店既通过非营利性活动降低其运营成本,又借力复合业态与数字化平台提升经济效益。以空间生产理论观之,社区书店已从传统的物理空间升维成凝聚人文关怀的媒介空间。中美作为目前的前两大经济体,在多领域行业发展方面存在互鉴之处。目前,我国社区书店的发展模式侧重于社区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总体来说,仍存在数量少、受欢迎程度低等问题,与美国社区书店相比,在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方面存在差距^[26]。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美国经验表明,实体书店的存续不仅依靠商业创新,更需注重其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的公共属性,构建“经济-文化-传播”三位一体的价

值网络,方能在变局中实现文化韧性的永续生长。

参考文献:

- [1] 韩琦,米盖拉. 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29.
- [2] 吉井忍. 东京本屋[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2.
- [3] 张中华,张沛,王兴中. 地方理论应用社区研究的思考——以阳朔西街旅游社区为例[J]. 地理科学,2009(1):141-144.
- [4] 岸见一郎. 被讨厌的勇气[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27.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 [6] Who are we? [EB/OL]. [2024-11-20]. <https://www.sadiesforthepeople.com/about-us>.
- [7] RAFFAELLI R, NOE R. Institutional Emplacement and the Novel Resurgence of Independent Bookstores [EB/OL]. (2022-12-15) [2025-2-17]. https://www.hbs.edu/ris/Publication%20Files/23-033_dda3ed7a-5e5d-4c14-b532-3f946e4553c0.pdf.
- [8] 曹子郁. 图书新零售:以用户思维和场景思维重新定义书店价值[J]. 出版发行研究,2019(6):47-51,76.
- [9] BIERSDORFER J. Where to Find Native American Culture and a Good Read [EB/OL]. [2024-11-22]. <https://www.nytimes.com/2019/07/25/books/birchbark-minneapolis-native-american-books.html>.
- [10] Barnes & Noble [EB/OL]. [2024-11-25]. <https://www.bookweb.org>.
- [11] Strand Book Store [EB/OL]. [2025-04-25]. <https://www.strandbooks.com/>.
- [12] 齐世峰. 拥书百城:美国独立书店的兴盛之道[J]. 出版科学,2021,29(3):73-80.
- [13] Blue Willow Bookshop [EB/OL]. [2024-11-22]. <https://x.com/bluewillowbooks>.
- [14] NUDO M. How BookTok is Helping Houston's Indie Bookstores [EB/OL]. (2024-03-19) [2024-11-24]. <https://www.chron.com/culture/article/houston-bookstore-booktok.php>.
- [15]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等,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2022:40.
- [16] OLDENBURG R. The Great Good Place: Cafés, Coffee Shops, Bookstore, Bars, Hair Salons, and Other Hangouts at the Heart of a Community [M]. New York: Marlowe & Company, 1999:40.
- [17] 吴琼,刘晓明. 美国女性书店经营策略创新与实践[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7):127-131.
- [18] Third Place Books [EB/OL]. [2024-11-26]. <https://www.thirdplacebooks.com/about>.
- [19] 刘锐. 基于 SIVA 营销组合理论的英美独立书店经营创新研究[J]. 出版科学,2022,30(4):59-66.
- [20] 於红梅,潘忠党,陈意如. 探寻第三场所:一个空间可供性的视角[J]. 新闻记者,2023(7):45-64.
- [21] Our History [EB/OL]. [2024-11-18]. <https://www.housingworks.org/about-us>.
- [22] 马克思. 致路德维希·库尔曼[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 [23] DELAP R. Feminist bookshops, reading cultures an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 c. 1974-2000 [J].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2016(1):1-23.
- [24] Burdock Book Collective [EB/OL]. [2025-05-05]. <https://www.burdockbookcollective.com>.
- [25]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与政治[M]. 李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3-24.
- [26] 吴贇,叶芃,陈清然. 中美实体书店业发展现状与趋势的比较分析[J]. 科技与出版,2021(6):26-33.

叙事学场景下泗县皮影戏非遗文化与文创设计研究

肖 帅

(宿州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摘 要:阐述了泗县皮影叙事艺术特征,分析了泗县皮影叙事实践路径,并对泗县皮影文创设计实践进行了详细探究,以此说明以文创设计为手段对泗县皮影戏的保护和传承起到积极的作用,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设计。泗县皮影戏通过双重叙事结构、多重叙事行为以及民间叙事语言呈现了当地民间皮影戏的艺术手法和造型特征,并成为现代文创设计的重要文化素材。

关键词:泗县皮影;叙事结构;叙事行为;叙事语言;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4-0111-05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Sixian Shadow Puppetry and Cultural Creative Design in the Context of Narratology

XIAO Shuai

(School of Fine Arts and Design,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34000, Anhui)

Abstract: It elaborated on the narrativ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Sixian Shadow Puppet theatre in this paper, analyzed its narrative practice pathways, and explore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CC design in preserving and promoting this art form. It demonstrated that CC design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Sixian Shadow Puppet theatre, ultimately contributing to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design infused with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The Sixian Shadow Puppet theatre, with its dual narrative structures, multiple narrative techniques, and folk-based narrative language, encapsulates the artistic craftsmanship and unique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is local traditional art form, becoming a crucial cultural resource for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CC) design.

Key words: Sixian Shadow Puppetry theatre; narrative structure; narrative behavior; narrative language; aesthetic value

“叙事”,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字记载方式,就是用语言表达形式向观众讲述一个故事,传递一种思想,描述一种现象,简言之,就是“叙述”+故事。《周礼·春官宗伯·职丧》、《说文解字注》中就有关于“叙事”的描述,徐岱在《小说叙事学》中指出,叙事结构、叙事行为、叙事语言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叙述^[1]。泗县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泗州戏”的发源地,有“泗州戏之乡”之美誉,近年来江玉祥、唐兆福、余家坤、张廷华、马飞、何泽华、任其

安、涂生球等专家学者从皮影的制作程序、操作表演、历史渊源等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对于泗县皮影进行了归纳总结,这些研究充实了泗县皮影戏研究的史料资源,为泗县皮影叙事艺术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然而,在泗县皮影戏叙事结构中“表层”与“深层”关系、民间叙事语言表达形式、叙事行为多种呈现形式方面研究还存在不足。文章将从叙事结构、叙事行为、叙事语言三个方面对泗县皮影戏叙

收稿日期:2025-03-02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AHSKQ2022D180)。

作者简介:肖帅(1989-),男,安徽宿州人,讲师,博士。E-mail:308253204@qq.com

事艺术展开研究,并对泗县皮影叙事艺术的审美价值及其形成原因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泗县皮影文创产品叙事艺术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议^[2]。

1 泗县皮影叙事艺术特征

泗县历史文化积淀丰厚,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泗州戏”的诞生地,享有“泗州戏之乡”的美誉。数千年来,勤劳朴实的泗县人民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过数辈的薪火相传,创造出了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令人叹为观止。在历史长河中,泗县曾为古泗州的治所。泗州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堪称汉民族文化的典型缩影。其中,泗州皮影戏作为极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瑰宝,以其独特的表演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泗县的文化传承脉络中熠熠生辉,成为当地民俗文化遗产与发展的生动见证。皮影艺术作为一门古老的民间美术,存在于电影、电视等现代影视艺术还没普及的历史阶段;皮影戏作为民间最为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之一,它将历史故事、民俗生活、地方戏曲等题材借助于光与影的相互配合,表达了人们追求真、善、美的思想内涵。

泗县皮影戏作为农耕文化的产物,是一种古老的乡土艺术,与民间信俗紧密相连。在影人制作上,泗县皮影戏运用独特的绘革技艺,历经选皮、制皮、雕刻、上色等多道精细工序,将皮料精心雕琢成独具风格的造型,充分体现了民间美术与手工技艺的深度融合。表演时,配合激昂或婉转的音乐,演绎着精彩的故事,将戏剧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融合多种艺术手段的古老民间艺术形式,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现其独特的叙事艺术特征。

秦德华,作为泗县秦家皮影的第五代传人,6岁便跟随父亲学习皮影制作,13岁时开始登台演出,一辈子都在从事皮影戏的演出,至今已年逾古稀,作为安徽省皮影戏技艺传承的代表性人物,仍然活跃于皮影文化的传承推广中。^③

1.1 以绘革技艺构成叙事手段

绘革技艺,当地人也称为“绘革社”,以手工形式对于牛皮、羊皮、驴皮进行加工,用红、黄、绿、黑四种颜色进行装饰,局部适当进行彩绘,脸谱造型采用抽象与写实方式相结合,多数以写实为主,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民间艺术风格^[3],通过影人雕刻在材质和皮革上进行设计创新,赢得“造型粗犷,古朴明快,简洁典雅”的称赞。泗县皮影因“绘革”“拉魂腔”两项独有的艺术特征而深受宿州、

徐州、豫东、鲁南等地区老百姓的喜爱。

泗县皮影绘革技艺指采用绘画的方式在经过镂空好的上等皮质材料上进行再次的设计创新,整个步骤分为8个部分。选皮,所选择的皮料要求能够坚韧耐用,迎着光照能够比较透明,通常会选择上等的牛皮作为制作对象。制皮,就是将挑选好的牛皮放入凉水中浸泡两至三天,用刀将牛皮上多余的皮、毛刮去,经过三、四次挂制后,牛皮变得薄且光亮,刮好后放在阴凉处晾干就可以了。画稿,制作皮影时有专门的画稿,这些图稿是经过祖辈世代流传下来的。过稿,用钢针等比较锐利的工具把具体的图案镌刻在修整好的皮面上。镂空,手艺人用不同的刀具将图案雕刻在皮面上。敷彩,手艺人采用印刷墨水进行上色,使得皮影在光源的照射下色彩绚丽。发汗熨平,采用电烫斗等工具使皮影中蕴含的水份挥发掉,从而使皮影的颜色更加栩栩如生。缀结完成,手艺人通过在皮影的关键位置装上卡口,能够使单一的皮影具有跑、立、坐、卧、躺、滚、爬、打斗等多种动态功能,丰富了皮影的活动空间。通过上述8道工序,静态的皮影形式被惟妙惟肖、形神兼备的艺术语言所取代,产生出一种艺术形式的融合创新。《小蝌蚪找妈妈》皮影中小蝌蚪的形态、青蛙在荷叶上的跳跃动作,都是皮影艺人通过多年的操作使得整个故事场景栩栩如生,让人流连忘返。

泗县“拉魂腔”,将泗州戏曲调进行了整合扩展,融合了慢板、紧板、剁板、二行板等音乐节奏,演出时能够根据剧本情景,现场结合人物情绪,表演朴实,内容健康向上,曲风优美,尤其是女腔变化丰富,大人、儿童都能即兴唱上几句,形成了“从东庄到西庄,要听还是拉魂腔”俗谚。泗州戏的表演艺术形式、曲调风格在泗县皮影戏的表演中得到了挖掘和提升。

1.2 以情节、情态模式完成叙事表达

泗县皮影手艺人一方面追求皮影制作技艺的考究,完成每年演出任务,另一方面也迎合市场潮流和百姓的口味,在“制作”“技艺”“剧本”等方面通过情节模式和情态模式对于清朝道光、咸丰以来形成的皮影叙事制作过程进行分类。

情节模式,作为一种再现故事全貌的叙事模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占据着比较大的比重。在泗县皮影技艺传承过程中,人们对于泗县皮影绘革技艺感到十分佩服,实际上可以归纳为对兽皮材料的雕刻之美和色彩配置之美的期待,对手艺人手工操作如此娴熟的深深佩服。情节模式一直是向外界介绍皮影制作过程的主要叙事形式,这种方式也是宋

元时期“讲史”和“说话”方式在民间手工艺传承上的一种表达方式的承袭。

情态模式,就是将皮影传承人置于叙事讲述的中心来完成皮影叙事艺术的传播。手艺人手工艺作品作为具体活动的主导者与被操作对象,在人与人造物(皮影制作品)的互动中创造出一种以自然形态为平台、表演技法为载体,传统文化曲目为媒介的情态模式。泗县皮影制作过程以及戏剧、音乐、美术等在皮影表演过程中的转化发展关系、泗县皮影“做工”和“艺术”技艺价值及非遗文化传播的当代意义是情态模式重点关注的。

2 泗县皮影叙事实践路径

就泗县皮影文创产品造型及材料选择来看,依旧是采用泗县地区独有的皮影制作技法,辅之以当地皮影表演剧本,采用手绘与电脑辅助设计的方式呈现出一种兼具实用功能与欣赏功能的文创产品。然而,随着泗县皮影文创产品叙事审美发展的需要,皮影创作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欣赏人群发生了变化,从一度以传播人生礼俗、民间信俗、消费习俗和生产商贸习俗到寻常百姓的居家日用,泗县皮影艺术需要从叙事结构、民俗语言与创新行为三个方面进行“叙事生活化”的探索,使其更具有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这其中需体现历史继承性和民间民俗性。

2.1 双重叙事结构形成泗县皮影叙事艺术基础

泗县皮影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叙事结构上具有“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传统文化”的双重叙事属性,这一叙事属性建立在讲述泗县当地皮影艺人艰苦奋斗的基础上,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传承人语言表述方式和技艺展示形式(表层叙事结构);第二,体验者沉浸式的体验感受(深层叙事结构);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共同建构起泗县皮影艺术的双重叙事结构。

2.1.1 表层叙事结构

泗县皮影传承人秦德华将皮影的历史渊源、技艺特点、产品成型、民俗艺术等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学徒,学徒通过这一方式继承了皮影制作技艺,建构起皮影表层叙事结构。随着泗县皮影制作技艺的大力推广,特别是通过不同类型的展销会、博览会和大师讲座、高雅艺术进校园、设计竞赛等活动的推广,越来越多的观众被这种指尖上的绘革技艺和复杂多变的色彩配置所吸引,这种以传承人为核心的叙事形式使得泗县皮影能够得到众多消费者的重视与关注。很多观众对于材料与技巧、使用者的各种点子,创作者的信念、作品的灵魂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光与影的变换中,观众在欣赏诸如《水漫泗州》等作品中亲身感受到皮影手艺人的执著与追求,领略到泗州戏的深厚的艺术魅力、表现方式与技巧,体验皮影戏的表演过程,感受皮影的实用性、观赏性、地域性和民族性,体验现代工业理性所不能代替的清新感。在表演中,秦德华将自己对于《水漫泗州》作品的理解和拉魂腔说唱结合起来,人物形象在光与影的变换中越发生动立体。以传承人讲述为核心的叙事方式,使得泗县皮影叙事结构能够突破非遗项目时空与地域的局限性,并可以进行多个侧面故事的讲述。在这一正面叙事结构的基础上,皮影的技艺展现更加立体化,历史继承性更加鲜明,项目题材更加丰富、实体价值更加多元,与观众的距离感更近。

2.1.2 深层叙事结构

结构主义强调整体间的相互关系,整体的结构决定着各要素的地位,要素在位置上的变化,亦影响到其他要素乃至整个系统,它强调要素对系统的依存性,强调整体大于要素之和。“形”作为一种符号,不仅是某事或物的代表,它还可通过本身意义,诱发行为功能,“形”与“功能”是相依存、互为因果关系,这种审美观也正是深层叙事结构理论的核心。

就泗县皮影文创产品而言,把皮影文创产品视为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产品的价值与意义不仅是一个容纳与支持行为活动的物质个体,而且包含了一连串诸如材料、性能、心理、个性、安全……等文化象征意义。泗县皮影文创产品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系统,包含了皖北地区人类文化的诸多现象,如人生礼俗、民间信仰、四时节令、社会习俗、社交仪式等,具有普遍文化意义。泗县皮影文创产品孕育着泗县皮影人勤劳朴实、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生活秉性和聪明智慧,赋予了更多的“向真、向善、向美”的创作内涵和哲学思考,建构起皮影艺术深层叙事结构。

表层结构就是结构之技,深层结构就是结构之道,二者的表现形态虽然有时有隐、显之分,却非绝对如此,它们之间不乏隐中有显、显中有隐的交叉或交融,有时则处在隐、显之间。^[4]结构之道如同泗县皮影绘革制作技艺,采用恰当的创作形式才能够体现泗县皮影的制作传统,蕴含泗州戏“野艳、明快、爽朗”的艺术风格,体现皖北地区居民率直又内敛的行为方式。器型之上便是结构之技,对于泗县皮影制作来说,绘革制作技艺传递出手工劳作的原生态与地域性,与当地人习惯于手工劳作传统一脉相承。技与道的结合过程就是泗县皮影的设计理念与

表演形式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传承人具体演示和体验者的亲身实践的双向互动,从而把手艺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对于“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执著进行了由部分到整体、由表层到深层的双重叙事建构,体现了泗县皮影的当代艺术价值。

2.2 民间叙事语言构成泗县皮影叙事艺术核心

语言作为传递情感、表达语意的一种交流方式在均陶叙事艺术中具有重要作用,其民间民俗性特征融合在泗县皮影表演的每一过程。许多上了年纪的观众非常热衷于与皮影手艺人交流,对于“不看影戏,不知礼仪”皮影表演现场有着深深的眷恋。他们会仔细询问作品的每一细节,甚至对于制作者的业余爱好也要进行详细的了解,说到高兴处,还会就《西游记》《东游记》《水漫泗州》等剧目中的人物角色与皮影手艺人进行探讨。纵向的泗县皮影制作历史和横向的个体生活片段在历史继承与民间民俗活动中进行了碰撞,叙述艺术将二者进行了充分融合嫁接,留住记忆中的“乡愁”便成为泗县皮影制作表演最直接、最具有地域性的特征,叙事语言也呈现出“儿时的记忆是最清晰的”的怀旧趋势。

2.3 多重叙事行为彰显泗县皮影叙事艺术价值

在泗县皮影的叙事过程中,叙事结构方式和语言形式都离不开具体的叙事行为主体,每一件作品背后都隐藏着一定的叙事行为,其表现形式是以人的具体参与体现叙事艺术的价值。叙事的主角作为“陈述行为主体”或可称为“发言人或讲话者”,叙事行为是传承人在泗县皮影制作表演叙事艺术中的主要存在方式,叙事行为包括三个方面:叙事者、被叙述者、缺席的叙事者。叙述者以一种由表及里的叙述方式对泗县皮影制作表演叙事艺术手法进行分析理解,被叙述者在接受其言语表达过程中理解其叙述的“价值意向”,对皮影作品的品位、绘革制作过程及创作意境进行反复体验,进一步对皮影作品所蕴含的艺术价值进行阐释。

作为时代的经历者和见证人,秦德华在皮影制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前辈的悉心指导,也通过自己的扎实工作,得到了许多同行专家的赞许,创作精品、传授技艺成为他一直以来专注皮影制作的不竭动力。在秦德华身上,流淌着师徒传承的血液和传统文化的基因。秦德华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在我的眼中,皮影戏是有生命的,它通过影人的形象、动作和表演者的唱词,向观众讲述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以此打动人,可以说是借灯显影,以影显形……”,许多参观者在秦德华浅显易懂的叙事语言中被这种淳朴、执著的敬业品质所感动,感受传统技艺与现代文

明体系的碰撞与融合^[5]。泗县皮影叙事行为通过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的双向互动实现了共鸣。

通过作品去“聆听”大师“叙述”当时的创作意图和制作过程,再现皮影手艺人的执著与追求,感受手艺人创造力的本源^[6],重温品味和消费在17世纪、18世纪均陶作品中的具体体现^[6],体会手艺人从“学徒”到“师傅”的完美过渡^[7]。对于喜多俊之所说的“产品的功能与美感、价值感要在经济面上取得平衡才会被世人接受……”^[8]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泗县皮影叙事艺术价值以这样一种直观生动的方式进行了展示与延伸,使人印象深刻。

3 泗县皮影文创设计实践

泗县皮影作为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标志与IP形象的设计蕴含着独特的文化逻辑与艺术价值,是地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深度融合。

首先,泗县皮影标志的设计,以地域文化为核心,巧妙提取“泗县”之“泗”字,将其进行艺术化变形,其中字母“S”的形态转换构成了标志的主体轮廓(见图1)。这一设计不仅是对地域名称的直观呈现,更通过灵动的线条韵律,传达出泗县的地域文化特征。同时,标志的设计融合了皮影戏在幕布上的呈现效果,即皮影独特的剪影轮廓与动态美感;叙事情节和情态模式在两个“S”的形态转换中获得了统一,“做工”和“艺术”的技艺价值在传播和表演中得到了提升。灯光下皮影在幕布上投射的影像,是皮影艺术的核心视觉元素,被抽象概括后融入标志设计,赋予了标志鲜明的艺术属性与文化辨识度,使受众能够迅速建立起与泗县皮影艺术的视觉联想。



图1 泗县皮影标志

其次,泗县皮影的IP形象“影影”,其设计灵感来源于泗县皮影的发展脉络与表演艺术。自清朝传入泗县后,皮影艺术在当地传承发展,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影影”的形象设计以清朝女子的头饰与整体造型为基础,展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风貌,呈现出古典文化韵味。同时,设计者深入挖掘

本地民俗文化,将泗州戏的演奏工具柳琴融入其中,突出叙事结构方式和语言形式,表现形式是以人的具体参与体现叙事艺术的价值。皮影演出常与泗州戏相互配合,柳琴作为泗州戏的代表性乐器,其独特的造型与音色成为地域文化的符号之一,融入 IP 形象设计,极大地丰富了“影影”的文化内涵与地方特色。

最后,“影影”的衍生形象还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其设计基于泗州大鼓书、泗县舞花挑、泗县划旱船这三种民间艺术。这些衍生形象通过多重叙事行为,再现了叙事者、被叙述者、缺席的叙事者的“陈述行为主体”对民俗文化元素的精准提炼与艺术加工,生动地展现了不同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见图 2)。



图 2 泗县皮影 IP 形象设计“影影”

因此,在泗县皮影文创设计过程中,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挖掘情节模式和情态模式叙事语言,设计出的人物形象既具有表层叙事形式(人物形象),又具有深层叙事形式(人物寓意特征)。使其在造型与色彩上既符合民俗文化的传统特征,又具备现代审美视角下的视觉冲击力与表现力。色彩运用上,选取明度复古的色调,通过色彩的组合与搭配,营造出独特的视觉氛围,不仅增强了形象的艺术感染力,更使受众在视觉体验中感受地域文化的历史厚重感。

4 结论

泗县皮影叙事艺术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在理论上通过双重叙事结构、多重叙事行为和民间叙事语言呈现皮影民间艺术手法和造型特征,彰显叙事艺术的历史继承性和民俗民间性,体现出皮影艺术的审美价值。皮影手艺人自我实现价值的内心独白,皮影手艺人真实的生活都不同程度上得到了传承与传播。未来需要进一步扩展泗县皮影叙事艺术理论本体审美价值研究,助力皮影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注释:

① 《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787 页,

及第 793—794 页。唐代贾公彦疏:“掌其叙事者,谓陈列乐器及作之次第,皆序之,使不错缪。”

- ② [汉]许慎撰写,[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44 页《周颂》:继序思不忘。传曰:序,绪也。此谓序为绪之假借字。

参考文献:

- [1] 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5.
- [2] 景晓璇.《老残游记》叙事艺术研究[D].锦州:渤海大学,2020.
- [3] 江玉祥.中国影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228.
- [4] 胡飞,杨瑞.设计符号学与产品语意——理论、方法及应用[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130,137.
- [5] 喜多俊之.给设计以灵魂[M].郭菀琪,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125.
- [6] 杜朴,文以诚.中国艺术与文化[M].张欣,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316—318.
- [7] 白英.中国手艺人[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211.
- [8] 杭间.手艺的思想[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5.

田野调查视域下蚌埠市非遗烙画的存续发展研究

汪二董^{1*}, 吴衍发²

(1. 泰山科技学院 非遗研究中心, 山东 泰安 271000; 2. 安徽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结合烙画的发展历程及艺术特征,以蚌埠市非遗烙画为例,利用田野调查法、访谈法,对蚌埠市烙画传承人、传承场地等进行实地调查采访,发现蚌埠市烙画技艺在传承人方面存在青黄不接、意志疲软的传承困境和传承危机,政府扶持的缺乏同样使蚌埠烙画陷入传承困局,基于此,从人才培养、开发宣传、创新途径三个维度、八个方面出发,分析蚌埠市非遗烙画的存续情况及策略。以期烙画艺术在之后能够得到当地政府及社会的更多关注,烙画文化能够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关键词:蚌埠烙画;柳聪;发展现状;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3-0116-06

Research on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aintings in Bengbu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Investigation

Wang Er-Dong^{1*}, Wu YanFa²

(1.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Center, Taisha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an, 271000, Shangdong;
2. School of Art,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Combi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brand painting, taking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rand painting of Bengbu City as an example, it used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 and interview method to conduct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s on the inheritors and inheritance sites of brand painting in Bengbu city in this paper, and found that there is a dilemma and crisis of inheritance in the inheritance of brand painting skills in Bengbu city, and the lack of government support also makes Bengbu brand painting fall into the inheritance dilemma. The survival and strateg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aintings were also analyzed in Bengbu. It hoped that the art of branding can get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the future, and the culture of branding can be passed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Key words: Bengbu branding painting; Liu Cong; development status; development strategy

田野调查法,源自于最早的人类学研究,是相关科学研究工作开始之前获得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步骤^[1]。非遗工作的延续,离不开一个前提,那就是田野调查。烙画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风行一时,但受社会发展和烙画自身因素影响,烙画艺术由盛转衰^[2]。其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21世纪后,会遇到何种发

展机遇?传承状况如何?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如何?在传承和创新问题上是否遇到瓶颈?在获取以上问题答案的过程中,田野调查必不可少。笔者以蚌埠市非遗烙画及烙画代表性传承人柳聪为主要调研对象,结合桌面调研资料,在了解蚌埠市非遗烙画发展历史和传承现状的基础上,共同探索推动烙画艺术发展的策略。

收稿日期:2025-01-10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19ZD01)。

作者简介:汪二董(1996-),女,安徽宿州人,助教,硕士。E-mail:2772906597@qq.com

1 非遗烙画的历史经纬

烙画又称火笔画,起源于西汉,兴盛于东汉,是中国传统艺术珍品。在古代,烙画被广泛应用于家具、建筑装饰、器皿等方面,是实用性与美观性兼具的一种艺术形式,是古代工匠技艺、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展现。烙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瑰宝,呈现着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3]。烙画技艺现主要分布在安徽、河南、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烙画艺人利用被火烧热、达到一定温度的烙铁,在物体上熨出烙痕来作画。在创作烙画时,烙画艺人不仅要根据画面把握烙具的火候、力度、角度及压力,还要注重“意在笔先、落笔成形”的创作要求。早期烙画仅在木板、树皮、葫芦等木制材料上进行烙绘,结合创作材料自带的自然纹理、斑点等原始特征,反复观察和思考,将想要创作的题材与创作材料的纹理、斑点等原始特征完美融合,呈现既自然又和谐的创作风格,利用碳化原理,辅以控温技巧,烙绘出具有一定浮雕效果、以黑、棕、茶、黄、白五色为主要色调的烙画作品。

完成一幅完整的烙画作品,一般需要经过选材、设计、打稿、构图、细修、装裱等多项步骤,其中选材和设计是最主要的步骤,因为它关系到后期作品的展示状态。随着时代的变革和技术的飞跃,烙画的呈现载体除以上提及的木板、树皮、葫芦之外,烙画艺人开始寻找新的艺术载体,在竹木、宣纸、丝绸等材料上进行大胆尝试,勾画烘烫作画,创作难度也随之增加,烙画的呈现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在不断的摸索尝试之下,烙画艺人结合个人不同的实践经历、文化背景、生活体验等,选择不同的、适合自己的创作材料,展开相应的艺术创作,进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2 蚌埠烙画的发展现状分析

作为“中国火笔艺术”的代表,烙画在国际展览中展现东方美学独特性,成为跨文化对话的媒介,同时其对天然材料的使用不仅蕴含着工匠精神,而且展示着匠人的生态理念。无论是在文创作品中,还是文旅体验中,亦或高端艺术品市场,都能发现烙画的身影。非遗当以传承为根脉,精心擘画其发展蓝图,以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精彩交融,作为众多绘画艺术形式中的一种,烙画也不例外。据调研,蚌埠市非遗烙画目前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除传承人青黄不接、意志疲软外,政府护持政策的缺失,也是蚌埠烙画出现传承困局的重要因素。若想改变当

下蚌埠烙画的传承形势,需认真分析其传承困境、传承危机和传承困局,进而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

2.1 青黄不接的传承困境

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蚌埠烙画在传承人方面出现人才断层的尴尬局面,即随着老一代传承人的逐渐隐退,新一代传承人或是热衷于新兴行业无心传承,或是尚不能挑起重担,出现青黄不接的传承困境。非遗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承载者和传递者,作为文化传播的主体,不仅承担着非遗活态化传承的责任与使命,同时也是保障非遗传承发展的核心人员,是非遗传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柳聪作为蚌埠市非遗烙画传承人之一,创作出《芙蓉锦鸡图》《仙人游戏图》《十八罗汉》等作品,无论是形态与色泽,亦或虚实与变化,都展现着高超的烙画技艺功底。据柳聪介绍,目前找他学习烙画技艺的学员陆续有几位,但最终迫于学业、生活等压力,学习并不够深入,学习被迫停止。除了找他学习的学徒之外,柳聪也让自己的女儿学习烙画技艺。柳聪抓住身边一切机会传承自己的烙画技能,培养更多的烙画传承人。一项非遗项目没有传承人就意味着这门手工艺随时面临失传危机,而出现传承人才断层的基本原因包括两个部分:缺乏核心人才培养;缺乏人才梯度建设。以上两种原因,会造成一个组织或是一项技艺群体的核心骨干人才在数量及质量上都较为欠缺,这将导致不同领域、层次的人才之间差异性越来越大^[4]。目前蚌埠烙画的传承在人才培养及人才梯度建设两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人才培养方面:经调研,目前蚌埠当地还未组建专门的文化传习班或文化普及班来为烙画的传承奠定基础,招揽人才;且在“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非遗相关活动中,受到烙画创作工具、创作时长等条件的束缚,导致更多人偏向于相对简单、上手较为便捷的剪纸、拓片等非遗项目进行了解、体验和学习,以上原因导致蚌埠烙画出现传承人才在数量上难以招揽的局面。人才梯度建设方面:一个有效的、合理的人才梯度结构可以使一个组织在面对内部人员流动或者外部环境变化时(如市场的变动、科技的变革等)保持相对稳定,这也因为有相应的人才及时填补空缺,或者是根据不同层次的人员质量进行灵活调整。但蚌埠烙画目前的传承人员除传承人之外,技艺水平均属于初级,层次等级总体偏低,在烙画传承这个组织中,人才梯度建设不完善间接导致传承人质量较低的局面。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使得蚌埠烙画目前处于青黄不接的传承困

境。

2.2 意志疲软的传承危机

从心理学概念理解,“意志力”指的是一个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来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克服各种困难,从而实现目的。而这其中最难的就是为了达成目的,要克服各种困难,一旦被困难拦住,则目标无法实现。蚌埠市烙画传承人柳聪说:“谁不想看到自己的技艺能够有人继承,但现在这种社会环境,大家都很难静下心来打磨和钻研,要寻找一个能够长期、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的徒弟,太难了!我甚至愿意免费为他们提供素材、无偿地教给他们烙画技巧,只要他们愿意来找我学习。”

结合非遗所遇到的各类传承问题,不难看出,传承人对艺术坚守的意志力,是非遗能够存续发展的关键核心要素。据柳聪介绍,一幅很小的烙画作品也要数小时甚至几天、几个月才能完成,这其中考验的不只是烙画技艺的熟练程度,还有对烙画文化坚守的意志力,要能够耐得住诱惑,坚守自己的本心。柳聪还提到,早些年,陆陆续续有人因为兴趣找他学习烙画,但都因外界生活的快节奏或是看不见未来发展、耐不住制作过程的枯燥等因素,被迫中途放弃。除此之外,科技的进步,使传统手工艺面临机械化的冲击和被淘汰的危机,这也是学徒在成为真正的烙画传承人的路上所要面临的危机。各类工艺品的批量化生产,确实会使传承人、非遗爱好者等对非遗技艺传承产生迷茫,内心产生是否坚持传承的疑惑,思考非遗传承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而只有意志力坚定的传承人才能固守本心,砥砺前行,守护非遗技艺。由此可见,蚌埠烙画要发展、要传承,需要强大的意志力为保障,战胜困难及各种瓶颈,继而不断锤炼技艺,摆脱意志疲软的传承危机。同时此类传承情况,在众多非遗项目类别中也有所出现,而此种现象的解决还需要各界非遗传承人耐心打磨、钻研技艺。

2.3 缺乏政府护持的传承困局

在非遗保护工作中,政府作为现阶段社会管理工作的主要参与者和引导者,拥有政策引领、法律规范、资源整合、文化传播、社会认同等多项职能,起到凝聚社会力量、构建文化认同的作用。

蚌埠非遗烙画缺乏政府护持的传承困局,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宣传范围的狭隘,在烙画宣传工作上,除相关专业人士外,大部分人还并不了解,甚至未曾听说过烙画艺术,导致烙画声名不显,从而直接造成传承人、学徒较少的后果;另一方面,关于非遗传承人补贴,政府的补贴额度微乎其微,并

不能够维持传承人的正常生活开销,且烙画创作材料,如竹片、葫芦、扇面等属于消耗性材料,需要不断购买而补贴金额杯水车薪。作为各种职能的主要执行者,政府会赋予不同的事业单位、公民以及社会组织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对非遗进行保护和利用;同时,政府是非遗保护的引导者和维护者,只有政府制定出针对性的政策及法律,对非遗实施必要保护,才能更有效地促进非遗传承和未来发展。如:加强非遗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加大传承人的筛选及培养力度;扩大非遗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等^[5]。调研发现,蚌埠市关于非遗烙画保护传承的相关政策、手段、制度等都较为缺乏,这也成为很多手艺人不愿意或不能够去传承这项技艺的主要因素。由此可见,政府的护持在蚌埠烙画的传承保护中担负着政策保障作用,若政府行为上能够做出相应改善,增强对非遗烙画的护持力度,相信蚌埠烙画传承的未来一定会蒸蒸日上。

3 蚌埠烙画的发展策略

非遗作为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基因和传统智慧,体现着古人对生活的观察及审美情趣。在文化层面,非遗构成文化多样性;在历史层面,反映着不同朝代工艺水平的变化和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在社会层面,增强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凝聚民族精神;在经济层面,带动地方经济,形成特色产业。可见非遗的发展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蚌埠烙画作为非遗众多种类中的一项,同样具有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责任,以下从人才培养平台的创建、宣传渠道的开发、创新路径的思考三个角度出发,探索蚌埠烙画发展的相关策略。

3.1 创建人才培养的多维平台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这句话表明人才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它们共同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展。只有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才能够更好地推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继而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6]。在文化传承中,非遗人才是技艺传承的载体,能够确保非遗的延续,传承文化精神内涵,从而维护文化多样性;在经济发展中,非遗人才能够促进就业创业,推动非遗产业发展;在社会价值中,非遗人才通过展示和传播非遗,能够增强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促进社会稳定,提升社会文化素养。由此可见,人才培养对非遗传承有重要意义,以下从知识学习、实践操作和社会互动三个维度出发,对非遗人才的培养展开思考与论述。

知识学习维度。由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实施的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为的是帮助非遗传承人“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有效调动了院校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结合以往的田野考察,可以发现目前大部分非遗传承人年纪偏高,文化程度不高,因此存在技艺高超,但限于文化知识的浅薄,缺乏相关文字、语言功底来宣传、保存、传授技艺,从而导致技艺的失传。烙画传承人柳聪也在采访中说道,烙画的创作需要大量的文化积累,只有这样才能在某些瞬间迸发出创作的巧思与灵感,否则创作的作品将千篇一律,丧失灵气与魅力,这将会阻碍烙画的未来传承与发展。基于此前提,非遗人才的培养视角可以聚焦至中小学、大学、教育机构等,致力于培养和挖掘“有文化”的传承人,借助学校的育人场所和政策,与烙画传承人签订定期的“进校园”活动,在全校范围内深度挖掘“校内传承人”——学生,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从而挖掘烙画爱好者,进行集中授课或培养;亦可以通过组建烙画社团的形式,让烙画传承人带领非遗爱好者们共同探索和学习,形成传、帮、带的社团制度,影响和培养一批优秀的校园传承人,让学生们在上好学的基础上,学会、学好进而传承烙画技能。

实践操作维度。非遗人才的培养,除专业知识或文化知识的积累之外,政府的各项政策和非遗类的各项比赛,同样不容忽视。政府政策层面,从调研中了解到,每月或每年的定额补贴并不能让大家坚守住对非遗传承的决心。在非遗传承人的选择上,政府的考核内容主要是针对知名度或是申报材料的完善程度,建议将传承人的文化素质修养部分也纳入考核之中,同时进行实地调研,对材料真实性进行核验,确保让文技兼修的人入选市、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除政府采取的措施之外,传承人个人应多参加非遗类的各项赛事,如“非遗文创大赛”“非遗广告设计大赛”“互联网+大赛”等,不断与各类非遗项目展开互动,互通有无,从而取其精华,实现烙画项目的去陈出新,创新性发展。

社会互动维度。随着非遗类的综合性政策《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等政策法规的颁布和各项人才培养政策的提出,非遗类的各项社会性互动活动层出不穷,如:非遗之夜、非遗展览、非遗市集、非遗表演秀、各类跨界晚会表演等,此类社会互动,就需要传承人积极参与,去宣传非遗,烙画也应如此,在确保烙画传播广度的基础上,才能对烙画的

传承深度提出要求,通过借助社会互动的影响力,寻找烙画发展的突破口。

3.2 开发烙画宣传的多维渠道

数字化、科技化、信息化的社会背景下,“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观念在今天已然不再适用。大众对物品的选择,开始受多重因素的影响,除物品自身价值功能外,宣传度、知名度也是大众衡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亦是如此,只有去宣传才能扩大知名度,才能引发大众的兴趣,大众才能主动去了解、去学习、去思考文化的起源、发展与嬗变。蚌埠烙画同样应该借鉴其他非遗项目成功的宣传案例,借助烙画的线下活动助力烙画传播,依托传统媒体加持烙画传承,使用数字媒体赋能烙画存续和创新。

线下活动助力。线下活动的意义在于能够为大众提供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从而进行直观、直接的互动。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但不限于:“非遗进校园”、线下培训班、线下宣讲会、线下非遗比赛等,如在学校、企业、社区等场所举办非遗相关的宣讲会,在宣讲会上设置专门的展位展示烙画作品,结合现场讲解,吸引游客关注,同时邀请烙画、剪纸、木雕等非遗传承人进行分享,并设置互动答疑环节,一对一解决大众的疑惑。如:烙画是什么?烙画学习需要多久?烙画的制作流程是什么样的等一系列问题,经过线下咨询,让大众与传承人建立联系,通过真实的、密切的接触与了解,潜移默化地吸引大众的兴趣,扩大烙画的知名度和传播范围。同样,“非遗进校园”活动,需要学校的相关安排和组织,在此前提之下,学生是最具潜力的传承群体,传承人应把握一切展示的机会,向学生、老师进行技能展现,最大化地利用和影响学生群体,将线下活动的价值淋漓尽致地进行呈现。

传统媒体加持。除线下活动之外,媒体宣传也是更快地让大众了解的方式之一,较为传统的媒体宣传方式包括广播广告、报纸杂志、户外广告等形式。如:利用广播电台的不同频段和节目对蚌埠烙画进行宣传,在交通广播的高峰时段,向开车的上班族介绍非遗知识,介绍蚌埠烙画技艺;在当地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刊登蚌埠烙画的相关报道,全方位扩大烙画的知名度;在城市的主要交通枢纽(如公交站)、商业中心、高速公路等位置设置广告牌,对烙画的相关作品、传承人、宣传视频等进行展示与介绍。借助传统媒体的宣传作用,增加非遗的曝光度,但实现以上宣传的前提,更多的还需要依赖政府的护持,将政策或是资源向非遗倾斜,传统媒体才能更高效地从空间层次加持烙画传承。

数字媒体赋能。数字媒体包括数字化的文字、图形、图像、音频、视频等,与传统媒体相比,数字媒体具有交互性、即时性、集成性等优势。例如,数字杂志不仅有精美的图文内容,而且有超链接、动画、视频等多种元素,增强阅读体验,这是传统纸质杂志难以实现的。常见的数字媒体包括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都可以通过创建相关账号,定期发布与烙画相关的、有价值的内容,包括推送文章、图文消息等吸引用户关注,还可以设置互动环节,以此来增加用户关注度。同时借助短视频风口,拍摄烙画的创作过程,对烙画进行普及性的介绍和展示,借助数字媒体的超强传播力,吸引各行各业的爱好者了解烙画、学习烙画。

3.3 探索烙画创作的创新途径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蚌埠烙画要传承延续,其创新发展同样至关重要,否则也必将被时代的洪流淹没。在遵循其传统制作技法基础上,烙画艺人对烙画的工具、材料、题材、创作思路等进行合理创新,让烙画技艺能够长久发展。

3.3.1 蚌埠烙画的创新现状

柳聪说:“手艺人生存下去的本源,是主动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不是被动接受保护,只有这样烙画才能不断发展。”在与柳聪的交流中了解到,不论是烙画创作材料的创新,还是烙绘内容的改变,柳聪都在不断思考和尝试。可以说柳聪的烙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随市场和时代的变化不断更新。据柳聪介绍,在烙画面临传承困境时,其创新显得尤为重要。据调研了解,刚开始柳聪主要从事葫芦烙画,后来有人让他尝试在竹子上烙绘,经过主动尝试,他开始学习竹子的各种种类及习性,全方位了解竹子,根据不同竹子的外部和内部特征进行创作。

如图 1:《庭院深深》,柳聪利用斑竹不同的斑点,结合构图,让这些斑点融合为烙画作品的一部分,使斑点与画面完美融合的同时,画面更加自然不扭捏,同时在这些斑点的衬托之下,更加突出了庭院的寂寥和空旷。

如图 2:《秋思》,柳聪将斑竹表面类似于雨点的斑点融合到画面中,鸟落在枝头,斑点自然化为秋雨,秋雨的急切和鸟的弱小形成鲜明对比,在急雨到来时,思念总是猝不及防。在柳聪的作品中,这种新奇的创意有很多,都体现着他对画面布置的深入思考。这幅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性,让人能够在烙画中充分领略艺术之美、文化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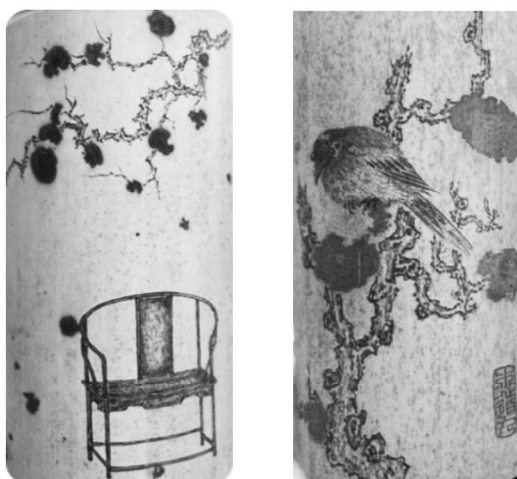


图 1 柳聪作品《庭院深深》 图 2 柳聪作品《秋思》

3.3.2 蚌埠烙画的创新途径

柳聪是这样理解创新的:“创新是必须的,但并不是推翻之前固有的一切,而是要在适应生活、社会、市场等条件之下,进行合理适度的创新。”因此,创新不应是一味地追求形式或内容的新颖,而应结合各项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衡量。

首先,在题材上要结合绘制材料特征进行创新。烙画早期仅在木板、树皮、葫芦等木制材料上进行烙绘,其材料较为传统,后经不断创新和尝试,在更高难度的竹片上进行尝试,这些材料的共同特点,都是较传统的器物,在思考其创新时,要结合材料的特质特征进行图案设计,而不能一味追求题材创新。要让图案与烙画器物的物理特征相融合,设计烙画图案时,除愉悦自身外,还需从市场角度出发,适应市场需求。如:在题材上,不仅要有传统的、吉祥的图案,还要结合社会热点话题、热点人物、热点事件进行题材的选择,让作品在不失传统的同时,拉近与社会、民众之间的距离,拉近传统文化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在多角度考量之下,选择合适的器物 and 题材进行烙画创新。

其次,在内容上要学会借鉴其他艺术种类,多观察、多思考。作为传统的绘画形式,烙画创作内容多为传统国画形式,讲究线条的工整及流畅,用笔细腻。但在继承传统绘画形式和技法基础上,烙画还可以借鉴篆刻、雕塑、油画、水彩之类不同效果的艺术创作形式,让传统与现代、传统与西方融合,创作出更多风格、题材的烙画作品。

最后,在材料上多做尝试。烙画从一开始在木板上烙刻,发展至今,出现了竹片烙画、宣纸烙画等更多形式,都是不断尝试和思考的结果。在烙画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传承人依旧应多尝试、多思考,寻

找更多烙画活态化传承的途径,除了借助宣纸上的肌理营造烙画氛围之外,还可以尝试自带肌理感的木桩、树皮等,探索是否也可以帮助实现烙画材料的创新,助力烙画存续发展。

4 结论

烙画,从承载于葫芦到锦帕,再到纸张,传承人用火笔绘出丹青,展示出高超的技能和精妙的想象力、创造力。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烙画技艺面临诸多挑战,烙画如何存续发展成为传承人及文化爱好者们当前深入思考的棘手问题。深思其发展困境、发展危机以及发展困局,发现烙画的存续发展,需要在人才培养、宣传、创新等方面下深功夫、做足准备、加大力度,可谓任重而道远。同理而言,传统文化保护是一项没有终点、持之以恒的文化事业,是需要大家戮力同心、共同承担的神圣职责。相信借助各个维度的发展策略,文化保护队伍将会逐渐扩大、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也将蓬勃发展,作为文化保护重要参与者的我们,也必将会积极践行国家的文化强国战略,让传统工艺在现代社会焕发生机与活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 [1] 陈达波,李姝,李虬. 田野调查是音乐研究的重要手段[J]. 音乐探索,2010(2):94-96.
- [2] 刘子冀. 烙画艺术研究[D]. 沈阳:沈阳大学,2021.
- [3] 赖远美. 以铁为笔,“烙”笔生花——非遗背景下烙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J]. 文化学刊,2024(6):63-66.
- [4] 王涛. 单位人才断层的形成原因与领导者的破局之策[J]. 领导科学论坛,2024(5):49-51.
- [5] 李姝嫒,聂娅青,田雨. 浅谈环境保护中政府的重要性[J]. 资源节约与环保,2015(4):88.
- [6] 金有惠,罗舒寒,周小林. 以火笔绘锦,助龙江振兴——新媒体时代非遗烙画意义非凡[J]. 中原文学,2024(39):27-29.
- (上接第91页)
- [2] 焦发存,张晔,张元春,等. 工程教育认证视域下化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研究[J]. 河南化工,2024,41(7):65-67.
- [3] 甘富万,陈立华,李雪芳,等. 新工科与OBE理念融合的课程改革与实践——以广西大学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为例[J]. 教育信息化论坛,2024(8):57-59.
- [4] 陈军,陈玉芳,陈广洲,等. 土建类高校GIS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J]. 现代职业教育,2021(31):126-128.
- [5] 蒋格格,范庆雯,肖尧,等. 新工科背景下交通工程导论课程体系创新探索[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24(5):62-64.
- [6] 陈鹏,于滨. 新工科背景下交通仿真课程教学探索与实践[J]. 教育教学论坛,2022(30):104-107.
- [7] 戴刚,蔡春丽,刘伟,等. 新工科背景下交通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模式与考核方式改革探讨[J]. 教育教学论坛,2020(29):129-130.
- [8] 邱欣,刘何音,童卫丰,等. 新工科背景下交通运输专业人才培养路径研究[J]. 教育教学论坛,2021(10):9-12.

20世纪50年代皖北民众积极参与治淮的精神价值

张 斌

(阜阳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摘 要:建国初期,淮河泛滥,皖北地区受灾严重。面对水患,党中央和皖北地方政府紧急开展救灾工作,社会各界团结一致、共克时艰,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参与治淮工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党中央,还是皖北行署,亦或是人民群众,都积极参与,发挥集体智慧,涌现出了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完美诠释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展现了治淮民众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艰苦奋斗和创新为引领的精神价值。

关键词:皖北地区;治理淮河;民众参与;精神价值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4-0122-07

The Spiritual Value of the People in Northern Anhui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Huaihe River Governance in the 1950s

ZHANG Bin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Anhui)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Huaihe river flooded, and Northern Anhui was seriously affected. In the face of flood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Northern Anhui urgently carried out disaster relief work,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united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and the people responded positively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Huaihe river regulation project. In this process, whether it i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 in Northern Anhui or the people, they all actively participated and exerted their collective wisdom, and a large number of advanced collectives and individuals emerged, which perfectly explained that the people are the creators of history and showed the spiritual value of the people in Huaihe river with patriotism as the core, collectivism as the principle and hard work and innovation as the guide.

Key words: Northern Anhui; harnessing the Huaihe river; public participation; spiritual value

淮河治理问题,其历史可追溯至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为歼灭宋军,金兵决堤黄河,至此淮河流域水患不断。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治理淮河,1950年,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皖北民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治淮工程,不仅改善了流域的水利条件,更在这一过程中孕育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治淮精神,开启了淮河保护治理的新纪元。70年来淮河治理取得了显著成就,关于治理淮河的相关研究已非常丰富,但深入

剖析治淮民众的内在精神,更能体现中国人民所独有的精神品质。

1 20世纪50年代皖北治淮工程概况

建国初期,淮河流域面临着严峻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发展的双重挑战。1949年夏,皖北发生特大水灾,至8月中旬,3000余万亩农田被淹,受灾人口达到800多万人^[1]。1949年秋季,该地区又连降暴雨,直至1950年2月,连绵不断的雨雪天气导致淮

收稿日期:2025-02-19

基金项目:阜阳师范大学省级科研平台能力提升计划项目(PT2021001)。

作者简介:张斌(1999-),男,陕西渭南人,硕士研究生。E-mail:1007314948@qq.com

河水位急剧上升,此次水灾致使全区遭受重灾的人口达到 525.67 万人,其中 450 余万人面临断炊的困境,其中因饥饿而致病死亡的人数超过 4700 人^[2]。1950 年夏,豫皖两省交界处又遭遇连续暴雨袭击,导致淮河水位暴涨,洪水泛滥成灾,对人民生活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害,农田被淹面积超过 4000 万亩,受灾民众数量高达 1300 万人以上^[3]。此后几年内,大大小小的洪涝灾害频发,而淮河中游(皖北段)之所以历年成灾,主要是“河小水大”“进大出小”“来急去缓”的缘故^{[4]59}。

为抗洪救灾,皖北各级地方政府迅速组织救灾活动。据记载,1949 年 11 月,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及各基层政府部门,包括各乡镇在内,都已经普遍建立了以政府为中心的生产救灾委员会,各界人士纷纷踊跃参加,县级及以上政府特别成立了生产救灾指挥部,该机构作为委员会的执行机构,由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同时担任指挥职务^{[5]1}。1950 年 9 月 15 日,皖北行署颁布《皖北各级生救治淮指挥机构试行组织条例(草案)》指出“皖北地区应自上而下贯彻统一指挥、集中领导的方针,在各同级政府的指导下,建立皖北各级生救治淮指挥机构,各级生救治淮指挥机构在各上级政府之领导即同级政府之指导下进行工作,并得接受各同级生救委员会的交办事项。指挥部下设各厅、部、处,分工办事,包括办公厅、政治部、工程处、生产处、救济处、民力动员处、财务处、供应处、卫生处和检察处。”^[6]皖北行署积极果断的决策,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生动诠释。

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毛泽东同志多次作出批示,强调必须采取根治措施,尽快制定并实施导淮计划,以避免未来的水患。中央政府相继调拨粮食超过 1 亿斤、盐 1000 余万斤、煤炭 52 万吨以及籽种贷款 350 亿元(旧币),以应对紧急赈灾需求^[3]。与此同时,水利部汇聚华东与中南两大区的水利部门、淮河水利工程管理总局以及河南、江苏、安徽三省的高层管理人员,经过周密而详尽的研判,确立了 1951 年度淮河治理工程的执行蓝图^{[4]1}。在治淮方针上,经过讨论,最终确定了“蓄泄兼筹”的策略:根据上游、中游和下游的不同情况进行综合治理;上游以蓄洪为主,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水道进行宣泄。

1950 年 10 月,治淮委员会成立,主持治淮工程,并对 1950 年冬至 1951 年春治淮工程实施做出指示,后编订《1951 年度治淮工程计划纲要》,开始实施第一期治淮工程。因农作与季节关系,第一期工程从 1951 年冬开始至 1951 年汛期前结束,即分

为冬修和春修两部分。1950 年 11 月,治理淮河第一期工程正式启动,动员了数以万计的民众参与,展现了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第一期治淮工程圆满完成后,毛泽东主席亲自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并由中央治淮慰问团转交给豫苏皖治淮指挥部,此举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积极投入治淮工程的热情。

1951 年 7 月,润河集分水闸工程竣工,一期工程结束。1951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10 日,水利部召开第二次治淮会议,拟定了《1952 年度治淮工程计划纲要》,明确指出以治淮工作为主,农田水利建设为辅,点线面结合,进行全面治理。1952 年度治淮工程,即二期工程,包括 1951 年的冬修和 1952 年的全年工程。皖北地区主要工程以修建水库、加固堤防、蓄洪、河道整理、修建涵闸、疏通航运等工程为主,主要包括建设淝河佛子岭水库、瓦埠湖蓄洪东淝河闸工程、濠河洼地蓄洪工程、花园湖蓄洪建闸工程、焦冈湖闸工程、东湖闸工程、老汪湖蓄洪建闸工程、老汪湖圈堤培修、润河集分水闸整修工程、滁潼河疏浚工程、滁潼河峰山护坡工程、泊冈引河工程、下草湾引河工程、沱河疏浚工程、安河疏浚工程、西淝河疏浚工程、赵王河疏浚工程、港河整理工程、奎河拖尾河疏浚工程、濠河疏浚工程、独山河与吴家沟疏浚工程、架河闸工程、新战沟闸工程、赵沟闸工程、润河集船闸工程、淮颍确保圈堤加高工程、寿县正南淮堤培修工程等^{[7]133-149}。

1952 年内涝发生,治淮难度加大,此时安徽省委与淮委共同推进治淮工作。1954 年,江淮地区又发生特大大水灾,安徽省 65 个县、市受灾,成灾面积 3977 万亩,成灾人口 1356 万人,粮食减产近 20 亿公斤、棉花 41 万担,倒塌房屋 404 万间^[8]。安徽各级政府和淮委进行紧急动员,上百万人民群众积极加入治淮队伍,但这次水灾仍然造成了很大损失,经过检讨,发现润河集分水闸工程一开始便存在隐患,且修缮不到位。事后淮委指出进湖闸静水池是因设计上的缺陷和错误而导致的冲毁;但在具体总结原因的过程中认为是因 1951 年有结余经费而在 1952 年上半年仓促施工,设计草率,加之“三反”运动,放松了试验工作,最终导致损失^[9]。在《1954 年淮河防汛工程报告》中,淮委作出深刻反思,认识到在治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此间治淮工程盲目贪多,存在严重保守思想,施工管理也存在问题。为加强治淮工作,淮委在《1954 年治淮工程施工总结》中指出,“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挖掘潜力,克服缺点,改进工作,提高施工管理水平,节省国家投资。”^[10]

此后,治淮工程每年按照计划如期进行,此间国家亦提供更多保障,1950—1954 年的五年间,国家共发放农村救灾救济款近 10 亿元^[11]。救济款的发放,为沿淮人民提供了生产生活中的保障,亦提高了人民参与治淮,以及治理好淮河的信心与决心。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至 1957 年冬季,淮河治理工程已基本竣工。国家在该项目上累计投入资金达 12.4 亿元人民币,成功治理了 175 条主要河道,兴建了 9 座水库,以及在 11 个湖泊洼地实施了蓄洪措施。此外,还加固了 4600 多公里的淮河干流及运河堤防,显著提升了区域的防洪和泄洪能力。

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皖北民众积极投入治淮一线,从 1950—1957 年,以修筑淮北大堤为主,实施了淮河干支流治理和主要支流堤防建设;先后兴建了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潭四座山谷水库;利用淮河两岸湖泊洼地,先后兴建城西湖、城东湖、濠河洼地和瓦埠湖四处蓄洪区^[12]。治淮工程的实施,既体现了皖北民众与国家共同面对挑战、战胜困难的决心,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缩影。

2 皖北民众的广泛响应与积极参与

人民的力量,是人民政府一切措施的基本力量^{[4]24}。在政府的号召与动员下,皖北地区民众展现出了极高的决心和热情,参与治淮人数逐年增加,治淮工程的进展也到了人民群众强有力的支持。他们积极参与到治淮工程中,不畏艰难,为治理淮河做出了突出贡献。

2.1 治淮动员与皖北民众的响应

建国初,皖北受灾最为严重的当属阜阳专区和宿县专区,但阜阳和宿县专区政府并未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动员民众参与治淮。1950 年 6 月,阜阳专区发布专员公署布告:“因阜阳春季受水灾、虫害影响,作物减收,入夏以来旱灾并未缓解,六月雨期又至,为抗旱救苗、挖沟排水、保证秋收起见,号召全区人民,立即紧急动员起来,组建互助组,修堤防洪,挖沟排水,同时也要发展副业生产,打破消极等待、听天由命思想。”^[13]宿县专区效仿,组织互助组来共度灾荒,在这样的号召下,众多先进分子积极投身其中,防洪排水工作有序进行。1950 年 10 月 20 日,皖北行署、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布了治淮动员令,要让广大民众认识到“做好工程为第一,治好淮河为自己,一时辛苦,子孙享福”的道理^[14]。1950 年 11 月,灾情得到控制,渡过了秋荒,人民群众参与生产自救热情高涨,参与治淮热情倍增^[15]。至

1957 年,皖北各级政府每年都会进行动员,组织民众参与治淮,随着动员工作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治淮工作的重要性,纷纷加入治淮大军。

皖北地区的治淮动员工作,主要以正面动员和侧面动员为主。正面动员主要包括:组建宣传网、将治淮与抗美援朝结合来激发民众爱国热情;侧面动员主要包括: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和劳动竞赛等。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政治动员、宣传教育和树立劳模等方式展开动员工作,随着动员工作的开展,以及治淮工程的顺利进行,皖北人民逐渐意识到治理淮河的重要性,明白了这项工程对于防洪减灾以及改善当地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

随着动员工作的深入,一大批治淮先进集体和个人涌现出来,这提高了整个治淮队伍的积极性。然而,积极主动参与治淮的民众实为少数,大多数民众大都缺乏积极性,被动参与治淮。皖北地区民众不愿参与治淮的主要顾虑有:怕走远挖内河;部分村干部怕后方生产救灾任务繁重麻烦;怕工资报酬少;怕上河工去,家里牛被土匪抢走,等。除此之外,治淮工作还面临很大困难,主要有:轻灾区工具容易配给而民工工作难;重灾区民工工作容易而工具工棚难以配给充足;人心不齐且难以组织;挖河虽然好但是家里生活难^[16]。

不难看出,皖北民众对参与治淮并非是不情愿,而是存在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淮委和地方政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积极组织民众动员工作,逐步组建起以村为单位的宣传网,组织宣传员积极宣传,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开展;同时将群众融入宣传员队伍,组织生产自救,即加强了组织建设,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经过宣传动员,大量人民群众投身治淮一线,为确保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并促进治淮工程的顺利进行,皖北行署结合救灾,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缓解民众生活困难问题。比如对于治淮工地上的民工,按照当时规定,“每个民工挑一公方土可得三斤半原粮(市斤),难方(挑取一公方土比较困难的)、远方(挑取一公方土比较远的)最多不超过五市斤,雨病工每人每天津贴小麦三市斤。”^[17]皖北行署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将以工程为主,保证完成工程标准的思想,贯彻到了广大群众中去^[18],为民众参与治淮提供了基本保障。

在皖北民众的积极参与下,润河集分水闸工程顺利竣工,标志着治淮一期工程结束。曾希圣曾认为这样巨大的工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用了一百天左右的时间就顺利竣工,而国民党统治时期

的泾渭渠渠首工程却用了两年以上的时间,可见治淮一期工程顺利竣工大大提高了全体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对于自己建设工程坚强的信心^{[4]218}。1952 年治淮扩大会议更是指出“要善用群众积极的一面去教育说服落后的一面。”^[19]此后在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人民群众对于治淮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有了质的转变,从少数人的积极参与转变成为了多数人的积极参与,治淮工程得到了大力支持。

整个治淮工程动员民众数百万,这些民众参与修筑的淮河堤坝、水库,以及整治的河道和开挖的新渠都对皖北的水利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治淮工程持续进行,至 1957 年,每年都有大量的民众积极主动参与到治淮工作中,为治淮工程的顺利开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2 皖北民众治淮的先进事迹与贡献

淮河流域发生水患灾害之后,皖北各地民众发扬团结互助精神、强帮弱,有帮无,仅阜阳专区当年就建立了 2000 多个临时和常年互助组^[20]。其他地区也是这样,互助组的建立是为了更好地度过灾荒,皖北民众发扬互帮互助精神,更是积极投身、自发参与治淮。1951 年冬,爱国主义教育在皖北地区得到了深入地开展,治淮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广大民众对治淮工作充满了信心和决心,他们在一线的治淮工作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

首先,在治淮一线,党团员和劳模积极分子在工作中起到了鼓舞和核心的作用,使得治淮动员任务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完成,同时也在治淮队伍中树立起了榜样。如在临泉县组织的动员会议上,城关区党员韦金明率先报告了自己的治淮决心,表明了坚决治好淮河的态度,激励了其他民工,使得五个民工主动报名上堤参与治淮工作^[21]。阜阳支援六安治淮的工作人员李怀仁,也是一典型代表。他时常工作到深夜;在民工渡河过程中,积极照顾每一位民工,直到所有民工都安全渡河后,他才摸黑渡河;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他甚至冒着风雪前往朱寨区,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治淮工作,他的事迹鼓舞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也带动了更多的人参与到动员工作中来^[22]。此外,阜阳一等模范王登高,为了工作任劳任怨,不辞劳苦地踏雪冒雨前往核销部门进行核对报账,工作主动、克服困难的精神,激励着大批民众参与到治淮工程之中^[23];王市区特等治淮模范朱纯修在面对挖河难挖的情形时,更是自己脱鞋亲自下水去挖,提高了民工挖河情绪^[24];而凤台县治淮特等模范程兴明更是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作为农会主任,他首先报名带民工上堤,积极稳定民工情绪,

在完成支援任务的同时也超额完成自己的任务^[25]。

1951 年 12 月 28 日寒流来袭,皖北地区气温骤降,但皖北治淮工地的百万民工,为了完成水利建设,都艰苦而英勇的坚持工作^[26]。寒流并未影响治淮民众的斗志,治淮工作仍然井井有条地进行。党团员等先进个人在治淮工作开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通过自身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有效地将党的号召转化为民众的自觉行动。像这样无私奉献的先进分子比比皆是,治淮工程在他们的带领与鼓舞下一路高歌猛进。

除各男同志劳动模范外,妇女劳模也是治淮工程的中流砥柱。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蚌埠郊区^①的甘彩华,她组织了 14 个姐妹,其中三位已经 40 岁,两位才 17 岁,背了竹筐拿了箕就在八大集村报名参加治淮工作,有些男工还不及他们。冬天甘彩华赤脚下河做工,大家也随着一起,脚都冻肿了,仍然照常工作。1951 年 4 月 25 日,华东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广播大会在上海举行,甘彩华赴沪参加,这次是她再度上堤从淮河边直接来沪的。她说:“开了会我就要回去,淮河不治好,我就睡不稳!”^[27]再比如阜阳的李秀英,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请缨参与治淮工程,不仅自己参与,还带领由 26 名姐妹组成的“女子突击队”投身于润河集蓄洪闸的修建工作。在治淮工地上,李秀英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出色的工作表现成为了劳动模范。她的事迹在工地广播站被广泛宣传,成为治淮工地上人人皆知的先进典型,她曾因劳累过度而累倒在工地,但依然坚持工作,从未旷工。其事迹和精神激励了更多的人投身于治淮工作。李秀英的工作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她被评为“特级治淮劳模”和“治淮一等功臣”。还有泗县治淮总队民工分队的队长金秀兰,积极团结群众,战胜各种困难,在她的带领下 1951 年春提前 38 天完成了任务,并突击了 7 个工段^[28]。同样作为治淮模范的收方员房文秀,发现硬土工程效率低下,普通民工情绪低落;于是,组织召开了一次民工大会,提出了“三不闲”(抬不闲、挖不闲、除不闲)的口号,推动了工作的顺利进展,并且带动了周围民工的积极参与^[29]。甘彩华、李秀英等人只是众多优秀治淮民工的一员,皖北治淮工地上还有着大批的先进个人。

劳动模范以其实际行动为治淮贡献自身力量,成为了治淮工程中的旗帜和标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不畏艰难、勇于奉献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参与治淮民众的士气。1951 年春,为了进一步推进和加强治淮工作,皖北地区举行了地县两级的庆功表彰大

会^[30],表彰在治淮工作中表现出色的劳动模范,以激励更多的人积极参与其中。各地县的劳动模范们在会议上分享各自经验,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通过开展劳模评选活动,表彰在治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952 年国庆,毛主席在北京设宴招待治淮劳动模范,这是治淮劳动模范最大的光荣,这是对劳动模范的肯定,也是其继续发扬优秀精神的动力^[31]。

劳动模范在治淮工作开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将自身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有效地将党的号召转化为民众的自觉行动。党员和团员劳模在治淮过程中身先士卒,积极发挥带头作用,得到广大民工的拥护,并有很多人被推选为民工干部,这种组织动员能力对治淮工程的推进至关重要。

除劳模个人的带头作用之外,皖北民众在治淮工程中的具体行动与贡献,还体现在他们对工作方法的改进和创新上。面对治淮工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挑战,皖北民众并没有退缩,而是积极思考、勇于创新。1951 年 10 月 23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项工作报告的决议》中提出:“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32]1952 年治淮工地也大力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治淮民工积极参与,治淮工地面貌一新,极大地推动了治淮工程的进展,参与治淮的民众更是能积极“想点子、找窍门、挖潜力”^[33]。而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皖北怀远县新民村治淮民工祝怀顺所在的小队。1951 年冬,怀远治淮总队远征淞潼河疏浚工程,而祝怀顺小队则是此工程中的一个模范小队,小队长祝怀顺是个青年团员,小队共 20 个民工,其中青年 9 人,壮年 7 人,40 至 50 岁的 4 人;在 1951 年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前,祝怀顺小队是全中队较落后的一个小队,增产节约运动开展起来后,逐渐成为当时中队效率最高的一个小队^[34]。他们的这种创新精神,既为治淮工程的成功贡献了力量,也为后来的治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祝怀顺小队工作效率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主要是在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后,祝怀顺积极参加各种会议学习,自身学习之后更是向队内成员传授心得,多次召开小队会议,强调要“算增产,看好处,找原因,下决心”,让大家深刻意识到治淮是为自己,更是为了国家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小队民工不断努力,创造出高效的工作方法,如“学办法、想点子、连三锹、用稀泥”等。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就召开“想点子”会,先后想出了“抓钩刨淤沙层土”、“挖淌沙,下锹轻,向前推,端锹不猛”等办法,并成立技

术研究小组,遇到困难,召开技术研究会议,化繁为简。祝怀顺小队的工作方法总结起来就是“力求劳动组合的合理,不浪费一个工;随时改进操作方法,节省人力与操作空间;劳动有计划、有制度。”^[34]

随后祝怀顺小队工作法在各地得到大力推广,各地都以此为模范进行学习,吸取先进经验,召开干部会、民工代表会,深入地在党内、团内、民工小组内进行贯彻。在这样的号召下,劳模金秀兰也不甘落后,领导全分队民工创造了“分排挖土,锹锨互配,行路分开”的办法,工作效率提高了 20%,又创造了合理的“平土法”和“节省烧草”等多种办法^[28]。此外,马长春小队在克服困难的基础上创造了“隔空轮错倒土法”、“三面挖沟,中心干”和“用泥赶水”的挖龙沟法;永城张振业小队在学习过程中结合结束工程提出“五步走”口号:不全部完工不走,不合标准不走,不集体不走等;同时还有濉溪仲言水民工小队和阜阳刘凤英民工小队的“借土还土法”,张世珍小队创造的“大方塘套小方塘”的办法^[35]。在劳模的示范和引领下,一批又一批高效的工作小队和创新的工作方法涌现出来。这些工作小队和方法在治淮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推动了工程的进展。他们的出色表现不仅展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而且彰显了皖北民众在面对重大任务时的团结协作和顽强拼搏的集体精神。

随着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和劳动竞赛的开展,至 1952 年底,仅在土方及砌石工程方面,阜阳专区共动员 46 万多民工,宿县专区共动员 57 万多民工,六安专区共动员 5.6 万余人,滁县专区共动员 1.1 万余人,淮南和蚌埠动员 6793 人^{[8]256}。到 1953 年初,上中下游参与人数已达 156 万余人,约占各地区治淮民众总数的 73%,在各地竞赛运动中共涌现出了 35580 名模范人物和 3536 个模范单位,学习和创造了 192 种先进经验,使整个工程的平均劳动效率比第一年度提高了近一倍^[36]。此后至 1957 年,高效的工作方法不断被创造运用,治淮工程效率有序提升。

显而易见,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对于推动治淮工程的进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极大地确保了广大民众对治淮工程的积极参与,高效工作方法的创造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劳动竞赛等活动还促进了先进工作经验和方法的推广与传播,使得更多的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以及其他先进工作方法得以涌现。20 世纪 50 年代,皖北地区民众积极参与淮河治理,他们每个人都是英雄,每个人都是共和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璀璨明珠。总而言之,皖北

民众的积极响应,不仅解决了治淮过程人手不够的问题,还极大地提升了工程的进展速度,展现了人民群众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巨大贡献。

3 皖北民众治淮精神的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淮河水患自宋以来,对沿淮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历代对淮河的治理都并未有显著成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发挥全党全社会的力量,发出根治淮河的号召,沿淮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多年的淮河治理形成了“人民至上、系统治理,求实创新、团结奉献、艰苦奋斗”的治淮精神^[37]。这是关于治淮精神的总体表述,而对于参与治淮的民众而言,更多的体现的是求实创新、团结奉献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

皖北地区作为淮河泛滥的重灾区,实行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措施,广大人民更是积极响应号召投入治淮,发动人民智慧,建立互助组,在治淮前线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无私奉献的治淮模范。这一过程能进展得有条不紊,总结起来就是治淮工程中所展现出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爱国主义、以团结奉献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以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创新主义所发挥的作用,其中爱国主义是民众治淮精神的核心,集体主义是原则,艰苦奋斗与创新是引领,这些精神共同构成了皖北治淮一线民众积极参与治淮的精神内涵,而这一精神内核的具体体现如下。

首先,以集体主义为原则是皖北民众积极参与治淮精神价值的重要体现。在党中央的号召下,皖北民众积极响应,面对淮河水患带来的严峻挑战,他们团结一致,共克时艰,展现了深厚的家国情怀,面对无情的灾害,在党的领导下,各地纷纷开展生产自救,建立互助组,将损失降到最小,而在治淮工地,更是建立基层党支部,加强对前线治淮工作的指导。中共阜阳县治淮委员曾对工地党支部工作计划做出如下指示:“一、迅速建立组织,依照党章规定九三个党员以上可成立支部,推选一个支书,七个人以上即可选举支委三人,直接大队党委领导,再看党员多少划分小组。二、建立生活制度,七天一次小组会,十天一次执委会,半月一次支部党员大会。”^[38]不难看出,治淮工作的顺利开展是离不开集体主义精神的,一个人的力量是一条细线,而一群人的力量则是一股绳,团结的集体是治淮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

其次,以艰苦奋斗和创新为引领是皖北民众积极参与治淮精神价值的生动诠释。在治淮动员之下,皖北民众积极响应,不仅克服了物资匮乏和技术

限制的问题,还通过劳动竞赛和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创新工作方法,提高了工作效率。如祝怀顺小队工作法,体现了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奋斗精神。此外,劳动模范如李秀英、金秀兰、朱纯修等人的先进事迹,激励了更多人投身治淮,他们身先士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榜样的力量,有效动员了广大民众参与其中,促进了治淮工程的顺利进行。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甘于奉献自己的力量,在治淮工程中,他们面对艰苦的环境和繁重的工作,展现出了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高度的责任感。同时,民工们相互支持、共同协作,形成了强大的集体力量,共同克服了各种困难,为治淮工程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无论是集体主义还是艰苦奋斗和勇于创新精神,都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真实写照。治淮民众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多个方面。他们积极参与治淮工程,不畏艰难险阻,展现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他们以各种形式支持治淮工作,如捐款捐物,体现了对国家发展的无私奉献;治淮民众在面对自然灾害时,团结互助,共克时艰,彰显了集体团结和集体主义精神。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进展中,这种存在于治淮民众间的精神内涵得以发扬,确保了这种爱国情怀得以延续。总之,治淮民众的爱国精神是通过实际行动和精神传承来体现的,同样也是其精神价值的核心体现。

总之,皖北治淮民众身上所体现的是一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艰苦奋斗和创新为引领的民众治淮精神是对皖北民众参与治淮功绩的生动诠释。这些精神价值既是治淮工程成功的基石,也为当代社会水利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启示,鼓励当代水利人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保持团结、创新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共同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4 结论

20 世纪 50 年代皖北地区民众参与治淮不仅是治淮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遗产。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至 1957 年,治淮工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改善了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更在民众心中种下了集体主义、艰苦奋斗、创新和爱国主义的种子。这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艰苦奋斗和创新为引领的民众治淮精神,这些精神价值在当时推动了治淮工程顺利开展,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皖北民众在治淮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是建国初期群众动员工作的生动诠释,也是广大民众积极治淮的

真实写照。皖北民众用行动证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因此,皖北民众治淮精神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未来的指引,它将永远激励着更多的水利工作者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国家水利建设事业。

注释:

- ① 甘彩华具体籍贯为蚌埠市郊区曹老集乡李甘村(现属蚌埠市淮上区曹老集镇),家住淮河北岸的吴小街镇八大集大队(今属淮上区),这里北临北淝河、南靠淮河,解放前常受洪涝灾害侵扰。

参考文献:

- [1] 李伯星,唐涌源. 新中国治淮纪略[M]. 合肥:黄山书社,1995:16.
- [2] 陆勤毅,李修松. 安徽通史[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92.
- [3] 为根治淮河而斗争[N]. 人民日报,1950-10-15(1).
- [4] 治淮委员会. 治淮汇刊:第一辑[M]. 蚌埠:治淮委员会,1951.
- [5]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徽省志·民政志[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166.
- [6] 皖北各级生救指挥机构试行组织条例(草案)[Z]. 阜阳市档案馆藏. 卷宗号 J054-0003-0003.
- [7] 治淮委员会. 治淮汇刊:第二辑[M]. 蚌埠:治淮委员会,1952.
- [8] 李文. 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38.
- [9] 刘奇,时春晨,司学龙. 王家坝[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57.
- [10] 治淮委员会. 治淮汇刊:第四辑[M]. 蚌埠:治淮委员会,1954:348.
- [11]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 当代中国的民政(下)[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84.
- [12]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徽省志·水利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21.
- [13] 皖北阜阳行政区专员公署布告[Z]. 阜阳市档案馆藏. 卷宗号 J040-0003-0006.
- [14] 皖北治淮动员令[Z]. 阜阳市档案馆藏. 卷宗号 J056-0001-0021.
- [15] 通报九八期·大同乡西湖亭通过算细账调配劳动力做到生救治淮两不误[Z]. 阜阳市档案馆藏. 卷宗号 X001-0004-0017.
- [16] 通报第九十六期·紧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决心根治淮患完成生救战胜灾荒而斗争[Z]. 阜阳市档案馆藏. 卷宗号 X001-0004-0015.
- [17] 皖北淮河干堤冬修工程计划[N]. 皖北日报,1949-12-11(2).
- [18] 地委关于坚决贯彻皖北治淮动员令做好治淮工作的指示[Z]. 阜阳市档案馆藏. 卷宗号 J001-0004-0009.
- [19] 治淮扩大会议的报告[Z]. 阜阳市档案馆藏. 卷宗号 J054-0002-0001.
- [20] 阜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阜阳县志[M]. 合肥:黄山书社,1994:302.
- [21] 阜阳专区一九五二年春治淮政治工作总结报告[Z]. 阜阳市档案馆藏. 卷宗号 J054-0004-0008.
- [22] 阜阳支援六安治淮工作人员(收方员)李怀仁的模范事迹[Z]. 阜阳市档案馆藏. 卷宗号 X046-0002-0025.
- [23] 阜阳县生救治淮总队部财供科治淮模范事迹一等模范王登高[Z]. 阜阳市档案馆藏. 卷宗号 X046-0002-0022.
- [24] 王市区治淮干部特等模范朱纯修模范事迹[Z]. 阜阳市档案馆藏. 卷宗号 X046-0002-0051.
- [25] 廖承祖. 访问劳动模范程兴明[J]. 治淮,1952(3):22-23.
- [26] 君徽. 风雪中的治淮民工(下)[N]. 亦报,1952-1-19(2).
- [27] 端木洪. 治淮功臣——甘彩华[N]. 亦报,1951-4-25(1).
- [28] 治淮女劳模金秀兰[J]. 人民水利,1952(1):87.
- [29] 收方员房文秀治淮干部模范事迹[Z]. 阜阳市档案馆藏. 卷宗号 X046-0002-0020.
- [30] 为总结生救治淮工作·专区预于五月召开劳模庆功大会[Z]. 阜阳市档案馆藏. 卷宗号 J054-0001-0008.
- [31] 东庄. 这是淮河人民的荣誉——治淮劳动模范国庆祝礼代表在北京[J]. 治淮,1952(7):20-23.
- [32]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 历史的丰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经济卷[M]. 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12-114.
- [33] 治淮委员会政治部. 治淮委员会政治部关于今冬明春在治淮土方工程中展开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的计划[J]. 治淮,1952(8):1.
- [34] 祝怀顺小队工作方法总结小组. 治淮民工祝怀顺小队工作法总结[J]. 治淮,1952(4):1-4.
- [35] 以祝怀顺小队工作法做榜样各地的劳动单位创造再创造[J]. 治淮,1952(4):6.
- [36] 进一步开展民工中的爱国增产竞赛运动[J]. 治淮,1952(9):16.
- [37]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 治淮精神阐释系统治理[J]. 治淮,2024(5):2-3.
- [38] 中共阜阳县治淮委员会对工地党支部工作计划[Z]. 阜阳市档案馆藏. 卷宗号 X014-0004-0036.

蚌埠学院学报

(综合类双月刊)

编辑委员会

主 任:陈国龙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艳春	韦文联	吕效华	朱兰保	朱家席	邬旭东
刘春景	许 晖	孙兰萍	孙西超	孙艳辉	李大胜
李文瑛	李宗群	吴长法	何 蕾	张茂林	陈发来
陈国龙	陈恩红	武 杰	郑晓奋	胡 飞	赵东勇
袁 飞	郭有强	黄迎辉	崔执树	魏天路	

主 编:陈国龙

副 主 编:郭有强 邬旭东 朱家席

目 次

党的二十大理论创新与实践·思政理论研究

-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发展进路研究 魏雪梅(1)
-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 王万春,高莉(7)
- 思政元素融入育人载体的创新实践探索
——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 侯芳,沈琪(12)

文学理论与新闻传播

- 概念隐喻理论视角下《诗经》中水隐喻认知分析研究 范敏,郭嵘(17)
- 论《金瓶梅词话》的近代性 赵献涛(21)
- 歌人生百态而尽精微
——论杜甫诗中之“歌” 徐 阳(26)

艺术创作与设计

- 新质生产力赋能徽州版画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探究 江明荟(34)
- 阿梅代奥·莫迪里阿尼作品的原始主义特征 汪臻,张璐瑶(40)

乡村振兴·区域经济建设与管理

-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特征、内在缺陷及改革路径 陆彦,张子涵,张翔硕(44)
- 基于三阶段 DEA-Malmquist 和 RSR 法的我国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探析
..... 郭凌霄,魏骅,陶群山(52)

外国语言研究

- 中国蒙学典籍英译中的文化自信
——以《三字经》及其英译为例 杜若凡(59)

《内经·素问》首部英译本副文本功能钩沉拾遗 郑鸿桥(67)

论《围城》隐喻英译的体认概称性 张雪莉,张凌(74)

高等教育与教学

后方法视域下大学英语复杂语法教学研究

——以关系从句为例 胡靓(79)

新工科背景下交通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以安徽建筑大学为例 黄坤,张宁,石贤增,等(86)

辅导员工作视角下的高校美育与思政融合创新 许卓佳,翟天然(92)

综合研究

PPP 物有所值立法问题研究 戴传利(97)

美国社区书店经营策略创新与实践 齐振伦,刘苏(105)

淮河文化研究

叙事学场景下泗县皮影戏非遗文化与文创设计研究 肖帅(111)

田野调查视域下蚌埠市非遗烙画的存续发展研究 汪二董,吴衍发(116)

20 世纪 50 年代皖北民众积极参与治淮的精神价值 张斌(122)

Journal of Bengbu University

Vol. 14, No. 4, Sum. No. 82, 2025

Main Contents

- Cultural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I Xuemei(1)
- The Practical Path of Integrating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Civics Clas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Wanchun, GAO Li(7)
- Innovative Practices of Integrating Civic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Nurture Careers Taking *NeZha: Mo Tong Nao Hai* as an Example HOU Fang, SHEN Qi(12)
- Water Metaphors in *Shij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FAN Min, GUO Rong(17)
- On the Modernity of *Jinpingmei Cihua* Zhao Xiantao(21)
- Singing Life is Full of Various Forms and Subtleties——On the “Song” in Du Fu’s Poetry XU Yang(26)
-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 of Huizhou Print Empowered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JIANG Minghui(34)
- The Primitivist Characteristics of Amedeo Modigliani’s Artworks WANG Zhen, ZHANG Luyao(40)
- Characteristics, Inherent Defects and Reform Paths under th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China LU Yan, ZHANG Zihan, ZHANG Xiangshuo(44)
-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Primer Classics: by the *Sanzijing*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s DU Ruofan(59)
- Supplement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Paratext in the First English Version of *Neijing Suwen* ZHENG Hongqiao(67)
- Complex Grammar Teaching in College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ethod Taking Relative Clauses as an Example Hu Liang(79)
-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raffic Engineering Specialty under the New Engineering: Taking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HUANG Kun, ZHANG Ning, SHI Xianzeng, et al(86)
- Innov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nselors XU Zhuojia, ZHAI Tianran(92)
- Research on the Legislation of PPP Value for Money DAI Chuanli(97)
-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Business Strategies for Community Booksto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QI Zhenlun, LIU Su(105)
-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Sixian Shadow Puppetry and Cultural Creative Design in the Context of Narratology XIAO Shuai(111)
- Research on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aintings in Bengbu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Investigation Wang Er-Dong, Wu YanFa(116)